中國現代史叢書 5

張玉法 主編

西安事變新探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楊奎松著



東大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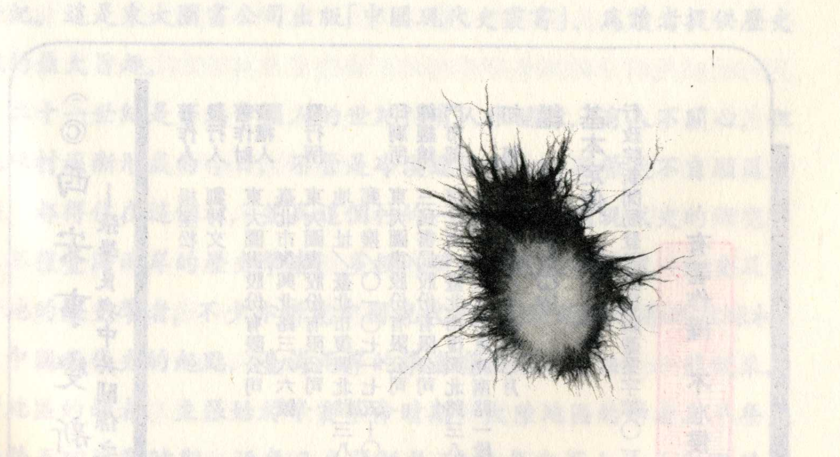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史叢書 5

張玉法 主編

西安事變新探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楊奎松 著



東大圖書公司

tad)博士和俄國社會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舍維廖夫(Konstantin V. Schevelyoff)教授。由於章斯塔博士的幫助，使我有機會前往莫斯科查閱有關文獻；而舍維廖夫教授則幫助我克服了我在閱讀資料方面所遇到的許多語言上的困難。

楊奎松
1995年5月於北京翠微園

西安事變新探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目　次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曾千方百計地把紅軍從中國南方地區趕走，紅軍能夠在中國南部或西南地區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區去；如果蔣當時調去西北剿共的不是東北軍，而是中央軍；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產國際召開了轉變統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沒有及時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繼續他們過去那種視一切國民黨上層勢力爲仇讎的作法，那麼，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

可是，反過來，只要蔣介石當時的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先統一後禦侮，只要這一政策意味著必須暫時犧牲中國東北等地以及相當一部分地方勢力，蔣就很難不用張學良的東北軍來剿共，張學良也很難不對蔣的這一政策逐漸產生反感。而只要中共改變了早先的政策，它就必定會注意到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這種矛盾，一旦它注意到了這種矛盾，西安事變或者其他什麼更嚴重的事變的發生，也就成了一件難以避免的事情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複雜和矛盾。

問題是，不管西安事變的發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過上面所舉的邏輯與事實，就不難得出結論，即西安事變不僅僅是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事情，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響並有中共的

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談論西安事變，就不能不談論中共，就不能不注意中共對張學良和蔣介石的政策及其變化。而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張學良走向西安事變的所有步驟，都是從他和紅軍在陝北接觸以後開始的。所以說，眞正想直接切入西安事變的史實，只要說明中共爲什麼到西北來，又爲什麼對張學良發生興趣，並成功地施以統戰工作就可以了。

中共和紅軍爲什麼會到西北來呢？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爲，中共和紅軍一步步從比較富庶的中國南方退向貧瘠荒蕪的西北地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蔣介石基於安內攘外政策，必欲消滅紅軍，至少也是要把紅軍趕出中國心臟地帶，因此其頻頻圍剿和進攻，弄得力量本來就弱小的紅軍越來越難以在南方安身。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當時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這也就是說，即使那個時候中共與張學良有所接觸，事情也搞不成後來那個樣子。因爲，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和紅軍至少曾經有過兩次十分類似的機會可以和國民黨反蔣派結成較大規模的反蔣聯盟，結果卻一事無成。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三三年，馮玉祥在共產黨的推動下發起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員遠比後來張學良在西北時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微晚些時候，即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十九路軍將領揭旗反蔣和發動「福建人民政府」，那時與之毗鄰的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和紅軍曾經與之成立了同樣的反蔣協定。但這兩次機會都沒有抓住。因爲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主張堅持涇渭分明的階級路線，反對與國民黨任何上層人物建立眞誠的統戰關係，只想暫時利用這些上層人物來奪取他們的軍隊。結果，不僅這些反蔣派被蔣介石的中央軍各個擊破，中共紅軍也因孤立無援而無法繼續在南方各個根據地立足，最後損兵折將，不得不開始了後

人所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固然是中共以前政策、觀念及其軍事路線諸多錯誤的結果，但它恰恰是我們了解西安事變來龍去脈的必要出發點。這是因爲，導致西安事變的一切主觀和客觀條件都是從長征開始生長起來的。表面看起來，長征以後的國共力量對比越來越對中共不利，紅軍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可正是由於中共爲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尋求蘇聯幫助，得到共產國際關於改變統戰政策的指示，又恰巧與因急於抗日而對蔣心存不滿的張學良東北軍相逢，結果兩相結合，終於造成了石破天驚的大舉動，迫使看上去已經勝券在握的蔣介石最終放棄了安內攘外政策，歷史的天秤由此竟漸漸轉向了有利於共產黨的一邊。由此可見，談論西安事變，確實應該了解紅軍是怎樣來到西北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蘇區，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事情。當時，在經過多年的鏖戰之後，勢力越來越強大的南京國民黨集團終於占領了共產黨在中國南方的最後一塊根據地，迫使共產黨的軍隊從此遠離中國的心臟地區，向西南偏遠地區轉移。

不過，率先退向中國西南地區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領導的中國紅軍第四方面軍。共產黨的這支軍隊原先經營著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塊重要根據地，北臨淮河，西抵京漢鐵路，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但該部還在一九三二年就因反「圍剿」戰爭失敗而輾轉退入四川北部地區，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據地。幾乎同時退向西南地區的是曾經經營著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第三軍，它在被迫離開湘鄂西之後，轉戰將近兩年之久，終於也在貴州東部建立起一塊根據地。隨後進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經長期堅持湘贛邊根據地的紅軍第六軍團，它於一九三四年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實行西征，一方面爲中央紅軍向西退卻探索道路，另一方面準備會合紅三軍後回師接應中

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所謂西南地區，主要指的是雲、貴、滇、川、康五省區。這一帶不僅山多路險、交通不便，而且多數地區物質條件差，少數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以至近代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幾乎都不能在這裡實行有效的統治。紅軍之所以紛紛退向西南地區，同樣是注意到這樣一些條件。既然在靠近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中再也無法堅持下去，而國民黨南京政府這時又同歷屆中央政府一樣，尙無迅速實現一統天下之能力，到遠離南京政府統治圈以外的地區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紅軍實力的一種好辦法。

其實，早在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就已經注意到，中國紅軍應當往中國的西南方向去。只不過，他認爲，紅軍應當找到一塊遠離中國心臟地區，同時物質及人力資源充足的地區來做爲自己的戰略根據地，據此向外發展。因此，他看重的是中國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過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應當注意中國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一九三三年三月，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的指示當中，又一次明確肯定了向四川發展的方向是正確的，聲稱：「我們對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的評價是肯定的」❶。

四川地處西南，四面環山，其中心卻是一塊大約六千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衆多，物產豐富，向有「天府之國」的說法。由於這裡與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嶺與大巴山讓人望而生畏的險關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險灘的滾滾長江，因此一旦占領了四川，不僅進可攻、退可守，而且因遠離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於戰爭之中，紅軍的生存發展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中共畢竟在四川的力量很少，影響甚微，而紅軍又過於分散，戰事不斷，爲保衛原有的各個根據地自顧尙且不暇，哪有力量向西南四川發展呢？更主要的是，在中共中央衆多領導人看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在於奪取那些位於中國最富庶地區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大中城市，而遠去西南，就意味著遠離中國革命的中心，在政治上難免有退縮逃跑之嫌。因此，即使中央紅軍被迫決定退出江西蘇區，轉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東的湘西山區，並沒有長驅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個多月之後，即經過十一月西渡湘江的戰役之後，八萬中央紅軍一戰竟只剩下不足四萬人，西去湘西會合由黔東東來的紅軍第二、六軍團已無可能，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向川黔邊發展，由此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認爲，無論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❷。

退向西南，本來就是逼不得已之舉，因此是否繼續西去，其實並不取決於紅軍本身的願望如何，而要看國民黨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過去兵不及西南無非囿於二因：一是中心地區尙未鞏固，戰事頻仍，無多兵可調；二是西南各省軍閥名義上均已歸順南京，師出無名。如今，中心地區基本統一，紅軍又大擧西去，正好給了國民黨中央軍尾隨西進的機會。結果，不僅便利了蔣介石南京政府借機統一中國西南地區，而且熟悉紅軍作戰的國民黨中央軍與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軍隊合爲一氣，使中央紅軍更處於絕對劣勢，幾乎無以立足。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首先決定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進至遵義後，因受國民黨軍四面包圍，根據一月中旬遵義會議決定改向四川西北部，與川北的紅軍第四方面軍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半個月後，即二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再度「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即決定進一步「以川滇黔邊境爲發展地區」❸。三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棄川滇黔邊計劃，準備堅持黔北地區，進一步「赤化全

貴州」。而一個多月後，即四月下旬，黔北難以立足，紅軍轉進雲南東北部，遂又決定在雲南東北地區「消滅敵人取得新的發展局面」❹。但此令發出僅幾天之後，紅軍又被迫於四月底離開雲南東北地區，橫渡金沙江，再入四川，決心「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❺。而中央紅軍入川北上強渡大渡河後，很快發現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很少可能，遂與由川北根據地西來的第四方面軍會合，於六月下旬召開兩河口會議，決定主力進入甘肅南部地區，努力「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❻。可是這樣一來，紅軍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區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就全然改變了。

很明顯，紅軍轉進西南地區，在貴州、四川及其周圍地區長途跋涉、東奔西突，軍事上固然機動靈活，實際上卻仍舊是逼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隊長期處於游擊狀態，沒有根據地，是極端危險的。因此，他們始終在要求部隊爲創造新的根據地而戰，但每一次這樣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總結起來，紅軍在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努力的失敗，根本上不外兩個原因，一是敵人力量較強；二是群衆基礎薄弱。這是因爲，西南雖然偏遠卻仍舊是人口密集地區，地方軍閥各霸一方，養兵甚多，除貴州軍隊不大能打以外，川軍、滇軍都有一定戰鬥力，加上蔣介石刻意經營西南，派遣大軍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軍閥聯合起來，異常積極地對紅軍作戰，從而使紅軍幾乎處於無日不戰，無處不戰的困難境地。與此同時，紅軍因兵力有限，非戰鬥人員較多，又因長途征戰損失不斷，補充困難，戰鬥力減弱，自不能不避實就虛，盡力避免與強敵決戰。因此，紅軍只好轉戰於川黔滇三省交界處和四川西部這些高原山區，力圖在敵人力量薄弱之處尋找立足點。可是這些地區之群衆，往往又以少數民族居多，民情方言處處隔膜，再加上這些地區少數民族與漢族民族關係一向較爲緊張，

紅軍不僅立足困難，而且給養、兵源完全不能解決。中共中央很快就開始承認：「我們過去對於少數民族不大清楚，現在經過許多少數民族的地區是清楚了」，要在這些地區建立根據地根本沒有可能。結果，中共中央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決定西征進入西南地區創造根據地，在雲貴川轉戰半年之久，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六月決定改變西征的方針，開始考慮實行北上甘南，以便進一步「背靠甘（肅）青（海）新（疆）寧（夏）四省的廣大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新方針了。

關於紅軍北上方針的提出，在張國燾《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

> 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❼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張所回憶的內容與目前中共保存的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並非由毛澤東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毛在江西中央蘇區期間曾倍受排擠，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間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才當選爲中央常委，開始參預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工作。三月以後更成爲中共中央軍事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成員

之一，並擔任了紅軍前敵政治委員一職。因此，在實際上，可以說毛澤東這時在軍事上確實大權在握。不過，這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完全改變遵義會議的規定，黨內在軍事上負總責者，名義上還是周恩來。因此，至少在這次會議上作軍事報告的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者是這時實際上充任總書記的洛甫(即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張國燾在回憶如此不準確的情況下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懷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的行動方向表明他們並沒有執行這樣一個指示的任何計劃，在上述中央紅軍一度所爭取過的重新建立根據地的目標中，有川黔邊、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東北、川西，卻絲毫沒有向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影子❽。

北上的方針毫無疑問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區已沒有建立根據地可能之後才提出的。問題在於，考慮到中共與蘇共之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中央爲什麼當初從江西撤退時不提出北上方針，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後才轉而北上？從地理上來看，北上應該遠比西征對中國紅軍更具有吸引力。早在二十年代初，蘇俄的勢力剛剛達到遠東地區，孫中山就接二連三地提出過從北部邊界接通蘇俄的戰略設想，蘇聯政府並且一度批准過孫中山的提議，準備利用中國西北地區幫助孫中山訓練軍隊。此後，蘇聯政府雖然因了解到國民黨在中國西北省分缺少影響，不願意國民黨利用外蒙古的庫倫作爲進攻北京政府的軍事基地，最終拒絕了孫中山提出的西北軍事計劃，轉道海參崴由海路援助廣州政府，但當中國馮玉祥的西北軍參加了反對北京政府的戰爭後，它仍舊很快通過外蒙邊境對馮的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這說明，利用中蘇蒙邊界來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只不過，援助國民黨是一回

事，援助共產黨則是另一回事。要中共來接通甚至靠近蘇蒙邊界，無論在蘇共中央，還是在中共中央看來，看上去似乎遠比援助國民黨要複雜得多。這是因爲，第一，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觀念上，「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並不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軍事主張。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當國民革命陷於困境時，蘇聯顧問鮑羅廷就曾提出接通蘇聯與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謂「西北路線」，結果這一設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義」的代名詞。第二，作爲共產國際下屬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衛蘇聯」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責任。而蘇聯這時正在受到來自高唱反對共產主義的德國和日本兩方面的戰爭威脅，中共中央顯然擔心，在這個時候公開靠近蘇蒙邊境，難免會給蘇聯帶來外交上的嚴重壓力，甚至爲日本進攻外蒙和蘇聯製造口實。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中共中央不僅不會設法去靠近蘇蒙邊界，就是連向北發展的想法往往也是否定的。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這時，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實行親蘇反帝政策，蘇聯已公開捲入新疆事務，因此敏感地注意到紅軍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條件。考慮到在西南四川一帶無法立足，東西南三個方向均無發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決心向北發展，準備首先進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區。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爭取從那裡取得同蘇聯的聯絡與援助❾。隨著六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提出了「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並準備設法與蘇聯接通。在六月十六日中央紅軍前敵司令員朱德等人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❿。可是，意想不到的是，統率第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六月十七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明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紅軍意圖已爲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表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於是就有了兩河口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進的北上計劃並沒有遇到像目前一些中共黨史著作中所形容的來自張國燾的反對，當然也不存在像張國燾在回憶中提到的那種爭論不休和議而不決的情況。相反，張國燾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過草原，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⓫。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

兩河口會議並沒有具體的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是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著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要想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在這時對於許多人來說還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蘇聯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明確認爲這種作法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安全。更多的人仍舊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有退卻畏縮之嫌，因此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則考慮更多，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他明顯地對紅軍在鄂豫皖蘇區

與國民黨中央軍作戰的失利仍然心有餘悸。因此他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似乎很有信心，但對北上與蔣介石的中央軍胡宗南部交戰，卻顧慮重重，以致在同意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之後，很快又開始拖延部隊行動。七月十日，一方面軍已經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朱德、毛澤東等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眞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⓬。

爲促使張國燾能確實執行北上計劃，而且考慮到四方面軍人多槍多，軍力遠較一方面軍強得多，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二日通過了洛甫的提議，在中央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之職，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張並爲軍委的總負責者，同時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徐向前和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前敵部隊總指揮和政治委員⓭。這種安排終於促使張國燾開始與中共中央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的計劃了。然而，事不湊巧，各部隊很快出現了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打亂。時間稍一耽擱，軍情緊接著也發生了變化，松潘戰役計劃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戰役計劃取消後，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加以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明確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顯然，中共中央經過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戰，已經再清楚不過地了解到紅軍不適宜在這一地區創造根據地。特別是在紅軍的力量已經極大削弱，國際聯絡中斷將近一年，而蘇聯影響已進入新疆的情況下，迅速北上創造根據地，努力取得國際的指導

與援助，對於中共是再需要不過的了。爲此，毛澤東在發言中也特別強調了它的意義。他在解釋了西北地區具有「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等特點之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

>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14]

張聞天、毛澤東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傅鐘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裡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中國共產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爲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剛剛從川北蘇區出來，人多槍多，數倍於中央紅軍，還沒有經歷過中央紅軍所遇到的各種令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數民族區域建立根據地之極端困難，他們唯一擔心的就是與國民黨中央軍作戰，因此他們的主張說到底就是想避免與國民黨中央軍交手。只是，由於他們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通過了洛甫的報告，張國燾會後又另生枝節，提出了一個避開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寧夏和新疆的新建議。但如此一來，蘇聯方面贊同與否尚且不論，西去邊遠的少數民族區域，遠離中國本土，與中共中央原來的設想更是相差不知幾何，難免不給人以退縮逃跑的印象。因此，毛澤東等對此斷然反對。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新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和〈夏洮戰役計劃〉，明確批評張國燾的西進青、新、寧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客觀上正適合於敵人的要求」，因而堅持並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戰役行動。但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人多勢衆，張在名義上又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多方掣肘。當九月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北去行動眼看就要成爲既成事實之後，張國燾終於以缺糧和部隊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領下的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壩地區，不走了。

九月八日，張國燾避開中共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其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逼迫中共中央聽從他的指揮。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中共中央聽從其號令，則地位全失，張國燾從此可以頤指氣使，爲所欲爲。反之，如果中共中央不聽其號令，必然造成兩個方面軍乃至中國共產黨公開分裂的嚴重局面。至此，中共中央已別無選擇。

中共中央於接獲張國燾電令之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召開包括陳昌浩、徐向前在內的政治局成員擴大會議，提出反對意見。陳昌浩與徐向前於討論中也對張國燾的命令表示疑問。故中共中央當即覆電，要求張國燾重新考慮其意見。但張九日再度來電，堅持原令，陳昌浩亦隨之改變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軍的幾個中共中央常委於十日討論並制定了緊急對策：

㈠致電張國燾，說明「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爲完全不適宜的。……中央認爲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㈡以周恩來改任右路軍指揮，並秘密下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

㈢指令陳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於日內尾隨一方面軍主力之後前進。

㈣發布〈爲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餓挨凍，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15]

然而，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掣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其實更不樂觀。因爲這時整個一方面軍和中共中央，作戰部隊很少，全部加起來也不過五千餘人，重新編制後的部隊只有六個團的戰鬥部隊，而它還要負責保護和運送上千的幹部和傷病人員。以這樣少的兵力和這樣重的負擔，要想實現原定的北上在川陝甘乃至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已經完全沒有可能。儘管李德建議看個把月結果再定方針，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九月十二日俄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行動方針。這就是：

>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爲）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16]

這個新的方針的中心之點，就是「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和外蒙，取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與援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可以肯定，在過去提出這樣一種方針，是注定要被人指責爲「退縮逃跑」路線的，但如今的情況完全不同了。現有的數千軍隊和幾百名幹部幾乎成爲中國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礎，任何進一步的重大損失都是不可想像的。只要能夠「保持（存）數百幹部、若干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因此，毛澤東明確認爲：在這個時候，

> 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17]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著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中央軍，全部紅軍力量這時多半一次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故人們一致強調：紅軍今後一定「要謹慎，不能冒險」。因爲根據毛澤東的估計，紅軍周圍的敵人至少有三十個團左右，在通往蘇聯邊境大約五千里路上，國

民黨不僅可以集中七十多個團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實行以紅軍現有技術手段所難以擊破的「堡壘主義」。面對這種情況，紅軍不僅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一下子消滅幾師敵人」，而且「有可能打敗仗，有可能較大減員」，甚至可能「成爲甕中之鱉，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爲了保（生）存，我們也要打通國際聯繫」，即使是爲了「準備這些陣地戰、堡壘戰的工具——飛機、大炮」，我們也應當取得蘇聯的援助[18]。這樣做並不等於什麼「退縮逃跑」，張聞天解釋說：既然依靠紅軍自己的力量「在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在目前較少可能」，打通國際路線就是一種必要的選擇。這不等於說不得到國際的幫助，我們就沒有辦法，問題在於，「中國革命應得到國際的指示、政治上的領導，最近一時期，與國際失去聯繫，這是我們很大的損失」。接通國際聯繫，不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九月十二日，中共最終於俄界會議確定了「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並開始具體實施了。他們不再等待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當即將紅一方面軍改編爲陝甘支隊，由俄界兼程北上，於六天後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占哈達鋪，進而搶渡渭河，鋒芒直向蘇蒙邊界。可是，幾乎是再巧沒有了。紅軍剛剛渡過渭河，就意外地從繳獲的國民黨區域的報紙中得到了新的消息，並很快在同中共陝西地方黨部的聯繫中證實了這一消息，得知在陝北一帶還存在一塊根據地和一支有相當實力的紅軍部隊。這個消息確實讓人大喜過望。於是，中共中央所率領的這個陝甘支隊再度改變前定計劃，轉而向陝北蘇區開去。或者可以想像，正是這一過去幾乎連想都未曾想過的帶有極大偶然性的決定，開始改變了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

第二節　陝北稱雄

中共中央是九月下旬在甘北榜羅鎮一次只有少數中央常委參加的臨時會議上，決定改變前定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的。毫無疑問，作出這樣的決定，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爲當初完全不清楚他們路經之處還會有一塊可以立足的根據地，當初決定打到蘇蒙邊境去，純粹是爲了保存數百幹部和幾千戰士所走的迫不得已的一步。但這樣一種行動，即使是萬不得已而爲之，總是未經共產國際批准的貿然行動，其影響蘇聯外交的程度可以想像，結果如何卻殊難預料。而且，在一九三二年中蘇復交，兩國關係正在恢復時期，蘇聯是否會像當年支持國民黨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樣，毫無顧忌地援助與南京政府完全處於對立的中國紅軍，也沒有人能夠說得明白。因此，儘管他們從感情上、觀念上相信蘇聯方面不會拒絕援救中國紅軍，但從組織上、紀律上卻多少感覺不妥。故當他們發現自己附近就有根據地可以立足時，做出這種決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共中央不要再打通國際路線了，在這次中央常委會上，人們一致決定，一方面以陝北蘇區爲自己的立脚點，一方面得機會時還要再派支隊去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國際援助。

能夠在陝北找到一處立脚點，這對於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來說，確實可以說是喜從天降。自西征以來，中共中央始終不知道在陝北有著這樣一塊根據地。即使決定北上，他們也未曾想到他們將有可能在他們所必經的陝北地區找到一塊立脚點。但經過一年時間，長途跋涉兩萬餘里，拋頭灑血，饑餐露宿，一路鏖戰之後，中央紅軍已經從八萬餘人戰至數千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隊損失殆盡，此時之紅軍可

謂精疲力盡已至極點。臘子口一役，僅有的數千紅軍減員竟又「超過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領導人深感震驚。就連毛澤東也嘆息道：損失比例如此嚴重，就是過雪山草地也未曾有過。由此可見紅軍疲勞之甚。再向前去，特別是要通過人煙稀少，寨堡林立，少數民族較多的甘西或寧夏，結果如何，很難想像。因此，就軍事領導人而言，迅速找到一處立脚點歇下來，遠比打通蘇蒙邊界更迫切、更重要。當他們意外地得知陝北有一根據地之後，可以想像他們會有多麼驚喜。紅軍實在太需要休整了！因此，紅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這時的態度無疑對中共中央的上述決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十月中旬，中共中央迅速帶領中央紅軍擺脫追兵，開進了陝北蘇區，停下來不走了。

但是，陝北蘇區是否眞的能夠成爲中共中央的立脚點呢？它會不會又成爲第二個江西蘇區呢？這一切仍舊取決於國共兩軍之間具體的力量對比。而這時的中央紅軍，即陝甘支隊只剩下大約四千人，加上剛從陝南蘇區轉進陝北的紅二十五軍與原在陝北蘇區的二十六軍組成的紅十五軍團，合起來也只有一萬人之譜。而國民黨方面，僅駐紮在陝甘一帶的由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就有十幾萬人，連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和其他雜色部隊，及已經尾隨追至甘肅北部的蔣系王均及毛炳文部的幾個師，少說也有二三十萬人。雙方力量極爲懸殊。不過，這時有兩個條件對紅軍是有利的。第一，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經不把北上紅軍視爲追剿重點。蔣介石這時明確認爲：「由毛澤東、彭德懷等率領向甘肅逃竄」的紅軍只是「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仍舊留在川北和川甘邊境」，國民黨軍隊須要重點對付的應當是這支紅軍。至於對毛澤東所率領的小部分紅軍，目前只要留意不要讓他們「回竄出來」[19]。因此，蔣雖於十月一日親兼西北剿匪總司令，實際上一切軍事均交給代總司令張學良處理，自己則親往成都指揮圍剿紅四方面軍的作戰行

動。故中共中央這時注意到，國民黨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已經「告一段落」，特別是國民黨中央軍已經不再積極跟進，「現進攻我們的主力是張學良，指揮亦是張學良」。第二，由於紅軍武器落後，彈藥匱乏，在江西蘇區反圍剿戰爭中吃了國民黨堡壘陣的大虧，中共中央最擔心的就是國民黨的堡壘主義。他們之所以急於取得蘇聯援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爲他們相信，必須取得先進的技術工具，比如飛機、大炮，才能粉碎堡壘主義。如今，要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能否粉碎國民黨的堡壘主義又成一大難題。但毛澤東很快就注意到：陝北、甘北地處黃土高原，既少樹木，又少石頭，故「敵人要想像中區那樣依靠堡壘是比較困難」。既然國民黨很難實行堡壘戰術，作戰部隊主力又是戰鬥力不太強的國民黨雜牌軍，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自然胸有成竹。他們不僅不擔心自己的力量過於弱小，相反，毛澤東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時期以吳起鎭爲中心向西在甘北發展，整頓部隊，擴大紅軍；然後向南進攻張學良、楊虎城，連接陝南蘇區，因爲「楊、張是好對手」，容易對付；待黃河結冰後，再進一步東進攻山西的閻錫山，使陝北蘇區成爲跨越陝甘晉三省的大根據地[20]。

這時，紅軍已經數度與張學良和張學良的軍隊交手。特別是紅十五軍團兩次大敗東北軍，顯示了紅軍比東北軍具有強得多的戰鬥力。像十月一日，紅十五軍團於陝北勞山一帶設伏，竟幾乎全殲東北軍一一〇師，擊斃了該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範馭州。不過二十多天，紅十五軍團又在富縣榆林橋全殲東北軍一〇七師之六一九團，外帶六二一團一個營，生俘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要知道，這時數以萬計的東北軍正在陝北一帶四處圍剿紅軍，然而一個紅十五軍團就打得東北軍不亦樂乎。可以想像，再加上幾千身經百戰的中央紅軍，東北軍更加不是對手。果不其然，十一月初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會師後，圍點

打援，在直羅鎮一舉全殲東北軍一〇九師一個整師，外帶一〇六師一個團。一〇九師師長牛元峰自殺，紅軍僅俘虜就捉了兩千餘人。

直羅鎮戰役後，紅軍已經穩穩地在陝北站住了脚。到陝北不過一個多月，已經擴增二千五百人，俘虜三千餘人，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總數已經接近於一萬五千人，加上在陝北蘇區周圍還有五千游擊隊，和三萬赤衛軍及赤少隊，整個中央紅軍的實力較前已經得到極大的加強。更爲重要的是，中共軍事領導人發現，國民黨軍隊在短時期內根本不可能對陝北蘇區實行有效的包圍。他們並且相信，在蘇區南面的東北軍在進攻紅軍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兩個雜牌師始終行動遲緩動搖，更是不足爲懼。蘇區的東西兩面雖有東北軍、馬鴻逵和閻錫山的幾個師，但其防線背後都很空虛，不難將其打破。在經過了長達一年時間的長途跋涉之後，能夠讓部隊得到充分的休整與補充，能夠讓部隊從長期的被動應戰轉爲主動進攻，這正是中共多數軍事領導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們顯然更加堅定了要全力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的決心，至於對兩個月前提出的「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則明顯地感到不那麼迫切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林育英(化名張浩）爲傳達共產國際的關於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外蒙輾轉來到陝北蘇區，向中共中央傳達了一個既令人吃驚又讓人振奮的重要信息，這就是，斯大林建議：

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㉑

斯大林同意中國紅軍在可能的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端渴望得到蘇聯援助，但又對打通蘇聯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

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高度興奮的消息。中共中央這時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當即於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中共這時軍事方面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張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顯然，考慮到這時的陝北蘇區只有安塞、保安、瓦窰堡三個縣的中心區，其餘都是與敵犬牙交錯的游擊區，特別是了解到國民黨已經開始在蘇區周圍地區修築堡壘，有重新推行堡壘主義的企圖，張聞天等對長期堅持陝北根據地並不十分樂觀。他們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經批准，迅速取得蘇聯援助將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此舉對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較之繼續堅持陝北根據地，無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

但作爲軍事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另外的看法。他們顯然對紅軍突破臘子口以後人數銳減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極端重視前此之長途跋涉給部隊帶來的嚴重損害，更加看重根據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他們對當前的戰爭前途十分樂觀，故毛澤東明確認爲，當前最緊要的是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仍應堅持他前此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紅軍下一步軍事行動的主張，即「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澤東在十二月一日給張聞天的復信中明白解釋了這個問題，稱：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他是完全同意的，因爲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他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中共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爲完成上述兩種任務，他相信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他建議，紅軍應在明年夏天或

秋天再向外蒙靠近[22]。

要用四個月的時間完成擴軍一萬的任務，就此時的情況而言，也許並不十分困難，但要想在六個月之內把陝北蘇區擴大到山西、綏遠，接通外蒙，卻頗難想像。僅爲了保衛陝北蘇區一地，紅軍就要應付大約二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再加上山西閻錫山部、綏遠傅作義部的十幾萬人，它即使擴大一倍，達到三萬人之衆，要對付數十倍於己的敵人，保衛如此之長的防線，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想像的。然而毛澤東卻敢於如此設想。

促使毛澤東有如此大膽設想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北方的這些國民黨雜牌軍不經打，並且紅軍竊聽電話和破譯電報工作相當成功，對於敵人軍事行動部署幾乎瞭如指掌；二是邊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軍連遭重創之後，明顯地更加動搖和畏縮，並且正在通過各種方式表示不想與紅軍作戰，這說明，紅軍完全可以通過統戰策略分化各路敵軍，使相當部分國民黨軍隊與紅軍結成秘密的統一戰線，至少是在戰爭中保持中立。

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早在二十年代就有過成功的嘗試。可是，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後，統一戰線的政策也隨之取消了。在紅軍抵抗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歷次戰爭中，紅軍曾有過許多機會可以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來瓦解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特別是中共南方各個根據地已經先後陷落，江西中央蘇區已處於嚴重危機關頭之際，在江西蘇區東方戰線上的國民黨主力十九路軍突然發動福建事變，主動與紅軍聯合，一旦雙方攜手，江西蘇區之圍自然化解，國民黨之圍攻將困難百倍，可是中共中央卻拘泥於共產國際前此的指示，拒十九路軍之於千里之外，終使十九路軍與紅軍爲國民黨各個擊破，江西蘇區也毀於一旦。如今，情形已大不相同。還在中央紅軍尚未進入陝北蘇區

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得到來自滇黔邊紅二、六軍團轉來的電報，該電稱國際屢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務必依據目前國際國內形勢需要和敵我力量對比，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實行反日反蔣的統一戰線政策[23]。而後，林育英又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實行統一戰線新政策的有關指示，其中關於中共應當實行的統一戰線新政策基本內容是：

(1)基本的方針是統一戰線；
(2)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統一戰線之最廣泛和最高的表現；
(3)工農蘇維埃改變爲人民蘇維埃；
(4)改變富農政策。[24]

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於，中共從此之後可以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集中火力來反對最主要的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和前此政策上和觀念上的種種束縛相比，中共和紅軍顯然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毛澤東等更是盼此久矣，因而他們剛一得知這一指示，就立即對周圍的國民黨地方勢力展開了積極的統戰工作。

其實，還在林育英尚未到達之前，因紅軍主力必須南去與東北軍作戰，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就已經開始做國民黨軍隊的分化工作了。鑒於紅軍南移後邊區北面空虛，在邊區東北綏德地區之高桂滋部最具威脅，毛澤東等已經派馬志明前往高部做統戰工作。此舉立即收到立竿見影之成效。高桂滋親自接見了馬志明，對馬所述在「抗日反蔣」基礎上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頗感興趣，對與紅軍訂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協約尤其贊同。對此，毛澤東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

中共方面關於雙方合作的具體設想，提供雙方之談判。中共方面提議之要點爲：

(一)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討賣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並使貴方處於安全地位，有任何賣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願以實力共擊之；
(三)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願將雙方關係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
(四)貴方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賣國賊軍隊（如井岳秀）時，務望採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
(五)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疋等），亦量爲接濟；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
(七)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連絡（交換密碼）；
(八)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㉕

十一月下旬，雙方代表很快通過談判達成草約，後經雙方上級正式批准，實現了兩軍之間的和平共處。

與高桂滋談判的成功，使中共領導人更加看重統一戰線工作。此時，紅軍直羅鎮一役雖然大獲全勝，東北軍正面之師紛紛後撤，但其兵力畢竟相當之多，非各個擊破不能摧毀之。爲盡可能地對東北軍實施分化瓦解工作，紅軍這時甚至不惜放棄可能的殲敵機會。就在紅軍準備再度圍殲太白鎮之東北軍一〇六師時，前受中共華北局派遣潛入一〇六師工作的董彥文與前線紅軍接通了關係，向毛澤東等通報了一〇六師師長沈克對於圍剿紅軍頗多動搖的情況，毛澤東等當即決定釋放被俘之一〇六師軍官數名，向沈克辦交涉，轉達紅軍願意與之談判的意願，決定「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只要沈克「同意反蔣反日則允許日後人槍如數退還」。不僅如此，紅軍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態度，主動撤去了對一〇六師的包圍，以示其誠意㉖。

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由此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十一月二十六日，張聞天致電毛澤東，提議：「爲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中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後大部分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㉗。考慮到擴大紅軍之需要，前方軍事領導人對上述提議略作修改後，開始大量散發據此制定的傳單，以宣傳紅軍對國民黨官兵的政策。其內容包括：

「同胞們！你們難道甘心讓你們的家鄉與父母妻子，受日本強盜的摧殘與屠殺，使自己亡國滅種嗎?」
「你們拋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幫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等來打抗日紅軍，得到了什麼好處?」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團結起來，不替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國人民自己的紅軍，在與紅軍作戰時，繳槍給紅軍，與紅軍打日本與賣國賊去!」
「你們繳槍給紅軍們，無論是官長與士兵，紅軍一律不殺，要回家的發錢回去，願留紅軍的按級任用，並享受一切同等紅軍的權利，自動嘩變或拖槍到紅軍中重重獎賞，紅軍留心醫治白軍傷病官兵!」㉘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中國日甚一日，不僅整個東北三省被日本占領，熱河、察哈爾也先後落入日本人之手。到一九三五年，日本更進一步公然製造了震驚全國的華北事變，逼迫南京政府放棄對華北地區的統治權，蓄意併吞整個華北。抗日救亡，無疑已經成爲全中國各政黨、各軍隊、各階級、各階層的當務之急。在這種時刻，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更何況，紅軍此時面對的國民黨軍主力，正是當年不放一槍就倉惶丟掉東北老家，以後長期受到國人唾罵和良心譴責的東北軍。還在中央紅軍同東北軍在甘肅北部第一次交手時就發現了東北軍的這一特點。當時，紅軍前衛部隊擊潰了東北軍騎兵一部，俘虜數十人，按照規定每人發兩塊大洋禮送回家時，俘虜們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無家可歸。這種情況淸楚地表明，東北軍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這種宣傳影響的。正是利用這一心理特點，毛澤東這時甚至開始嘗試著對東北軍的高層將領做統戰工作了。

這時東北軍調入陝甘參加剿共的部隊共有四個軍，即第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駐守甘肅蘭州天水一帶，下轄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三個師；第五十七軍(代軍長董英斌)，擔任陝北蘇區西南一線之攻守任務，下轄一一一、一〇八、一〇九、一〇六、一二〇五個師，其中一〇九師已被殲；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擔任陝北蘇區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務，下轄一〇七、一一〇、一一七、一二九四個師，其中一一〇師被全殲，一〇七師遭重創；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駐守甘肅西峰鎮一帶，下轄三、六、七、十四個騎兵師。另外還有一個獨立師（一〇五師）和兩個直屬師（一一二、一一五師）。鑒於第五十七軍之一〇九師被殲，沈克之一〇六師動搖，毛澤東遂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逕直寫信給第五十七軍代軍長董英斌，委託釋放的該軍軍官帶往，勸其

「勒馬懸崖」，速與紅軍議和。信稱：

> 紅軍爲打倒帝國主義而戰，爲打倒投降帝國主義之賣國賊而戰，全國民衆爲紅軍之是賴，是以江西一軍轉戰二萬里，縱橫十一省，紅旗所向，當者披靡。既達陝甘，便可東進，不意張學良賣國賊之不足，又從而牽制抗日紅軍，進兵蘇區，恣其蹂躪。敢告足下，此乃最大罪惡行爲，環球之所共憤，通國之所不容，即東北軍言，不但一切士兵不以爲然，即中級下級幹部亦多不以爲然。不信請看勞山、榆林橋兩役，百零七師、百十一師所剩幾何？然此猶謂非足下所親見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直羅鎭之役，足下親率四師之衆，葫蘆河邊老人山上望遠鏡中自當歷歷在目。百零九師一上戰場，全軍覆沒，貴軍長亦不得不星夜潛逃。不逃則已，一逃二百里，暫借隴坂聊定驚魂，險哉此役！貴軍長有生以來未有之也。此其故何也？須知決不僅屬紅軍之英勇善戰，何立中、劉翰東之部屬叛何立中、劉翰東而投紅軍，貴軍長之部屬叛貴軍長而投紅軍，人人不願打仗而願繳槍，不願打同胞而願打日本，何立中努力掙扎，終究身傷命絕；劉翰東逃入鄜縣再也不敢出城；牛元峰固守直羅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終不得不束手就縛。此中消息，何不深長思之？勞山、榆林橋、直羅鎭三戰，只當對足下及東北軍各軍師長一個嚴重警告，警告之不聽，災必其身矣。古人云，見兎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補牢未爲遲也。及此改圖，猶可以盍晚節，猶可見諒於國人，何況當此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全土，蔣介石、張學良繼續賣國到底之日，舉國痛憤達於極點，稍有人心，決不應自殘同類而任四萬萬同胞魚肉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東北軍將領雖

> 鑄九一八之大錯，然而今日者固猶是，食中華之粟，踐中華之土，東北軍之與紅軍固猶屬中國境內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今與貴軍長約：(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貴軍或任何他東北軍部隊，凡願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願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上述各條紅軍歷來均如此宣言，如此實行，今再爲東北軍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貴軍長顧全民族大義，立即決策，接受鄙人提議，遣派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屆時鄙人亦當遣代表到貴軍接洽。時危禍急，率意直陳，勒馬懸崖，是在明哲。[29]

毛澤東的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張學良撤職，而未能發生作用。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高層將領發生關係卻是從這裡開始的。只是，這時中共中央基於「抗日反蔣」的方針，不僅不相信蔣介石有聯合的可能，而且也不相信作爲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張學良有聯合的可能。很顯然，從抗日和反賣國賊的角度，張學良當年不放一槍丟掉東北三省，如今又指揮大軍圍剿紅軍，其賣國、反共比蔣介石也有過之而無不及，豈能設想與之聯合？因此，中共中央此時的策略顯然是盡可能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上述毛澤東給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十二月五日給原陝西省政府主席，現任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這種策略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在致董英斌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勸說東北軍愛國將領和士兵與張學良分道揚鑣。信中說：

> 昔在報紙屢識臺名，遼瀋整軍儼然重鎮，居常竊念，以爲董英斌者，或亦愛國健兒之亞。豈知瀋陽變作，曾無衛國之人，一槍不放，空國而逃千里，關山慘然變色。人民欲戰，軍隊不欲戰；士兵欲戰，官長不欲戰；下級官中級官欲戰，上級官不欲戰。亡國罪魁、敗兵禍首張學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張學良爲保存自己及其奸黨數十條性命，竟不惜令十餘萬英勇士兵與中下級幹部盡變爲無家可歸之亡國奴，竟不惜三十萬同胞盡變爲日本帝國主義之俎上肉。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有更可恥如此者乎？從此賣國賊之徽號有口皆碑，逃將軍之頭銜無人不知。醜聲洋溢，穢德彰聞。張學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輩青年將校乃亦隨風而靡，良可歎也？[30]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的信中更告誡楊虎城，陝甘地方勢力，非與紅軍合作則必完全受蔣、張之宰制，以致盡失容身之所。信稱：

> 蔣、張勢力布滿陝甘，楊虎臣（城）先生如處甕中，舉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險情形不可言諭。爲今之計，誠宜急與敵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敵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日本軍力現已發動平津，控制之後，轉瞬即及山陝。蔣雖讓出陝甘地方政權於張學良，但蔣之四十餘團兵力仍實際的控制陝甘。張學良主力入陝，一面固爲對付紅軍，一面實欲對付虎臣先生。臥榻之側，勢決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爲目標，則敝軍甚願與虎臣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爲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幹。是在今日

東北軍中如沈克等（此次敝軍追擊董英斌消滅審師一個團，非所願也），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寶珊亦爲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係。聞先生與之有舊，能爲先容，曷勝禱企。[31]

當然，中共此時的統戰政策尚在初步嘗試之中，其對士兵乃至下級軍官的爭取工作歷時已久，較有把握，但要爭取中上層軍官，特別是要爭取聯合那些高層將領和地方軍閥，卻尙無成功經驗。這時的上層統戰工作，在觀念上明顯地還屬於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範疇。而且，從信中的語氣也可以看出，由於紅軍聊一還擊、略施警告，就連殲裝備精良的東北軍近三師之衆[32]，因而他們思想上對這些國民黨雜牌軍的將領，也多少還有些輕視，事實上其工作重心更多地仍舊放在軍事發展上，而不是統戰工作方面。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總任務」應當是，「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分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的力量，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北方紅軍與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而紅軍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打擊張學良與閻錫山，因爲閻錫山「同張學良是我們當前兩個主要敵人」[33]。

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瓦窰堡舉行的中共中央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在其報告中並沒有特別強調敵軍統戰工作，其談到敵軍統戰也仍舊是以下層統戰爲主，強調「沒有士兵之援助，民族戰爭是不能勝利的」。而對於上層統戰，卻只簡單地提到一句，即盡可能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以便執行抗日聯軍的政策。與此相反，毛澤東所提出的下一階段全部工作的內容，就是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蘇區。他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爲三個步驟來實現，即：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儘管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最初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但在會議上，多數與會者實際上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也應把二者並列起來。因此，在會議決議的行文上，關於打通國際路線與鞏固和擴大蘇區的先後順序問題被規定爲：「拿『打通蘇聯』作爲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他密切聯繫起來」。不論怎樣理解，中共中央所設想的一九三六年的行動計劃，都是一個過於樂觀的大規模的擴軍計劃和戰爭計劃。按照這一設想，紅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以前至少要再擴充五千正規軍，二千五百游擊隊；八月以前至少還要擴充兩萬兩千正規軍和四千游擊隊。與此同時，向南要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向東要占領黃河西岸五縣以上地區，創立山西根據地[34]。即使不考慮而後進軍綏遠，靠近外蒙問題，要實現它也是極端困難的。這是因爲，正如李德後來所說：「我們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三千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八萬人」[35]，進攻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結果陝北蘇區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裝和游擊隊來唱空城計，不難想像，一旦陝北蘇區周圍十個團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勢，原有蘇區難免陷落，如此則新蘇區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難鞏固。但看起來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這時對此並不十分擔心，有人甚至認爲陝北蘇區人少物質困難，主力紅軍不易久留，而毛澤東也很清楚：「陝西之保護，主要依靠赤少隊」，難免會有部分損失，但爲了便於擴大紅軍，爲了「靠近蘇聯」，「部分損失不要緊的」，「應該忍受」。値得

注意的是，與一般所說的不同，同以後的實際情況比較起來，不僅毛澤東，而且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考慮整個一九三六年軍事工作之際，最初都還沒有把通過加緊開展敵軍上層統戰工作，減少乃至瓦解陝北蘇區周圍國民黨軍隊對蘇區壓力的策略問題，放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來。這表明，中共中央對於統戰工作也並非是早有謀劃，二十年代中期的國共合作幾乎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借鑒的統戰經驗，三十年代前半期中共強調階級分野的作法，更使得統戰工作幾乎不復存在。因此，在相當程度上，瓦窰堡會議以後中共在陝北同張學良的交往以及因此而取得的重大成功，其實可以說是它成功進行統戰工作最初的也是最爲重要的範例。因爲，正是從它在陝北的這段頗具戲劇色彩的經歷中，中共中央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了解到，統戰工作可能具有何等神奇的效力[36]。

第三節　洛川諒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因陝北蘇區南面東北軍壓力較大，紅軍主力先後南下對付東北軍去了，陝北蘇區重心因此迅速南移。但陝北蘇區最中心的區域實爲保安、安塞、瓦窰堡三鎮，原本靠北，因紅軍主力南去，中心區的鞏固一時又成了問題。還在十二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駐守在靖邊一帶的國民黨井岳秀部的手裡，瓦窰堡及安塞也隨時有可能爲井部所陷。如此一來，一直就很複雜的陝北形勢，更是變得極其微妙了。

這時陝北蘇區的範圍，如果以紅軍和游擊隊的自由活動範圍而論，則南達洛川，北抵橫山，西出太白鎮，東至黃河邊，方圓不下一萬平方公里。但就實際範圍而言，紅軍其實只控制著這一帶地區的鄉村，

幾乎所有的城鎮還都在國民黨軍隊的手裡。西面太白鎮一帶爲東北軍五十七軍沈克之一〇六師所據，而最具威脅的是沿洛川、鄜縣、甘泉、延安一線深入陝北蘇區中心地區的東北軍六十七軍，和駐守宜川、韓城一線的國民黨十七路軍馮欽哉部。顯然，如果不能確保南北兩線之鞏固，紅軍進一步的東征山西計劃勢將難以實現。因此，還在十二月十七日，即中共中央召開瓦窰堡會議討論下一步軍事行動之前，毛澤東就已經開始部署向北擊退井岳秀部，和向南奪取甘泉、宜川的作戰行動了。他決定調紅二十六軍北上，會合七十八師消滅井岳秀部，命令一軍團以一團兵力奪取甘泉，一軍團主力則準備奪取宜川。同時命十五軍團主力南進，待一軍團奪取甘泉、宜川後，一同進一步向南推進，達成赤化洛川、宜川兩縣之任務[37]。

紅軍北線反擊井岳秀部的作戰看來十分順利，前後不過十幾天，即剛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井部就遭擊退，井岳秀本人竟也意外地被打死[38]。不過，紅軍南線的軍事行動卻因爲出現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最終不得不完全停止下來了。

原來，根據情報，毛澤東等很快即已得知，宜川、洛川同深入陝北中心區的延安城一樣，都有較爲堅固的城牆。紅軍不僅裝備落後，幾乎完全沒有重武器，而且土製炸藥威力也十分有限，因而紅軍一向避免作攻城之戰，通常圍城只是爲了便於圍點打援。延安城深入陝北蘇區中心，威脅甚大，紅軍久已將其團團圍住，卻不予奪取，其原因也就在此。如今宜川又是這種情況，奪取宜川的計劃自然也難以實現。故毛澤東下令奪取宜川不久就決定：因延安、宜川堅不易攻，故應放棄原定奪取宜川城之計劃[39]。

與宜川相比，甘泉的情況則有些不同，關鍵在於甘泉的城牆較爲殘破，守軍又只有五個連，看上去較易於攻占，因此負責包圍甘泉的

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開始時對甘泉曾數度採取攻勢，大有不下此城不止的勢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時甘泉守軍儘管兵力較少，所憑據城牆也較爲殘破，但武器較紅軍好得多，又全力加固舊城牆，致使紅軍進攻久無建樹[10]。好在由於紅軍大軍圍城，每日利用前東北軍俘虜宣傳喊話不斷，加上甘泉與洛川方向東北軍主力之聯絡完全切斷，解圍無望，守軍軍心日漸動搖，不斷有士兵攜械叛逃出城，因此彭德懷很快即下決心採用攻心之策。於是，彭德懷調來已經歸順紅軍的前東北軍六十七軍一〇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令其前往甘泉進行勸說工作，使其放棄甘泉乃至實行火線起義。由於東北軍多數官兵此時對與紅軍作戰已相當厭惡，久困甘泉的東北軍守軍又身歷險境，深知甘泉之陷落只是時間問題，因此高福源進入甘泉城後，很快就說服了城內守軍。只是守軍指揮官希望紅軍務必同意所部如數南撤洛川，以歸還其主力。對此，毛澤東等當即表示同意。毛在給前線彭德懷的電報中宣稱：「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條件無不可以磋商」。只不過，毛澤東要求前線的談判代表向對方說明：「要抗日須與紅軍合作，且須影響和組織其他東北軍一同抗日。如現在就歸還主力，不僅不能抗日，且將爲其上級所疑或重驅其進攻紅軍。故爲抗日計，宜先揭義旗，在蘇區一時期，並求得延安鄜縣及其他東北軍響應，……方濟於事」。至於起義後的部隊，可以另起名義，或爲抗日人民革命軍，或爲東北抗日軍，其指揮官亦委以師長或團長名義[11]。

不料，此舉尚未付諸實施，又被新的情況打斷了。

高福源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賞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軍長手下任職，直至擔任六一九團團長。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時恰值五四運動之後，深受新思潮影響，因此思想上一向

較爲激進，被俘後自然很容易就對共產黨的主張感到心悅誠服了，自願回東北軍做勸說工作。而高福源到甘泉勸降之事，又很快被王以哲軍長得知，王當即經甘泉守軍電臺轉電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六十七軍軍部一談。高得電後當即出城徵求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的意見，同時表示願意進一步見王以哲說明共產黨人的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對此自然當即表示同意。隨後，高福源於一月八日前後即前往洛川見王。一週之後，即一月十五日，高福源就帶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據高福源說，他在洛川不僅見到王以哲，而且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與他談話，結果不僅王以哲對於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而且張學良也表示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商談。這種情況確讓彭德懷感到意外。如果說王以哲爲了避免再度損失部隊而有如此表示，彭德懷等還多少可以理解，與蔣介石幾乎同爲一丘之貉的張學良如此表示，則多少讓人有所懷疑。但彭德懷仍舊立即致電中共中央，說明了這一新的重要情況。其電報稱：高福源負我們使命赴洛川，他去後見過王以哲、張學良，於本週回來，得情形如下：㈠王以哲頗熱烈的表示願與紅軍共同抗日，並請求與彭見面；㈡張學良表示，我眞抗日，願以實力相助，急請我方派全權代表到洛川與張一談[12]。

毛澤東接到彭德懷電報後，當即意識到此事意義重大。一旦與東北軍實現全線停戰，達成抗日反蔣的合作協議，整個西北局面勢將根本改觀，區區一個甘泉城自然不必斤斤計較。據此，毛澤東立即回電提出：

對張王提出如下條件：

一、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

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

三、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張王意見；

四、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

五、立即交換密碼；

六、歡迎王軍長與彭見面，目前亦派周桓去洛川爲宜，編一適當密碼帶去，來回最好是十天以內。[43]

周桓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其雖負責政治工作，但對談判及情報工作卻未必在行。因此，彭德懷認爲派周桓前去進行初步談判並不適宜。隨後毛澤東又接連提出以伍修權爲初步談判代表，而以葉劍英或蕭勁光爲全權代表的建議，但彭均認爲不適宜。此時，恰逢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來到甘泉附近的方面軍司令部，彭德懷當即決定改派李克農隨高福源去洛川[44]。

一月十六日，李克農隨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王以哲通過電報通知了張學良，並於當晚與李克農見了面，進行了初步的交談。談話沒有太多涉及實質性的問題，但氣氛頗爲融洽。李克農當天即通過王以哲軍部的電臺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稱：「王對抗日聯軍、國防政府暗約同情，但需決定於張」。第二天，即十八日，張學良亦來電，請王以哲轉告李克農，稱他將於明後日親到洛川晤談。

鑒於兩軍正式接觸已經開始，爲促使談判成功，毛澤東於二十日明確指示彭德懷解除甘泉之圍，並要彭德懷迅速將此消息通知李克農以便轉知張學良與王以哲，顯示紅軍之誠意。彭立即致電高福源與李克農稱：「在洛川以東地區之我們（軍）已撤至鄜縣以北，甘泉之圍已解，城內缺乏柴草，已令動員群衆送賣，請轉王軍長勿念。」

就在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解除甘泉之圍的幾乎同時，李克農與張學良的會談也剛剛結束。李克農當晚在電報中具體說明了談判的情況，稱：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據張學良說，國民黨內同情於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願爲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爲此進行斡旋，約期兩週，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爲保守秘密及自身環境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經濟通商[45]。

二十一日，李克農返回紅軍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情況，說明張較「滑頭」，而王較「誠懇」。張學良一面表示贊同中共的某些主張，一面表示對「抗日反蔣」方針不能同意，強調他對蔣有好感。倒是王以哲多少表現出對蔣介石的某種不滿，從中可以看出東北軍對蔣介石其實還是抱有戒心的。張同時大談國民黨中許多人贊同停止內戰和組織國防政府的主張，主張盡快對日開戰。他並且說他也曾與閻錫山等討論過同樣的想法，得到了閻的贊同。因此，他表示，如果活動成功，兩週之內他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這樣的問題。

中共此時的政治方針是「抗日反蔣」，其與張學良的合作同樣也只能是建立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毛澤東一向對利用矛盾的策略是十分欣賞的。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向黨的幹部宣講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問題時，他就曾經特別強調過國民黨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和利用這種矛盾的極端必要性。只不過，他斷定這種矛盾的背後總是有帝國主義的影響，國民黨各派及其軍閥都是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的走狗，因而把他們之間的矛盾視爲「狗打架」，比喻成「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

間的鬥爭[46]。由此可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這時對張學良的認識，在理論上恐怕也不出其右。只是在實際上，毛澤東似乎並非嚴格地按照其理論上的分析來了解問題。也許是對張學良的地位過於重視，也許是對張突然轉變的原因缺少深入的了解，誤以爲張學良來找中共密談一定是想與蔣介石翻臉，總之，毛澤東這時明顯地對聯合張學良共同「抗日反蔣」所寄希望過高。他曾專門致電李克農，說明只要張學良同意「抗日反蔣」，則一切問題均好商量，甚至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第一把交椅也可以讓給張學良坐。電報稱：

>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
> (乙)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
> (丙)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47]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裡這時大概是最重視槍桿子的，其成功的經歷中，很大部分也突出地表現在軍事上。因此，毛澤東多半也是最了解所謂實力原則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很顯然，談判不過剛剛進行，毛澤東就主動推舉張學良出任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首腦，他所根據的正是所謂實力原則。既然紅軍數量少，裝備差，而東北軍十倍於紅軍，又有較好的裝備，占有重要的地區，一旦兩軍共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爲實力最強一方的張學良，自然沒有屈居人下的道

理。因此，與其到時候再來談這種問題，不如預先向張學良交個底，這也可以清楚地表明中共和紅軍的誠意。同樣，關於幫助東北軍解決軍餉、械彈之類的說法，其意雖僅在使張學良放心離蔣，但內中也明白地暗示中共日後定有辦法從蘇聯那裡解決經費及裝備問題。此言外之意，張學良自然可以清楚了解。事實上，在與李克農談話中，張學良已經談到，紅軍最有利的發展條件，就是奪取寧夏、綏遠，背靠外蒙、蘇聯。

無須說，李克農談判所得，與毛澤東的期望有相當大的距離。難怪彭德懷在聽了李克農的匯報後並不滿意。他明確認爲，張學良找紅軍談判，看來仍舊是軍閥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種表現。張多半只是在紅軍的威脅下，在蔣介石一時抽不出很大的力量來援助他的情況下，「企圖以抗日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閻錫山則「可能反蔣而不抗日來替日本清道」。如此種種，「仍是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反映」。具體說到張學良就是：「英美日在中國矛盾更加尖銳，蔣張以英美爲背景，聯合反動各派，以新的欺騙緩和革命」。

不管張學良、王以哲的主觀動機如何，也不管中共領導人對他們的行動怎樣去理解，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正是從這時開始，越來越多的國民黨人開始來找共產黨和紅軍尋求妥協甚至合作了。就連閻錫山也四處「找國際及（中共）黨的關係」，並三次與中共北方局代表秘密交換看法。而駐守太白鎮的東北軍一〇六師師長沈克，這時也背著張學良秘密地與中共和紅軍達成了妥協，允許中共中央利用一〇六師防地作爲與西安及華北地下黨聯繫的交通線，甚至主動借給處於經費困難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楊虎城這時也在積極尋找中共關係。只不過楊虎城過去長期與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統有聯繫，因此雖見到汪鋒和汪帶去的毛澤東的信件，也見到中共西安黨組織提出的談判條件，

卻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統負責人王世英找來，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說明，他一貫都是革命的，也贊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但目前他只能做到：㈠聯絡東北軍中上層將領，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運動再變爲不合法運動；㈡整頓內部；㈢與中共的關係是：⑴維持原防，互不侵犯；⑵交通運輸上在可能範圍內可以幫助；⑶不嘩變他的軍隊；⑷絕對保守秘密，包括不給他寫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電臺聯繫[48]。

楊虎城的態度，很典型地反映出這時乃至此後相當一批試圖與共產黨保持秘密聯繫的國民黨人的特點。他們大多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處處受蔣系排擠，與蔣系有明顯的矛盾；但他們相互之間爲了各自的利益，又很難聯合起來，因而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只能臣服於蔣介石南京政府之下並受其宰制。正是這種矛盾屈辱的地位，使得他們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覺到自己與敢於公開反抗蔣介石，而且生命力極強的中共紅軍，有著某些共同點。爲了生存和地位，他們不得不到處給自己留下後路。因此王世英評價說，這種人「凡事謹愼機警，鬼心眼兒特別多，深恐上當，於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攤子搞光，地位弄丟」[49]。楊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願意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共和紅軍保持關係，一方面又不願同中共和紅軍訂立正式協定，明確合作關係，其原因多半也就因爲此。相比較而言，開始時眞正能夠與中共和紅軍實現合作關係的，也就只有張學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農前往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會談之後，雙方之間的電臺聯繫就正式建立起來了。彭德懷盡管根據李克農的報告，對張學良不夠信任，但統戰工作畢竟仍在繼續，加上彭對王以哲的印象較好，相信王對抗日態度誠懇，只是較軟弱，因此頻頻去電加以影響，雙方的聯繫可以說還相當密切。還在李克農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二十三日，彭德懷就致電王以哲，進一步轉達了毛澤東關於願意推舉張學良爲抗日聯軍總司令的意見，強調日本進攻甚急，「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爲目前救國圖存唯一策略，務請我兄從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實現」。同時，彭德懷表示：「爲求得各種問題更進一步了解，深望與兄在延安一晤」。二十四日，彭德懷雖得到王以哲回電，知道王並不急於見面，「雙方協商具體答復須俟張回」，但彭德懷仍於二十六日再電王以哲，強調：爲秘密迅速完成抗日準備，對於抗日軍餉、彈藥及技術兵種的籌備，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據地的確立，國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等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及兄等早日見面。否則，日本帝國主義將阻礙或破壞吾人抗日之實現。

彭德懷這時所以再三致電王以哲，要求迅速合作，並且一再電邀王以哲會面，已經不單純是出於對王的好感了。因彭此時又進一步得知：洛川會談後，王以哲即召集幹部訓話，宣稱打紅軍戰鬥快要結束，三個月後東北軍就要去打日本了，因爲日本準備大舉進攻，我們已無路再退。而且據探報，「王以哲部聯合紅軍打日本空氣甚濃厚，其特務連副連長秘密來我處接頭，河北大明抗日義勇軍有四千餘人，其首領也派人到洛川」。注意到這些情況，彭德懷自然試圖對王以哲多做爭取工作。可是，王以哲也確如彭德懷所估計，政治上較爲軟弱。由於他是在張學良的命令之下與共產黨進行聯絡，他無論如何不敢越俎代庖，更擔心背上一個暗中與紅軍通款的罪名。因此，他對彭德懷的再三相約始終不敢應允，其覆電更明確加以拒絕。稱：所商大計均須待張學良先生決定，但張先生尙無回電，殆已離省。如此奔走去矣，預計數日內當有回電及確切決定，爲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單獨先與兄晤。

一月二十七日，爲實行前此在瓦窰堡會議決定的一九三六年第一步東渡黃河，進攻山西的作戰計劃，中央軍委下令十五軍團先期北上，

開往甘谷驛與延長之間的張家渠。次日，一軍團在甘泉以東之臨眞鎭也舉行抗日討賊誓師大會，第二天全軍亦遵命北移延長地區。至此，彭德懷也必須要帶領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軍司令部向北移動。二十九日彭德懷抵達臨眞鎭，三十日趕到延長，其與王以哲見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紅軍是否應當東渡，東渡目的應以何者爲主，根本上也就是說，當前形勢下紅軍作戰究竟是應當以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爲中心任務，還是應當以打通蘇聯爲中心任務，這一點已經在中共領導層產生了爭論。特別是在紅軍主力南下迫使張學良放棄剿共，轉而求和，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統戰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際，彭德懷深感「立刻東渡，致壓力一失，恐國防政府立刻實現之機會也立時失去」。況且在張學良東北軍事實上已經與紅軍停戰的情況下，「鞏固的向四周發展，很容易擴大現有之蘇區人口一倍，並取得與陝東南與外蒙直接的連絡，對全國革命領導有極大意義」，而冒險東渡，不僅回防困難，新根據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現有根據地也有重新變爲游擊區的可能。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彭德懷等人明確認爲目前戰略方針是錯誤的，它不僅帶有冒險成分，而且可能走到離開蘇區的危險，因而紛紛致電中共中央，請求重新考慮。還在二十四日，彭德懷即有電報給中共中央，提出：「向東有與陝北蘇區一時隔絕可能，閻張聯合壓迫我軍於察晉邊境，則我有過早與日帝接觸之不利。同時在客觀上緩和了國民黨內部某些衝突，並可取得日帝對國民黨的暫時的部分的讓步，來共同對付我們」。他認爲：「目前應以不放鬆威脅張學良，幫助目前交涉的順利進行，並繼續鞏固與擴大南面陣線，以主要力量向北發展，恢復神木、府谷、榆林、橫山蘇區」爲主。東渡只應在宜川、延長、延川、綏德一線渡河容易，閻軍防範不嚴時才是應當的，而其目的也只應限於「求

得消滅晉軍之一部，調回孫楚、李生達部這一戰略上的佯攻」[50]。

問題在於，中共中央在最初考慮一九三六年軍事方針時，就不純粹是從打通蘇聯這一點考慮的。打通蘇聯或打通國際路線，一向都是同紅軍生存問題聯繫在一起的。中共中央雖確信陝北可以立足，但從眼前利益考慮，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糧食及兵源都不能解決；從長遠利益著想，地貧人稀的陝北地區無論如何也不適宜紅軍的進一步壯大與發展。況且從對日戰爭和更大規模與國民黨軍作戰的前途考慮，紅軍也必須設法打通蘇聯。可是，要依據陝北向北去連接外蒙，則必然要經甘北而入寧夏，結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糧越少。再加上寧夏地區少數民族甚多，往往圍寨而居，攻取不易，這更是紅軍作戰之大忌。因此，要解決紅軍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也只有向東這一條路。故中共中央於二十五日覆電彭德懷說：常委考慮過你的意見，認爲：甲、向北是沒有出路的作戰，要單純的打堡壘，則糧食亦無辦法；乙、張學良如有同我們聯合解決陝境內蔣介石部隊的決心，並願劃渭水以北地區給我們，則我們自可不過黃河，而以對蔣作戰爲目標，但此可能我們認爲很少的；丙、除此則只有取得閻錫山爲對手，基本的作戰方針取穩紮穩打，依據黃河發展，並以調動孫楚，求得陝北殘敵的肅清[51]。

不過，對前此以打通蘇聯爲中心任務的軍事方針表示不同意見的，已不僅僅是彭德懷等在前線的軍事領導人和陝西地方黨的幹部。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人這時也開始持懷疑態度。最先主張打通國際路線的張聞天，這時明確認爲：打通蘇聯，接取援助，改善紅軍之技術條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舉影響到根據地的鞏固，則可能適得其反。「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因之，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曾經力主應以打通蘇聯爲中心任務的周恩來等，這時固然不同意將打

通蘇聯解釋爲單純的技術條件之取得，強調「打通蘇聯我們認爲不是一個單獨的技術問題，這包含著整個黨的政治任務及戰略總方針之實現問題」，但他們也認爲：就目前階段而言，「擴大紅軍、擴大蘇區與游擊區，更成爲急迫萬分的事」。李德這時的態度更明確。他直接上書中共中央，認爲現有力量對比情況下，進一步向山西挺進本身就帶有冒險性質，而把靠近外蒙，同蘇聯聯繫當作主要戰略目標，就更是錯誤，因此「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中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52]。面對這樣多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在一月三十一日於延長召開的軍事會議上，雖然仍舊說服與會者不改變原定之第二步計劃，即繼續實行東征，以便解決兵源、糧食不足的困難，同時擴大蘇區到更好些的地境。但會議最終不能不同意，取消原定計劃的第三步，將一九三六年的軍事方針僅僅限制在擴大蘇區和紅軍的目的上，全部作戰著重於鞏固的發展，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正因爲如此，與會者明確認爲應當抓緊一切可能，迅速與對蘇區南線威脅最大的東北軍達成協議。彭德懷據此於二月三日及六日又兩電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農再赴洛川商討一切。其六日電稱：㈠數日來未通書信，殊深繫念。張總赴京多日，情況如何，請電告。㈡共產黨中央近復號召國防會議，共謀抗日救國，不久可派李克農兄傳達此意，並質高明[53]。

王以哲接彭三日電後，即轉張學良，因張此時已決定歸來，故王以哲爲等張學良回到西安提出見面時間因而沒有及時答覆彭德懷的兩封電報。延至九日，張學良又電告王以哲，說明暫時因事耽擱，不能立即返回，王這時才覆電彭德懷，表示：擬由李克農兄來此商討一切，極所歡迎。因張先生暫時因事耽擱不能即歸，故目前只能將尊電轉達並俟其歸來時再行電商。

二月十五日，張學良終於返回西安。這次，張學良的態度與前次

相比，又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張在上次與李克農面談回西安後，意外地見到持有南京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公函，受命接通國共兩黨中央關係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謀求政治解決中共問題。據張學良後來回憶說，當時董健吾持財政部公函要求赴陝北蘇區，「良親爲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眞實任務，難獲通過，（彼）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張隨後即飛南京，亦經蔣證實董健吾確負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這件事對張學良觸動之大，十分明顯，以致張學良後來曾斷言：正是這件事使其下決心與中共謀和，故「這是共產黨最成功之策略之一」[54]。但事實上，這件事與其說是共產黨的策略，不如說是蔣介石的失著，因董健吾赴蘇區轉達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張學良看得如此重要，並牽動其心弦，其要害之處並非在於董健吾此前曾爲共產黨員，它根本上在於董健吾使命的南京背景。既然蔣介石也要秘密謀求與共產黨之間的和平，他張學良和東北軍自然沒有必要爲剿共而賣命。這不可避免地使張學良感到，其與共產黨謀求妥協於情於理都無可非議。

基於這種情況，張學良自然對與中共秘密商談更加重視。還在張學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際，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電彭德懷，要李克農去洛川面商大計。同時，雙方正式建立起電臺聯絡，只是爲保密起見，雙方約定了各自主要聯絡人物的通電代號。

二月十八日，彭德懷得到高福源來電，立即通知周恩來命李克農速去洛川。

鑒於此次談判意義重大，爲爭取最佳結果，彭德懷和毛澤東於次日又聯名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明確要求張學良以華北事變爲鑒，認清蔣介石的賣國嘴臉，切不可心存幻想，與虎謀皮。電稱：

> 日本滅亡中國之一切行動均得到南京政府蔣介石之贊助與擁護，希望其起（而）抗日，實無異於與虎謀皮。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為蔣賊等所深恨，造作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之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則他勝幸甚。但對於蔣賊之陰謀暗算，切實嚴防。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面談一切，望接洽。[55]

當然，通過前次談判，毛澤東等這時多少對張已有所了解，因而並非眞的以為可以輕易勸說張學良贊成「抗日反蔣」。在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給李克農的談判訓令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這次並沒有設定過高的談判目標。訓令所規定的談判原則如下：

> (一)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
> (二)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 (三)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衆、喪國辱權的會議，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但在此談判中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造成尖銳對立，致妨礙初步協定訂立。
> (四)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問題付之，全國人民公決，而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做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之政府為度的初步討論。
> (五)如張提出取消暴動，則克農即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全國抗日，如此則自無暴動之必要，否則以暴動戰爭對付日本與賣國賊，是中華民族的神聖事業。
> (六)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
> (七)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56]

基於上一次的正式接觸，中共中央此時對張學良的估計相當實際，這就是：張學良之所以願意與中共談判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根本上是因為他懼於紅軍的威力，加上東北軍以及全國範圍抗日情緒高漲，同時他也對蔣介石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控制不滿。但是，張學良目前還不會馬上接受共產黨的「抗日反蔣」主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軌道，引進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最後瓦解紅軍」[57]。因此，談判目的，並不在於爭取張學良參加反蔣，僅僅是「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而已。

二月二十一日，李克農起程經甘泉道草鋪前往洛川，於二十五日抵達。不料張學良因事又突然離開西安，連王以哲也不清楚張此行之目的。但張學良行前顯然已經向王以哲布置過與中共談判事宜，因此，王以哲此次不僅表現出「抗日熱情極高」，主動表示願意向華北宋哲元及韓復榘等處宣傳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主張，而且對成立雙方協定也相當積極。王以哲還坦率地提出有關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被圍軍隊及其交通的徹底解圍的三項辦法。經過磋商，雙方於二十八日初步達成如下「口頭諒解」：

> （甲）由膚施至甘泉至鄜縣沿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內雙方均不駐軍隊，凡經此之一切補充，均不得阻攔，雙方並負有互助幫助之責。但雙方均不應攜帶武器，在該地區亦不得有

偵察或破壞等行爲，該地區政府亦應非武裝化。紅軍過路應予通行，惟紅軍部隊橫過馬路時，應事先通知東北軍。

（乙）爲避免雙方衝突起見，凡甘泉膚施城周二十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採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衆不得強買強賣。

（丙）如蘇區民衆須至白區採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爲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後，蘇區民衆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爲。[58]

上述「諒解」，在毛澤東等看來無非就是要紅軍解圍，既然成爲友軍，互不侵犯，這一點自然不成問題，甚至條件還可以再放寬些。毛澤東在二十九日的覆電中進一步提出，可以考慮：

（甲）爲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

（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

（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衆憑價購買，爲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埃發動群衆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

（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係，紅軍採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59]

王以哲對毛澤東所提方案當然贊成，只是他無權對整個東北軍的

行動作出許諾，因而他把毛方案中有關東北軍的字樣，統統改成了六十七軍。同時，增加了紅軍進入白區採買貨物需著便裝的文字。不過，王以哲最關心的還是如何使紅軍與東北軍脫離接觸的問題。他誠懇地請求毛澤東和彭德懷同意：「爲保證永久的雙方安全，紅軍圍甘部隊應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軍不得進駐；另沿鄜甘膚馬路雙方亦不駐軍隊，惟蘇區政府武裝不在規定之內，此又可掩人耳目，對外搪塞」。對此，毛澤東等答應得十分痛快，他在給李克農的回電中稱：抗日救國大計既定，凡屬有利友軍而無妨大局之事，我方無不樂從。望轉告王以哲，以後隨事商量，可不拘形跡[60]。隨即，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所屬有關部門：「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現先與六十七軍王軍長以哲所部訂立……局部的口頭協定，並於三月五日開始執行」。陝甘「兩省省委及軍區應將本協定各項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鄜縣等靠近六十七軍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縣區鄉黨部、政府、民衆團體、紅軍、游擊隊、赤少隊，解說明白，並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係，以達成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定之目的」[61]。

僅僅把紅軍與六十七軍的關係保持在一種和平的水平上，自然與中共中央的期望甚遠。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要「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定」。但能夠同王以哲如此順利地達成諒解協定，看來多少使中共領導人爭取張學良東北軍「抗日反蔣」的信心又有所增強。而三月五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再度會談的結果，顯然更有理由使他們感到樂觀。

張學良是三月三日返回西安的，他當即就通知王以哲，說明他將前來洛川與李克農見面。五日凌晨，張學良駕機飛抵洛川，立刻與李

克農見了面。與原先預想的相反，張學良關於抗日應當聯蔣一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農準備用來應付張學良在政治上發難的種種答詞，幾乎完全沒有派上用場。張學良當場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夠儘快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延安進行會談，並派代表常駐西安。同時，張學良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這無疑也是中共中央所想的。還在三日上午，彭德懷、毛澤東就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轉告張學良、王以哲：「深望張副司令王軍長領導東北軍完全團結，與我合作到底，並確立聯俄政策。當今之世，惟有蘇聯是眞正反侵略者又眞正有實力者，英國亦探聯俄政策，中國更應速決大計」[62]。如今，張學良主動提出秘密聯蘇問題，這意味著，他與共產黨更加接近了。

第四節　延安撥霧

李克農與張學良洛川會談所取得的結果，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兩條。據李克農三月五日報告，其一爲雙方負責人見面地點已經約定爲膚施，時間在一星期內；其二爲雙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張學良一方人選二三日內即可派定。在這裡，格外値得注意的是時間。要求在一週之內立即與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談，並保證在兩三天之內就可以選定東北軍方面赴蘇交涉的人選，這再明顯不過地反映出張學良對此已早有準備，此時心情更是急迫萬分。

張學良決心和共，自然有種種原因。據張學良自己所言，最初是鑒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去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所得的感概。概括言之有六點：「㈠朋友之諷勸，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㈡少壯同志則責良，不應同所謂親日者輩，同流合污。㈢刺汪兇手孫鳳鳴之行爲和言詞。㈣黨內之紛爭，多爲私，少爲公。㈤良認爲中央負責之同志，不熱衷抗日，而其反有內心爲親日者，而良個人之觀念上認爲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㈥汪兆銘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認爲非是對外，乃係對內」。所有這些都使張學良對於理應肩負抗日救國重任的國民黨日漸失去信心。但更爲重要的轉變看來還在東北軍三次剿共作戰嚴重失利之後，尤其是牛元峰師覆滅，張學良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趕回西安之後。這時東北軍兩個師接連覆滅，「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認爲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匪之戰鬥力，不爲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63]。由此就有了一九三六年一月趕赴洛川面見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負責與中共接洽，二十一日再赴洛川秘密會見李克農，許諾親去南京遊說抗日等事情發生。

從張學良與李克農第一次交談的情況看，他當時對遊說各方抗日頗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閻錫山來與中共會談，力圖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後，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當局也在秘密地與中共進行接觸，一負有接洽任務並化名王牧師者(即董健吾)「持有財政部公函見良，要求進入匪區」。此事更使張學良有所疑惑：爲何一面令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消耗，一面卻越過東北軍去與中共謀和？這不能不使張學良再添不滿。既不信任國民黨南京當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蔣介石有借刀殺人之意，這自然使張學良開始與蔣介石離心離德。張自述：「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並已動搖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再見不能成功，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衆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衷，……實動我心」[64]。於是，他從此開始放棄原先遊說南京的設想，

轉而與南京以外之各個地方實力派領袖頻頻聯絡，甚至與剛剛從新加坡回國的西南反蔣派的領袖胡漢民，暗中往來磋商大計。

僅僅幾個月時間，張學良就已經日益明顯地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了。面對遙遙無期的剿共戰爭，張學良深知以東北軍繼續硬撐下去只能拼光老本，從而受到所有東北軍人，乃至東北人民的唾罵。張學良已再無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於爲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有可能回家鄉，也只有抗日才能對得起爲他東征北戰、拋頭灑血的十幾萬東北軍人，和許許多多流亡關內的東北人。然而蔣介石卻不做此想，他的原則是「攘外必先安內」，要抗日必須先剿共。在張學良看來，這一政策所導致的切身問題卻是，如果共產黨剿不了，剿不完，豈不是抗日無期？何況，張學良已經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數「勇於內爭，怯於禦外」。既然如此，張學良只好另謀出路了。張後來回憶，他數次與這時在上海的東北抗日將領李杜討論過如何才能收復東北的問題。李杜「曾向良表示，擬返北滿招集舊部，再從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贊許」。但李杜明確認爲，而今要收復東北或在東北抗日，必須與蘇聯和中共進行合作，否則將難以進行，故「彼要求數事：(一)去北滿時，必須經俄，其次北滿已有共黨活動勢力，故必須向共產黨取得聯繫。(二)路費及活動款項由良供給。(三)請良選派二人幫彼辦事，並任聯絡。」對於李杜所請，張學良後來自稱他當時就全然表示同意[65]。可是，張學良沒有進一步說明的是，李杜這裡所謂「幫彼辦事」云云，其實就是代表張學良去與蘇聯政府聯絡，請求蘇聯給予援助。

蘇聯政府會不會輕易同意援助他張學良呢？關於這一點，張學良內心其實非常清楚。

中國東北一向在俄國與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日俄兩國在東北從來勢不兩立，即使在蘇聯成立之後，這種矛盾衝突依舊是其遠東外交

政策最主要的制約因素。蘇聯政府對中國的一切政策，幾乎都要受到這一衝突的直接影響和左右。一切便利於日本擴大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人物和事件，無論如何都是受到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的。而一向爲「東北王」的張作霖從來依靠日本，蘇聯政府最初幾度試圖施加影響，結果張作霖不僅毫不領情，反而爲爭取日本及英國對其北京政府的支持，竟以武裝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公布蘇聯秘密外交文件的極端措施相報，這使得蘇聯方面對其留有極惡劣的印象。張學良繼承其父張作霖的地位之後，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慫恿下，舊事重演，輕率地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繼而試圖以武力收復根據一九二四年中蘇條約仍舊主要由蘇聯人管理的中東鐵路，引發了著名的中東路事件，此舉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蘇聯人。直到東北三省淪陷之後，張學良才漸漸意識到其前此作法之不智，因爲從日本入侵東北三省之後整個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情形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這個世界上，唯獨只有與日本積怨甚深，並直接受到日本進攻威脅的蘇聯才是可能幫助他實現收復東北願望的強大力量。爲此，張學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旅歐期間，曾再三想與蘇聯方面取得聯繫，先是通過南京政府駐法公使與蘇聯大使聯絡，要求訪蘇，後又通過東北前抗日將領馬占山等私下與蘇聯有關方面進行交涉，結果全都毫無結果。蘇聯方面對張學良的不信任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張學良所不了解的是，蘇聯情報機關這時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過張學良，以探詢張學良與蘇聯絡的眞實動機和背景。他們當時曾通過歐洲的共產黨組織派了一名叫余斌的華裔英國共產黨員，秘密了解張學良的情況。據余報告，他同張學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個月，張確實對蘇聯抱以極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強調余應當到蘇聯去學習，爲此他願提供一切費用[66]。

要抗日，必須聯蘇，這一點張學良早已確信不移。但蘇聯能否改

變對自己的態度，張學良竟無從了解。如何才能接通蘇聯，並使蘇聯接受如今的自己呢？過去，張學良只能寄希望於南京政府，如果蘇聯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是援助了自己。如今，等了五年多之後，特別是在與紅軍交手受挫之後，他已深感絕望，相信要等南京政府眞正完成安內與統一再來抗日，恐怕是河清無日了，因此，他不能不設想通過另外的途徑來推動中國走向抗日。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轉而寄希望於中共之幫助，是再合理不過的了。事情明擺著，在中國，中共是蘇聯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蘇聯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獨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願意爲其奔走，蘇聯或者會愛屋及烏，逐漸對他張學良另眼相看的。不過，張學良最初看來並不相信遠在陝北窮鄉僻壤的中共和紅軍，會與蘇聯有什麼直接的聯繫，因此，即使在與陝北紅軍接上關係之後，他也仍舊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機會，親自前往上海，請李杜代他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秘密組織或上海的共產黨。很顯然，他並不清楚，這時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絡的樞紐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難以成功。

不得已，張學良只好又反過頭來求助於陝北的紅軍了。特別是張學良二月下旬外出期間，注意到紅軍二月二十日開始發動的東征山西的戰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線」的旗幟，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這是因爲，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稱的閻錫山與張學良在對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問題上頗有些共同語言，張正在努力爭取得到閻錫山的同情並與之達成共識，以此來形成對蔣介石的政治壓力。紅軍如今一打，難免會逼使閻錫山轉而支持蔣介石的安內政策，使張學良的勸說工作前功盡棄。另一方面，紅軍東征山西，勢如破竹，輕而易舉地擊潰了閻錫山五個團，俘虜一千二百餘人，占領了石樓、中陽、孝義、汾西、隰縣、永和六縣近四千平方公里的地區，如果紅軍眞的照

其公開宣傳的目的，全力以赴殺上華北抗日前線，難免不會很快與在華北的日軍發生接觸，結果很可能誘發全面戰爭。考慮到目前國民黨各個實力派別的不同心態，若不能盡快接通與蘇聯方面的聯繫，此種作戰能否引起全國範圍的響應和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頗難預料，那時情況或將變得更爲複雜，甚至不利，也說不定。這也是張學良急於在一週之內會晤中共領導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實際上沒有能夠在三月五日之後的一週時間內見上面，這次會晤的時間因爲種種原因竟整整推遲了將近一個月。

在接到李克農的電報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於三月五日當天就從山西前線發來回電，說明原可派在陝北後方指揮一切的周恩來與博古二人之一前去會談，可惜此二人這時均已去山西前線參加重要會議，如果約期迫切，最早也只能於三月十七日左右趕到延安。不料，張學良由延安飛向西安途中，先是發現所乘飛機出現故障，後又突患喉症，再加上中共中央早已決定要在山西石樓召開重要會議，討論和貫徹剛剛得到的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的文件，以便統一黨內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剛剛趕來山西的負責陝北工作和與東北軍談判的周恩來如果因此不能出席，未免不是一種損失。因此，這次會談只好向後推延了。

這時，東征山西之紅軍前鋒已經達到文水、交城、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一線，並占領了同浦路之一段。閻錫山在山西的整個統治因此而嚴重動搖。山西一向是閻錫山的獨立王國，如今閻卻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求援了。於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陸續開始進入山西境內，同時爲加強陝西圍剿和牽制的兵力，蔣介石也進一步調派中央軍開到陝西來。可是，這樣一來，紅軍所面臨的形勢就漸漸變得不那麼一帆風順了。不過，更加爲此而焦慮的，這時其實還不是中共

中央，而是那些在陝北地區與中共和紅軍暗通關節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將領們。張學良在與李克農的談話中，就明確認爲，打閻錫山政治上未必好，山西不易立足，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不得到蘇聯的援助，靠自己單獨來抗日很難成功。楊虎城部負責與紅軍聯絡的軍官也紛紛對紅軍的行動表示難以理解。孫蔚如軍長更是直截了當地對中共代表說：紅軍過黃河是不妥的。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的影響，而且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軍的藉口。另外一些軍官甚至斷言：「紅軍到處都是幫助蔣介石解決雜牌軍隊的」，在四川、貴州如此，「現在又是這樣」。東北軍中了解張學良和共密謀的幹部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尤其擔心中央軍大舉開入陝西，那樣勢必會使驅使剛剛停止下來的剿共戰爭重新展開，東北軍難免再度成爲犧牲品。即使不考慮此點，以紅軍現有之兵力，與閻錫山作戰也未必有決勝的把握，一旦失利，前途亦不堪設想。

但友軍的擔心看來並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時陝北蘇區南線已經分別同東北軍之六十七軍和楊虎城駐宜川的部隊達成了諒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經被擊退，高桂滋部也已經同紅軍達成默契，其駐周家嶺一帶的八十七師五一一團甚至與紅軍簽訂了一個書面的互不侵犯協定。因此，原來關於紅軍主力東去，陝北蘇區將會變成游擊區的那種擔心，在中共中央內部幾乎不復存在。加上紅軍東征一直相當順利，這時也還是處於順境之中，並未遇到嚴重抵抗，中共中央這時十分希望能夠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因此，中共方面還並不認爲形勢已經有了不利於自己的變化。當然，爲求得友軍，特別是東北軍高級將領能夠對紅軍的行動多少有所理解，毛澤東與彭德懷於三月二十日專門致電張學良、王以哲及全體東北軍官兵同志，強調：

> 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侵略華北，危及晉、綏，復受日帝指揮，派兵六旅之衆，屠殺陝北蘇區民衆。國人痛憤，罪不容誅。鑒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錫山竟爲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攔阻紅軍，……敝軍迭次宣言，全國紅軍白軍亟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閻錫山置若罔聞，不顧民族國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與同胞爲敵，誠不識是何居心。諸公深明大義，抗日救國早具同心，應請仗義執言，責閻錫山以叛國之罪，勸其即刻悔悟，撤其攔阻紅軍之兵，開赴張家口與紅軍一同執行抗日任務。敝軍本民族大義，決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賣國，繼續執行日本攔阻紅軍之任務，則紅軍爲貫徹抗日目的計，不得不首先誅此賣國賊。至於陝甘蘇區(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爲抗日戰爭之後方，堅決鞏固此後方，使我抗日將士安心殺敵，應不獨紅軍與全蘇區抗日人民之責，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愛護維持之心。倘有攪亂此抗日後方者（例如毛炳文輩），願諸公與敝軍聯合制止之。[67]

指閻錫山爲賣國賊，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紅軍這時軍事行動的一種需要。至於閻錫山這時對抗日態度如何，其與張學良有何種共鳴，中共方面自然一無所知。其實，閻錫山此前與張學良一樣，也在找國際（指共產國際）及黨（指中共）的關係。據北方黨部軍委負責人王世英幾天之後的報告看，閻錫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設法與中共方面進行聯絡，至二月紅軍東征之前，閻本人至少已經與北方黨部的代表有過三次談話。閻所擔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繼續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對於中共代表所稱中國唯一出路在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閻錫山明確表示贊同，但聲稱中共的說法不論站在民族方面、國家方面或民

衆方面，都是對的，只是在房子裡談可以，站在他的立場，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卻不可以，「因爲一談就是很大亂子」。而對於中共代表所說山西唯一出路在與紅軍訂立協定，閻錫山則表示異議，他也知道山西確在危機之中，東有日本，南有蔣軍，西有紅軍，但他的態度是對誰也不妥協，保持中立，堅持繼續獨立控制山西局面。他聲稱：他的防共保衛團計劃每年訓練十五萬人，三年可訓練四十五萬人，到那時他什麼都不怕。可是，不論閻錫山如何嘴硬，他主動的並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談話，清楚地說明他這時已經頗爲恐慌和動搖，對閻錫山展開統戰工作並非毫無可能。但看起來，由於戰爭的關係，儘管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經聽取了王世英的口頭匯報，其對閻錫山的態度一時仍難以有所改變。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的文件精神討論了統一戰線方針與軍事行動計劃問題。根據討論情況可知，中共中央這時以「聯俄聯共」爲分水嶺，把國民黨區分爲「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兩大類，仍舊把閻錫山歸爲「民族反革命」一類，認爲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馮玉祥、閻錫山等爲「民族反革命派」，「堅持反革命立場」，「反對聯俄聯共」。只是，分析承認，這一派內部也並不統一，沒有口號，有些甚至可能在民衆逼迫下假裝抗日，可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戰線。除此之外，一切聯俄聯共者，均可視爲民族革命派，但他們中間仍可分爲三類，右翼不用說，與蔣無嚴重區別，重要的是中間力量，張學良就屬於這一派。分析認爲這一派反對日本殖民政策，主張聯俄聯共，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只是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義者，都不相信中國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由此可知，一方面由於張學良前此談話中不主張反蔣，一方面也因爲張學良、馬占山、蔡廷鍇等軍事領袖所具有的特殊身分，中共中央這時對張學良的評價還並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來，自己眞正的同盟者應當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這就是以宋慶齡爲代表的軍隊中下層、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勢力，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故「此爲我們與反革命爭奪的中心」。至於如何有效地爭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認識很一致，第一，必須要高舉抗日的旗幟；第二，必須要高舉聯俄的旗幟。當然，對於這時的東征抗日問題，毛澤東也做了專門的解釋，說明中共中央提出「全國紅軍集中河北」的口號，並非就眞的要立刻去河北尋日本開戰。他指出，紅軍固然不怕與日本作戰，也不必等到數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終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非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不可。在目前這種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下，沒有蘇聯的援助和參加，僅靠紅軍的力量直接對日作戰，是不可能的。要想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首先必須實現紅軍與蘇聯接近，蘇區與蘇聯打成一片。故東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線，「唯一的任務是取消賣國賊的資本，並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的根據地，爲聯蘇抗日做準備[68]。

李克農這時也已經趕到山西石樓，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毛澤東上述的談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針對張學良的一些說法講的。把張學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類，反映出共產黨人已經明確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時還不滿意他革命的不徹底和不堅定。但無論如何，中共中央這時已經把張學良確定爲革命派，對他和東北軍的政策自然與對反革命派蔣介石的政策截然兩樣，因此，紅軍對東北軍，特別是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這時已經建立起十分密切的關係。被困數月之久的甘泉守軍，在紅軍的引導下，終於實現了久已經渴望的換防，久被圍困的延安城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糧草接濟。

三月下旬，張學良終於再度回到西安，並如前約邀請周恩來前往延安會談。於是，四月五日下午五時，王以哲致電毛澤東與彭德懷，代表張學良請周恩來迅速前往延安。電稱：現張學良先生擬於本月八日晚上八時在膚施與貴方代表周君恩來晤談，請兄如期至膚施城外附近暫駐，等我方派人去取聯絡，且將到城之地址見告，以免屆時有誤爲盼。

接到毛澤東、彭德懷轉來的電報之後，周恩來立即作好了出發準備，並於次日上午八時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他和李克農準備於七日動身前往延安，八日下午六時前可以趕到延安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等待東北軍派人聯絡並接引入城。六日十二時，毛澤東與彭德懷立即將此一情況通過電報通知王以哲和張學良。但不料，因雨雪將至，天陰電大，雙方電報均發不出去。故周恩來等於八日下午到達川口之後，一直等到晚上十點仍未見延安來人接引。張學良、王以哲也停在洛川未動，等待消息。直到九日晨毛、彭再電洛川說明情況後，張學良與王以哲二人才於上午由洛川飛往延安。當晚八時，周恩來、李克農等也終於由張學良派人接引進入延安城。

延安會談由四月九日晚九時至十日凌晨三時許，進行了將近六個小時之久。關於此次會談的內容，如今各種記述中比較流行的是兩種說法。其一是張學良本人在將近二十年之後寫的〈西安事變懺悔錄〉裡的說法。張學良在裡面這樣說：

>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良告彼，中央已實施抗日準備，蔣公宵旰爲國，雙方辯論多時，……周承認蔣公忠誠爲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蔣公舊屬，如中央既決心抗日，爲什麼非消滅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熱誠之共產黨不止？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受蔣公領導，進而討論具體條件：（大致如下）
>
> (1)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
>
> (2)擔保不欺騙、不繳械。
>
> (3)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產黨武裝同樣受點編。
>
> (4)取消紅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
>
> (5)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
>
> (6)共黨停止一切鬥爭。
>
> (7)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
>
> (8)准其非軍人黨員，居住陝北。
>
> (9)待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一如國軍，復員遣散。
>
> (10)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爲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然等等。[●]

依據張學良的這種說法，延安會談所討論的，完全不是如何抗日，如何聯蘇的問題，倒是如何使紅軍受南京政府改編，與共產黨如何服從蔣介石領導的問題。嚴格地說，蔣介石在一年之後試圖做到的也不過如此，結果尚未能完全如願，而這時張學良卻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蔣介石還要圓滿得多。這樣一種說法顯然頗難使人相信。

另外一種說法多半來自於劉鼎。在延安會談中，參加者只有五個人，即張學良、王以哲、周恩來、李克農和劉鼎。以後由於王以哲死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來、李克農均無關於此次談判的系統回憶，唯一還有系統回憶的就只有劉鼎了。

劉鼎，原名爲闞尊民，一九二四年赴德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五年

八月受中共旅歐支部指派，隨朱德等六十人經莫斯科回國參加工作。但到莫斯科之後，因情況發生變化，劉鼎等二十二人被中共旅莫支部決定留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進行學習，並在東方大學期間成爲中共黨員。經過幾年學習之後，劉返回國內參加工作，直至一九三四年底被捕，後入九江反省院。一九三五年十月，劉獲保釋出獄，並返回上海。十分偶然的是，恰好張學良此前曾用過一位叫潘文鬱的留蘇學生作秘書，其人雖然已經脫離共產黨，但對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各種主張，特別是對蘇聯的情況相當熟悉，能力極強，給張學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0]。此時張學良又要聯蘇，又要聯共，身邊恰好非常需要像潘文鬱這樣的參謀。因此張學良要求李杜代爲尋找。李幾經周折，終於通過一向與上海共產黨組織有關係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找到了劉鼎。劉鼎的情況恰好與潘文鬱的情況十分相似，其剛從監獄經保釋放[71]，到張學良處工作政治上也不會引起麻煩。故李杜將劉鼎的情況通知張學良後，張相當滿意，很快於三月下旬派參謀趙毅前來上海，將劉鼎接到西安。雙方幾次晤談後，張即帶劉前來延安參加會談了[72]。

劉鼎關於延安會談內容比較完整的文字回憶，見於其一九七五年間所記的追記筆記。據劉所記，當時總共討論了六個方面的問題，分別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抗日救國道路問題、聯蔣抗日問題、聯蘇問題、停戰通商等問題，以及培養幹部的問題。毫無疑問，劉鼎因爲後來曾經長期擔任編寫《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組長一職，因此對周恩來會談之後給中央的談判報告的內容是很清楚的，其筆記中無疑利用了當時周恩來報告中的許多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鼎在回憶中也有與周的報告不同的內容。這就是所謂「聯蔣抗日」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無論是在中共中央爲談判所規定的內容裡，還是在會談後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裡，都未曾有過。

據劉鼎回憶，會談中，張學良最關心的就是聯蔣問題。因此他力勸中共放棄「抗日反蔣」的方針，實行聯蔣抗日。稱：

> 張學良認爲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不好辦。張說，蔣有民族情緒，在國民黨中領導力量最強，據他回國後兩年的觀察，蔣可能抗日。……蔣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錯在「攘外必先安內」，把這錯誤政策扭過來，就可以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做到這些不容易，要作艱苦工作。共產黨在外面逼，他在裡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張學良還表示，除非蔣投降日本，否則他不能反蔣。

據劉鼎說，對於張學良的聯蔣主張，周恩來的反映是：「毛澤東同志也有這樣的想法」，「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回去報告中央，認眞考慮再作答覆」[73]。

結果，張學良提出的聯蔣抗日主張促進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張學良的意見後，大多數同志感到如果反蔣口號連張學良這樣熱心聯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難了。聯蔣抗日的問題就定了下來。五月五日紅軍回師通電不再提反蔣口號了[74]。

顯而易見，張學良和劉鼎兩個人的回憶，在對蔣介石的問題頗有些相似之處，只不過一個強調當時說的是「擁蔣」，一個肯定當時說的是「聯蔣」；一個說周恩來當場承認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一個說還要回去考慮考慮。可是問題在於，這兩份事隔多年的回憶，在這一點上同當年周恩來會談之後第二天所寫的報告內容全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派去的代表，中共中央在決定

派周前去延安談判的同時，曾明確規定了此次談判的內容和原則。關於談判原則，早在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給李克農的談判訓令裡，就已經寫得明明白白，即中共不接受任何有損蘇維埃政制與紅軍利益的要求，但也不要因爲張學良不同意反蔣而與其發生爭執。至於談判內容，則具體提出五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特別迴避了對蔣問題的討論。而有關談判內容的提議，也已經通知了張學良與王以哲。這就是：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
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
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
四、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
五、責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75]

上面的情況說明，中共中央這時不僅沒有像最初那樣要求他的談判代表力勸張學良參加「抗日反蔣」，而且乾脆主張周恩來適當地考慮迴避這個問題的討論。當然，這並不等於說中共中央不準備再勸張學良另立局面，「抗日反蔣」。但既然中共中央已經了解張學良可能會有與蔣介石類似的提法，並已經在一個半月前指示李克農堅決反對，於三月下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再次明確肯定了蔣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說剛剛出席了這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的周恩來會輕易地被張學良說服，並支持張關於改變中共政策的提議，這怕是很難想像的。事實上，在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後的報告當中，確實也並不存在任何這方面的內容。

爲了便於讀者更完整地了解周恩來所報告的談判內容，我們不妨

將如今已經公開的報告做一較爲詳盡的引證。

此報告主要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張學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二部分是張學良的一些重要觀點；第三部分是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基本估計。但由於報告較長，又分兩次寫成，有些問題略有重複，加上當時收報有誤，個別字讀不出，個別段落被分割顛倒，但從報告中仍可清楚看出，雙方著重討論的是有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東征、反蔣抗日、派代表赴蘇和保證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問題。據周報告，張學良就此答覆說：第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開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蔣令，進駐蘇區。他認爲，紅軍與日帝一接觸，不打紅軍，共同抗日的運動便可引起。第二，全國主力紅軍集中河北，他完全贊助。但他認爲紅軍在山西恐難立足，但目前出河北太早，最好爭取綏遠，解決德王，以綏遠爲根據，靠近外蒙。第三，如我堅決東向，他可通知東北軍在直南平漢路西的四師與我聯絡。紅軍第四方面軍如北上，他可使陝甘部隊讓路。紅軍二、六軍團則須取得中央軍同意方可，他願爲此事活動。第四，「對蔣問題。他的問題部下確有分化，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問題是如蔣確降日，他定離開他。」第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歐洲去，我們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並派人聯絡盛世才。第六，他再不聽命，無以回答，問題是蔣有電責他，並轉閻電報，說他隔岸觀火。他原意先取關中，並求直羅鄜縣封鎖，但蔣堅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澗綏德，楊虎城由宜川出延長延川。第七，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他認爲要抗日只有此路，他願醞釀此事。十大綱領，他研究後，願提出意見。第八，最後商定紅軍在關中積極行動，在韓城澄城牽制楊部，並派人赴陝南(由張設法送去)，令陳先瑞向藍田鄠縣活動，威脅西安，以便東北軍藉口而進行洛鄜甘膚間的築碉修路(彼此交通仍舊)。如此推延

一月，看形勢變動再定以後行動。第九，經濟通商。普通購物由紅軍在他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他可代購辦，並可送彈藥。應互派一得力人僞裝偵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頭腦及色彩不濃之人在他處做事活動，克農因公開，不便在他處任事[76]。

周恩來進一步總結談話中張學良就抗日、聯蘇、蔣介石國民黨各派基本傾向及其前途等問題，所表達的主要看法時特別說明：第一，張談抗日的問題提出，(1)抗日戰爭發生後日本將在中國沿海樹立許多御用政府，封鎖中國沿海，中國抗日沿海困難。(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內部變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將如何？第二，張格外關心：蘇聯是否必幫中國？蘇聯是否眞心助中國？是否爲利己？第三，張承認紅軍是眞心抗日，剿共與抗日不能並存，紅軍東向可與日本接觸，有了導火線，東北軍即可響應。但他不相信紅軍進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勝日，故他希望紅軍到時由綏出察，可靠外蒙。第四，他認爲國民黨完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一條法西斯。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國，在國民黨要人中只佩服蔣尚有民族情緒，領導大得力，故相信幫蔣能抗日。同時他也知蔣之左右多親日派，蔣不能下抗日決心，且極矛盾。張之立場，如蔣降日，張即辭職而另幹。故現時派人去新疆聯絡盛世才，爲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張有把握。第五，張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他的內部有秘密組織，梁干喬在內。國家主義派在張處的已失敗，李石曾等已降日。蔣在張周圍有偵探，其特務均爲蔣的人。第六，張認爲閻錫山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過甚。兩三星期後張擬仍往太原，問閻是否有意聯紅軍。同時，張亦認爲閻與日人來往完全不得要領。第七，張認爲，南京蔣系分爲幾派，藍衣社（眞名復興社）爲蔣信徒。陳果夫則主聯俄，馮玉祥、于右任則主聯俄聯共，唐生智主抗日，翁照垣、蔣光鼐、蔡廷鍇主抗日聯共，陳誠、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學系、安福系、何應欽、張群等均親日，宋子文與蔣關係未恢復，張主張我們寫信給陳、胡，並找 CC 派。第八，張表示不願打紅軍，但現在不能停，蔣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現處苦悶。北進想駐清澗綏德大道，道路旁山區可爲蘇區，亦可讓出通黃河交通。同時他承認剿共北進就不能抗日。他承認在東北軍中仍要提出紅軍抗日便是我們的朋友、擁護紅軍抗日的口號。他說明東北軍進膚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駐洛川[77]。

從上面周恩來關於張學良談話重點的報告中，我們看不到在張學良的懺悔錄中和劉鼎追憶筆記中所記錄的力勸中共聯合蔣介石的那些情況。很明顯，至少在周恩來看來，會談中關於蔣介石問題的討論並不占重要地位。不過，周恩來仍舊明確提出，張學良應該離開蔣介石，和共產黨一起實行「抗日反蔣」，而張學良的回答是：「他現在反蔣做不到」，以後要看形勢發展再做決定。他這時對蔣的看法是，蔣是兩面的，旣有民族情緒，可能抗日，又爲親日派所包圍，可能降日。因此，他對蔣也是兩手，現在還想幫蔣，認爲幫蔣才能抗日，同時也注意到另一種可能，故暗中準備在西北聯俄聯共，另立局面。有誰能夠想像，處在這樣一種將信將疑，連自己都準備另立局面的矛盾態度之中，張學良會力勸中共應當擁蔣、聯蔣？其實，周恩來對張學良的這種態度也是心中有數，因此周向張解釋抗日之必要與可能，解釋蘇聯援助中國之必然與眞心，解釋紅軍在山西站得住，對日軍作戰有把握，卻並不多談對蔣問題。並非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爭論而已。因此，說什麼周恩來被張學良的擁蔣、聯蔣主張所打動，表示要回去勸說中共中央改變政策，完全不合邏輯。不僅如此，事實上周恩來仍舊把「抗日反蔣」視爲一體，他明確認爲，張學

良現在之所以還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爲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與蔣介石相對抗，而他還不能完全改變對蔣介石的幻想。周恩來於會談後第三天即說明過此點，稱：「關於目前行動，彼因對蔣尚幻想及利害關係，反蔣尚不可能，但認識蔣眞投降，彼即離蔣獨幹。」[78]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周恩來仍舊寄希望於張學良能夠轉而參加抗日反蔣。事實上，周恩來已經斷定，張學良具備這種轉變的基礎，只要條件成熟，他肯定會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周恩來總結他的印象是：估計張：

> 一、確有抗日聯共聯俄要求及初步決心，但揭旗抗日，必須情況發展到下列程度：(1)紅軍與日本直接衝突；(2)國際外交有進一步開展；(3)或蔣介石急他，蔣降日賣國狀況益顯著時。
>
> 二、目前行動，只要我們在關中能打擊東北軍，楊部在宜川不進，沿潼關到膚施大道發展游擊戰爭，摧毀其沿途工事，並乘其主力回調，擊中央軍，打通永和關以南兩岸交通，判斷東北軍北進行動可暫停止，以便促進局勢開展。
>
> 三、張對經濟、通商、交通上助我，確有誠意。[79]

從上述報告及相關文件的內容中，我們怕是很難相信延安會談有所謂張學良力勸中共實行擁蔣、聯蔣，周恩來爲之心動的情節。其實，關於周恩來延安會談後究竟是繼續堅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蔣」方針，還是接受了所謂「聯蔣抗日」思想的問題，從周恩來回瓦窰堡後寫給張學良的親筆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稱：

> 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後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爲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爲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爲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爲抗日戰線計，爲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80]

在這裡，周恩來主張張學良反蔣的態度可以說是再明白也沒有了。蔣介石爲日帝所要挾，屈服難免，其進兵山西、抗議蘇蒙互助協定，足以爲證。以蔣勢力之大，排斥於抗日戰線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爲了要抗日，就替蔣介石這樣的人做殉葬品。故眞要是爲抗日戰線計，爲東北軍前途計，就應當迅速準備聯合紅軍，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對[81]。這就是周恩來的態度。其中豈有聯蔣之意？正因爲如此，周恩來回瓦窰堡後向留守後方的軍政委員會匯報了會談的全部內容之後，給毛澤東的第一封電報中，就直截了當地稱呼蔣介石爲「蔣賊」[82]。周同時起草的向東北軍宣傳的口號，明確地主張東北軍應以蔣介石爲敵。主張東北軍官兵：「反對接受蔣介石命令自相殘殺」，提醒他們認識到：「強迫東北軍搗亂抗日後方是蔣介石賣國鐵證」、「強迫東北軍開入蘇區分散兵力是蔣介石陰謀」[83]。可想而知，延安會談如果說促成了什麼人對蔣政策的改變的話，那麼，至少可以肯定地說，被改變的決不是周恩來。

注釋

[1]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轉見《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並見〈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電〉，一九三三年三月，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 83 頁。

❷〈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十冊，第 441-442 頁。

❸〈軍委關於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中共中央遵義會議前後有關戰略方針的七個文件）。

❹〈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黨中央爲粉碎敵人新的圍攻赤化全貴州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軍委關於消滅白水曲靖等地敵軍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第 495-498 頁；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❺〈軍委關於野戰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第 499 頁。

❻〈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第 516 頁。

❼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第 226 頁。

❽分別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第 4 頁；〈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我軍渡烏江的作戰計劃〉，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央軍委關於在川黔滇創造蘇區的指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中央軍委關於消滅白水曲靖等地敵軍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軍委關於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第 499-501 頁。

❾〈周恩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 282-283 頁。

❿〈朱毛周張爲建立以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問題給張徐陳等電〉，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五期（關於中央紅軍長征北上的三篇文電）。

⓫〈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⓬〈朱毛周關於四方面軍北上致張電〉，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285 頁。

⓭〈中央軍委關於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爲總政委通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朱張周王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組織前敵指揮部決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285-286 頁。

⓮〈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毛澤東年譜》（上），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 465-466 頁；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⓯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獨自率領一方面軍主力脫離四方面軍緊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較爲流行的是多數中共黨史書上關於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等以武力脅迫中共中央南下，被葉劍英發覺報告毛澤東，毛迅即決心採取此一行動的說法。但考慮到九月十日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來往電報一度十分頻繁，雙方各陳己見，說明原因，卻均未提到密電一事，而後中共中央召開的討論這一事件專門會議也絲毫未提及此一密電，故筆者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參見〈中央致國燾同志電〉，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給陳昌浩、徐向前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爲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共致國燾同志電〉，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71-472 頁。

⓰〈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丁之前引文。

⓱丁之前引文。

⓲丁之前引文。

⑲ 蔣介石:〈在成都行轅對四川各高級將領講：四川治亂爲國家興亡之關鍵〉，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三，第 476-477 頁。

⑳ 〈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十月，丁之前引文。

㉑ 轉見〈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㉒ 〈毛澤東給洛甫的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3 頁。

㉓ 〈任、賀、關致中共中央電〉，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

㉔ 有關林育英傳達的國際指示內容，目前僅見於〈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該電關於國際指示問題說明原文如次：「國際指示都是原則上的，即是：(1)統一戰線這是基本的策略方針；(2)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這是統一戰線之最廣泛與最高的表現：(3)工農蘇維埃之改變爲人民蘇維埃；(4)富農政策。以上這些均已電達。」

㉕ 〈中國抗日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致培吾師長閣下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 30-32 頁。

㉖ 參見〈彭、毛致聶並致林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彭、毛致聶政委並致林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0-491 頁。

㉗ 〈洛甫致毛澤東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㉘ 紅軍政治局:〈告白軍官兵書〉，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紅軍總司令部命令〉，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等:〈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㉙ 〈毛澤東致董英斌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0 頁。

㉚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0 頁。

㉛ 〈毛澤東致杜斌丞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5 頁。

㉜ 〈毛澤東、彭德懷致楊虎城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4 頁。

㉝ 毛澤東:〈關於直羅鎮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提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2 頁。

㉞ 〈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第 589-597 頁。

㉟ 〈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㊱ 許多有關的中共黨著作都強調說，中共中央在瓦窰堡會議期間已經高度重視統戰工作，這一點固然不難肯定，但從這時軍事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幾乎沒有具體提到上層統戰工作的重要性的情況可以看出，人們這時對上層統戰工作的認識還是與後來的作法有距離的。

㊲ 〈毛澤東、周恩來致德懷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497 頁。

㊳ 井岳秀時任第八十六師師長，據嚴佐民回憶，井岳秀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彎腰到地上拾東西時，裝在衣兜裡的手搶掉到地下走火把自己打死的。但嚴這裡回憶的時間有誤。因彭德懷、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就致電聶榮臻等稱:「井岳秀確打死」。參見李海文整理:〈訪問嚴佐民同志記錄〉，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㊴ 〈毛澤東致彭並告左聶徐程陳彭電〉，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03-504 頁。

㊵ 國民黨軍這時電稱：紅軍無攻城能力，甘泉只駐兵五連，城情潰壞，紅軍「猛攻數次均未得逞」。參見〈二局關於敵情報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此時下設四個局，二局爲情報局，三局爲通訊局)

㊶ 〈毛、周致彭電〉，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02-503 頁。

㊷ 邱路:〈西安事變前彭德懷在中共統戰工作中的歷史建樹〉(未刊稿)。

43 〈毛澤東致彭電〉，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05頁。

44 參見王焰等：《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 159 頁。

45 前引《彭德懷傳》，第 160 頁。

46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豎排版，第 143 頁。

47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07 頁。

48 〈王世英的報告〉，一九三六年二月。

49 王世英前引文。

50 邱路前引文。

51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08 頁。

52 〈洛甫、博古對於奪取綏遠戰略計劃的意見〉，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博古致張、毛、彭電〉，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轉見邱路：〈紅軍東征戰略方針的提出過程及其演變〉，《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53 邱路前引文。

54 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領導下，以聖彼得教堂牧師身分爲掩護，秘密從事濟難會工作。後專門聯絡租界巡捕房，負責「警報」工作。此時受宋慶齡之托，持孔祥熙財政部發給的公函秘密赴陝接通與中共中央的關係，轉達南京方面的談判願望。另見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轉見畢萬聞編：《張學良文集》，第二冊，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55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2 頁。

56 〈中央及軍委給李克農的訓令〉，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4 頁。

57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4 頁。

58 邱路前引文。

59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7 頁。

60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9-520 頁。

61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博古致林、聶、朱、徐等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1-2 頁；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19 頁。

62 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02 頁；邱路前引文。

63 張學良前引文。

64 張學良前引文。

65 張學良前引文。

66 〈王明給切爾諾莫爾基克同志的信〉，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67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23-524 頁。

68 參見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27-528 頁。

69 張學良前引文。

70 潘文鬱因被南京方面懷疑通匪，逼迫張學良將其殺害。張學良對此事深以爲憾。有關情況可見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 298-299 頁。

71 張學良前引文。

72 劉鼎回憶自己到西安的時間是三月十日，負責整理劉鼎回憶筆記的張魁堂先生推斷劉鼎關於此一時間的回憶有誤，認爲劉到西安的時間應在三月二十日。這兩種說法看來都不正確。因爲，已知劉鼎行前見過董健吾，而董此前正在陝北，他離開瓦窰堡的時間是三月五日。這時由瓦窰堡到西安通常要花四天左右時間，即先花三天到洛川，然後再由洛川坐車或乘飛機去西安。如此再加上董從西安到上海的時間，可以肯定，董最快也要在三月十日以後才能到上海。就是說，劉鼎在三月十日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不可能在上海見到董健吾的，因而劉不可能在三月十日到西安。同樣，劉也不可能在三月二十日到西安。因爲劉清楚地記得，他到西安後的第二天，就被帶去張公館見張學良。可是，根據當時電報和公開的報導，張學良在三月十九日就已經離開了西安，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才返回西安。因此，劉鼎到西安的時間應

該是在三月二十六日張學良回西安之後，和張學良四月初到洛川之前。參見張魁堂：〈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張學良文集》，第 951-959 頁。

73 此處引號中的話，據說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周恩來與張學銘夫婦談話中說的。由於筆者未見談話記錄原文，不能隨意推測此話之原委。但至少依據目前的隻言片語來做事實根據是不準確的。因爲第一，周恩來這時剛從三月下旬政治局會議上來，他當然清楚毛澤東並無聯蔣的想法。不僅毛澤東這時在會議上已明確肯定蔣爲民族反革命派，張學良等爲民族革命派，而且中共中央也已經就此確定了統一戰線的範圍與對象，批准了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第二，依據現存之文獻記載，周無論是在談判過程中，談判之後的各種報告中，都未曾有過類似的說法。

74 〈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二)〉，《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周恩來年譜》也支持這樣的說法。在談到周、張延安會談時，年譜稱：「周恩來說：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75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32 頁。

76 《中共黨史資料》公布的周恩來此一報告與原文比，日期提前了一天，公布者爲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應爲十一日。報告文字整理也存在明顯的錯誤，如原文「對蔣問題」一段，應爲「他的問題部下確有分化問題，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問題如確降日，他決離開他」，公布的文字則修改爲：「他認爲蔣部下確有變化，蔣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蔣如確降日，他決離開他」。從原來的文字看，「他」（除最後一個「他」）字多半應該是指張學良自己，所謂「部下確有分化」，「現在歧路上」等，應該都是指張學良，而非指蔣介石。正是因爲他的部下現在確有分化，自己現在還很矛盾，因此才有後面的「他現在反蔣做不到」的說法。公布的文字加上兩個「蔣」字之後，無疑完全改變了原意。成了「蔣現在歧路上」，張因爲蔣介石現在還處在抗日與降日之間而不能反蔣。類似的錯誤在公布的文件中有不少，恕不一一

列舉。見〈周恩來關於與張學良商談各項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前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3-5 頁；並見《周恩來年譜》，第 305-306 頁；張魁堂著：《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 152-157 頁。

77 同上注。

78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印刷，第十五冊，第 537 頁。

79 同注76。

80 〈周恩來致漢卿先生書〉，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 87 頁。

81 由張魁堂整理的〈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三)〉稱，周恩來信中所謂「爲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爲抗日戰線計，爲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是「中共主張有條件地聯蔣」。此說曲解文意之甚，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前引《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82 〈周致彭、毛電〉，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06 頁。

83 〈周致理治、勁光並告張浩同志並告毛、彭主席〉，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輯，第 301 頁。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儘管經過兩次洛川會談，張學良與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已經相當接近，但頗讓人奇怪的是，在延安會談中，張學良的言談話語，卻並不十分坦白。特別是在對蔣介石的態度問題上，張學良看來還多少留了一個心眼兒。結果，延安會談並沒有使雙方關係取得重大突破。對於張學良的種種許諾，共產黨方面還多少有些將信將疑。

在得到周恩來十一日電報的第二天，毛澤東和彭德懷曾專門就此通知後方軍事領導人說：「我們與彼方新的談判已經成就。此種談判就全局看對於我們是有利的，雖然就局部看屬於不利（彼方進兵甘延並沿路築堡）」。但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仍舊指示部隊要保持高度警覺，對東北軍仍要嚴加防範，稱：「在我們沒有得到彼方通知，因而沒有發出可以允許彼方部隊通過與建築防禦物的通知給你們時，你們應堅決打擊之。在我們將來對外交涉時，可將此種行動作爲你們及地方部隊獨斷行動，並不妨礙大局」❶。

兩天後，毛澤東與彭德懷進一步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三千支步槍、六十萬發子彈，以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的問題，認爲可以以此來驗證張學良、王以哲聯共是否眞有誠意。他們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特別強調說：「關於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

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眞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爲證」❷。

嚴格地說，中共和紅軍此前確已通過甘泉解圍、協助換防和運送糧草給延安城守軍等事，表明過自己的誠意，而張學良尙無任何具體表現，毛澤東等有所懷疑也在所難免。不過，不論信任與否，對張學良的統戰工作仍舊是關係到紅軍在陝北成敗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鑒於山西前方戰事日益緊張，且經由山西轉電陝北費時誤事，毛澤東和彭德懷迅速將陝北一切統戰工作及聯絡任務轉交給了周恩來。他們於十四日爲此致電周恩來稱：「張楊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對王以哲電臺僅於你認爲有必要時才用彭之名義發生一些交際性質之關係。」同日，毛、彭二人電告張學良、王以哲：「從本日起，敝方與貴方一切具體接洽與商談關係統由周恩來負責，以專責成而便聯絡。二兄對弟有所賜教之處，請經由周恩來轉交可也」❸。

由於周恩來實際上已經直接負責與張學良、楊虎城的交涉工作，因此，周在回瓦窰堡同留守的軍政會討論之後，也已就下一步與張、楊聯絡和派人赴蘇等具體問題進行了安排。周在給毛澤東、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一)決派劉鼎留在張學良處。劉鼎同志與張學良繼續開展談判，增進具體辦法，並協助張學良組織其幹部(東北軍有抗日情緒，但無組織，且求不成得力人才，是張學良最大弱點，故張頗佩服蔣賊之黃埔生，而自己連教導團或隨營學校都沒有)，灌輸抗日主張，與張同駐洛川。(二)與張處之聯絡員我方派白堅，隨劉鼎去駐王以哲處，表面任偵察員，來往蘇區，可進行下層軍官活動。(三)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四)派戴季英經張處去陝南陳先瑞處巡視。(五)鄧發同志代表中央偕張派赴新疆代表到迪化後轉送蘇聯❹。

此時，由於國民黨中央軍陸續進入山西，閻錫山也已集中起四個縱隊進行反攻，紅軍此前占領之大部分重要城鎭均已失去，作戰之自主性也受到極大限制。不僅如此，根據四月十三日周恩來從陝北發來的消息，「目前東北軍正以主力圍剿關中，以一〇五師、六十七軍構築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鎖，並企圖配合十七路軍北進延長、延川、淸澗、綏德，十七路軍之孫蔚如師已有一部進至宜川、韓城」，有向北進攻並封鎖黃河西岸之勢。一旦陝北張學良與楊虎城兩部沿鄜、甘、膚及延川、延長之線步步深入陝北蘇區，不僅紅軍唯一的戰略後方可能受損，而且東征作戰也將陷於極大被動。因此，毛澤東、彭德懷這時不能不格外擔心張學良和楊虎城是否眞有與紅軍合作的誠意。爲此，他們一方面要求周恩來通過「外交」途徑盡可能遲緩東北軍的推進，並派來山西前方匯報工作的王世英立即返回西安找楊虎城談判，一方面則要求東征部隊立即做好向西回擊張學良、楊虎城之準備。

準備向西回師陝北，這在中共中央來說，無疑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戰略方針的改變。還在四月上旬，紅軍中部分將領就已經開始懷疑在山西是否站得住的問題了，但當時中共中央仍堅持認爲，如果不能設法創造更大的根據地並取得蘇聯的直接支持，要想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對全國各反蔣派別的影響力，無論如何都是困難的。因此，它明確發布指示說：「中央與軍委的極重大的任務，是使第一方面軍在數個月內擴大至五萬紅軍以上，在山西與華北取得大勝利，在華北首先在山西經過游擊區階段，創造比較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在此根據地內建立模範的人民政權，成爲號召全國革命的中樞，將此根據地與外蒙連接與蘇聯打通。凡此一切連繫於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基本方針，連繫於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形成，也只有如此，才有眞正的外交可辦」❺。然而，不過半個月之後，即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就已經不能

不開始考慮回師陝北的問題了。這種變化之快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究竟是回師陝北，還是繼續東進，毛澤東等這時還沒有拿定主意。從毛澤東四月二十日給洛甫、周恩來和鄧發的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淸楚，他這時還在考慮如何轉進綏遠建立根據地，與外蒙接通，直接取得蘇聯軍事援助的問題。電報要求鄧發盡快前往蘇聯，稱：鄧發去蘇聯的任務關於軍事者有如下各項：

(1)對日作戰彼此雙方之共同步驟問題。

(2)兩軍委通信聯絡問題。

(3)我軍向綏遠行動並在綏遠創立局面問題。

(4)技術幫助問題。能否接濟步槍、步槍彈、輕重機關槍、高射機關槍、步兵炮、新式架橋設備、無線電器材等。如能接濟，我軍在秋天全部開赴綏遠接運一次至兩次。

(5)人員幫助問題。擔任特種技術教育者數人，擔任作戰者數人。❻

很明顯，毛澤東等這時仍然準備在山西繼續作戰和創建根據地，並仍打算照原定計劃經山西轉進綏遠。但幾天之後，整個形勢已不容紅軍繼續在山西滯留，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部及閻錫山的幾路人馬節節推進，紅軍已被全部壓到黃河東岸永和一帶狹小地區，西渡回師已成不可避免之勢。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與彭德懷終於下令班師回陝。命令說：在山西是閻錫山加蔣介石（五十一個團）再加堡壘主義，在陝西是張學良、楊虎城在蔣令下向陝北進攻，企圖封鎖黃河，在甘肅是蔣介石之胡宗南部，再加上周岩兩部入山西，毛炳文調甘南，王均等在陝南與甘南，張學良原在環水區域之部隊調陝西，只有神府區域、三邊區域和環水區域及其以西地區較爲空處。「根據上述情況，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陝西甘肅則產生了順利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以執行擴大蘇區，鍛鍊紅軍，培養幹部等任務。另一方面，粉碎賣國賊擾亂抗日後方計劃，亦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據此，毛澤東與彭德懷向張聞天提議，應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針問題。電報稱：「甲、東面情況已根本的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爲穩固計，決定西渡。乙、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之關連的問題，地點在延長」❼。

自五月二日起，到五月四日止，在山西境內的紅軍全部順利地撤回了陝北。爲了宣傳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於回師之際特別發了一個回師宣言，提出停戰議和問題，並且不稱蔣介石爲賣國賊，改稱蔣氏。但此宣言的目的，正如毛澤東所解釋的那樣：「這是爭取白軍，推動運動，孤立蔣介石的好策略」，目的就是要「使蔣介石在全國群衆面前孤立起來」。誰也知道蔣介石不會與紅軍握手言和，正好，「不和則是賣國賊，打賣國賊！」❽

至此，紅軍自二月二十日開始的東征戰役全部結束了。比較一九三五年瓦窰堡會議所規定的作戰目標，可以知道此次作戰除了在人員、糧食和部分裝備方面獲得暫時的補充以外，原定的種種任務均沒有實現。毛澤東總結說：「此次失著是太謹愼，未能立即出河北，我們未過黃河前對閻錫山估計太高」，在汾河西岸過於猶豫，沒有下決心東進到晉東南去。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然大大不同。而如今，紅軍的處境顯然相當被動。特別是山西境內的大約三十個團的國民黨軍隊一旦乘機跟進，陸續西渡，對陝北蘇區的鞏固必將帶來更爲嚴重的威脅。値得慶幸的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五月初，負責與張學良聯絡的中共代表，突然傳來張學良願意聯合紅軍，抗日反蔣，在西北另立局面的驚人消息。這一消息顯然使中共領導人倍感意外，更深受

鼓舞。

關於張學良決心聯合中共、另立局面的消息，最早見自於劉鼎四月二十七日給李克農並轉周恩來的報告。劉鼎自延安會談之後隨周恩來進入陝北蘇區，並到瓦窰堡，向洛甫等留陝中共中央領導人匯報之後，於二十三日持周恩來給張學良的親筆信離開瓦窰堡，於二十六日返回洛川。當晚，張學良即與其談話，態度已與半月前延安會談時截然兩樣。根據這次談話，劉鼎第二天馬上以隱語方式寫信給周恩來，說明情況。信中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原來人們所想到的太短促了。這位老頭兒昨夜同我見面，短簡的一段談話中，除了我預備了要說的都談了以外，他第一給我一個東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計劃。這兩者都可見他一日千里地進步著。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劉鼎解釋說：所謂東西，是一本小冊子，名叫《活路》，最鮮明的提出了反蔣抗日、聯蘇聯共、分土地的旗幟。其中分四篇內容，約二千來字。內中有一些笑話：每士兵打回東北分土地五十畝。內中又有些過於樂觀：晉秦綏寧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會聯成一起。紅軍就是徹底抗戰的主力。內中除講外蒙蘇聯之幫助外，又說及日本內部革命的爆發。……他本人囑某起草，未經他校閱而書已印成，現在他也只是說「一口氣把我的話都說完了，不大好，不過秘密的，不要緊」。

那麼，他那個「不小的計劃」又是什麼呢？報告稱：你看他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這一邊）完全拿過來，東頭一條大道他也企圖著；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爲強幹的打手。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

對於這封信的內容，或許要稍加解釋。這裡所說的「老頭兒」就是指張學良，「大老闆」就是指蔣介石，「他家這莊大房屋」即指東北軍，「他的幾個傭人」即指東北軍的某些幹部，如此等等。

從這封信的內容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張學良這時不僅與蔣介石離心離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揚鑣了。奇怪的倒是，爲什麼延安會談時張學良還在那裡搞「外交」，患得患失地談什麼，相信蔣有民族情緒，幫蔣能抗日之類。從張學良介紹《活路》一書的出籠過程看，延安會談之前他其實就已經同《活路》的作者談過類似聯俄、聯共、抗日，乃至反蔣的話題，並且同意他們的觀點，支持他們印成小冊子在東北軍中秘密散發。但在延安向周恩來正式表明態度時，他反倒猶豫退縮了。當然，延安會談時他其實也隱隱地談到他準備離開蔣介石另起爐竈的想法，只不過他說得不那麼明確罷了。而如今，他多少有點破釜沈舟的勁兒了。這裡的原因，據劉鼎信上說，就是：不久前的談判和宣傳已經發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闆越發在他面前現惡，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經感覺到大老闆對他開始了惡毒的布置」。

從劉鼎報告的情況，可以看出，張學良之突然準備反蔣，大致不外基於兩點考慮。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實力，而這兩者事實上又密切相關。過去張寄希望於幫蔣介石能抗日，現在則發現等到蔣介石開始進行抗日，他的東北軍大概也差不多不存在了。張學良之所以稱贊《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講的話一口氣都說完了，也正是因爲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紅軍殲滅的東北軍一一〇師、一〇九師，這時竟被取消番號；張要求給陣亡的何立中、牛元峰兩位師長家屬各特恤十萬元，結果也

是「礙難照准」。氣得張學良大罵：「我張某人混的不値十萬塊錢了」❾。這也難怪張學良在回憶中稱所謂「惡緣種種，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條就是「請求撫恤、補充，皆無結果」一事❿。照這樣下去，他張學良拿什麼去面對那些指著他吃飯，指著他帶他們回老家的東北父老鄉親。所謂「大老闆越發在他面前現惡」，「對他開始了惡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爲此。

不過，張學良固然開始相信「聯俄聯共」是東北軍唯一的「活路」，但作爲一名軍事統帥，張學良也十分清楚，目前還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蔣的時候。第一，所謂「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邊）完全拿過來」，這表明張此時尚無完全把握東北軍之力；第二，所謂要「把他的幾個傭人都練爲強幹的打手」，也證明了前引周恩來電報中的話，張這時還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幹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僅以東北軍和紅軍之力，要對付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又要實行抗日，不僅兵力上過於懸殊，而且武器彈藥各種軍事裝備的補給也將完全中斷，因此，如果沒有蘇聯的直接援助，沒有各地反蔣實力派的響應，要想與蔣介石抗衡和實行抗日，無論如何難以想像。這也就是爲什麼張學良明確表示，「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這裡所說的「鄰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楊虎城等原西北軍將領；這裡所說的「嚴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閻錫山以及傅作義、宋哲元、韓復榘等關係較好的實力派領導人。當然，這種活動終難逃過蔣介石的耳目，因此，張學良表示，他只是「暫時與大老闆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準備，同時還要提防大老闆下他的毒手。」劉鼎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報告說：「老頭兒提出，牽延到十一月就起變化。這當中一面對內親和，對友作抗日的大活動，另一面捧大老闆登峰造極。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濟。我要幹就徹底幹！」

難怪劉鼎誇贊他「實在可愛」呢！張學良之直率、坦誠、嫉惡如仇，實在出乎劉鼎意料之外。以至於他認爲：將來我母親見她時，以至於同居時，我想母親也會喜歡她。她的好處還不止於某些人所言傳而已。她並且深覺人類的善惡，深覺人群中孰優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會有極良好之統系——不私有，則小夫婦、小家庭。此次戀愛之結果，大且偉矣！

當然，由於國民黨中央軍開始大批進入陝甘，形勢已相當嚴重，劉鼎也不能不擔心張學良這種表面文章能夠做多久。但是，儘管他一再告誡張學良：「時間太危急了，誰能擔保此不生不死之狀態到半年之久呢?」他也不能不承認，張學良的考慮確實也有他的道理。劉鼎五月二日給周恩來和李克農的信稱：她本來就在歧路間，又戀新又捨不得舊。這個矛盾變化得雖然快，究竟離終點還遠，還有些難關哩！現在已經變到這樣，所謂捨不得舊，還想最後從他家得著一些最後的錢財，來同新愛人渡歲月。她想把此痴人夢延到十一月去，即是要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這幾個月中去進行欺騙，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時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不過她自己已經覺得了少許，恐事不由人願。因此我盡朋友之誼，也該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騙」是痴人作夢，新愛人方面可由愛情上獲得一切，徘徊是損失。

這裡所說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無疑就是指望到時候能夠得到蘇聯願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顯，之所以要拖到十一月才起事，這個考慮實在是再關鍵沒有了。儘管劉鼎強調「新愛人方面可由愛情上獲得一切」，對此張學良也未必不清楚：蘇聯即使

不願意直接援助他張學良，它還能不願意援助中共與紅軍嗎？但爲了進一步堅定張學良的信心，劉鼎還是建議：「頂好找那八字算得頂好的鬍子和瞎子一同來給她再算一命」。這「鬍子」就是指這時蓄著大鬍子的周恩來，那「瞎子」則是指戴著眼鏡的李克農。

張學良決心反蔣的消息，在共產黨人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負責中央聯絡局電臺的曾希聖首先得到消息，並於五月五日電告中共中央，稱：

> 近因蔣愈惡，張頓悟，已有抗日反蔣決心，言要幹就徹底幹。惟爲準備計，反蔣事暫不公開，但如何處理各內系統問題，盼有所商定。示張能否見面，定好地點。⓫

五月七日，直接負責與陝甘地方實力派聯絡工作的中共陝甘省委領導人朱理治也致電中共中央，告之張反蔣決心已定，但要求給他時間準備並保密。電稱：

> 他希望我們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騙到蔣介石一些武器補充後，再約公開。他希望紅軍不要寫紅軍與東北軍聯合起來，他將我黨口號修改後，一下印了許多。現在外方很爲懷疑說，東北軍的口號爲什麼和紅軍一樣的。⓬

十幾萬東北軍的統帥張學良突然決定參加革命，這不能不讓中共中央感到驚喜。剛剛撤回陝北，正在爲應付東、南兩面迅速推進的國民黨軍，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向而焦慮的毛澤東等人，立即感到了極大的安慰。在五月八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聯合東

北軍，接通外蒙、蘇聯，爲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的行動方案。他說：時至今日，中間階級的態度終於轉變過來了，落後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覺醒了。「其中最明顯的是張學良的態度，這是大革命到來的標誌」。「現張由反日的決心開始進到決心反蔣的程度」，這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應該爭取也可能爭取的。考慮到現在的有利形勢，中共中央總的任務「是全國人民統一戰線，戰勝蔣日」，但具體到西北地區，現在的任務應當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中國革命首先在西北勝利。他強調說：爲西北國防政府鬥爭是可能的，因爲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這後一點尤其重要。我們不要「光榮的孤立」，我們可以和寧夏、新疆、外蒙聯繫起來，與蘇聯結成聯盟，從而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指出：「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當然，毛澤東說，以西北爲根據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動員群衆的口號。這是因爲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的前沿，提出「保衛西北」的口號，並把它與「保衛中國」聯繫起來，足以號召群衆，和「反對賊子日本、蔣介石」。

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決定了紅軍也必須以西北地區爲發展方向。考慮到這一點，毛澤東明確提出，下一步行動方向目前只有陝北、寧夏、陝南、甘肅這四條路可走。陝北「沒飯吃，狹小，不能去（留）」；寧夏少數民族區域，到處是寨子與堡壘，「從政治軍事觀點上不應去」；陝南條件最好，但蔣介石的力量也最強，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則就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使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⓭。據此，中共中央又擬定了西征戰役計劃，提出：爲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爲著擴大抗日陣營，爲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爲著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團聚，西北軍委決以紅軍之一部箝制

蔣閻西渡部隊，及陝北渭北敵人，以主力組織西北野戰軍活動於陝甘寧廣大區域。另以有力支隊，進出陝南，與我陳先瑞部會合，活動於陝鄂豫三省，調動並吸引蔣介石主力於該方面，使我主力易於在西方取得勝利⑬。

紅軍實行西征，自然需要張學良的東北軍給予配合。因此，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再次會談實屬必要。只不過，雙方這時所關心的重點看來還不完全一致。剛剛下決心參加反蔣行動，但又不敢立即起事的張學良，這時顯得格外小心謹愼。他特別告訴中共代表，聽說上海及南京風傳他與共產黨在洛川開會，蔣最近又派了許多政訓人員到東北軍裡來，實則爲監視他。他若行動大意，必致引起懷疑。因此，對於蔣介石要他迅速向陝北蘇區腹地推進的命令，他已不能不從。結果，當劉多荃師長遵命指揮東北軍一〇五師沿甘泉向鄜縣推進，並企圖築堡時，終與蕭勁光指揮下的紅二十九軍發生衝突。而五十七軍常經武師和沈克師這時也向直羅鎭方向挺進築堡，這不能不迅速引起紅軍方面對東北軍有否誠意的疑惑。周恩來當即致電劉鼎，要求張學良說明內情。爲此，雙方反覆電商未能解決。

五月一日，六十七軍參謀長趙鎭藩急電李克農，說明：一〇五師之一部於龍坊西北泊村與貴軍之一部發生不幸事件，此事出於一營長之不明情形，弟已告知劉師長轉告其部下，以後不可如此行動。同日，王以哲也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提出：甘膚間築碉事與周恩來先生曾面談過，請即刻通知沿途紅軍勿生誤會爲荷。

對此，周恩來則在五月二日的覆電中答覆說：甘泉與鄜縣間築堡問題，與敝方破壞碉堡事，曾與先生等面約藉掩外人耳目。現爲徹底解除誤會，已令敝方蕭軍長停止任何敵對行動，另對鄜膚間東西大道敝方交通，已飭駐軍勿生阻礙。但對政訓處進入蘇區編組保甲、武裝掩護地主收租搶糧等事，務請給予制止。另外，近日直羅鎭和羊泉間貴方突然集結重兵並深入套通、老人倉各路築碉，事前即未談妥，且不明貴方意圖。請代詢張學良先生，並示以眞象。爲此我方願派李克農同志到洛川面商一切。

三日，李克農得到趙鎭藩來電並接到赴洛商談的指示之後，也覆電趙鎭藩，強調：對在鄜縣、甘泉及直羅鎭地區築碉堡一事，事前張學良先生與周恩來並未談及，事後亦未見電商，眞相不明。兄部行動致使兄我兩方敵對區域擴大，頗非前途。請向張學良先生、王以哲先生說明，特別是與六十七軍的協定若能擴大範圍至五十七軍則最好。至於兩軍衝突事，已電令蕭勁光軍長就近與一〇五師劉多荃師長妥商解決辦法。可是，當蕭勁光派人前去一〇五師接洽時，劉多荃師長恰好前往洛川，部下對雙方關係一無所知，竟將來人扣押，電詢洛川如何處理。此舉令張學良十分被動。張不得不讓劉鼎電告中共方面：「請今後勿輕派人來，令人難處」。王以哲進而也於四日再電周恩來，就此解釋說：一〇五師深入老人倉事，只因劉師長在洛，以環境關係，蕭同志不必再來商洽，弟可負責告知。而常、沈師到黑水寺、直羅鎭、羊泉鎭、鄜縣之線築碉事，前張學良先生在洛川曾與李克農同志議過，故會面時未曾提及。而五十七軍一旦到達黑水、羊泉之線後決不再前進，務請放心。

十分明顯，雙方關係這時變得非常微妙與複雜，許多具體問題急需詳商解決辦法。特別是處此進退維谷之境的張學良，更是焦心如焚。尤其是當他得知紅軍已全部撤回陝北，國民黨中央軍可能迅速跟進陝北之後，這種擔心更加明顯。按照劉鼎來信的說法就是，張擔心「在自動標揚之先而被人察覺，則我暗彼明，常常會遭受一些意外的損失」⑮。因此，張學良之希望與周恩來見面，十分明顯地比周恩來還要著急。

還在五月四日，劉鼎即代張學良要求與周恩來見面。其電稱：此間得知紅軍西渡，湯恩伯之二師於後跟進。如確，則張求見周，面商對策，見面地點在甘泉舊縣。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周建屏前來陝北，路經洛川時，張學良特別約見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恩來說明，蔣介石命令楊虎城由宜川經延長向延安推進，楊則以張部未能前進至臨眞鎭，其左側缺乏掩護爲藉口不進。故張學良要求紅軍允許東北軍開兩團人到臨眞鎭，十數天內不建碉堡，即行退回。與此同時，張要求周建屏向周恩來進一步轉達以下數點：第一，蔣介石有命令給直屬四師中央軍，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黃河，會合楊虎城向前推進，張學良要求紅軍從山西方向加以牽制，防其西渡。第二，張希望紅軍給中央軍以打擊，不要回陝北。因回陝北恐有六師部隊隨之西渡，對紅軍與對張均不利。第三，蔣命張部一面由延安進至延川，同時由延安進至瓦窰堡，築碉構堡。爲應付計，張要求得到紅軍允許，使東北軍可以由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長之線建築碉堡。紅軍如回，允予通過。

張學良最後再度「要求與周恩來見面」[16]。

値得注意的是，張學良這裡所擔心的問題，在中共中央看來卻未必十分重要。既然張學良已經決心反蔣，兩軍如何協調以應付蔣軍，嚴格地說並不難於解決。中共中央更關心的，顯然是紅軍與東北軍之間更進一步的大規模的配合行動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蔣」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問題。因此，毛澤東、彭德懷與周恩來接到上述電報信件之後，當即於五月七日覆電劉鼎轉張學良與王以哲稱：再度會談極爲必要，請張學良先生決定時間，愈快愈好，地點以川口或延安爲宜，弟等三人中可來二人。對於張學良擔心紅軍西渡問題，電報解釋說：我軍全師回渡，現正加緊訓練，準備對付大老闆大舉進攻。大老闆在北方之全力，我軍力能應付，吸引大老闆全力於我軍周圍，即可保證張學良先生及其他友軍在適當時間完成政治軍事經濟各種準備。關於東北軍須受命由延安推進至延川和瓦窰堡的問題，電報主張張學良迅速發布紅軍有向膚施、甘泉、宜川及韓城方向前進模樣之消息，用以搪塞南京方面。另電報強調：張學良非有確實可靠之政治環境條件作保證，萬不可輕易離開部隊，以防意外。至少在與弟等晤面前勿他往。電報同時還明確提出雙方晤面所談問題如下：

A、張學良先生準備大舉之實際具體步驟，即政治軍事經濟之問題；

B、楊（虎城）、閻（錫山）、馬（占山）、鄧（寶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聯合戰線問題；

C、張學良先生所部與弟等所部今後行動方針問題。[17]

接到毛澤東等三人的來電之後，張學良當即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議，並決定十日晚仍在延安見面。五月八日，王以哲爲此覆電毛澤東等，說明：「茲訂於灰（十）日晚仍在膚施與兄面晤，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員往接入城」。

但因周恩來此時正在延川參加重要會議，且延川至延安二百五十里，一時趕不及，故周九日再電王以哲、張學良，提議十二日下午到川口，當晚入城晤談。電稱：現在延川與紅軍同志開會，延川去膚施二百五十里，定明日動身，十二日下午趕到川口，當晚入城與兄晤面。

結果，周恩來等因事遲至十一日晨才動身往延安，但仍於十二日下午趕到了延安城外二十里之川口，當晚經張學良派人接引入城，於十三日晨出城，十五日返回延川。至此，張學良與周恩來再度延安會

談大功告成。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二次延安會談中，周恩來與張學良又談了些什麼呢？由於周恩來會談之後當即返回延川，只對正在延川的毛澤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做了口頭匯報，以至我們至今看不到周恩來的有關報告。但會談的基本內容，在根據會談前後雙方來往電報，以及雙方之間這時圍繞著東北軍進入蘇區築碉問題所發生的矛盾，仍舊可以獲得大致的了解。

根據會談之前雙方的要求和願望，我們可以知道，這次會談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㈠東北軍反蔣行動的各項具體準備問題。

㈡向各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工作問題。

㈢東北軍與紅軍今後共同的行動方針問題。

㈣東北軍爲應付蔣令在陝北蘇區內築碉問題。

在會談後，通過雙方的來往電報，我們又可以知道，雙方至少在以下幾件事情上取得了協議或達成了一致：

第一件事，就是允許東北軍進入蘇區築碉，除原定之直羅鎮一帶、甘膚之線以外，考慮到蔣介石、閻錫山軍隊即將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中共中央還特地要求東北軍迅速在靠近黃河西岸的干谷驛、交口鎮向延川、清澗一線築碉，以便阻礙蔣閻軍隊進占。

五月十五日，即周恩來回到延川的第二天，就有電報給王以哲並轉張學良稱：據查蔣閻入陝六師勢在必行，彭德懷、毛澤東諸同志均認爲東北軍應速作經干谷驛、交口鎮入延川、清澗之一切準備，並請將行動日期見告。此間亦擬以一部兵力圍困宋家川，遲滯該敵渡河[18]。

同前此雙方軍隊圍繞著直羅鎮一帶築碉問題發生摩擦的情況相比，這時周恩來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僅直羅鎮的問題不再提了，而且直截了當地要求東北軍到靠近黃河西岸的地區築堡。這說明，雙方在這次會談中已經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具體的妥協。

第二件事，則是根據中共中央前此之決定，紅軍之一部將前往陝南並計劃轉進河南發展，一面由南面牽制北進之蔣軍，一面爭取在鄂豫皖三省間取得新的發展條件。爲此，周恩來提出請張學良放行並支援紅軍彈藥問題，張答應由東北軍支援紅軍七九子彈十萬發，並將其中六萬發運送至延安城，另四萬發送給將出陝南之部隊。

五月二十二日，周恩來致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說明：紅軍去陝南並準備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隊，已準備就緒。依前議，決取最捷道路南下。經牛武鎮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趨臨潼下游之交口鎮或新豐鎮渡河，出藍田，但必須東北軍方面駐臨潼部隊代爲準備船隻於北岸，方能確實無誤，渡河迅速可靠，必可爭取入豫先機。電報要求張學良迅速就此進行準備，並依照前議調撥七九子彈十萬發，從中抽三至四萬發於臨潼附近，以便交紅軍去陝南部隊，其餘子彈則仍依前定辦法在膚甘之間轉交紅軍[19]。

周恩來此電表明，他與張學良已經就紅軍南下河南問題達成協議，並得到張學良願意爲此撥子彈十萬發的承諾。不過，這一行動幾天後就停止了。這是因爲中共中央這時得到了西南可能發生事變的消息，如果西南地區發生事變，整個西北的局勢無疑也要因此而發生變化並須紅軍積極籌劃響應，西北計劃有迅速實施的可能。在這種條件下，中共中央原定派部隊經陝南下河南的計劃，自然中止。據此，周於二十九日再電劉鼎，請轉知張學良，稱：由於現在出現了新的有利條件，在兩個月內即可取得，因此赴陝南部隊決暫不派出，待一個半月後適

應新條件時，再行派去爲有利。惟彈藥仍甚需要，望商張學良設法撥給，並在甘泉、膚施道上或其以北地點交付爲盼[20]。

看來，張學良對這一計劃的變更也沒有異議。因爲，周恩來所提出的請張繼續照前議撥付子彈的要求，張學良很快就予以了滿足。到六月一日，六萬發子彈仍舊照約定送到了延安，準備送給紅軍。王以哲爲此電告周恩來「子彈六萬發已到膚施，待弟到膚後再電取法」。這件事確實讓中共領導人感受到張學良與中共合作之眞誠，周恩來二日曾有電專門感謝稱：「承撥子彈，足證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勝感紉」[21]。

第三件事，是雙方商定了有關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行動之西北大計劃。計劃的中心內容就是「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這顯然是第二次延安會談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毛澤東在五月八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爲西北國防政府鬥爭」的目標，並明確提出了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步驟，即以抗日爲號召，通過紅軍與東北軍的聯合行動，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聯盟。周恩來將中共有關此一計劃的設想向張學良進行了詳細的說明，雙方並且進一步商定了發動以「抗日反蔣」爲號召的西北國防政府的具體時間表，規定九、十月間爲兩軍共同組成西北抗日聯軍並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的時間。而促使張學良對這一大計劃全力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對於取得蘇聯援助的信心。關於這種情況，很容易從下面的來往電報中看出來。

五月二十日，即第二次延安會談過去一週之後，中共中央曾有電報給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領導人，內稱：關於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在目前僅能使高級幹部知道，對外應守秘密。此一計劃之中心內容就是：「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

政府，打通蘇聯，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至於蘇聯的態度，可以說完全不必擔心，因爲「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22]。

五天之後，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再一次去電更具體地解釋了這種情況，說明已與張學良商量好，協助陝北紅軍策應紅軍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北上，漸次接近外蒙，接取援助，蘇聯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電稱：

> (一)國內及國際的政治局勢均取著暴風雨般的姿態向前發展，黨的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議事日程上的具體任務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迅速對日作戰，以走向建立全國國防政府，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
> (二)西北的形勢是：紅軍與東北軍取得密切合作，與楊虎城、鄧寶珊亦有聯繫。胡宗南由山西向陝南，王均在漢中，毛炳文甘南，閻錫山受紅軍重大打擊後，現只能出八團入陝，湯恩伯率十八團（四個師）準備入陝亦頗動搖，于學忠率兩師在蘭州天水間，奉軍主力在洛水、環水、涇水流域，陝軍在韓城、宜川線，馬鴻賓主力在寧夏境，馬麟在青海，一部在蘭州以西。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
>
> (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兄等，使蔣軍不能攔阻。至於奉軍，已與秘密約定，不加攔阻。[23]

這時，根據預定作戰計劃，紅軍主力已經開始進入甘北作戰，準備背靠東北軍，控制慶陽、鎭原之線以北地區，力爭轉進寧夏，接通外蒙。東北軍除照約定應爲紅軍讓路外，還應盡快控制蘭州及其陜甘大道。爲此，中共中央接連致電王以哲及張學良，要求後者務必盡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隊，便利接通蘇聯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動，切勿讓蔣介石的軍隊制其先機。其五月二十六日電稱：蔣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進駐，則割斷了陜甘大道，對於將來兄部增向蘭州，準備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計劃，大有妨礙。應請立時準備以兄方一部進駐鎭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機[24]。

其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二日均有電報給王以哲和張學良，聲稱：紅軍已經開始進行西征作戰，左路軍占領悅樂鎭、曲子鎭、環縣、洪德城後，擬以主力向固原進，並占領固原，一部留悅樂、曲子、環縣線。請兄方部隊保持於慶陽、鎭原之線，勿向該線以北前進，以便我軍以慶陽、鎭原之線以北地區爲根據，向固原、預望、鹽池、靈武、求得確定的勝利，接近黃河，有利爾後打通友邦之步驟。特別是蘭州爲西北大計劃之最重要戰略根據地，兄部務以適當兵力，預先控制[25]。

通過上述資料可以很淸楚地看出，這時中共中央與張學良之間已經在西北大聯合計劃問題上達成了具體的協議，雙方在關於計劃的內容、行動步驟以及實施的大致時間上，也都有了明顯的默契。

第四件事，則是雙方商定立即由張學良負責送中共代表鄧發（化名楊鼎華），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匯報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實，此事之商談早在第一次延安會談中就已經有所商定。這次不過是更進一步將其具體化而已。而張學良爲此積極籌劃和幫助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張確實對此做出了明確的承諾。

鄧發去蘇聯行前經過的一段時間的準備。因此，在第二次延安會談過了二十天時間，鄧發才開始動身。五月三十一日，周恩來致電劉鼎，說明自己及鄧發等一行六月三日可到延安川口，但因事忙，請王以哲來晤，以節省時間。

接著，六月二日，周恩來再電劉鼎說明此行人員情況，並順便請王以哲在可能的條件下來延安一晤。電稱：弟及楊鼎華、李克農等明晚可趕到川口與你們相會。王以哲兄如能來膚施一談更所切盼。

六月三日，劉鼎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與周恩來等見了面，但王以哲卻並未前往。値得一提的是，周恩來此行並非僅僅爲了送鄧發轉去蘇聯，和聽取劉鼎近期工作的匯報，根據中共中央這時的布置，周此行還負有十分重要的任務，即向劉鼎說明中共中央關於推動張學良響應西南兩廣事變，遞交中共中央爲此起草的具體行動計劃書。原來，這時已有消息說明西南不穩，兩廣之陳濟棠和李宗仁已開始揭旗反蔣，因此中共中央極力主張東北軍與紅軍均應迅速做好在西北發動事變的一切準備。爲此，中共中央專門擬定了行動計劃書，由周恩來當面交待鄧發與劉鼎轉交張學良。計劃書中除具體分析了當前的西北政治、軍事、經濟狀況，敵我兩軍態勢等綜合情況之外，「並將彼我兩軍關係，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聯、外蒙關係及縮短準備時間等，均具體開列給張，堅定其信心並促其實現」[26]。在具體布置了這一工作之後，劉鼎與鄧發即一同於五日返回延安，致電王以哲派車接引，然後於八日抵達洛川，九日中午飛到西安，十日即晤張學良，據劉鼎事後電稱，雙方縱談良久，彼此稱快。可見張對於中共中央的這一計劃也頗爲動心。隨後，張學良當天就親自駕機飛至蘭州，前往蘭州民政廳爲鄧發辦好護照，再派飛機送鄧發到蘭州，又打電報並寫信給盛世才，其熱心程度尤爲引人注目[27]。

在五月底，因劉鼎報告張學良「聯赤聲大」，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

人員得到反蔣宣傳小冊子《活路》，因此蔣有西來的消息，中共中央一時對張學良等人的安全頗感擔心，急電王以哲與張學良，請二人「務祈注意奸人暗算，嚴加防範」。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更加急迫地希望張學良能夠加緊起事的準備工作，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

六月初，中共中央已經得知兩廣發生事變的確切消息，知道粵桂軍揭抗日反蔣旗幟，組抗日革命軍，陳濟棠總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軍夏威部未遭湘軍抵抗，七日進占衡陽，粵軍張達部將與夏會合，繼續北進。而華北宋哲元亦對此暗中支持。王以哲這時明確提議中共方面可派人前去西南活動，中共中央對此當即表示贊同，決定派重要代表南下連絡，並做到互相配合。因此，中共中央迅速決定派重要聯絡人員交王以哲送出，分別派往兩廣和河北宋哲元等處。

兩廣事變的消息在中共中央內部引起極大震動。對於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的發動來說，西南的發動無疑是對西北發動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華北同時舉起「抗日反蔣」的義旗，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甚至分崩離析。因此，兩廣事變引起中共中央的極大重視。中共中央專門發布指示稱：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抗日討逆的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西南的發動就是這一新階段開始的標誌，它「可以得到最廣大的最複雜的各種抗日反蔣的力量的擁護，從共產黨起一直到帝國主義，可以發展到最廣泛的抗日討逆的統一戰線的創立」。「我們的策略是在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爲全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而共產黨在目前階段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加速西北的發動來響應與配合這一發動」。在六月十二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更進一步提到了以西北發動響應西南事變的問題，有人明確主張：推動張學良加快發展，加強對兩廣的工作，同時還要加強加速西北抗日反蔣運動的發展，事情很

清楚，西南若惡化，對西北發動有困難，因此，戰略方針要適當的考慮。毛澤東也認爲：西南事變已經成爲中國革命的一大推動力，已經成爲目前中心的一環，對西北發動有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西北發動可提早時間，當然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並以勝利爲前提。據此，中共中央決定提前西北發動的時間，並將前此與張學良商定和進一步向張學良提交的計劃書內容，於六月十六日詳細上報共產國際請求批准。電稱：

> 我們與東北軍間的統一戰線上層方面，業已堅定了張學良抗日反蔣的決心。……西北國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兩廣的發動，華北宋哲元與四川劉湘等的醞釀，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寧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們與蘇聯地理關係的重要關鍵，目前還沒有有利的情況，然而以紅軍與東北軍兩個西北主力起而舉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國防政府已有他堅定的基礎了。……爲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爲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面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因黃河的障礙，在結冰以前紅軍沒有辦法出至黃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東北軍。西北國防政府應以蘭州爲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推張學良，我們則任其副。

在上述報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難就是經費和裝備問題。因爲這不僅是中共中央擔心的問題，也是歷次談判中張學良最關心的問題。兩廣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始終沒有對中共中央的行動計劃作出

明確的響應，而是積極送鄧發前往蘇聯，同時更主動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別經上海和新疆與蘇聯進行聯絡，其目的也正是關心蘇聯的態度，擔心事變發動後若無蘇聯的援助，幾十萬大軍糧草彈藥將無以爲繼。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種情況，因此其報告明確提出：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裝備的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28]。

六月十六日，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正式恢復電訊聯絡的第一天。上述電報也是中共中央恢復電訊後給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中央發去第一份電報。在第一封電報中就詳細解釋迅速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大聯合的計劃，可見它這時已經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並成爲當務之急。其實，儘管此時中共中央在發動的時機方面仍要求共產國際給予指示，它絲毫也不懷疑共產國際會予以全力支持，因此，其內部已經就西北發動問題做出明確決定。其決定說：

> 甲、時局已起重大變化，這使中國革命走上了一個新階段，黨的任務是使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進到高度具體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
>
> 乙、西北國防政府已經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與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
>
> 丙、西北發動的時機與部署須以爭取勝利爲原則，依此原則並顧到各方面的條件。[29]

這時，張學良在送鄧發前往蘭州後即轉去南京，已不在西安。但

周恩來仍爲此致電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務必加緊準備，並約張學良回來後立即前來協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發動的一切準備工作。其電報明確講：目前大局，兩廣發動後，宋哲元有加入說，雲貴川湘亦在醞釀，大有造成全國抗日反蔣之可能，東北軍發動時機業已成熟，一俟張學良先生回來，即須協商具體辦法。西北國防政府之樹立，此其時矣。吾兄乃東北軍之柱石，務望對內部組織方面十分加緊。時局要求我們提早時間，大約一個月內即須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張學良歸後，務請將以此意轉告之[30]。

但這時不僅張學良不在西安，而且王以哲也不在洛川。由於中共中央與張學良東北軍的電報聯繫，僅由洛川六十七軍軍部一部電臺負責傳遞，因此王以哲不在洛川，使得雙方聯絡上不免出現時間差。再加上連天雨阻，不僅電報有時聯絡不暢，並且汽車也通行困難，結果這邊中共中央急盼盡快發動東北軍響應兩廣事變，創立西北抗日反蔣新局面，那邊東北軍爲應付南京之軍令，軍事上仍在不斷向陝北蘇區推進，轉眼間竟兵臨「紅都」瓦窰堡，使前線之紅軍與東北軍隨時可能爆發新的戰爭。形勢一時竟變得十分嚴峻。雙方又不得不爲此而頻頻交涉。

還在六月十一日，即張學良離開西安的第二天，東北軍六十七軍一〇七師（師長劉翰東）、一一七師（師長吳克仁）及一〇五師第三旅（旅長高鵬雲）根據西北剿總發布的命令，分三路向蟠龍和安塞方向前進。由於這一帶中共黨政機關較多，後勤補給也多集中於此，紅軍和東北軍和解後部隊警戒和防務均已相當放鬆，加上主力部隊已全部西去作戰，而東北軍推進之前又未打招呼，以致沿路一帶中共黨政貿易機關均不及準備，群衆方面亦不無疑懼。東北軍此舉確實讓中共中央措手不及，毛澤東和周恩來一面急調正在蘇區東北方向準備對付湯

恩伯中央軍進攻的二十九、三十兩軍緊急增援，一面迅速致電王以哲，要求東北軍立即停止前進，「以後行動希能早日電知，俾得一致」。但不料，由於王不在洛川軍部，聯絡不靈，該兩師繼續前推，一〇七師並且迅速占領蘇區後方之蟠龍鎮，大批機關後勤機構和傷病人員未能及時撤退和疏散，給整個蘇區後方造成極大的震動。中共中央亦十分震驚。

此時紅軍主力集中甘北作戰，陝北後方空虛已極，東北軍大舉推進，特別是直搗紅色首都瓦窰堡，不可避免地會在紅軍及蘇區群衆心理上造成極大損傷。因此，中共中央將這件事看得相當嚴重和急迫。然而，周恩來的幾封電報卻未能使局勢出現轉機。雖然十二日當天，正在洛川的劉鼎就有電報來，說明王以哲部向蘇區推進事實爲西北剿總命令，現已通知停止，軍部允許暫待二三日，等張學良返歸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動，可是，中共十三日得到的一〇七師司令部何東升副官送來的公函，卻仍舊聲稱，該部奉命向蟠龍鎮及永坪鎮、瓦窰堡各地前進，要求紅軍予以方便。十四日，東北軍果然又有繼續向前推進的消息。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深感疑惑，以致一面再三致電王以哲等東北將領，要求下令東北軍立即停止推進，一面緊急作應戰準備，急調二十九、三十兩軍回防瓦窰堡，決心不得已時對東北軍加以打擊[31]。

王以哲直到十三日方才收到周恩來的電報，他當天急匆匆給周恩來回覆一電，一方面對未能及早將此次行動告知紅軍表示歉意，一方面卻又再三解釋稱，東北軍此次行動，實在是照張副司令命令行事，命令要求所部於元日經拐卯、蟠龍向瓦窰堡前進，一部向安塞前進，情非得已，特此通知。當然，從周恩來幾封電報的語氣當中，王以哲也清楚地意識到此次行動確實已引起中共中央不滿，因而不得不再度去電加以解釋，說明此令之下達實在是因爲中央軍湯恩伯部聲稱十五日將推進到瓦窰堡，東北軍方面考慮到瓦窰堡已然不保，自不如由東北軍來占領對紅軍爲好，東北軍也好有一個機會來向蔣介石表功。但是，既然兩軍上層已經事實上結爲盟友，友軍無論如何不能僅僅爲了應付上峰指令就陷紅軍於危機中，因此，周恩來對於王以哲的這一解釋，仍然不能滿意。他明白表示：此一行動事前既未談定，故無搬移準備，今兄突入，使弟方橫遭蹂躪，決非大局之幸。務望火速電令前線兄部停止前進。如已進蟠龍、安塞，亦須負責保護醫院、工廠，並謀撤退。他在電報中甚至不得不發出警告，強調如果東北軍仍堅持進攻，勢必逼使弟方部隊出面應戰，並出兄後方截斷糧道，造成兩方敵對，於目前局勢實有大害[32]。

當然，在整個局勢極端有利發動東北軍參加抗日反蔣的時候，公開因爲這件事而與東北軍重開戰火，絕不是中共中央所情願的。因此，中共中央一面緊急部署二十九軍和三十軍回防，準備萬不得已時阻擊並側擊繼續向瓦窰堡推進之東北軍，一面仍不放棄爭取和平解決兩軍爭端的一切可能。爲此，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不惜冒險前往蟠龍面見一〇七師師長劉翰東，說明與張學良、王以哲前此約定之雙方地域範圍，要求該軍務必停止繼續向前推進[33]。可是，劉翰東卻以未得王以哲命令爲由，明確拒絕了中共所請，表示向瓦窰堡前進無法停止。這樣一來，東北軍和紅軍之間停熄了幾個月的戰火，竟又有一觸即燃之勢。

兩軍之間的這場衝突終於沒有成爲事實。十五日，王以哲再度來電解釋原委，並致以歉意之後，整個形勢因此而重現緩和。王十五日電是這樣解釋這件事的。電稱：兄我兩方之精誠相見，事實俱在。此次敝軍前進，一則因弟離開洛川，負責者本總部命令前進，事先確不知之；一則法西斯利用張不在西安，弟不在洛川，急催前進。如果弟

事先知之，當必與劉翰東兄說明原委，此等情況尚請諒之。現已急電前方負責者，令前進部隊停止於現地點，弟認爲此一點小誤會障礙不了兄我大體之方針。張先生一二日返西安，弟想彼我對國家民族之工作上，當必開展一步。望兄寬恕，並向各方解釋，爾後行動弟決負責。

事情的具體經過如何，內情怎樣，外人無論如何是搞不清楚的。但這一天，王以哲畢竟在西安以剿匪總部名義電令六十七軍所屬前進各師停止原地不動，並將此情況再報周恩來，同時說明「對兄方傷病人員待遇，已令前方負責者轉令各部隊優待之，請放心」。

既然這件事的背景如此複雜，中共方面也只能努力諒解了。周恩來十六日致電王以哲稱：來電既作解釋，此間同志均已釋然，毫無芥蒂。此事當係出於法西斯晏道剛（時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等之搗亂。還望兄及張兄注意及之。兄部務請撤至拐卯鎮之線，爾後環境如須再進，則彼此商好進行。

十七日，一〇七師果然送來公函，通知紅軍方面該師已停止前進，內稱：「頃奉王軍長電，顧慮紅軍與東北軍友好關係，可與紅軍商酌進行，萬不可發生誤會爲要等因，一〇七師已令在現地停止」。但當日吳克仁師尚無停止行動跡象，周恩來仍不得不再寫信給吳克仁，並派人送去王以哲給周恩來覆電抄件，囑其切實退兵。信稱：東北軍連日來突然深入蘇區，弟等爲兩方眞誠合作計，逐步退讓，並連電張學良、王以哲兩先生詢究竟，今幸得王軍長十五日電，稱已令貴各師停止前進，但觀察貴師行動似乎仍未得到王軍長電令。現特將王軍長來電抄陳，希予鑒察，停止今日攻瓦行動，俾雙方永保交誼，共謀抗日。

終於，劉翰東、吳克仁兩師分別於十六日和十七日退出了進占的永坪、蟠龍兩鎮。然而事情卻並不能因此了結。這是因爲，瓦窰堡這時事實上已經成爲戰區，不僅南面的東北軍，而且北面的高雙成部，

特別是東面的中央軍湯恩伯部都已距離瓦窰堡不遠，瓦窰堡要確保不失幾乎沒有可能，這一點毛澤東也早已看得清楚。因爲紅軍此時在陝北後方之兵力，只有二十九、三十兩個軍，這兩個軍又都是新由地方獨立團剛剛擴編而來的，不僅人員較少，而且戰鬥力不強，要抵抗國民黨中央軍的進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澤東還在十五日其實就已經做出中央機關全部撤離的具體部署。命令稱：「甲、東北軍現三路向瓦窰堡前進，昨日其左中兩路已抵安塞、蟠龍，右路達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綏敵人亦有配合前進可能。乙、估計到瓦窰堡遲早必失，我軍決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及軍委各機關準備移至洪德城河連灣一帶，其輜重先行，並以楊家園子及吳起鎮附近爲轉運休息地點。丙、軍委決定：(1)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並布置中央及軍委轉移。(2)德懷負責布置洪德城河連灣一帶機關（紅校在內）期於本月底完成。(3)林彪負責指揮沿途搬遷的機關部隊並定十六日開始」[33]。

多虧十五日有了這一決定，並且沒有因爲東北軍的後撤而停止執行此一決定，從十六日就開始了全面的撤退工作，否則中共方面的損失不知將有何等嚴重。這是因爲，這個瓦窰堡僅僅四天之後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國民黨軍占領了。

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根據王以哲通報，中共中央已經得知，由山西西渡黃河的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部將於二十日開始由綏德方向向瓦窰堡推進。王同時還明確表示，希望紅軍在瓦市不保時能夠首先讓東北軍進占，以便東北軍可以藉此來掩南京耳目。

鑑於瓦窰堡必失無疑，把它交給東北軍而不是交給湯恩伯，即使在紅軍方面也是最好的選擇。因此，周恩來雖寄希望湯部不會傾巢而來，但也不能不做相應準備，請東北軍不要遠撤，以便必要時能讓東

北軍而不是讓湯恩伯進占瓦窰堡。雙方並且約定，一旦兩軍靠近時，應各自向天放槍，以資掩飾。至於東北軍進入瓦窰堡的時間，還須視紅軍東線情形再行商定。

可是，國民黨方面雖然已經知道紅軍主力多半西移，但湯恩伯仍舊小心翼翼，當他得到王以哲發來的電報，得知東北軍因給養困難，不得不暫停前進時，他同樣不敢貿然推進，二十日當天只派了兩個團向老君殿方向搜索前進。鑑於這種情況，周恩來又開始相信暫時可能不必做放棄瓦窰堡之準備，故要求東北軍緩進。不料，王以哲得周恩來前電和李克農要劉翰東師立即準備占領瓦市的消息後，就已經照中共方面的建議早早向西北剿總謊報六十七軍占領赤區紅都瓦窰堡，南京方面迅速得到這一戰報，正在瓦窰堡以北最近的石灣鎮駐防的高雙成第八十六師兩個營也得知了這一情況，第二天以張雲衢爲首的炮兵第二營和步兵營就乘機出來打算半路截擊撤退的紅軍，撿些便宜。沒想到，他們進至離瓦窰堡三十里處得知瓦窰堡並不在東北軍手裡，而且得知這時防守瓦窰堡的紅軍主力正在東北方向準備抗擊湯恩伯部，城裡只有極少紅軍。張雲衢當即率領炮兵第二營和步兵營不過三四百人乘虛襲占瓦窰堡，致使「紅都」轉瞬之間不明不白地丟掉了[35]。待周恩來急調二十九、三十兩軍及警衛營星夜回援之後，張部已據城固守，紅軍因攻城乏術，只好轉而圍城，再急請東北軍劉翰東師以救援爲名於二十三日中午開入瓦窰堡。瓦窰堡到底還是沒有保住。不僅如此，一週之後，因湯恩伯的中央軍趕到，劉師受命撤出，瓦窰堡還是落在了中央軍手裡。因此，儘管一〇七師一度得以進占瓦市，其言辭中卻頗多對紅軍的不滿。

瓦窰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紅軍和東北軍兩軍聯合之事在東北軍內部上下之間太不通氣，不僅許多高級幹部不明就裡，而且與紅軍保持

密切聯絡的王以哲等高層將領，也對兩軍聯合之前途及意義缺乏深刻了解，因此只能更多地爲東北軍自身的利益著想，兩方人員並沒有形成眞正的盟友關係，思想上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其對紅軍的嚴重困難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與理解。甚至，在東北軍上層，這時也仍不乏願意貫徹南京旨意之人。這使得聯合改造東北軍之事，遠不像中共中央原來想像的那樣簡單，而張學良地位之關鍵也因此而更加凸顯。爲此，中共中央一面強調「兄我兩方關係似應詳告兄部各師長及團長中之優秀者，以厚團結，以便聯絡」，一面急盼張學良能速回西安，從而速定西北發動大計及其具體步驟，擔心久無聯絡，是否發生意外？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多次電召劉鼎回陝北蘇區開會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內完成發動準備的重要問題。

再度讓人吃驚不已的是，張學良這次從南京回來，對中共的態度上竟又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

張學良六月十日離開西安，先去蘭州爲鄧發辦前往新疆之各種手續，又於十一日轉去南京，至二十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後的第三天，即二十二日，他就前往剛剛在長安縣王曲鎮開辦的長安軍官訓練團，發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講演，開始實踐他關於訓練「傭人」的諾言。他在講演中大談「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已經到了！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時間已不容我們談準備了！我們要馬上將準備與行動聯繫起來！」「寧肯因鬥爭致死，決不束手待斃！」[36]其意義無疑是激勵他的軍官們內心深處的抗日熱情，改變過去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信條，要求他們以抗日求統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緊接著，張學良回到西安，再度與劉鼎密談，詢問有關共產黨的各種知識，甚至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請求中共中央考慮和接納。

關於張學良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情況，還在一九八六年前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文件選編裡，就已經被披露出來了。在那裡公布了一份共產國際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就提到了這件事，電報明確指出共產國際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據張學良要求準備發展其入黨的提議[37]。這份文件在一九八八年《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上被專門譯成了中文，因此也爲中國許多讀者所知，只是許多年來一直相信關於張學良不同意反蔣而主張「逼蔣」、「聯蔣」的衆多讀者還弄不清楚，張學良怎麼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只要了解到張學良自四月下旬即決心聯共反蔣的事實，對於張學良一度提出入黨要求的情況，就不難理解。儘管，如果平心而論，張學良的要求入黨，其實未必眞的帶有多少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的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於他對中共的某種信服，特別是服從於他爭取蘇聯同情與支持的現實目的罷了。

張學良要求入黨的最初文獻，見之於劉鼎六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這封電報由於當時發電和譯電的技術上的原因，譯文上存在著許多明顯的錯誤。可以讀懂的內容大致是：第一，說明劉已收到中央關於要其立即回蘇區匯報的電報，因連天陰雨，汽車不通，故暫不能返。第二，說明西南事變起後，北方韓復榘和宋哲元暗中商量響應，韓並試圖拉張學良入夥，張打算讓劉鼎與韓復榘派來的代表接談，劉因急於返回陝北已婉拒。第三，說明張學良要中共幫助訓練幹部，劉並要求中共爲其準備發報員等。第四，也是最關鍵的，即是「日要求入我黨耳，求專人訓練」一句。這裡的「日」就是張學良這時通電時的代號，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說：張學良主動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要求派專人加以訓練[38]。

要證實這封電報的確實性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因爲在兩天之後，

即在目前保存在莫斯科的另一封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就提到了這件事。而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電所答覆的，也正是這封電報。在落款時間注明爲七月二日的這封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中共中央事實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專門匯報了這件事，明確認爲可以許其入黨。電報說：

> 張在歐洲時，因蘇聯拒絕他到莫斯科，他便認爲蘇聯記舊恨，無助他意。經我們解釋，特別因我們在會議上，在軍事行動上，在經濟互助上，對他表示了誠意，他即轉而十分信賴蘇聯，多方設法幫助我們打通國際連絡。……（張自寧）回來後，即要求加派領導人才去爲其策劃，並要求加入我們的黨。我們擬派葉劍英、朱理治去，並將來擬許其入黨，因爲這是有益無損的。

同時，該電對東北軍的特殊性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稱：

> 東北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驅逐，亡國亡家的一個軍隊，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且直到現在仍爲日本帝國主義所嫉視。他已經與一般軍閥軍隊有很大的不同，雖附屬於蔣介石，並未給他地盤，且在待遇上歧視他。但仍保持東北軍的整個系統。

電報特別要求蘇聯方面對張學良和東北軍給予信任，強調與東北軍的聯合以及蘇聯對張學良的支持，蘇聯對西北發動的援助，對即將付諸行動的西北大聯合計劃有決定性的意義。電報稱：

> 目前我們與蔣介石爭奪東北軍到了最後決鬥的時期，我們客觀與主觀的條件雖都好過蔣介石，但還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國

> 際的援助是一個重要條件。……西南發動已二十餘日，……華北韓復榘、宋哲元醞釀響應，已經發出雙方不得進行內戰的宣言，但尚無軍事行動。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共同舉事。……東北軍在西北的發動決不容緩，我們計劃至遲到八月應該發動。八月上旬二、四方面軍可到甘南，那時實是最好時機。你們意見如何，即行見告。[39]

「至遲八月應該發動」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現在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時間，各種重要準備工作尚未完成，難怪中共中央這時要三番五次地急著找劉鼎前來安塞開會呢！七月一日，周恩來再度致電劉鼎，要其即日動身由膚施到安塞相見。當劉同日來電表示準備後日動身時，毛澤東二日竟又再電劉鼎，叮囑他務到安塞見面，有重要事開會討論，千萬勿誤[40]。不僅如此，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均早早就專門前往安塞，等候了將近一週時間，可見其心情急迫和事情重要之程度。

第三節　八面來風

六月份的形勢變化對於中共和張學良都實在是太令人興奮了。先是有一個轟轟烈烈的兩廣事變，與西北方面正在密謀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不謀而合；緊接著華北宋哲元、韓復榘，四川劉湘等地方實力派也在暗中積極串聯，密謀響應，其代表都先後來到西安，對張學良展開遊說；與此同時，遠在川滇黔之交的紅二、六軍團和進入西康地區紅四方面軍這時也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提議揮師北上，前來與陝北紅軍會合了。如此這些令人振奮的新情況，使得中共與張學良六月初剛剛商

定的西北發動時間，不得不大幅度提前。可是，恰恰在這個時候，張學良不在西安，這著實讓中共領導人很是著了一番急。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這時最關心的，其實還不是發動的時間問題。因爲只要時機適宜，準備成熟，張學良對於何時發動不會有所異議。關鍵在於，從瓦窰堡事件所暴露出來的東北軍與紅軍統戰關係極其脆弱的嚴重情況，使中共中央深感整個東北軍的改造與爭取工作必須立即提上議事日程，否則，一切軍事發動都可能因爲東北軍內部的不穩定和政治目標的不統一而前功盡棄。

這時，西北大聯合計劃還僅僅存在於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頭腦之中，一切準備剛剛開始，大量的具體工作尚無著落，特別是對整個東北軍的內部動員和爭取工作，正處於起步階段，張學良、王以哲與共產黨的一切秘密聯絡即使在東北軍的高級將領裡面，都還必須嚴格保密，否則難免不被洩露給蔣介石，甚至引起東北軍內部的分化。這也就是爲什麼張學良從一開始就表示，他與共產黨合作的第一步，首先並不是如何與蔣對抗的問題，而是如何把東北軍的大部分爭取過來。實際上，儘管張學良在東北軍中有極高的威信，但在涉及聯合誰，反對誰，最終走哪條路的重大問題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這一邊)」，還並不很多。而要在西北發動事變，對西北和全國形成重大影響，建立足以號召西北甚至全國的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使蘇聯能夠另眼相看，施以援助，如果不能把東北軍整個的，至少是大部分爭取過來，西北發動就很難達成目的。甚至連西北其他地方實力派，包括楊虎城等，也難以爭取過來。這也就是爲什麼，毛澤東等人一再強調，西北的發動固然要提前，但必須以能夠確保成功爲前提的原因。因爲這樣的前提這個時候還遠不具備。

自六月十二日起，毛澤東、周恩來就不斷打電報給劉鼎，要其立

即來蘇區討論重要事情。這次之所以特別叫劉鼎來，而沒有叫張學良和王以哲見面，其目的主要也就是要具體部署中共在東北軍中的工作。隨後，中共中央迅速組成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爲書記，其成員包括葉劍英、朱理治和邊章伍。同時由這個東北工作委員會具體擬定了一份題爲〈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的工作文件，經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日批准實施。該文件非常詳細地說明了中共中央爭取東北軍的具體作法。

該文件強調，爭取東北軍的關鍵，在於使東北軍自動脫離蔣介石的控制與影響，拒絕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並且公開反對蔣介石。其方法主要靠耐心的說服與解釋，集中攻擊蔣介石的政訓處，和個別忠實於蔣介石的分子，對整個東北軍不搞陰謀詭計，以爭取整個東北軍爲目的。即使是萬不得已的軍事行動，也要以自衛爲限度，以政治爭取爲目的，不能採取消滅的和瓦解的方法。因此，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必須與共產黨所慣用的下層統一戰線工作同時並進與互相配合。而爲了便於爭取整個東北軍，尤其要設法在東北軍內部物色並引導東北軍中勇敢積極的軍官，使他們能夠在東北軍中形成領導核心。同時，爲了便於爭取東北軍的工作能夠有指導的進行和順利開展，有必要在東北軍內部建立中共黨的組織，並派最好的幹部去東北軍裡開展工作[41]。

由於中共中央這時內定的西北發動時間至遲爲八月，爭取整個東北軍的工作最多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了，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幾次三番地電召劉鼎前來商量這一工作，不料，因種種原因，劉鼎遲至七月五日才來到安塞，剩下的時間竟連兩個月也沒有了。其實，即使有兩個月的時間，要想順利完成上述爭取工作，也是難乎其難的。在這裡，只有大力加強上層統戰工作，分別派人前去接近、勸說、影響東北軍

高級將領和中層軍官，從政治上感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是唯一可行的捷徑。毫無疑問，毛澤東已經清楚地看出了這一點。

在七月五日舉行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的安塞會議究竟談了些什麼，至今尚無文獻能夠直接說明。但通過這次會議前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仍舊不難看出其討論的大致內容是什麼。

就在劉鼎到來的前幾天，毛澤東即有電報給彭德懷談到大力爭取東北軍，以便早日發動西北大聯合的問題。電報在指出「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可能二、四方面軍北上後局面當有變化，也許就在此時發動西北政府」後，特別說明目前必須採取的工作方法。電稱：

> 爲準備在二、四方面軍北上後不久時間東北軍能作政治軍事上的發動(爲策應西南甚宜早動)，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部軍師團三級。目前分工，甘肅境內完全由你任之；陝西境內周與我任之。辦法須派較得力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抗日」、「反蔣」、「聯俄」、「聯共」、「東北軍本身問題」、「組織問題」等五六個根本而且具體的問題。現請先在前方征集幹部(如鄧小平、黃克誠等)，經過你的訓練找適當線索派遣出去往來於彼我之間。我們於若干天後或派克農、雲逸二人來加強之。此事請大大注意。這邊正動員劍英、克農、章五三人向王、劉兩部三師三旅十八個團分途突擊。這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爲重要。至於上層及在東北軍中建立黨的基礎，此間正在加力，並且大有希望。[42]

其實，這時在東北軍上層，如對張學良、王以哲的工作，已經很

有成績，吸收張學良入黨的工作甚至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在東北軍內部建立黨的基礎的工作，同樣也有成績，無論是中共北方局前此派來的劉瀾波、宋黎等人，還是這時在前線從事統戰工作的李克農、朱理治等人，也都已經陸續在東北軍內部發展黨員，甚至還建立起個別共產黨的秘密支部。但這時最困難的是爭取軍師旅團一級的軍官。中共和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多半還只是建立在與張學良、王以哲個人關係的基礎上，更多的只是一種上層統一戰線關係。幾個月來，中共中央對整個東北軍的內部狀況、主要幹部情況，以及政治動態，不僅無從把握，而且不甚了了。顯然，要開展對東北軍中上層的全面爭取工作，深入了解並把握東北軍的情況是絕對重要的。這正是中共中央急於找劉鼎回來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由於東北軍軍師旅團一級軍官是整個東北軍的樞紐，他們又直接掌握部隊，一旦政見分歧，即使是張學良、王以哲也將奈何不得，因此要突擊爭取整個東北軍，爭取或影響這些軍官，「目前最爲重要」。考慮到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一方面決定組織幹部分途去見東北軍各軍師團長，做政治宣傳工作，同時根據紅軍多年政治工作的經驗，決定召劉鼎來告之以紅軍政治工作優點，要其設法勸說張學良能夠在東北軍各級軍事單位設置政治工作系統，中共並願意爲東北軍配備政治工作幹部。

從劉鼎來後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看，中共中央對劉鼎報匯報的東北軍狀況及其中共在東北軍內部的工作，大體上還是滿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劉鼎來安塞之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曾有電報來，對劉鼎在被捕期間的表現提出懷疑，要求中共中央嚴重注意。但中共中央這時對此完全不以爲然。毛澤東七月六日致彭德懷電稱：「劉鼎來，布置了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工作大有希望」[43]。這明顯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對劉鼎這時所擔負的工作的重視與信任。

七月七日，劉鼎從安塞經洛川返回西安。但這一天，張學良恰好同于學忠以及邵力子、朱紹良等一道從西安啓程前往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劉鼎自然沒有能夠見到張學良，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張從南京回來，此事才得以提出，結果張學良因擔心爲蔣所知而未能同意。如此一來，安塞會議的設想整整耽擱了二十天的時間也未能實現。只不過，由於在此前後兩廣事變突生變故，作爲事變主角的廣東一方已被南京完全瓦解，中共中央此前關於迅速以西北發動來響應西南事變的計劃自然也中途擱淺[44]，故此種耽擱並未造成嚴重後果。並且，在中共中央那一方面，它所確定的「突擊」做東北軍各級軍官工作的計劃，仍舊能夠照常進行，並未因此而停頓。在這方面，尤爲典型的就是葉劍英、朱理治所領導下的針對東北軍一〇七師的工作。原本，中共中央計劃在張學良同意在東北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統時，派葉劍英、朱理治等到西安去，因此一計劃擱淺二人遂留在陝北專門從事東北軍六十七軍前線部隊的「突擊」宣傳計劃。他們明確分配了工作任務，派劉仲明專門做一〇七師的工作，馬文瑞專門做一二九師的工作，劉培植專門做一一七師的工作，另一人專門做一〇五師的工作，並且一律設法隨軍行動。同時，他們也注意利用各種宣傳手段來影響東北軍士兵，專門請蘇區的人民劇社在安塞與延安間的楊家灣集市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演出，以便針對趕集市的東北軍官兵進行政治宣傳，此舉收到極大效果。很快，東北軍六十七軍下轄的幾個師裡，都發展了共產黨員，並建立了秘密的黨組織。最好的如一〇七師，發展共產黨員有二十之多，還成立了以六三〇團陶翊周營長爲書記，王昌奎、李瑾玉爲委員的中共一〇七師黨委會[45]。

不過，確切地說，中共此時在東北軍裡進行的突擊宣傳活動並不十分成功。這一時期共產黨人在東北軍中工作者不可謂不多，但由於

分屬上海、北方局和蘇區幾個系統，各系統間又因為早期建立的地下交通線和以上海為中心的中樞指揮系統被國民黨所破壞，以致相互之間多年沒有直接的工作聯繫，中共中央對其他系統的工作情況也不甚了了。中共中央在前線一時間並不能利用上海及北方局系統前此在西北的工作成就，全靠自己重新開展工作局面，因此，它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裡的成果並不十分理想，六十七軍裡最好的一〇七師也不過就發展了二十幾名黨員，其中絕大多數還都是士兵，軍官中，特別是團長以上的軍官中不僅沒有一個黨員，而且接近和影響都相當困難[16]。除了師長劉翰東以外，絕大多數團以上軍官都畏懼政訓處的監視，而劉翰東以及其他個別高級軍官之與紅軍保持較好的關係，一方面是因為張學良和王以哲與中共友好，另一方面則是長時間和平共處雙方不免互有所求，而且也不免使雙方指揮官之間滋生某些好感。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東北軍內部，負責軍官要避免因失槍而受罰。特別是這後一條，在東北軍中這時有嚴格的規定，凡丟失槍支，不論何種原因，不僅不予補充，並且負責軍官還要受到嚴厲處罰。而這時，因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東北軍士兵攜槍投奔紅軍的事又屢有發生，因此，這時一〇七師高級軍官，包括劉翰東師長與中共代表的交往，很大程度上都與這件事有關，即請求紅軍方面能夠將叛逃者的槍支返還給自己。這種情況表明，在一個短時間內要想爭取東北軍軍官普遍接受中共「抗日反蔣」、「聯俄聯共」的政治主張，無論如何都是困難的。

當然，對東北軍的突擊工作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兩個月時間畢竟太短。值得慶幸的是，中共畢竟爭取了張學良，而爭取了張學良就已經成功了一半，進一步爭取其軍隊所缺的不過是時間而已。而更可以讓中共領導人感到欣慰的是，劉鼎、王世英

以及隨後由莫斯科經香港、廣州、南京來到陝北的潘漢年，還相繼送來了中共地下組織爭取其他地方實力派已經取得重要收穫的消息。這裡，最突出的就是，廣西、四川、華北幾方面的地方實力派領袖都積極與中共聯絡，贊成共同抗日反蔣。

還在六月上旬，廣西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就專門派代表劉仲容、王公度等分別前往上海、平津地區尋找共產黨的關係，王公度已經在六月二十日與中共中央派駐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馮雪峰）進行了初步接觸。該代表保證：「李、白此次反蔣堅決，粵陳（即陳濟棠）此次亦不致動搖，望各界各派特別是 CP 和他們合作」，他們非常渴望與中共合作。雙方因此商定，在以下幾個方面，即㈠輿論與宣傳；㈡群衆團體之策動與配合；㈢軍隊上之聯絡；㈣浙贛線、粵漢線、平漢線等路交通工人群衆之影響；㈤浙、贛、閩、湘、皖、鄂等省紅軍游擊隊等方面，一致行動[17]。劉仲容隨後也經中共北方局介紹來到西安，要求與中共中央談判。

這一階段急著找中共聯絡的，還有前東北抗日名將馬占山，前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以及華北宋哲元及韓復榘的代表劉子青等。中共中央這時也陸續派出雲廣清、張金吾、彭雪楓、張雲逸等作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四出活動。毛澤東並有信致身居抗日最前線的宋哲元與傅作義等，突出強調紅軍實力的強大，特別是有取得蘇聯援助的保證，宣傳自己奉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以影響這些地方實力派向自己靠攏。

中共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在這時無疑對諸多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不滿的地方實力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毫無疑問，不少地方實力派這時尋求與中共的合作都是看重這一點的。比如陳銘樞等人，這時就是直接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尋求支持的。陳曾專程前往莫斯科，代表由

諸多反蔣國民黨將領組成的中華民族革命行動委員會與中共代表團達成合作協議，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中共代表團也已開始向這一反蔣組織提供支持，幫助其在香港進行宣傳工作。而後，在中共代表團的支持下，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人更相繼回國，開展活動，並且開始與廣西李宗仁等攜手，準備在廣西重組十九路軍，直接參加抗日反蔣。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團長王明曾就此向中共中央做了具體的說明，並且特別通知中共中央，陳銘樞要求與中共中央簽訂抗日救國合作協定，而代表團方面已經決定支持其爲重組十九路軍訓練幹部，並決定在幹部上和物質上爲其提供援助[48]。

這個時候格外注重中共同蘇聯的關係，甚至明確表示願意爲此而盡力的，還有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以盛世才在新疆的地位，他對中共與蘇聯的態度，無論對於他自己的統治，還是對於中共和紅軍，都是及其重要的。盛世才對此顯然早就明白。正是因爲這樣，盛世才在公開聯蘇之後，又主動要求實行聯共，他同樣也像張學良一樣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盛世才原本就是東北人，早年在東北軍著名年輕將領郭松齡的資助下赴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曾在南京任職，而後經人介紹轉入新疆擔任當時新疆統治者金樹仁的軍事顧問，於一九三三年登上新疆統治者的寶座，並在蘇聯軍隊的支持下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此，盛世才公開在新疆實行「反帝」、「親蘇」、「民本」、「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並引進大批蘇聯顧問，表現十分激進。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轉入西北之後，盛世才已經看出新疆在中共聯蘇問題上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因而開始積極靠攏共產黨。還在三月十五日，盛世才就寫了一封熱情揚溢的信給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聲稱：

我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但您知道，國民黨並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蔣介石也不是一個誠實的革命家，而是一個投機的軍閥。與蔣介石國民黨相反，我和阿波列索夫(Apolesov)同志搞的新疆工作，卻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的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夠受到您的領導。我知道，過去蔣介石欺騙了蘇聯，利用和欺騙了中國共產黨，但誰也不會說我是第二個蔣介石，我和他們完全不同。第一，他們過去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也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們聯合蘇聯與中共只是爲了投機，而我卻相反，我要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完全沒有投機的心理。第二，我在還沒有到新疆之前，還沒有成爲督辦的時候，就已經打算加入中國共產黨了，現在更是如此。我現在更要利用我的地位，乘此時機公開實現蘇中友好，公開實現與中共的聯合。第三，蔣介石、馮玉祥搞中蘇友協及其與中共謀和，是因爲他們沒有出路，但誰也不能說我沒有出路，我參加了反帝鬥爭，對蔣介石、汪精衛及其南京政府產生了敵對的感情，有人說，我要保持督辦的地位，就必須和蔣、汪及南京政府進行合作，當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我卻敢於以督辦的身分與蘇聯合作，並且反對南京政府，因爲我信仰共產主義，反對南京政府的叛賣行徑。第四，蔣、汪與蘇聯的友誼是暫時的，而我與蘇聯及共產黨的友誼是永恆的、不變的。我在新疆三年來所做的工作，可以證實我實際上正是站在反帝陣營一邊的。第五，蔣、馮利用他們的政治地位進行欺騙，因爲他們是軍閥，而我卻完全是誠實的，最近八十年以來，在中國各種軍事和政治的領導人中，絕對沒有像我這樣無私的人，這是因爲我信仰共產主義。[49]

在這這封的結尾，盛世才用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盛世才」落的款。

說盛世才是馬列主義信徒，信仰共產主義，自然不那麼可信。但可以相信的是，盛世才這時的確是願意與中共合作。在其隨後不久向蘇聯國防部提交的軍事問題建議書中，和他再度給王明的信中，甚至還主動提出了蘇聯應該經過新疆大規模援助紅軍的問題。他給王明的信稱：

> 中國紅軍現在最好的發展條件就是中國西北，因此應當把陝、甘、青、寧、新五省變成中國革命的可靠根據地。現在最迫切的就是占領甘肅省。一旦甘肅占領之後，中國紅軍就能夠秘密地從新疆、外蒙古接受蘇聯的援助。如果紅軍能夠把這幾省變成他們的根據地，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他們就能夠非常便利地向中國北方和南方擴展。即使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西北根據地也可以保持與蘇聯和外蒙古的密切聯繫。……你們應當利用已有的便利條件盡可能地幫助中國紅軍，向紅軍提供軍事裝備，包括軍用飛機，特別應當建設飛機場，發展自己的空軍。我已請國防部長元帥除了賣給我們軍事裝備外，還要準備大批裝備以便秘密地援助中國紅軍。[50]

不論盛世才的這種表態究竟出於何種動機，在中共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中，新疆這一關可以肯定已經順利地打通了。有了盛世才的支持與合作，再加上張學良東北軍在陝西和甘肅的勢力，紅軍只要設法征服攔阻在陝甘兩省之間的敵對的國民黨軍隊，西北大聯合計劃不難實現了。

然而，對於這時的中共中央來說，在陝西還有一部最重要的力量需要爭取過來。這就是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在陝西的國民黨軍隊中，除了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外，整個非蔣系部隊中，就屬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最強了。特別是因爲十七路軍在陝西土生土長，與蔣介石又有著深刻的矛盾衝突，因此中共領導人自打到陝北來，就注意到對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但儘管一九三五年底毛澤東派汪鋒去見過楊虎城，也訂立了有關通商和交通問題的口頭協定，可是與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相比，中共這時對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不僅難有進展，而且簡單可以說是困難重重。這是因爲，與東北軍的關係畢竟是建立在與張學良的大體相似的政治傾向和密切協商的關係基礎上的，而與十七路軍的關係幾個月來卻更多地只能依靠少數軍官來維繫，楊虎城只是採取默認的方法一般不加干預，他個人則有意與中共中央不發生任何關係，甚至在四月間王世英受命找他談判時表現冷淡，這些都使中共領導人對楊的可靠性產生懷疑。特別是四月中旬毛澤東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楊虎城商談拖延向蘇區進兵事，楊竟推諉不見，「王同志走時要他給護照，他口頭答應敷衍，結果不見面了事」[51]。這件事無疑給了中共領導人很不好的印象。毛澤東斷定：「楊虎城怕蔣特甚，一時當難與我們建立積極關係」[52]。楊虎城直到六月因爲發現部下幾個團長被蔣收買，意識到蔣介石對其仍舊包藏禍心，才又反過來趕緊派人於六月下旬一方面找黑社會關係設法阻止，一方面找中共組織，「表示極迫切與我方聯合及求助」。可楊到底是否能下張學良那樣的決心，中共方面卻不能不有所懷疑，一直負責十七路軍交通線，對十七路軍情況十分了解的梁明德明確認爲：「對楊不要估計過高」。即使是這次楊主動找紅軍，看上去也「還不是十分需要的，不過作一種不要斷的聲勢」[53]。

楊虎城原爲馮玉祥西北軍系統的一個師長，一九二九年背馮傾蔣，

一九三〇年蔣、馮、閻大戰中從一個第十七師迅速擴編爲第七軍乃至第十七路軍。由於楊在這場戰爭中助蔣有功，戰爭結束後得到陝西省政府主席之高位。然而兔死狗烹，當馮玉祥的西北軍再不能在陝西對蔣構成威脅後，蔣爲控制陝西，轉而又頻頻對楊下手，削其兵，奪其權。楊擴編的三個師被蔣撤銷了一個師，剩下的兩個師，其中一個師長馮欽哉又被蔣所收買。在一九三三年底蔣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就免了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主席一職，改由蔣的親信邵力子來做。一九三五年東北軍又大兵入境，楊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如今，蔣竟連他最後所有的幾個團也不放過，這不可避免地要把楊虎城逼上梁山了。

楊虎城要上梁山，自然得找共產黨。而楊虎城在二十年代也確實同共產黨人打過不少交道，深知共產黨裡有不少人才。因而楊爲了自身的發展，幾年來利用共產黨陷於嚴重困難的機會，在他的部隊中也搜羅了不少因各種原因與共產黨組織失去關係或者脫黨的共產黨人。甚至從一九三六年春天起，以中共黨員謝玆山（謝華）爲首，徐彬如、李木庵、宋綺雲、金闓生、童陸生等還在十七路軍裡面組織了一個西北特別支部，用楊虎城撥給《西北文化日報》的經費開展自己的工作。七月以後，這個「西北特支」更進一步在西北軍原有的救國會的基礎上，組織了一個公開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西救」），大張旗鼓地在西安展開了抗日救國的宣傳。對此，楊虎城事實上都是睜一眼閉一眼，加以默認的。但這並不表明楊眞的信任共產黨。據謝玆山七月三十日第一次給中共中央軍委的報告說：

> 今年二月初，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南（北）來發動西北抗日工作。在這（半）年當中，與十七路軍談判很多，直至現在還在繼續討論……。他們態度還好，但缺乏勇氣，不敢發動。他們對我們說：只要川康紅軍向北集中，中央紅軍能把湯（恩伯）部解決，我們一定配合行動起來。我們現在還是耐心地進行討論的工作，我們認爲不到絕望的時候決不放棄這種談判。[54]

上述報告表明，楊虎城固然允許並同情共產黨人在他的軍隊和轄區活動和宣傳，但即使是對像謝玆山這種在十七路軍上中層中「信仰很好」，「關係很多」的共產黨員，也不能使楊掃除對共產黨的疑慮並決心與紅軍秘密結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自楊靠蔣之後，共產黨方面曾一再破壞其部隊，並屢屢發動兵變，其部下騎兵團團長王泰吉組織的一次兵變，幾乎把他的騎兵團整個端走了。而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楊爲自保，秘密地與剛剛在陝西鄰界的川北建立了赤色根據地的紅軍第四方面軍達成一項口頭協議，約定以巴山爲界，紅軍不來攻陝南，楊虎城的部隊也去不打川北蘇區。但一年之後，因蔣發現了雙方的秘密妥協，楊被迫停止了與紅軍的往來，並遵命向川北蘇區推進，沒想到紅四方面軍因此大舉進攻陝南，殲滅十七路軍達四個團之衆，僅俘虜就捉了四千餘人[55]。更讓楊不信任共產黨的是一九三五年紅二十五軍消滅其警備三旅，並殺害旅長張漢民。當時紅二十五軍剛剛進入陝西不久，楊的部隊連吃敗仗，爲自保，楊派曾爲共產黨員的張漢民率警備三旅去與紅二十五軍保持接觸，試圖與紅軍實現互不侵犯，沒想到不僅警備三旅被消滅，被俘的張漢民也不免一死。所有這些，都讓楊虎城對中共統一戰線的誠意深感懷疑。楊之所以幾個月來一方面願意在前線與紅軍實現妥協，一方面卻又極力避免與中共有任何聯繫，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種既怕蔣介石，又怕共產黨的心理在起作用。只不過，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到底不可能保持太久。蔣介石秘密拉攏其部下的作法使他不得不承認，繼續跟著蔣走，他終將失去

他的全部家當，與共產黨聯合，順應民意，抗日反蔣，或許還有一搏。

在整個中國都受到日本進一步大舉侵略的嚴重威脅面前，楊虎城像張學良一樣也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內攘外政策極爲反感。因此，他在政治上很顯然是中共抗日反蔣主張的同情者。但不應當忽視的是，中國近代的地方實力派人物之所以能夠稱雄一方，靠的都是軍隊。在這方面，楊虎城也不例外。因此，像這時所有的地方實力派軍事領袖一樣，楊同樣最看重自己的軍隊。而蔣介石同衆多地方實力派之間之所以矛盾重重，有時甚至勢不兩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於立志一統天下的蔣介石，千方百計地要取消地方實力派手裡的兵權。既然繼續聽命於蔣不能保全自己的軍隊，楊虎城也只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冒險聯合中共，取得中共的合作與支持，像兩廣事變的領導人一樣，以抗日反蔣來求讓生存。當然，楊虎城一向謹小愼微，當其存心反蔣之後，就連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也托病不去，並且力勸張學良也不要去。

楊虎城一向謹愼，這次卻敢於下此決心，根本上固然是蔣介石所逼，但同時也是由於他淸楚地知道張學良與共產黨的關係，知道在西北發動反蔣不會因勢單力孤反而弄巧成拙。並且，他也淸楚，只要聯合了中共，利用西北的接壤蘇蒙的地理條件，就有可能得到蘇聯的幫助。當然，即使到這時，爲了保險起見，楊虎城也還是爲自己留了一手。關於這種情況，在八月下旬潘漢年經張學良介紹見楊時，楊曾有過明白的說法。據潘漢年報告說，在他特意說明了毛澤東希望與他建立直接合作關係的意思之後，楊當場提出三個問題：

(一)十七路軍暫不能一一轉變爲紅軍，目前只能政治上加緊準備；
(二)合作途徑必跟張某走，毋須另起爐竈；

(三)軍事上先打通國際路線。

但對於潘漢年關於楊虎城應該直接與中共中央建立電臺聯繫，以便及時聯絡的提議，楊仍舊極力表示他的電臺不能用，要聯絡就只好通過張學良[11]。

楊虎城雖然一直小心地不與中共建立一種直接的關係，但中共中央仍舊始終在爲此努力。事實上，由於陝北蘇區受到十七路軍的直接威脅，東北軍的調動又破壞了原有的交通線，中共方面爲了打通十七路軍方面的關係不知花了多少力氣。由於無法與楊虎城直接聯絡，周恩來甚至不能不致電張學良，請其設法勸說楊與中共直接發生關係。因此，當楊虎城要求與中共聯合的信息傳達到陝北之後，不論人們是否對楊前此行爲是否理解，毛澤東還是很快寫信給楊虎城，表明了中共方面的歡迎態度，並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作爲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專程前往西安與楊虎城談判雙方合作問題。毛澤東的信說：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爲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移態度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爲友爲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陝甘受其威脅，覆巢之下，將無完卵。蔣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依靠英國，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國各派聯合漸次成就，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一若秘密之聯繫，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於先生者也。茲派張文彬同志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做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

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爲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57]

毛澤東同時還有信致杜斌丞，請其加速推動，以使楊虎城聯合中共願望能夠切實付諸於行動[58]。只不過，中共與楊虎城之間的統一戰線關係開始眞正形成，已經到了九月份了。

張文彬於八月二十六日到達西安，三十一日晚與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開始正式會談。王一上來就明確表示，楊虎城認爲目前政治形勢十分緊迫，綏遠方面有日本人的進攻，廣西方面李宗仁等因拒絕南京政府命令另立政府，再樹反蔣旗幟。因此，楊認爲抗日反蔣都已到關鍵時刻，有必要「立即在西北發動軍事行動，楊並有軍事計劃意見」，希望能夠在中共、張學良與楊虎城的三方會議上進行討論。王菊人初次會談就開門見山地代表楊虎城提出如此大膽果決的謀反計劃，這不僅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楊虎城此時的急迫心情，而且也表現出楊虎城這時在反蔣問題上甚至比張學良還來得更堅決。只是張文彬對此明顯地缺乏思想準備，以致不相信楊的這種提議確是出自眞心，竟懷疑「渠欲以此試探我方軍事行動及張與我關係，和有無背他之處。」因此，張文彬的答覆明顯地避重就輕，含糊其辭。張稱：

楊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議發動，我方甚爲欣喜，願楊能提出具體意見。但第一，我楊雙方尚無合作前提……與共同意志在事實上的表徵，希能脚踏實地地眞誠做去，不徒空(言)。第二，對張方情形我不清楚，對關係第三者情事似非單方面可以解決。如眞有此種情勢與發展到此必要時，當由各方共同會議籌劃。屆時或有四五六七方面亦未可知。但我均無事實根據。尤在此

時我楊雙方尚未有初步明確協定前提，似覺尚談不到，而不便作徒言推測。[59]

不過，坦率言之，張文彬此次前來的主要目的，就是接通雙方之交通聯絡，就雙方互不侵犯和自由通商問題達成協議。在張文彬等看來，既然楊虎城連聯絡及通商這樣的小事情都不敢做，他又如何有膽量做大舉動呢？這也難怪張文彬不相信楊虎城有反蔣決心呢！在張文彬與王菊人見面之後，楊虎城又連著六天不露面，說是有病，這更讓張文彬對楊虎城的態度感到不能信任。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說：楊虎城之所以有這種態度，顯「係因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後其部隊群衆爲我爭取，及害怕蔣之發覺而遲緩」。

直到九月六日晚，楊虎城終於出面接見張文彬了。雙方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張文彬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合作口頭協議的草案，其內容爲：

一、互不侵犯：

(1)雙方各駐原防地，在實際行動上取消敵對行動。

(2)楊負責抑制民團行動，不在蘇區及原有革命組織的地方組織保甲。

(3)不摧殘革命組織，改善軍隊紀律，密切與群衆的關係。

二、取消經濟封鎖：

(1)設專門貿易站在十七路軍掩護下保障蘇方國家貿易的流通。

(2)不禁止群衆的自由通商。

(3)蘇方不禁止群衆供給十七路駐軍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購

買。

三、建立軍事連絡：

(1)雙方軍事行動事先通報，楊方除將本部屬行動通報外，並供給南京等各方情報。

(2)有關雙方糾紛問題均經雙方磋商解決。[60]

上述提議與前此汪鋒及王世英等過去的提議，沒有多大的區別，因此，楊虎城當即表示原則同意。他甚至第一次在原則上同意中共派代表駐西安，並在西安設立一部電臺以與陝北聯絡的主張。當然，楊虎城顯然更關心共產黨對十七路軍的策略及態度。張文彬報告稱，第一，他表示，因爲十七路軍的力量與現處環境的關係，目前尚不能離開南京政府。第二，他強調，因爲十七路軍的基礎關係，目前不能與紅軍走一條路，但可以走「人」字路，將來再會合。第三，楊宣稱，紅軍除非接取國際援助，不應繼續游擊戰爭，不過紅軍的根據地最好設在甘肅、寧夏與陝西交界地區。第四，他擔心國際援助一時來不了，更擔心國際援助只給紅軍不給十七路軍。第五，他再次強調西北發動要由張學良來領導，但擔心張部複雜，且擔心因張繼承父業，未經艱苦經營，關鍵時可能靠不住。

對此，張文彬做出的答覆是，第一，應付南京是必要的，但必須努力做實際的抗日準備，防備和打擊蔣介石的破壞陰謀。第二，對十七路軍，紅軍從未有過挖角的企圖，不過希望十七路軍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成爲堅強的抗日友軍。第三，紅軍發展的方向及根據地的建立，需要根據與友軍的聯絡情況以及敵人方面的情況來決定。第四，「國際援助不成問題」，並且「一切抗日友軍，一切聯俄聯共武裝都可援助，方式與方法則按具體情形決定」。第五，對張學良及其軍隊的情況雖不十分清楚，但以其特殊的亡國情形，應該是可以改變自身的弱點的，並希望楊虎城能夠根據本人的革命歷史和意志及共處西北利害相關的緣故，對張學良給以全力推動[61]。

張文彬對楊虎城的看法很明確，他仍舊相信楊的談話突出地反映出其必欲保全自己軍隊和地盤的願望。當然，通過隨後與杜斌丞的談話，張也注意到楊虎城的過分謹慎，是與前此與紅軍交往的教訓有關。他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中提醒中共中央說：「據杜談，張漢明（民）原是十七路內認爲最左傾的分子，終爲紅軍所殺。又曾一次渠親自派一學生到漢中與張（國燾）、徐（向前）交涉，亦被殺。此等事在十七路中有很不好印象，楊、孫等現在猶怨我方不能遵守信義。深望我方注意」[62]。

七日，張文彬根據與楊虎城六日晚談得的結果，與王菊人等具體商訂了紅軍與十七路軍合作協議的具體條文。最終達成協議。協議共四條內容如下：

一、十七路軍現尚未接防，準備以十七師王旅駐最前線，旅部將在鄜州，膚施及其以北到蟠龍止，均以最少數部隊營連分駐（蟠龍是否駐還不定）。十七路軍主力均在鄜州以南，以備有事。整個部署俟決定後當再電告。

二、民團將以消極的集中訓練統一指揮名義嚴密紀律等抑制其活動。積極的方式是改造其個別不聽從指揮者。保甲組織，以目前部隊無政訓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將來如有政訓處也不致成大問題，至少可以採東北軍所用過的方法去抑制。

三、交通地點決在膚施及到甘泉的側翼，由十七路軍、紅軍各派二人以副官名義前後各駐一個辦理貨物轉運，至於人員的來往，另外由人負責，以更謹愼。

四、電臺可立即設立。[23]

時至於此，共產黨人在成功地爭取了張學良之後，終於又成功地使一向搖擺的楊虎城比較肯定地到了自己的一邊。再加上西北地區的小軍閥鄧寶珊、高桂滋這時也已經表示贊同與紅軍妥協，而在接通蘇聯問題上最關鍵的新疆盛世才也明確支持中共和紅軍的大西北計劃，西北發動的整個準備工作看上去頗爲順利。

第四節　引弦待發

隨著一九三六年秋季的日漸到來，至少發動西北大聯合的諸多條件都已經開始成熟起來了。但在另一方面，中共在陝北的物質條件卻是極端困難的，它也直接影響到紅軍的軍事發展，限制著中共力量的進一步壯大，因而不利於中共在它所倡導的統一戰線中成爲主導的力量。

中共這時在西北的條件究竟如何呢？在莫斯科保存的一份相當詳細的報告對此有具體的說明。根據這份制定於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報告，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紅軍當時確實極其需要來自蘇聯的援助。報告首先說明了陝甘寧蘇區狀況，稱：蘇區版圖北以鹽池、定邊、靖邊三縣與綏遠蒙地爲界，安邊、寧條梁、新城堡在敵手。橫山南部，米脂西部爲蘇區，惟綏德至石灣封鎖線區劃在其間。東抵黃河，吳堡、清澗東部、延川、延長及宜川一部，原均爲蘇區，現則爲清剿部隊隔成數塊。南則沿膚施、甘泉、鄜縣大道兩側以外尙爲蘇區。入甘境，合水、慶陽、固原以北均爲蘇區，西則以豫旺堡及其南北之線內與寧馬爲界。中間環縣、保安、安塞、安定四縣則屬全縣。縣城在我手中者爲鹽池、定邊、靖邊、安定、延川、安塞、保安、環縣、豫旺九城。除定邊外，餘爲均不足兩百家之城市。蘇區東西最長處有一千二百餘里，南北六百餘里。行政區域分陝北及陝甘定兩省，陝甘特區及中央直轄保安縣。整個蘇區的特點是：一、地形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鬆，人戶少，交通運輸極不便。北部靠近蒙地，更多沙地，均不宜大部隊運動。二、人口極稀，總計不過四十餘萬，除沿黃河西岸外，一般村莊少超過四五十家以上的。即在大道上亦常四十里無人家。陝甘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紅屬與人口比例超過江西蘇區。三、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特產除沿河西產煤及煤油(現入敵手)，鹽池產鹽，一般的畜羊外，無其他大宗出口。由於國民黨對蘇區實行封鎖的原因，這裡的商業更加蕭條，只有東北軍防線及內蒙古等少數地區尙有些商業來往，然而它也只能部分地滿足紅軍及機關需要，並還且需要現洋及白票交易，而蘇區目前現款已經告罄。

報告接著說明了現時西北方面的紅軍狀況，這是目前所知最詳盡的關於這一時期陝北紅軍兵力及其配備的檔案資料。報告稱：

甲、一軍團現轄三個師，計第一、第二、第四師，另一騎兵團，一炮兵連，一工兵連，一教導營，共約八千人。

乙、十五軍團轄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三個師，另一騎兵團，一炮兵連，一工兵連，共約六千人。

丙、各直屬部隊計有二十八軍，轄三個團，一炮兵排，共約一千四百人。二十九軍轄三個團，一炮兵排，共約一千二百人。三十軍轄三個團，一炮兵排，共約七百人。第一獨立師轄兩個團，一炮兵排，約五百人。兩個獨立步兵團，共

約八百人。一個騎兵團約四百人馬。一個山炮連一百五十人。其餘通信、警衛等部隊約八百人。總計約七千二百人。以上正規紅軍三項共兩萬一千餘人。

丁、地方部隊陝北省有三個獨立團，五個獨立營及各縣區游擊隊，共約三千人。陝甘寧省有兩個獨立團，一個獨立營及各縣游擊隊，共約一千三百人。陝甘特區有游擊隊約三百五十人。中央直屬隊有二百人。關中蘇區有游擊隊約四百人。神府蘇區有一個獨立團及各縣游擊隊，共約八百人。總計六千餘人。

戊、武器在正規紅軍中，步槍約及全部人數之半。在地方部隊中約超過五分之二。步槍總數在一萬以上。重機槍約一百餘挺，輕機槍約二百五十餘挺(另存有二百數十挺)。迫擊炮十六門(另有二十餘門)。山炮兩門。子彈一般缺乏，正規紅軍每槍平均不及四十發，地方部隊僅十餘發或二十餘發不等。[14]

由上不難看出，這時，西北的紅軍，餉彈匱乏，人槍有限，根據地又貧瘠偏僻，並且已被國民黨軍切割得七零八落，其自身就已經困難萬分了。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雄踞各地之反蔣實力派仍舊紛紛前來相邀入盟，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很顯然，各地反蔣派之所以看重力量並不強大的西北紅軍，除了對紅軍的戰鬥力有足夠印象以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在中共和紅軍背後毗鄰的強國蘇聯的號召力了。無論是張學良、楊虎城，還是陳銘樞、馬占山、宋哲元、李宗仁以及劉湘等等，無論他們的目的是抗日救亡，還是爲了設法保住自己的地盤與軍隊，他們之所以紛紛試圖聯合紅軍來抗日反蔣，自然不是指望可以靠紅軍的力量來左右開弓，挫蔣阻日，而是因爲他們知道，無論是要對付強敵日本，還是要對付漸漸變得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南京政府，非有強國的幫助不可，而如今也只有蘇聯才有可能幫這個忙。但是，在中國，要想聯合蘇聯，恐怕首先就必須聯合紅軍，因爲在中國，蘇聯唯一肯於援助也必定會援助的，大概也只有紅軍了。因此，聯合紅軍，是爭取蘇聯承認與支持，進而取得蘇聯援助的幾乎唯一的途徑。

那麼，這時蘇聯是否準備援助中共呢?

在今天莫斯科的檔案館裡可以看到一些曾經是高度機密的文件。這些文件表明，早在一九三三年初，共產國際就已經開始提出中國紅軍向西北邊境地區發展，以便接取蘇聯援助的設想了。到一九三四年以後，這一設想實際上已經開始提上蘇聯和共產國際中國政策的議事日程，並日漸成爲他們爲中國革命計劃好的戰略發展方向。

目前所見最早的一份有關共產國際提出紅軍向西北發展的文件，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一九三三年初給中共中央的指示電，該電明確肯定紅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是正確的。電報提出:「我們認爲，在四川，在陝南和有可能的話向新疆方向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15]。

在一年多以後，另一份文獻所提出的主張就更加明確多了。還是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福萊德(Flate)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給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尼茨基(Peyanisky)的一封信，信中建議立即在蘇聯中亞西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聯絡部人員聯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發展游擊戰爭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陝北的紅軍，並通過他們接通四川紅軍。爲此不僅應當從莫斯科派遣一些中國幹部，而且應當考慮派遣一些在蘇聯遠東地區工作的幹部，

包括一些從東北來的游擊隊成員，通過新疆到中國的西北地區去。爲此應當在蘇聯的中亞細亞地區組織一個秘密的軍政學校，並建立一個至少足夠裝備五萬人的秘密武器庫，以便訓練這些人員，並隨時準備向西北地區的紅軍提供軍事援助。

同一天，另外一份文件也提到了這一主張。這是王明、康生當天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其中明確提出中共中央應當加強陝甘寧三省的政治軍事領導，努力將川陝蘇區聯成一片，進一步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並斷言此舉爲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

另外還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皮亞尼茨基給蘇聯紅軍情報局長皮爾金(Bergin)的信，請他設法盡快協助調查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情況，以便考慮經過中國的西北邊界具體援助中國紅軍的可能性。多半是根據類似的建議，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有關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調查報告。這樣的調查報告在一九三五年已經被提交給共產國際，它們中有〈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等。這些報告說明，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至少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過外蒙進入綏遠的定遠營，接通寧夏。後者要比前者對紅軍更爲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離較遠，道路困難，費時較長，但由於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卻好得多[66]。

從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紅軍行動的一份報告來看，共產國際在這一年的四月間已經決定要紅軍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了。該報告宣稱：「現在，不僅四川地區的西北邊界已經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威脅，而且今後紅軍向陝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爲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已經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並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

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甚至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特別研究了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其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這個小組的一份報告明確肯定紅軍在西北發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67]。由此不難看出，斯大林這時之所以明確表示希望中國紅軍能夠向中國西北地區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及外蒙，其實是早有計劃的。共產國際和蘇聯有關方面也確實在密切注意中國紅軍的發展動向，並努力與紅軍取得直接的聯絡，以便指導紅軍同蘇聯外蒙接通。爲此，僅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它就接連六次派人潛入中國西北地區來接通與中共中央的聯繫[68]。同時，它們也開始具體籌劃經過西北邊界對中國紅軍的援助工作。毫無疑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之所以一再宣布：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也正是根據於此。只不過，特別是在被迫從山西退出來的情況下，考慮到在西北紅軍生存越來越困難，而發動西北大聯合必須要以蘇聯爲後援的情況，他們要求蘇聯援助的心情多半比蘇聯想要援助他們更要迫切得多。

還在提前發動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緊鑼密鼓的醞釀過程中，毛澤東就再度開始提出盡快實現打通蘇聯，接取援助的主張了，他甚至準備不等紅軍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到來就迅速就此採取行動。毛澤東提出：

> 甲、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

乙、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

丙、紅軍出動的時機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決渡河船隻，這是最好的時機。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則只好等候結冰。

丁、不論採取哪一條路與哪一個時機，給馬鴻逵以堅決的打擊都是決定的條件。因此，請你考慮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軍團向金積、寧安之間或寧安、中衛之間行動的問題，及在黃河搶奪船隻的問題。

戊、如能在東岸解決馬鴻逵一部，又能搶到船隻時，或東岸雖不能而依據已得材料，我軍有在西岸戰勝馬部之把握時，則均應準備西渡。[69]

對於毛澤東的提議，彭德懷表示同意，只是調查結果顯示兩條路各有利弊，一時難下決心。同時彭德懷注意到以陝北紅軍現有的兵力還不能做到兩相兼顧，若因貿然渡河使陝北蘇區落入敵手，則未必妥當。故他相信仍應花一個月的時間鞏固甘北占領地區，西渡黃河，接取援助的作戰只能在八月初開始進行。據此，彭德懷決定暫以打馬鴻逵爲目的，以十五軍團一部圍金積或吳忠堡，主力集結石溝堡附近，努力調動馬鴻逵打擊之。同時以一軍團出黃河東岸中寧、靖遠之間，相機搶奪船隻，赤化黃河東岸並控制中寧、豫旺、同心三角地區，以

便隨時協同十五軍團打擊馬鴻逵和依據條件渡過黃河[70]。

根據彭德懷的電報可以看出，無論出寧夏或出甘肅，作戰及紅軍生存條件都十分困難。兩條路線都有人煙稀少，缺糧少水，不利大部隊迴旋作戰和行軍宿營的困難問題，而兩條路上有村寨的地方，當地民團又都是深溝高壘、堅壁清野，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部又多是騎兵，速度快、威脅大，圍殲難。再加上國民黨現在大軍壓境，以紅軍現有的兩萬兵力一方面要保衛蘇區，一方面又要完成長途跋涉，搬運大批軍事裝備和彈藥的雙重任務，實在分身無術。因此，毛澤東不能不寄希望於「外蒙能出兵策應並解送軍械」。對此，彭德懷雖估計很少可能，卻也不能不希望國際能夠動員新疆出兵，「奪取甘、肅、涼三州，響應兩廣，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組成，援助我們」[71]。但所有這些設想都不是中共中央所能解決的，故毛澤東最終不能不很快放棄迅速打通蘇聯的想法，準備把問題提交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去考慮。無論如何，在與彭德懷反覆通電商量了打通蘇聯的設想之後，毛澤東已經注意到，在預計的八月發動開始之前，接取援助的工作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事實上，一切接取援助的工作，都要等到西北國防政府發動之後才能具體考慮。毛致電彭德懷稱：現在以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的進展程度，「可能二、四方面軍北上後局面當有變化，也許就在此時發動西北政府，我們方針力爭此著。但即能如此，打通蘇聯取得接濟仍是總的戰略方針中重要一著，不論爲紅軍爲東北軍均須如此。」目前，關於接運物資的困難尚須解決，新疆、蒙古出兵策應並解決運輸路線，即擬向遠方提出交涉，非達到這一層，我們即使到達了寧夏或甘、涼、肅，也是沒用的，因我們不能向新、蒙去搬東西。

當然，一旦發動成功，一切又將有所不同，故毛澤東也注意到：「彼時行動更有便利條件」，因爲那時將不必再爲紅一方面軍和紅十五

軍團兵力不足而苦惱。那時不僅紅四方面軍，紅二、六軍團都將到達甘北地區，而且東北軍也可以爲此助戰。那樣，無論是向西打通甘、涼、肅三州，還是北上寧夏直出五原，都將有足夠的兵力保障。

爲爭取紅軍四方面軍北上，中共中央此前已經做了大量的勸說工作。還在二月中旬，雙方關係十分對立之際，中共中央就曾以林育英的名義，一再打電報給四方面軍，說明陝北蘇區形勢十分有利，主張四方面軍立即北上。林育英與張聞天二月十四日電更進一步向其傳達了斯大林的意見，稱：

> 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爲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爲使國内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爲使紅軍眞正成爲抗日先遣隊，爲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爲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72]

至五月下旬，因爲同張學良已經商定西北大聯合計劃，中共中央再度急電四方面軍領導人，力勸後者下決心北上參加此一重大行動。爲此，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等領導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以及二、六軍團領導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具體提出了與東北軍合作，創立西北國防政府，接通外蒙、蘇聯，實行抗日反蔣的戰略設想[73]。

由於中共中央首先與其上級指導機關共產國際取得了聯繫，紅四方面軍卻困於偏僻閉塞的西康一帶，生存發展十分艱難，因此張國燾此前雖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已經自行組織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

府和中央軍委及紅軍總司令部，要求陝北原中共中央改稱西北局，接受其領導[74]，這時也已不得不自動取消，改稱中共西南局，表示願與中共中央取協商關係[75]，同時，鑒於西南事變爆發，西北發動成功在望，張國燾等更進一步接受中共中央的勸告，準備帶領紅四方面軍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了。

六月十日，張國燾等來電，表示：「擬於六月底出動，向夏洮西北行動，大約七月二十日前後可達夏洮」。對於張國燾率四方面軍等直接出夏洮入青海的方針，中共中央這時明顯地表示異議，爲此力勸四方面軍等仍以出甘南爲有利，不僅甘南敵情較弱，利於以後出陝南策應時局，且較青海利於補充，也不致引起馬步芳等挑動少數民族與紅軍對抗。六月底，張國燾來電，終於同意照中共中央建議，率四方面軍等於七月十日左右出松潘，向甘東南方向發展[76]。

七月初，紅軍二、六軍團已經到達紅軍四方面軍所在之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一處，並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以賀龍爲總指揮，任弼時爲政治委員。爲此，中共中央專門發出賀電，並再勸二、四兩個方面軍迅速北上。電稱：

> 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出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與蘇聯、外蒙打成一片，與全國抗日人民、抗日軍隊、抗日黨派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組織人民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挽救中國之危亡，解放中華民族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77]

至八月初，二、四兩個方面軍終於出至甘南，三個方面軍在甘北會合眼看就要實現了。如此，則整個紅軍在陝甘的兵力將達到大約十萬之衆。形勢對中共頗爲有利。

八月六日，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中共中央派往上海接通共產國際關係，以後曾任駐莫中共代表團成員的潘漢年從香港轉經南京、西安到達陝北保安，帶來了共產國際有關紅軍發展戰略方向的明確指示。共產國際再度重申了中國紅軍應該在中國西北地區發展，設法將陝、甘、寧、青、新打成一片，與蘇聯、外蒙接通的戰略意圖。同時，共產國際明確肯定，在中國紅軍有可能接通外蒙和新疆的條件下，蘇聯方面可以考慮從外蒙和新疆兩個方向爲紅軍提供必要的軍事物資的幫助。與此同時，潘漢年七月二十三日到西安後，張學良恰於二十四日回到西安，雙方進行了具體的商談，潘漢年說明了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決心援助紅軍的情況，張學良也表示希望更進一步密切雙方關係，準備建立他本人與中共中央之間的直接電臺，並且說明了他對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具體設想。據潘漢年匯報，張學良這時關於行動步驟的基本想法是：

第一，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建立；

第二，打通蘇聯及西北發動的時間應考慮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進攻綏蒙之際，並將攻擊方向指向綏遠，如此方能號召時局；

第三，打通蘇聯的實現暫以紅軍爲主，東北軍目前暫做隱蔽的配合；

第四，歡迎二、四方面軍到甘肅來。二、四方面軍宜先奪岷州，據此出隴西攻擊毛炳文，以便調動東北軍于學忠部控制蘭州；另以一部出夏河攻擊馬步芳老家河州，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東援，爭取使東北軍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

第五，爲便利西北發動起見，紅軍一部出河南仍是調動陝西中央軍出境，確保陝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

第六，目前西北發動的最大問題是東北軍自身的統率與改造問題，依目前條件，必須盡快物色和訓練一批可靠軍官，爲此請派有力幹部前來協助。[78]

對於潘漢年所轉達的這兩項重要消息，中共中央當然非常重視。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了紅軍行動的整個戰略方針問題，終於再次下決心實施打通蘇聯的軍事行動。會議明確決定：「打通蘇聯的意義是偉大的，應放在第一位」，它是黨和紅軍目前階段的基本任務，無論是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統一戰線的鞏固，還是抗日戰爭的實行，以及對付蔣介石南京政府，黨的所有工作均應圍繞它來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的動搖。甚至，還在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就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心，並希望與張學良具體商定行動步驟。他在八日給劉鼎的電報中明確要求劉鼎轉告張學良，說明中共中央已經了解了張學良關於共同行動的基本設想，行動問題原則同意，步驟尚須商酌。故特令潘漢年十號動身來西安與張學良兄商量各種問題，請張兄暫勿他往。

與此同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還聯名致函張學良，具體說明了中共中央對張學良行動設想的意見，並派潘漢年迅速攜返西安去見張學良。在這封信裡，中共中央明確表示同意張學良關於首先實行打通

蘇聯，九月以後再準備發動的意見。實際上，還在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根據兩廣事變受挫的情況，就已經致電共產國際，說明在兩廣失敗條件之下，張學良發動恐須略爲推遲[79]。而潘漢年帶來的共產國際已確定援助紅軍的消息，又使得中共中央認識到應該以打通蘇聯爲第一等的任務，因此，中共中央對於張學良所提以九月爲西北發動時間的建議，自然比較容易接受。甚至，中共中央考慮，依目前條件，整個西北的發動時間多半要在十月了，因西北的發動應該盡可能與打通蘇聯同時並舉，這樣相互配合才較有把握。當然，考慮到打通蘇聯的工作尙須時日，中共中央相信這一切最遲不應晚過十月份。據此，中共中央在信中向張學良提議稱：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爲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定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爲基本戰略方針。乘蔣注意西南，無力北顧之際，我們的整個計劃須於八、九、十三個月完成其基本部分。我們認爲占領蘭州是整個計劃的樞紐，其方法：用東北軍守城，紅軍二、四方面軍攻擊城外之毛炳文，勝利後紅軍一部轉向蘭州上游給馬步芳以打擊，然後以一部取甘、涼、肅三州，一部取寧夏，配合東北軍之一個軍出綏遠抵禦德王的進攻，樹起抗日旗幟，紅軍之另一部，則在陝甘寧交界控制黃河東岸，並準備南下策應東北軍主力抵抗蔣之進攻。爲此東北軍應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制蘭州，如此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我們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要說全國勝利）的最基本點，而要在秋天打通蘇聯，不使推到冬天氣候條件最困難時去做，則必須以占領蘭州爲樞紐。以戰略上鞏固內部來說，好好的完全的占領蘭州，也是絕對必要的。準備必要時以蘭州爲中心。對甘、涼、肅的占領，最好使用東北軍之一部，留紅軍在外面用，但如東北軍覺得有困難，便應以紅軍之一部用於此方面。因爲拿打通蘇聯的意義來說，占領甘、涼、肅比較占領寧夏更爲重要，這是不受日本威脅，有永久保障的一條道路，新疆的協助與蘇聯的接濟已不成問題，其詳情請問潘漢年同志。中共中央特別強調指出，戰略上與政治上鞏固內部，是發動後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一個基本任務，拿戰略意義來說，在蔣介石進攻與楊虎城動搖的條件下，我們不但不是進攻河南，也並不是保持陝西，東北軍應準備在必要時把陝西交給楊虎城，自己在北上抗日的口號下，把主力縮到甘肅境內，以便一面集結部隊，利用政治上組織上改造內部，一面與紅軍靠近占據戰略上鞏固的形勢，然後待有利時機再打出去，方能操勝算。至於發動時機的問題，信中明確表示同意張的意見，並說明，這是政治上最好機會。同時蔣在此時忙於西南，他要立即顧到西北是很困難的，然而西南一解決他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我們必須在他動手之前，完全主動的發動自己的計劃，不使自己處在臨時應付的被動地位，這是基本的原則[80]。

中共中央強調：目前「關鍵全在乘蔣注意西南時，我們以突然的姿勢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那時不管他來打也好，不來打也好，我們都有勝利的把握」。關於張學良所擔心的東北軍的改造費時費日的問題，中共中央在信中深表贊同，但他們強調：這種改造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幾個月所能做到。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一面堅決肅清東北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一面由張學良親自與軍師團長談話，或發布書面指示，再經過軍師團長們去發動下級。中共中央決定盡快派潘漢年、葉劍英、朱理治三人前往西安協助張學良進行這一工作。另外，中共中央提出：

> 我們正在討論西北發動後，共同採取一致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如人民政權形式，人民軍隊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經濟政策等，而不採取目前有差別的形式與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團結與號召全國。[81]

準備在西北大聯合實現之後，與東北軍採取統一的人民政權和人民軍隊形式，實行無差別的政策方針，包括實行統一的土地經濟政策等，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對張學良信任之深。中共中央的這封信第一次親切地稱呼張學良爲「同志」，儘管共產國際還沒有就他們所提出的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做出裁決，但他們無疑對張學良所表現出來的政治上的進步態度深表贊賞。信中特別說明：

> 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兄所採取的各種步驟與提出的意見，我們都是基本上同意的。[82]

不過，嚴格地說，十月的發動期限能否實現，多數中共領導人仍無切實把握。他們很清楚，西北發動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打通蘇聯，如果此舉看不到切實成就，整個西北發動就可能出現嚴重困難，以至分裂和失敗。然而，以紅軍現有的狀況，中共中央這時又確實對打通蘇聯的作戰沒有太多把握，並且，他們對張學良能否迅速下定決心，並完全掌握部隊，東北軍到時候能否完成各項準備，切實開始發動，也並無太多信心。因此，在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內定的「今後戰略方針」中，他們不僅沒有提到西北發動的具體時間，甚至也沒有把西北發動擺在重要位置。整個戰略完全是以打通蘇聯爲中心。這其實也不奇怪，只要打通了蘇聯，還怕西北發動不成功嗎？正如毛澤東等人在給張學良的信中所說的：「打通蘇聯之後，那時跟我們來的還多著哩！」[83]當然，爲了穩操勝券，中共中央實際上也並沒有把打通蘇聯的寶押在八、九、十三個月裡。文件明確規定，打通蘇聯的任務基本上應由紅軍獨立完成，整個過程應分爲三個階段，十二月之前爲準備階段，具體開始實施打通蘇聯的直接作戰行動應在十二月黃河結冰以後。中共中央在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中關於此一方針的內容具體表述如下：

> 一、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
> 二、根據一、二、四方面軍會合，甲軍與我們聯盟，日本指揮蒙僞軍進攻綏遠、內蒙，企圖隔斷中蘇關係，及蔣介石注意西南，暫時無法顧及西北等情況，上述任務可能而且必須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之。
>
> 三、打通蘇聯爲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爲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其步驟爲：
>
> 甲、二、四方面軍盡可能的奪取岷州或其附近，作爲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之一段，候部隊相當整理後，即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相機消滅之，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甲軍李忠部三個師全部集中於蘭州，控制蘭州爲戰略樞紐；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馬步芳老家，目的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兵力之東援，以便甲軍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於甲軍之手。在消滅青馬一部

後，促其與我講和，李毅現有代表青馬處。以上是李毅與我商定之計劃。此處再派較小一部拒止王均於于西禮之線，並派員與王進行外交。同時也對毛炳文進行外交。彼時均在極危懼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計劃大概以一個半月時間實現之。……

乙、完成上述任務之後，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十月到十一月完成之。

丙、十二月起，三個方面軍以一個方面軍任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84]

中共中央在上述計劃中對張學良和東北軍明顯地沒有寄予太多的指望，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對東北軍這時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它的作戰能力不抱幻想，他們之所以提出紅軍和東北軍應共同退入甘肅，力爭甘、青、寧，也正是出於這種擔心。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半個多月，張學良竟又突然變得猶豫不決起來。不僅如此，就是曾經最先支持張學良聯共反蔣的王以哲這時也表現出某種動搖。

八月十二日下午，潘漢年從安塞出發經延安轉往西安。到西安數天張學良竟未迅速接見，雖說張此時確實生病，但潘仍不免有些生疑。十九日，潘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說：來了這麼久，尚未見到張學良。他確患病，但尚能起坐與邵力子對弈，而不急欲見我，未知何故。劉鼎只是順從，經我多次解釋急欲面談之重要，他依然無甚辦法。今晨我會見孫銘九、應德田二政治幹部，除將他們急應積極準備一切的意義解釋外，並誠懇拜託轉達張學良君，抽一短時間讓我將中央的信予他，長談可待他全癒後，未知結果如何？直接電臺尚未峻工，一切因爲張學良想到而不動手做。原因手下無一系統工作組織，而原有軍事幹部系統，他認爲不可靠、不中用，因此什麼事除他自己動手外，旁人都無辦法。我問劉：如張學良暴死，我們在東北軍中工作豈非一無所成？他默然無答。據劉瀾波告劉向三，王以哲日內態度不佳，藍衣社有三人經常包圍他，故最近拒絕與左翼人物接近。藍衣社提出倒張擁王口號，並聲言東北軍反蔣無出路，力言張當初擁蔣，今又反蔣，是無信義，他絕不贊成。王之參謀長趙鎮藩亦表示，如蘇聯無確實把握決不能輕動，並懷疑蘇聯的幫助是否可靠。我以此事詢問劉，他認爲這是少數國家主義派活動，王態度閃倏，因張本身未公開主張云云。眞相如何，憑諸猜測，都不可靠。總之，如張學良接受信中所提基本方針，一切不難解決[85]。

不難看出，東北軍內部的情況確實不那麼簡單。特別是兩廣起事的迅速失敗，對相當一部分前此贊同聯共反蔣的軍官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這些人過去一直就把西北發動的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支持上，如今的態度更是如此。然而，這時張學良派去新疆的代表栗又文、董彥平已經到達，但從新疆聯絡蘇聯的工作尚無進展[86]，張從上海派出的代表李杜雖已獲得蘇方簽證乘船經歐洲前往近一月，但迄今也尚無任何消息[87]。在這種情況下，東北軍內部一些了解張學良意圖的幹部明顯地有些消沈。不過，張學良的顧慮看來與王以哲等人的顧慮還有某些不同。因爲張在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之間，發現國民黨上層聯俄呼聲甚高，甚至蔣介石也明確向他表示決心聯俄。這種情況頗使張感到困惑。剛從南京回來時，張心急如焚，立即接見潘漢年，通知中共中央，決心提早在西北發動，率先聯俄。但事過之後，借病靜思半月餘，思想上又不免十分猶豫。因爲，他張學良決心發動西北國防政

府，本意原在聯俄聯共實行抗日救亡，如今若蔣也願如此，自己再另立局面而與南京對立，豈不給人以居心不良之口實？這自然使張學良一下子又變得猶豫起來。

經長時間的考慮，張學良到底還是拿不定主意。因此，他雖於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晚兩次接見了潘漢年，在潘的眼裡，他仍舊是變得讓人有些捉摸不透。儘管張學良在研究了中共中央給他的信之後，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可商談的結果在潘漢年看來卻是亦喜亦憂。喜的是張仍舊十分誠懇，態度明確，中共中央要借錢，張問也不問就拿出五萬元，並表示願意多借；而憂的是張許多事情沒有準備，對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方針很難主動配合，其對蔣變得過於恐懼，甚至寧願部隊與紅軍作戰受損，也不願因配合紅軍行動而使秘密外洩。據潘漢年電報稱：「彼同意原則，但對（爲）團結自身仍不敢公開聯紅，須繼續對蔣保持灰色與忠順。因此對蘭州可由彼軍設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諸地任我攻擊取道，聽諸少數騎兵犧牲，彼未便明令退出」。潘這時還在書面報告中更進一步解釋了兩次會見的經過情形。報告說：我已見了張兩次，他表示完全同意信上所提的一切基本問題，不過他始終不願意向其幹部公開說出聯紅，目的在對蔣仍取順從態度，恐有把柄落在彼手中。因此，蘭州城內只要他單獨控制已足，我們切勿進城，即固原城以北諸鎮，他亦不願調開，任憑我們去打，他願意犧牲該少數部隊云。潘說明，他要與我聯合幹的決心是有的，對咱們關係倒也客氣，爲什麼許多事情弄不好呢？我觀察，第一，他手下沒有可以運用的組織系統。第二，對蔣力量恐慌，因此不肯立即對其幹部表明他自己的政治主張與企圖，即對王以哲亦是含混其詞。如軍官團、電臺等事，他不放心讓幹部放手做去，其舊有技術幹部，他無一信任，新的沒有，因此許多想辦的事無從進行。第三，過於誇大其部隊傳統的一定能服

從他個人領導的作用。第四，對縮短防線，先退後進的戰略，原則上認爲不錯，但他怕退出中心城市引起部隊悲觀失望。當然，對於我們借錢，他仍立刻應許，已交五萬元，我暫時放在劉鼎處存著，其餘的需要通過上海外國銀行撥付，免令人懷疑，但他聲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數萬定可由此地付出。對於占領蘭州，打通蘇聯，確定願意共同努力。每天前線情報，兩次見他都毫不遲疑地給我看，並囑電告中共中央。對王以哲的動搖，他毫不掩飾，而且是他先告訴我的，並和我商量如何爭取王。對於與你見面事，他在設法。他說必須找個出巡機會，順便在鹽池落下，很秘密的敘談，不能讓當差的知道，不能讓我們部下一人知道，主要是怕蔣介石。關於對幹部解釋事，已得如此結論：他認爲可靠的必開誠布公的講，其餘他不能深信的立刻進行調查，壞蛋趕走，中立的爭取，至於大規模的用組織化的方式去做改造工作，此刻他還不願幹[86]。

從上述潘漢年的報告中不難看出，張基本態度並未改變。甚至從八月二十五日起，由於早先負責與中共通電的王以哲臺要隨六十七軍西調甘肅，張學良已經自建一部電臺準備直接與中共中央通電。而張學良與毛澤東第一次直接通報，就明確表示決心一切仍照原定戰略計劃行事。即當毛澤東轉述四方面軍「朱德同志來電詢問，李毅部隊是否有進一步進占隆德、靜寧、會寧、定西、莊浪、秦安、天水、甘谷、武山等縣，反對二、四方面軍前進之意」時，張學良明確覆電表示：「我部決無反對貴部前進之意，近向西蘭路出動乃按雙方協定戰略，控制彼路各據點，以配合貴部前進」。「我據點請勿強攻，避之爲妥。彼等亦不敢積極出動，因已囑彼等守城保實力。萬一貴部必須路經某據點時，請兄通知，我當設法調濟。」惟天水、甘谷爲王均部，渭原、隴西、武山線爲毛炳文部，可攻擊之。由此可見，張學良這時本意仍

在繼續實行前此與中共約定之行動計劃。只不過，他這時對蔣的恐懼明顯增加了，一切均從「避免落證據給蔣」出發，故「對準備著對付工作猶豫不決」，甚至早先提出的要求中共派幹部來幫助工作的事，也變得猶豫不決了。在潘看來，「這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可是如何才能使其對整個西北發動充滿信心，徹底掃除對蔣介石的恐懼呢？潘漢年一時也想不出任何好的辦法。就在這個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情況再度發生重要的變化。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張學良意外得知中央軍三師及一補充旅由鄭州西開西安三原一線，作爲西北剿總代總司令，中央軍突然大舉開進其轄區而不打招呼，這使張深感不安。當夜，忽又得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便衣偵探密捕東北籍大學生宋黎、馬紹周等，這更使張學良深受刺激。一怒之下，張當夜調集衛隊及手槍營，一舉抄了省黨部，並把捕人的便衣偵探統統捉到「剿總」審問。張同時打電話給邵力子及省黨部負責人，警告他們務必取消便衣偵探，今後不得擅捕東北軍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人，如確有證據，必須先經過他批准方可逮捕[illegible]。次日，張又得知有關中央軍秘密西進的消息是誤傳，並且憲兵團將南京方面指令逮捕劉瀾波、孫達生二人的正式公文交給張看，於是張又不得不一面致電蔣介石請求處分，一面下令逮捕劉、孫二人交軍法處審問。不過，張私下叮囑軍法處不得用刑，並告劉瀾波「要理直氣壯，慷慨陳詞，說明自己是抗日分子，並無罪狀」。

張學良的這一表現，明顯地反映出其內心的恐慌與不安。鑒於此，潘漢年於三十日晚再與張學良密談數小時。潘明確告誡張說：

> 據我的觀察，蔣對你與紅軍妥協實已洞悉，正因爲你正面沒有提出反蔣口號和反蔣的軍事行動計劃，他又忙於桂事，現在無法過問。因此你要放膽的在準備抗日口號下，在利用蔣的統一對外名義下，迅速進行整理部隊，加強政治工作，可以在幹部中提出聯俄聯共口號，只要對蔣在表面上仍擁護他，而且利用南京派人找紅軍的事實，解釋蔣預備聯俄聯共，因此東北軍眞要抗日，更應當積極做去。對於一些藍衣社漢奸，可以用他們行動言論是違反蔣要抗日的傾向來打擊他們，可以用他們破壞蔣委員長的威信驅逐他們。總之，不要怕蔣知道你在做聯俄聯共，只要表面文章使他不難堪。相反，如包圍黨部事，對蔣不甚好看。而你硬說劉瀾波不是共黨，只是抗日分子，不能捕，蔣對你今天還是沒有辦法。如你希望做到蔣完全不知道你的眞相，這是不可能的事。何況過去許多事情，據你說，材料蔣已完全知道，現在要爭的是眞實的預備工作，不是怕蔣知道與否。……即如桂事被他解決，回頭要來對付你，你早已預備妥當，已無可虞。如爲著要欺騙他，而眞的不動手做準備工作，那麼你的危機很難克服。[40]

潘漢年所說，在張聽來，確有道理。其實，張學良及東北軍秘密和共的大致情況，南京方面早已知道，只是蔣始終騰不出手來處理罷了。對此，張也十分清楚。如今確像潘漢年所說的，即使張親自對部下說，我們今天不能打紅軍，這消息傳到蔣的耳朵裡也毫無關係，不僅蔣對此已經了解，而且蔣自己也與中共有聯繫，目的也不外是和平。問題是，張的顧慮更爲複雜。這裡最重要的當然是張擔心他與中共密謀反蔣的事情不小心即可能敗露，但這時張實際上還多了另外一層擔憂。張學良於這天晚上終於說出了他這時的主要擔心所在。據張說：一件過去未曾料到的事最近始終在困擾著他。這是因爲，

> 他赴二全會時，蔣向他表示過要聯俄，而俄態度不明。毅提出要抗日又要打紅是不行，問蔣有無辦法，蔣向他看看，蔣說不用著急，將來有辦法。同時蔣廷黻曾找過他二次，要他向蔣提出聯俄容共，他問蔣：你爲甚不提？他答：我提出，恐無效力。這次蔣發表爲駐蘇大使，他認爲南京對外政策是有新變動。他正是因爲蔣有可能與我們妥協，所以怕做得太難看，使得蔣說他投機而不滿意他，或者誤會他要與蔣爭一日之長短。[91]

事情明擺著，如果蔣眞的決心聯俄，那麼很顯然蔣是想要抗日，同時蔣若眞心聯俄，勢必也要實行聯共。如果蔣介石眞的這麼做，他張學良反蔣豈不是要給人以投機之感？對此，潘漢年完全不以爲然。他明確認爲：張「缺乏一種進步的政治鬥爭認識，他父親遺留給他一些軍閥辦法尚未刷洗乾淨，恰巧這一付舊本事與蔣去鬥，正是必敗之數」。潘向張解釋說，如蔣眞的聯俄聯共，你準備之事對蔣並無損害；可是如果蔣像他半年多來所做的那樣，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繼續堅持剿共戰爭，那麼無論你準備與否，他到頭來也不會原諒你「通共」的行爲，那時不僅抗日不成，反蔣不成，而東北軍也將成爲其俎上肉。

在潘漢年的反覆勸說之後，張學良終於開始下決心了。據潘九月一日報告說：目前他對我們計劃的了解程度，已較前十天好一些了。直接與中共中央通報的電臺建立起來了，具體準備行動也決定陸續開始了。十天前對要葉劍英、朱理治來西安猶猶豫豫，現在也痛痛快快地歡迎他們來了。張學良與我現能每晚見面，對鞏固幹部，統一內部的工作，原做得很遲緩，現決定由他普遍的提高抗日呼聲，宣傳要抗日就要保存實力。他認爲可靠之士，便進一步的提出與他聯合，他對整個計劃的爭取時間、迅速準備的原則是很了解。現在對於縮短防地

問題，他也開始注意了。他自己說，必要時把洛陽新兵師調回，除增加西安守衛兵力外，整個中心放在平涼[92]。

終於，經過一番周折，「西北大聯合」的車輪又重新開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按部就班地運轉起來了。紅軍與東北軍公開成立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地逼近了。

注釋

❶ 邱路前引文。
❷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35 頁。
❸ 邱路前引文。
❹ 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06 頁。
❺ 〈彭德懷、毛澤東致林、聶二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30-531 頁。
❻ 〈德懷、澤東致洛甫、恩來並致鄧發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36 頁。
❼ 〈彭、毛致洛甫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38-539 頁。
❽ 〈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
❾ 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 11 頁。
❿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⓫ 〈希聖致彭、毛、周電〉，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轉見《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⓬ 〈朱致張、毛、周、彭電〉，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前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⓭ 前引〈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⓮ 〈西征戰役計劃〉，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關於紅軍北上抗日方針的十八份電報)。

⓯ 邱路前引文。

⓰ 邱路前引文。

⓱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40頁;前引《周恩來年譜》,第308頁。

⓲ 邱路前引文。

⓳ 轉見邱路:〈也談劉鼎在張學良那裡的時候〉,《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以下簡稱邱路前引文2)。

⓴ 邱路前引文2。

㉑ 邱路前引文。

㉒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凱豐、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程子華致朱、張、徐、陳、任、賀、肖、關、夏諸同志並轉各負責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147-149頁。

㉓ 〈育英、洛甫、澤東、恩來、博古、德懷、林彪、海東致朱、張、劉、徐、陳並轉任、賀、肖、關、夏諸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533-534頁。

㉔ 邱路前引文2。

㉕ 邱路前引文2。

㉖ 〈洛甫致王明、康生、陳雲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81。

㉗ 同上注。

㉘ 〈中央書記致王明、康生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同上注。

㉙ 〈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德懷致朱張二同志並轉弼時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49頁。

㉚ 〈周恩來致王以哲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

㉛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44頁。

㉜ 〈周恩來致王以哲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313頁。

㉝ 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44頁。

㉞ 〈毛、周致彭、左、聶、徐、程等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46-547頁。

㉟ 參見〈訪問嚴佐民同志記錄〉。高雙成是在井岳秀死後接任第八十六師師長的。

㊱ 張學良:〈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卷,第968-980頁。

㊲ 轉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㊳ 原件無抬頭,亦未注明年月。但文末有「中央:(劉)卅日」字樣,根據判斷,文末「中央:」字樣,應爲收電人,「劉」應爲發電人,「卅日」即爲三十日,年代自然應爲一九三六,月份則應爲六月。

㊴ 同注㉖。

㊵ 邱路前引文2。

㊶ 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171-181頁。

㊷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55-556頁。

㊸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56頁。

㊹ 七月四日粵空軍首先飛離廣州,宣布擁護南京中央。緊接著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等亦公開宣布擁護南京。十三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爲廣東綏靖主任兼四路軍總司令。十八日,陳濟棠被迫離穗赴港。二十一日,廣西將領通電南京,表示擁護和平統一,服從中央命令。但實際上,廣西問題此時並未解決。

㊺ 關於王以哲軍長已成爲中共黨員的說法,十分盛行,據說還得到中共有關部門的肯定,但筆者至今未見任何歷史文獻對此有所記述。

46 〈中央工委代表葉劍英致陶同志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黨的文獻》一九九〇年第二期，（葉劍英同志的三份文電）。

47 〈李允生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注43。並見邱路前引文。

48 王明電報內稱：「陳銘樞於四月來莫，不久前離去，王明、康生曾與之晤談。陳提議與我黨簽訂抗日救國的合作協定，我們贊成陳的意見，但同時向陳解釋關於具體合作形式，尤其是組織抗日救國聯軍與總的抗日領導機關等問題，只有在國內與中央特派員代表簽訂協定。我們現在只與陳在關於下列問題上達成了口頭協議，即㈠在《大衆日報》、《前驅報》及《大美晚報》之間合作；㈡在香港共同組織培養民族革命幹部訓練班；㈢在英法等國共同進行華僑工作；㈣派我黨幹部去進行幹部工作。雖然爲進行報紙及訓練工作而派去的幹部是由我們從此地派出的，但我們向陳說是由中央派去的。我們決定根據實際需要今年逐漸爲此支出兩萬美金。」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1。

49 〈盛世才致王明信〉，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78。

50 〈盛世才給紹禹先生的信〉，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同上注。

51 〈梁明德報告〉，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

52 〈毛澤東致德懷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54 頁。

53 同注46。

54 〈謝玆山致中央軍委信〉，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

55 關於這一情況的是非曲直至今尙有不同看法。原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稱，紅軍進攻陝南是因爲十七路軍孫蔚如部出兵攻打紅軍，並任憑胡宗南的勢力伸向川陝邊威脅紅軍，同時也是爲了吸引四川敵人向北，便於紅軍突破嘉陵江。但也有人認爲楊虎城的進攻只是一種對蔣的敷衍，是虛張聲勢做給蔣看，並非有意破壞雙方的協定，而紅軍的大舉進攻則有違協議。

56 〈張文彬給毛澤東、周副主席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前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5-8 頁。

57 〈毛澤東致虎城先生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前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38-39 頁。

58 〈毛澤東致斌丞先生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前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36-37 頁。

59 〈張文彬給毛主席、周副主席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60 〈張文彬給毛主席信〉(1)，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前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11-17 頁。

61 前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11-17 頁。

62 〈張文彬給毛主席信〉(2)，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63 前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第 11-17 頁。

64 〈軍委致戰士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1。

65 轉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66 分別見〈福萊德的建議信〉，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王明、康生二同志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信〉，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皮亞尼茨基給皮爾金同志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一九三五年；〈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一九三五年，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19，卷宗號 575。另外，這時陳銘樞、蔡廷鍇等也明確提出了一個準備武裝割據中國西北甘、寧、青、新四省的「民族革命行動方案」，要求中共代表團代爲向蘇聯和共產國際請求援助。此計劃於一九三五年十月由王明上報季米特洛夫，後由季米特洛夫轉送蘇聯軍事當局。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78。

67 東方書記處：〈中國紅軍前線的新形勢〉，一九三五年四月；〈有關軍事問題的報告（絕密）〉，一九三五年，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19，卷宗號 574，575。

❻❽ 根據已知的情況，可以肯定共產國際這一段時間至少爲與西北地區的紅軍聯絡，派出過六批聯絡人員。最早派回的是閻紅彥。根據該人一九四二年回憶，他是一九三四年七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時間即被派回國遞送密碼電本，並準備接一批軍事幹部來蘇學習。閻由新疆入境，經過甘肅轉到綏遠，再轉北平，最後由山西轉陝西進入陝北蘇區，時間是一九三五年底。其次是林育英，即張浩。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期間，由共產國際選派經外蒙入境，轉經寧夏、甘肅，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到達陝北蘇區的「首都」瓦窰堡，除負責傳達有關指示外，也帶有密碼本。隨後被派往陝北蘇區的劉長勝，化名羅英，一九三五年三月到達陝北前線，主要任務也是送密碼本。一九三六年二月，當共產國際得知中央紅軍已到陝北，並向山西發起東征戰役之後，又迅速從外蒙送入一個七人小組，負責轉送電臺及密碼本，但在陝北與民團遭遇，六人戰死，一人被俘。另外，還有幾人於一九三六年五月被派，準備轉經北平前來陝北。七月又有兩人經北平要進陝北，北方局曾有電詢問與此兩人接頭暗號，以確定他們的身分。另外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底五月初經歐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傳達蘇聯方面重要戰略意圖的還有潘漢年。

❻❾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551-552 頁。

❼⓪ 邱路前引文。

❼❶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553-554 頁。

❼❷ 〈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❼❸ 同注㉓。

❼❹ 見〈黨團中央來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轉見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 115 頁。

❼❺ 〈國燾致育英電〉，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前引于吉楠書。

❼❻ 〈西北局致育英並轉北方局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德懷致朱、張二同志並轉弼時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朱、張致育、聞、毛、周、彭諸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集》（中），第 165-166 頁，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❼❼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致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肖克、關向應各同志等〉，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48-51 頁。

❼❽ 〈潘漢年報告〉，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

❼❾ 〈中央書記處致代表團轉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1。

❽⓪ 〈毛澤東等致張學良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 566-567 頁。

❽❶ 同上注。

❽❷ 同上注。

❽❸ 同上注。

❽❹ 這裡所說的李毅，是張學良和中共通電時的化名。甲軍即指東北軍，李忠即指于學忠。〈洛、育、恩、博、稼、懷、凱、澤致朱、張、任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❽❺ 〈潘漢年致毛澤東、張聞天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❽❻ 栗又文、董彥中九月間到達新疆，並與盛世才及蘇聯顧問幾次面談，說明張學良決心抗日，要求蘇聯能夠提供必要的援助。此時尙未得到具體的答覆。但據栗又文的回憶稱，對於張學良提出的請求蘇聯幫助東北軍在平涼地區修建一座兵工廠的要求，後來曾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此說是否可信，值得懷疑。因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政治指示信等有關電報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蘇聯人對張學良缺乏信任。參見〈盛世才致紹禹先生信〉，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78；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西安事變資料選編》，第二輯，第 84 頁。

87 李杜這時已經由上海中共黨組織發展入黨，並於六月二十六日帶著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和董健吾的兒子，以及張學良的一名副官和另外一人啓程前往蘇聯。據馮雪峰六月二十五日報告稱：「李杜係一可靠之人，現爲黨員。但他黨籍的最後批准，我意叫王明同志來決定（我寫了一信去），明天即起程赴法轉俄。俄亦已有電來促其前往」。〈李允生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另據五月二十九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蘇聯情報部外情部負責人莫斯柯文關於請求批准李杜來莫給斯大林的信可知，李這時化名王原華，一行六人，三個孩子，要求來莫與蘇方商談援助東北抗日等問題，該信對李杜評價頗高，稱李「最近一年來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積極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見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78。

88 〈潘漢年致毛澤東、張聞天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89 據晏道剛回憶，張對南京特務人員的不滿由來以久，還在七月二十日，張就有一信給晏，憤然聲稱「這些特務人員對我嚴密監視，挑撥離間，令人氣憤。」但寫此信時，張顯然相信蔣介石還沒有拿到多少他聯共的證據，故而他還信誓旦旦地表示：「王曲軍官訓練團的學員對提起『蔣委員長』四字沒有立正，豈是我教給他們的嗎？前線官兵與共產黨私有來往，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這許多？他們甚至說我與共產黨曾有聯繫，眞是無中生有。」轉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 197-198 頁。

90 〈潘漢年致毛澤東、張聞天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依據現有資料，可知蔣早在湯恩伯部入陝時，即獲得東北軍與紅軍聯絡文件，其最早獲知張學良有在西北另立局面意圖的風傳的時間，則在九月十八日之後。當日駐西安的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有電報致蔣稱：「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爲中心，後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見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臺北國史館一九九三年四月版，第 17，20 頁。

91 〈潘漢年致毛澤東、張聞天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92 同上注。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就在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八月十日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和毛澤東等八月九日信，勸說張學良加緊實施西北大聯合計劃，同時與已經進入甘南之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相配合，開始共同爲實現打通蘇聯的戰略計劃展開軍事行動的最關鍵時候，情況突然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一變化幾乎使中共中央完全改變了前此的計劃。

造成中共中央突然改變原定計劃的原因，是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政治指示。這一指示的核心內容在於以下三點:

第一，批評中共中央繼續實行「抗日反蔣」的策略方針。指示稱:

>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爲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爲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爲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鑒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

> 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爲此，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

第二，批評中共中央支持國內軍閥的反蔣行動，強調不能信任張學良。指示稱：

> 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認爲，你們號召支持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利用這種接觸來開展我們對張學良軍隊的工作，加強我們在他的各個部隊中的地位，並在士兵群衆和軍官中廣泛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但是，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第三，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準備停止推行蘇維埃制度，謀求在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指示稱：

> 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該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其他組織在完全保持它們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的情況下，在共同的抗日立場上的協調一致，而這些力量當中的每一支力量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都對自己的作戰地段負責，在完成共同的作戰計劃任務時都服從統一的指揮。國防政府應該是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黨派和組織的眞正代表機構。……因此，最好由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主張建立統一的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主張在普選基礎上召開中華全國議會和成立中華全國國防政府。這是在目前條件下聯合中國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衛祖國抵禦日寇的最好手段。中國共產黨還可以聲明，一旦建立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蘇區將納入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將參加中華全國議會，並在自己的區域實行整個中國確定的民主制度。❶

在發布這樣一個態度頗不尋常的政治指示之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經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的一次會議上宣稱：中國共產黨人很年輕，他們很會打仗，但他們在政治方面卻不夠成熟，沒有能夠很好地應付他們所遇到的複雜局面。以致在對待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使得政策轉變晚了兩三年的時間。他固然注意到「蔣介石本人不想搞統一戰線」，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種民族「鬥士」，但他認爲，在蔣介石「已經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組織起來」以後，共產黨對蔣介石沒有其他的選擇可能，必須主動提出統一戰線的口號，不能讓蔣介石把民族統一的資本都撈到手，要想方設法迫使蔣介石承認共產黨所發起的抗日統一戰線運動的既成事實。因此，繼續在事實上同蔣介石對抗，支持甚至鼓動國內反蔣運動，都是共產國際所不能同意的❷。

共產國際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主張聯合蔣介石，這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但無論如何，說在聯合蔣介石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

的政策轉變晚了兩三年時間是由於中共自己在政治上不夠成熟造成的，是不準確的。因爲衆所周知，共產國際自己提出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問題，到這時也不過就是剛剛一年之久。而且一年之前，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幾乎所有的與會代表在討論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沒有不罵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就是季米特洛夫也不例外。而在季米特洛夫直接領導之下的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甚至直到季米特洛夫講話批評中共中央的前十天，還在發表文章公開支持西南事變和反蔣運動❸。這種情況表明，關於聯蔣的問題，共產國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至少是沒有比較明確的說法。至於在兩三年以前，恐怕連想也沒有想過。

當然，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後，通過王明的文章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政策多少有了一些改變。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一篇文章中，王明當時曾經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可以給蔣介石一條「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❹。措辭雖然不中聽，但弦外之音不難辨別。此後，王明曾經又主持過與南京政府派駐莫斯科的武官鄧文儀的談判工作，其目的自然是願意與南京政府共同找到一種妥協的方法，但在這一談判中斷之後，王明及其中共代表團又重新回到「抗日反蔣」的宣傳上來了。中共代表團機關報《救國時報》又連篇累牘地刊登社論，宣布「蔣介石已成爲全國人民團結最大的障礙，抗日救國的最大障礙」，「實爲害國害民的最主要的蟊賊」。持續到四月十九日，人們才又可以在中共代表團的會議記錄中看到對蔣態度的某種改變。這就是，中共代表團已一致同意：「反日必先討蔣不正確」，決定將「反日討蔣」的口號，改爲「反日討賊」。這一字之改，反映出他們這時注意到對蔣應當保持某種比較靈活的態度。可是，這種轉變並不徹底❺。因此，很快又有中共代表團派潘漢年、王炳南等回國，首先謀求聯合西南、西北反蔣派的事情發生。直到七月初，王明才又有信給潘漢年，要求潘將談判重點轉移到南京方面去。據王世英七月二十一日所得消息，因爲蘇聯認爲蔣介石可以抗日，因此最近要潘漢年去南京直接找陳立夫談判，潘漢年說他是「奉王明及國際之命令來商合作問題，提出條件是：1.不壓迫愛國運動；2.肅清內部官僚；3.對日表示明確態度。實行這三條即可取消××（反蔣)。」❻當然，潘漢年得到消息時季米特洛夫還沒有在莫斯科發表他那通批評中共政策的講話，共產國際也還未發出八月十五日那封著名的政治指示，因此，潘對王明要他前去南京談判的信，也並未眞正看成是黨的整個政策的轉變，仍多少把它視之爲一種策略手段。因此，當潘漢年與 CC 系張冲接上關係，專程到南京與陳立夫見面，卻被陳以潘應先同陝北中共中央取得正式約定再談而婉拒之後，他對爭取這一談判的成功幾乎不抱任何明顯的希望❼。這多半也就是爲什麼，潘漢年雖於八月上旬返回陝北傳達了共產國際和王明信的意圖，中共中央八月十日會議所決定的政治軍事方針與前此相比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潘漢年也不再負擔與南京談判的任務，反倒轉而去做要張學良反蔣的工作去了。

很難想像，如果共產國際此前對蔣有過明確和肯定的政策，潘漢年乃至整個中共代表團對於聯合蔣介石的問題，會如此的不重視和左右搖擺。實際上，共產國際對中共在西北地區的發展一直相當重視。因此，中共代表團制定近遠期工作計劃時，就曾明確規定，近期以爭取東北軍、晉軍與紅軍停戰爲主，以後則要爭取「組織抗日聯軍，以西北爲中心」，建立「反蔣統一戰線」❽。直到七月中旬，共產國際已經開始下決心確定聯蔣政策之際，它也仍舊專門發來電報詢問紅軍與反蔣派共同發動西北大聯合計劃的把握如何。電報稱：

> 請你們立即告訴我們以下的情況：(一)宋哲元、韓復榘的發動，是只反蔣，還是同時也反日呢？如果宋哲元、韓復榘是日本走狗，而我們與他們一起反蔣，是不是會使我們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進而在客觀上反到使蔣介石鞏固其地位呢？(二)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口號之下發動時，蔣介石的軍隊有沒有可能部分的被吸收參加呢？我們認爲，必須把停止一切內戰和建立紅軍與中國各軍隊，包括蔣介石的軍隊在內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口號，特別強調地提出來，同時眞正按照這個方向進行實際工作，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自衛地進行反對蔣介石軍隊的行動。我們非常想知道，黨在全中國蔣介石軍隊中的工作，特別是在西北蔣系軍隊中的工作達到怎樣的程度。(三)應設法取得與東北軍共同進行抗日的發動，但對張學良必須格外小心，因爲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張學良很可能會背叛我們。●

共產國際何嘗不希望中共通過聯合中國各種地方勢力來使自己成爲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呢？特別是對於爭取東北軍，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蘇聯方面，從來都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蘇聯曾不止一次地幫助難以堅持的東北義勇軍和游擊隊退入蘇聯境內，其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出有必要援助中國東北的抗日戰爭，包括幫助東北的游擊隊回到東北去。前面提到過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的報告書，甚至明確主張，應當訓練和幫助這些東北人轉入中國西北地區，一旦日本敢於進攻蘇聯，「我們即可大規模地提供武器和幹部的幫助」，使他們能夠重新在中國發動武裝抗日運動。因此，即使在共產國際已經決定了聯合蔣介石的方針之後，他們對中共聯合東北軍發動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仍舊不能不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肯定必須聯

合蔣介石的軍隊，盡可能停止與蔣介石軍隊的戰爭；一方面卻仍舊對紅軍與東北軍發動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前景抱以某種期盼，希望這種發動能夠進行下去；一方面擔心這種發動能否爭取到部分蔣介石軍隊的參加，一方面卻又直截了當地要求中共應設法取得與東北軍共同進行抗日的發動，而並不介意蔣系軍隊能否整個地響應。很明顯，直至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發表針對中共政策的明確批評之前不過一週時間以前，共產國際事實上仍舊在對中共所提議的西北發動計劃抱以相當的興趣。問題是，它明確認爲這種發動只有在能夠爭取到相當部分蔣系軍隊參加時，才是可能的。而這也就是說，如果中共這時在蔣系軍隊裡也已經有了相當的工作基礎，或者，如果中共中央告訴共產國際領導人，他們有絕對把握可以吸引部分蔣系軍隊參加西北的發動，情況很可能向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當然，中共中央如實地回答了共產國際希望了解的問題，而這種回答看上去不能讓共產國際感到滿意。結果，一切就迅速朝著中共中央意料之外的方向發展了下去。

中共中央告訴共產國際，「目前無疑應以國民黨爲主要對象，在CC派、藍衣社、英美派中進行實際的工作」，「但我們工作可以說還未眞正的開始」。目前的工作主要的仍集中於兩廣、華北及西北方面。不過，

>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與實行，已成爲實現統戰的重要政策。蔣介石之崩潰主要依靠這一口號的實行，而不是反蔣戰爭。不但宋、韓我們不能贊助其不抗日的反蔣，即張學良發動時，對於陝甘境內蔣系部隊，依現在情況看，亦不宜採取攻擊態度。並紅軍對蔣系軍隊作戰亦在同樣原則之下，應該在反對攔阻抗日去路與反對擾亂抗日後方的口號之下執行。從去年十二月以

> 來，我們就這樣做了。但蔣系部隊參加西北發動目前尚無此可能。在兩廣失敗條件下，張學良發動恐須略爲推遲，時間當容許我們進行工作。[10]

既然中共沒有能力將蔣系軍隊吸引過來，而蔣介石又已經將三分之二的中國統一了起來，那麼共產國際，或者說斯大林也就只好下決心要中共中央改變既定的一心要讓蔣介石「崩潰」的「抗日反蔣」方針，改行「聯蔣抗日」的方針了。既然要千方百計地聯合蔣介石，那麼，那種以「抗日反蔣」爲旗幟的西北大聯合或曰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理論上也就應當隨之取消。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季米特洛夫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裡，還是在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的電報指示裡，沒有一個字提到中共與張學良的西北發動計劃是否應當完全放棄的問題。結果，無論是中共代表團，還是中共中央，這時都只能作這樣的理解，即既然共產國際直截了當地提出聯合蔣介石的方針，他們自然也就否定了西北大聯合計劃。王明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代表團會議上明確講：過去我們估計國防政府有三種可能，一種是與南京共同組織，南京、西南、蘇維埃統統取消；一種是部分的國防政府，西南、西北和南京分別組織；再有一種就是以蘇維埃政府爲中心，加以外力的武裝發動，即將蘇維埃變成唯一的國防政府。當時估計第二種可能性大一些。根據國際現在的指示，今後看來不是三種可能的問題，而是只有一種前途，即爭取成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若只組織一部分國防政府，則變爲內戰政府」。因此，組織國防政府，「沒有南京參加，則不行的」[11]。這也就是說，單獨的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是不行的，因爲它只能「變爲內戰政府」。

不過，這種理解未必完全準確，蘇聯人和共產國際這時對西北大

聯合計劃的態度，至少是含混不清的。而這種含混不清，歸根到底其實仍舊是他們不願意立即放棄這一計劃的表現。換言之，季米特洛夫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和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的電報中之所以沒有提到中共中央正在積極準備的西北發動問題，並不是偶然的。從共產國際電報特別擔心張學良的政治態度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並非不關心紅軍與東北軍的共同發動問題。在七月中旬來電之後，共產國際第二次告誡中共中央張學良不可靠，有背叛共產黨的可能，這表明他們仍在擔心紅軍通過張學良聯合東北軍和實行西北發動的計劃，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當然，關於所有這一切，蘇聯方面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看來還沒有太多的把握，因此，他們在講話和指示中都明確表示：前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西北發動和國際援助等問題，需要等待中共中央的代表鄧發到達莫斯科做過全面匯報之後才能作全面答覆[12]。但問題在於，中共中央似乎並不了解這種情況。因爲他們始終是把西北發動的計劃同「抗日反蔣」方針聯繫在一起的。在實行聯合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方針提出之後，至少在中共中央看來，繼續西北發動的計劃，已經很少可能了。

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中共中央是在哪一天接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政治指示的。但多半可以確定的是，它應該在八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之間，因爲根據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中張聞天的報告，在十六日中共中央已經就此作出了一個決定。從此後中共白軍工作部及紅軍總政治部均根據這一決定所做的改變方針的一致部署看，這個決定是比較簡單的。它的中心內容如下：

> 今後一切宣傳應以聯紅抗日爲中心，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應改變過去抗日必須討蔣的口號，表示希望與歡迎蔣及南京政府

> 參加和領導抗日戰爭，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自由，而反對和揭露每一妥協欺騙和投降的具體步驟，宣傳南京內部分化與蔣系左派找我的事實。對西北各部則以日使僞蒙攻綏，主力紅軍會合，要求大家停戰一致準備抗日戰爭來保西北、保華北、保中國、恢復東北失地。[13]

這一決定的中心之點就是要改「抗日反蔣」爲「聯蔣抗日」。結果，既然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應改變過去方針，要爭取蔣介石及南京政府參加甚至領導抗日戰爭，那麼，張學良此時希望繼續保持「灰色」與對蔣之「忠順」，當然也就是必要的。因此，毛澤東很快於八月二十五日打電報給潘漢年，要求潘漢年立即向張學良說明此種情況，並立即返回陝北根據新的方針領受新的任務，然後前往南京進行談判。毛澤東在電報中說：向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兄應在接電後七天內回到保安，受領新的方針，再以七天至十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請立即向張學良說明，這種談判的成功對於東北軍和紅軍兩軍合作有大的幫助，將使兩軍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於合作。並要求張學良於外出活動時注意督促南京與我們迅速成立諒解[14]。

希望用上述電報來使張學良了解中共對蔣方針的突然變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但中共中央這時對共產國際指示尚無具體討論，也沒有系統的政策指示，因此不要說對張學良，就是對潘漢年也不能具體說明這種政策轉變的細節。但爲了讓張學良了解這種轉變是有理由的，毛澤東還是急忙於上述電報發出的第二天，即八月二十六日又再打電報給潘漢年，請他向張學良解釋中共這一政策轉變的原因，即因爲南京已開始了切實的轉變，我們的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因此應當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15]。至於南京怎樣突然間開始了切實的轉變，中共因何突然決定改行聯蔣抗日的方針，毛澤東的電報仍舊沒有能夠具體說明。

潘漢年二十七日就接到了毛澤東二十五日的電報指示，但他看來並沒有向張學良去說明這一新的突然的變化。這多半是因爲二十九日晚在西安發生了張學良因陝西省黨部亂捕東北軍範圍裡的人而查抄省黨部的事件，張學良這時對南京的態度正在火頭上，他前幾天又一直在爭取張學良下決心實行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突然改口多有不便。更何況，即使是潘漢年本身，這時也對中共新方針的具體內容不甚了了。因此，潘漢年在八月三十日晚與張學良的談話中，完全不曾談到要張學良繼續與蔣介石保持統一的問題。

其實，共產國際的指示來得如此突然，這時就是中共中央或毛澤東本人，恐怕對聯合蔣介石的可能性也仍舊多少有所懷疑。共產國際的指示當然要堅決貫徹，問題是在蔣仍未停止進攻紅軍的情況下，對蔣能否完全信任呢？從總政治部與周恩來八月二十日前後給有關各方面的政策轉變的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的這種態度。電報一面提出必須改變前此抗日必須討蔣的方針，歡迎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參加並領導抗日戰爭，一面又緊接著提出：對於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仍要「反對和揭露（他們）每一妥協欺騙和投降的具體步驟，宣傳南京內部分化與蔣系左派找我的事實」[16]。在九月一日發布的政策轉變的正式指示當中，中共中央更明確地肯定了堅持此種態度的必要性，並將此一態度稱之爲「逼蔣抗日的方針」。該指示之要點如下：

> (一)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

(二)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面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面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

(三)……我們的主張同全國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我們並宣布贊助他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出的全國的國會，擁護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可成爲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指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破壞和平統一的。南京的國防會議與國民大會是不能集中統一全中國抗日力量的。

(四)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⑰

上述方針同共產國際指示的唯一區別之點，就在於強調了要繼續揭破南京政府每一退讓及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這也就是說，共產黨固然主張蔣介石南京政府參加並領導抗日戰爭，但在政治上仍舊應當保持一種進攻的態勢，用以逼迫蔣放棄現存的國民黨一黨領導之下的南京政府、國防會議與國民大會等政權組織形式，從而接受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通過實行普選制，首先選舉國會，進而由國會產生全國國防政府，最後在此國防政府下建立抗日聯軍的政治變革過程。很難認爲這種態度不正是共產國際所要求的。事實上，這樣一種政治變革過程恰恰是共產國際自己提出來的。季米特洛夫在七月講話中也清楚地了解：「蔣介石本人不想搞統一戰線，害怕統一戰線，因此需要在中國創造這樣一種局面，在蔣介石的軍隊中，在國民黨中造成這樣一種運動，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這種抗日統一戰線」⑱。在有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參加的中共代表團關於共產國際政治指示的討論過程中，王明及米夫也都堅持認爲：共產國際的指示所要求的是，這種統一戰線的政府必須是從國會中產生的，這種國會必須是普選的，「要有真正的權力，要通過憲法，並且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憲法，而是眞正能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的憲法」。必須在此基礎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組織共同的司令部，制定共同的作戰計劃，但「紅軍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必須保持，決不能接受蔣介石的『改編』，否則就是破壞分裂紅軍內部組織，這是絕對不允許的」⑲。可以想見，要想達到這樣一些目的，特別是要否定南京政府及其附屬的軍事政治權力機關，僅僅靠提出聯合蔣介石的口號，靠政治上的勸說和呼籲是不可能做到的。提出「逼蔣」方針，這在中共中央是唯一可能的選擇。

關於中共中央實行「逼蔣」方針的時間問題，也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中共中央九月八日的一封電報引起的。在這封由洛（即張聞天）、恩（即周恩來）、博（即秦邦憲）、澤（即毛澤東）四人署名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中，在傳達共產國際的政治指示時，對中共中央的政策轉變過程作了如下的解釋，說：

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之前給你們的電報。然而我們的估計還是不

> 足的。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目前我們的連絡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雙方正式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問題。依情勢看有成就之希望。⑳

這裡所說的「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無疑就是要肯定中共中央從二月開始就已經在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了。這種說法自然容易使人誤以爲，中共中央從二月份開始就已經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直到四月底五月初之前，中共中央事實上從沒有放棄過使用「抗日反蔣」的口號。最明顯的就是中共中央在二月初就當前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所發出的文件。這一文件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共中央這時對「日本帝國主義、賣國漢奸蔣介石成爲滅亡中國的主要敵人」這一點是確信不移的。因此，他們明確規定：目前黨的策略路線乃至反日統一戰線的意義，都只是「集中全中國所有抗日反蔣的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漢奸蔣介石，在最廣泛的下層的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基礎上)，去奪取最大多數群衆，利用敵人的每一間隙和矛盾，去分散與削弱敵人的力量，去孤立反革命派別」㉑。進一步在三月下旬討論統一戰線政策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們仍舊明確地肯定蔣介石是民族反革命的代表，認爲這一派人堅持反革命立場，其階級基礎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因此對於蔣介石的這一估計現在與將來暫不改變。只不過，他們這時已經開始注意到，鑒於抗日的問題已經成爲一個最急迫的和最具有全民族性的政治訴求，在宣傳策略上把蔣介石作爲「賣國賊」來打，「是最聰明的一個辦法」。也就是說，將抗日反蔣在宣傳上改爲抗日反賊，對外不強調革命與內戰，而是主張「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這樣更容易揭破蔣介石，和爭取落後群衆。正因爲如此，當四月上旬末，即周恩來與張學良第一次延安會談的當天，毛澤東等人在得知張聞天準備發布一個「討蔣令」的文件時，曾當即提出不同意見。他在這一天給張聞天的電報中說：在此時機發布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㉒。

正是根據毛澤東等人的建議，中共中央於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接連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爲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以及〈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兩個公開文件，第一次不再公開辱罵蔣介石爲「賣國賊」，稱之爲「蔣介石氏」，表示願意「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㉓。但此種作法，顯而易見還並不意味著他們準備改變「抗日反蔣」的方針。正像此後毛澤東於六月兩廣事變爆發後，主張配合兩廣反蔣派，提出「請蔣出兵，以便掃除障礙，促蔣內部起變化」一樣，它只是毛澤東所強調的一種策略手段，目的是在於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來「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因爲它比「抗日」與「反蔣」並提，「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軍隊，最能取消蔣介石之政治資本」。這多半也就是上述洛、恩、博、澤九月八日電報中所說的「開始改變此口號」的本來意思。因此，他們承認，這種「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的口號改變，事實上是不徹底的，即所謂估計還是不足的。這也就爲什麼直到七月間，中共中央在各種內部的政策性文件和來往電報中，特別是在針對張學良東北軍的工作中，始終在大談「抗日反蔣」的宣傳及準備問題。這也就是爲什麼，儘管潘漢年帶著共產國際關於應當以南京爲主要的和必要的談判對手的進一步的指示來到陝北之後，「八月上旬政

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中共中央卻肯定直到這時「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因爲事實很清楚，在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給二、四方面軍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電報中，他們儘管一面主張「認定南京爲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重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強調一切統一戰線的談判以忠誠態度出之，一面卻仍舊特別告誡黨內負責同志說：「不可忘記對於眞正敵人之革命的警覺性」，「所有以上對南京的策略，都是爲著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騙，孤立其首領，爭取其群衆」[24]。

上述中共中央的策略口號變化，很顯然同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政治指示到來之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逼蔣」方針，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不論有無「逼蔣」的形式，歸根到底還是以「反蔣」爲目的的。如果說這一政策在二月，或者在四月間有過什麼口號的改變，那也只是從「抗日」與「反蔣」並提，從討日令和討蔣令並舉，改變到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爲口號，「在討日旗幟下實行討蔣」而已。但在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指示到達以後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因爲這時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策略方針，不論形式如何，根本上到底是以「聯蔣」爲目的的。只不過，由於它仍舊包含著要取消蔣介石南京政權的內在目的，因此只好採取一種帶有政治攻勢意味的「逼蔣」形式了。結果也就引出了許多複雜的情況。而這一新策略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堅持與各反蔣派密切聯絡，並以此爲策略來壓迫蔣介石接受共產黨政治條件的問題。

實行「逼蔣」策略，僅僅靠幾萬紅軍和這時更多的只在少數邊遠落後農村具有影響力的共產黨人本身是不夠的。要想達到這一「逼蔣」的目的，除了仍舊要謀求國際方面的援助以外，在國內中共仍舊必須堅持乃至積極謀求與各反蔣派別的聯合。但這樣一來，中共中央對蔣

的態度雖然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它聯合反蔣派的方針卻沒有任何重要的變化。特別是對張學良及東北軍，毛澤東並不在意共產國際關於必須保持階級警惕性的告誡，仍舊給予高度重視和信任。這時的突出例證就是當毛澤東聽說王以哲有些動搖，並有國民黨藍衣社分子在旁鼓動以王取代張之地位後，一方面擔心消息不確，故並不立即轉知張學良或即視王爲異己；但另一方面則迅速專函王以哲，苦口婆心地加以警喻與勸告，以爲預防之策。其維護張學良之地位及東北軍之團結，可謂用心良苦。毛澤東函稱：

>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於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於最後的失敗。因爲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眞實、不純潔之主張，乃眞心實意爲國家爲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爲，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糊幹於此。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專節之分子，逞其私慾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爲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於謠言，或爲蔣氏左右之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干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

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25]

張學良這時對中共中央新方針的轉變，尙不明就裡。得知潘漢年應中共中央的要求必須返回陝北，他特別告訴潘漢年要快去快出，並帶中共重要幹部出來，特別是要盡快帶葉劍英來西安工作，因東北軍這時與陝北蘇區的唯一通道由於一〇七師即將調防會被迫放棄，晚了恐出不來。果然，潘漢年於九月十一日進入蘇區之後，一時竟因一〇七師調走，受阻不能出來。這時，雖然張文彬與楊虎城談判成功，與十七路軍的通商問題得到解決，但通過十七路軍轉送東北軍的人或中共的代表進出蘇區，仍舊沒有可能。因此，張學良不得不暗示駐守羊泉張村驛一帶的一一二師師長霍守義可以與紅軍方面接洽一切，再由紅軍派人接談，改善關係。於是，直到十月四日潘漢年才與葉劍英一同經過一一二師的防地，輾轉回到了西安。

潘漢年在陝北保安期間，參加了中共中央關於具體討論落實共產國際政治指示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召開的時間爲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參加者是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人數最多的，達到三十四人。因此，會議的討論及決定頗能反映黨的整個高層的意見。報告人張聞天首先即承認：「從前把抗日與反蔣是並提的，這是錯誤的。過去我們對南京政府的估計，完全說他是與冀東政權一樣的，這也是錯誤的。說蔣力量的削弱，但沒有估計到蔣仍是抗日的大的力量，也是錯誤的。過去我們對南京的策略，雖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沒有轉變的，並沒有明顯的指出『抗日反蔣』的口號並提(的錯誤)。後來接到國際的電報，才有完全轉變過來。」如今，「我們要聯合蔣介石抗日，要指出認爲反蔣戰爭有進步性質的看法是錯誤的」。當然，對蔣介石仍要看到他動搖妥協的一面，要看到他鎭壓民衆和進攻紅軍的一面。正如毛澤東所補充說明的：對於蔣介石，要看到「他和我們聯合是可能的，但那天可實現聯合是說不定的」，因此「我們的警戒是不能放鬆的」。「要用各種方法逼蔣抗日」，「改倒蔣爲批蔣，對他們要嚴格批評」，只有這樣才能迫使蔣介石接受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放棄收編紅軍的幻想，並爭取實現自己在未來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至於與南京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會議決定原則如下：

(一)在政治方面，是中共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訂立共同反日的綱領上的協定，同時各黨派均保存其政治上的完全獨立性，絕不是使中共與中國某種政治組織混合。

(二)在軍事方面，是紅軍與其他武裝力量關於組織抗日聯軍的協定，同時每個參加的力量保存其獨立性和擔任一定的戰線，但在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時，服從統一的指揮，絕不是使紅軍與其他的一切抗日軍隊混合。

(三)盡力鞏固黨和紅軍是抗日戰線最主要的正確路線，現在保障隊伍的純潔和黨的團結一致，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四)要利用上層的統一戰線進行下層群衆的統一戰線，要用鞏固的下層的統一戰線鞏固上層的統一戰線。

(五)在服從抗日戰爭的利益條件下，盡量擁護群衆的利益，領導群衆鬥爭。[26]

會議對於中共與張學良的關係，以及實行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問題，完全沒有提及。但可以看出的是，根據張聞天所宣布的，今後應當反

對反蔣戰爭，不應當如過去那樣同情反蔣戰爭的觀點，西北發動的計劃事實上是不能繼續了。與此同時，會議還根據共產國際的批評，否定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窰堡政治決議中關於「不問他的社會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的決定，儘管會議對共產國際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一事未置一詞，但突出強調這一入黨規定的重新更改表明，中共中央實際上也已放棄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初衷[27]。所有這一切政策上的重要變更，都使中共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一下子變得較前更加微妙和複雜了。

中共突然轉而以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爲主要統戰對象，並且迅速開始全力展開對南京上層的統戰工作，前此積極準備與紅軍同舉義旗，共謀反蔣的張學良怎麼辦？中共中央又如何去向一度準備推舉爲西北國防政府首腦和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的張學良去解釋？特別是從西安回來的潘漢年更是擔心，他剛剛把張學良同蔣介石鬥爭的意志鼓動起來，現在又要去告訴張學良應當放棄與蔣介石決裂的準備，重新去向蔣介石表示「忠順」，這會不會引起張學良的不滿。但情況其實遠不像中共中央這時所顧慮的那樣困難，恰恰相反，張學良剛一得知中共中央準備實行聯蔣方針的消息，立即要求劉鼎轉告中共中央，他「對那個信極表贊成，並願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一，結力抗日，請爲蔣使，冒險說和」，並希望能就此再與周恩來一晤。

張學良這樣說，也或多或少地這樣去做了。「九一八」事變五週年之際，張學良特地轉托馮庸向陳誠表達其決心抗日之意。聲稱：「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陝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故「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28]。二十二日，張復借否認轉托陳誠說明抗日心跡事，致電蔣介石再稱：「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良此時在鈞座指揮下盡剿匪之職責，尤願早日在鈞座領導下爲抗日之犧牲。惟冀鈞座於國防會議內確定整個計劃，實行抗日，良決負弩前驅，惟命是從。」[29]儘管，張學良出於種種考慮，並沒有貿然出面代紅軍向蔣「冒險說和」，但即便如此，向蔣介石直接提出「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這在張學良也已經是破天荒了。事實上，由於蔣介石這時已經平息了兩廣之變，基本上使各派武裝臣服於國民黨南京政府之下，唯有中共與紅軍尚在對立位置，故張在這裡說什麼必須集中全國力量云云，其實非常明顯地就是暗指應當把共產黨也集中起來之意。

關於這一點在幾天後張學良給陳誠的電報中表露得更明顯一些。電報稱：「至於抗日之實際行動，非有整個計劃，齊一步驟不可。局部行動，失敗之前車，則皆弟所深悉。在弟固當謂欲圖救亡，必須抗日，欲謀抗日，必須統一。但統一力量，不應偏重軍事，統一全民力量，乃是堅固之武力。」[30]這裡所說的「統一力量，不應偏重軍事」，所指爲何，自然更加清楚。

張學良陸續向南京方面提出統一全國力量一致抗日主張之議的時候，潘漢年還沒有回到西安，因此，張學良並不曾與中共中央具體商量中共和平條件之極限，甚至不知中共是否同意以其爲說客，這多少也是張學良此時未能直截了當地代爲轉述共產黨要求的原因之一。但無論如何，自得知中共贊同聯蔣之後，張接二連三地主動向當局表露抗日心跡和委婉要求停止剿共的情況，反映出他此時的心情相當興奮。這多少說明，西北發動對於張學良來說，仍屬不得已之舉。如果因中共對蔣態度之轉變，蔣介石及南京政府能夠轉而實現張學良的抗日願望，集中國力以收復失地，他張學良更寧願國共兩黨攜手對敵。

第二節　艱難交涉

還在九月二十日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曾專門提到張學良已經看過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說張對「那個信」極表贊成。張學良這時看到的「那個信」，其實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個文件大致完成於八月二十五日之後，九月一日之前[31]。九月上旬已通過交通經劉鼎轉送張學良，請其提出意見。該文件一面對國民黨對日妥協退讓大加批評，一面則詳細地說明了中共這時的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在主要方面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沒有太多區別，只是它考慮到通過普選國會再來產生國防政府過於遲緩，且目前情況下自己影響地區及人口過少，直接普選的辦法對自己明顯不利，故根據它在四月二十五日宣布的建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參照共產國際的主張，提出了「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主張。在這裡，它的核心主張其實只是，首先成立由各黨各派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並且眞正能夠決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抗日救國代表會議(或國防會議)，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他們顯然希望，可以在這個基礎上與國民黨達成妥協[32]。

問題是，南京政府是否願意與共產黨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呢？如果願意，它所開列的條件又是怎樣的呢？

可以肯定，蔣介石是願意與共產黨通過談判達成妥協的。事實上，不論蔣介石如何繼續進攻紅軍，也不論中共中央過去如何堅持「抗日反蔣」，國共兩黨之間的接觸與談判從一九三六年初開始，始終就在秘密的進行當中。而且，這種談判之得以發生，從一開始就是蔣介石的

主動。

蔣介石最早找中共談判，發生在一九三五年底。當時共產黨已經被迫退入邊遠的西南和西北地區，南京政府已經將大半個中國統一在自己的權力之下，相反，日本人卻在接連侵占了東北三省及熱河和察哈爾大部分地區之後，又向綏遠、內蒙甚至平津地區推進了，爲了設法阻止日本人進一步染指華北乃至全中國，蔣介石這時十分希望能夠與蘇聯政府簽訂一項軍事互助條約。他十月份向蘇聯大使提出此議，恰好這時蘇聯極爲擔心日本可能首先進攻外蒙，進而進攻蘇聯，因此反應頗爲積極，十二月時上旬蘇聯政府就明確表示願意同南京政府討論軍事互助問題[33]。但與蘇聯人締結軍事互助條約，至少在蔣看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這就是國內的共產黨問題。蘇聯政府的積極反應使蔣介石產生了一個錯覺，誤以爲蘇聯會因此放棄對中共的同情與支持，他可以利用此點要求蘇聯政府向中共施加壓力，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基於這樣一種考慮，蔣介石一接到蘇聯同意討論軍事互助協定的答覆，就立即向蘇聯大使提出了他關於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設想。而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法，說到底就是要共產黨放棄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南京政府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存在[34]。

其實，還在蔣介石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願意政治解決國內共產黨問題之前，爲準備與蘇聯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蔣就已經在準備與共產黨談判了。蔣介石這時曾委托陳立夫等人秘密尋找共產黨的關係，打算開始與中共直接談判。就在得知蘇聯政府願意與之建立密切關係的幾乎同時，蔣介石恰好得知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後正在開始改變政策，宣傳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這更使蔣介石相信，他可以通過莫斯科來解決共產黨問題。因此，蔣當即決定派回國

述職的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迅速返回莫斯科，去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接觸與談判。

隨後，蔣介石又秘密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清，攜同張冲，化名江淮南，一同趕赴柏林，準備一旦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的談判稍有頭緒，就立即就近予以指導，並且馬上開始與蘇聯政府具體商談軍事互助協定問題[35]。

鄧文儀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趕回莫斯科後，很快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是同潘漢年，後是同王明，就國共兩黨合作問題進行了四次秘密的商談。在一月十七日與王明的談判過程中，鄧文儀代表蔣介石明確提出了在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基礎上，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據鄧文儀稱，蔣介石的具體條件包括下列四點，即

> 第一，關於政府，取消蘇維埃政府，邀請所有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第二，關於軍隊，紅軍應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因爲要抗日一定要統一軍事領導。當然，紅軍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政府和紅軍可以交換他們的政工人員，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員到紅軍中去，紅軍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員到南京軍隊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第三，關於黨的問題，蔣先生考慮了兩個辦法，或者是恢復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兩黨合作形式，或者共產黨獨立存在。這個問題可以以後逐步解決。蔣先生知道紅軍沒有軍事裝備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軍事裝備和食品給紅軍。另外，關於防線，可以派一些軍隊和紅軍一起到內蒙古去參加抗日鬥爭，因爲南京政府的軍隊主要的軍事行動在長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較多的部隊到別的地方去。[36]

在這個時候，中共代表團的基本設想還是要建立以自己爲中心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他們對於這樣的條件自然不可能接受，但談判雙方仍就中共代表團派代表前往南京與國民黨當局就此進行具體談判問題，達成了一致，並約定中共代表和鄧文儀一起，於一月二十五日從莫斯科出發，前去南京。不料，就在臨行前兩天，即一月二十三日，鄧文儀突然告訴王明，聲稱蔣介石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參加另外的談判，他們商定的前往南京談判的事情暫時必須向後推延了[37]。之後，鄧文儀一去不返，再未與王明等聯繫。

蔣介石突然決定停止在莫斯科的談判，純粹是因爲他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一次談話。這一天，鮑格莫洛夫代表蘇聯政府正式拒絕了蔣介石關於由蘇聯出面幫助他勸說中共向南京輸誠的提議。蘇聯政府的這一態度，顯然使蔣介石極爲惱火。蔣無論如何不能理解，既然蘇聯政府已經表示贊同與南京政府締結軍事互助同盟，這自然也就是承認了南京政府的正統地位，難道它一面承認南京政府的正統地位，一面卻還要同以推翻南京政府爲目的的中共保持特殊關係？

在與蘇聯人直接打了十幾年交道之後，蔣介石始終認爲蘇聯一心想在中國扶植共產黨，而對自己和國民黨不利，故自二十年代末期，他就已經採取了斷然的反蘇措施，甚至不惜同蘇聯斷絕了一切關係。蔣介石重新打開對蘇聯關閉的大門，僅僅是因爲「九一八」事變後中蘇兩國在對日政策上存在著共同的利害關係，當今世界上又只有蘇聯才有強烈的遏制日本侵略的願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已經在一九三四年取得了軍事上的絕對勝利，從而使紅軍幾乎不再可能對南京

政府的地位進行任何直接的挑戰了。正是因爲如此，蔣介石這時有理由相信蘇聯人願意同他談軍事互助的問題，是因爲蘇聯人已經看出，中共已經不行了。不料，在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的談話中，蔣雖再三要求蘇聯政府在國共兩黨的衝突問題上表明立場，警告蘇聯必須通過向中共施加壓力，支持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方式，來取得他的信任。而鮑格莫洛夫卻絲毫不爲所動，這位大使甚至明確轉達蘇聯政府的意見說，蘇聯與中共毫無關係，解決兩黨衝突是中國內政，蘇聯政府絕不會充當調解人的角色。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見中，蔣介石反覆勸說長達八十分鐘，竟全無結果[33]。

既然蘇聯政府並不想放棄他們對中共的支持，蔣自然失去了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他甚至對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也心灰意冷了。儘管事實證明，對於南京政府來說，這是與蘇聯結盟的唯一的一次機會，但事情很明顯，在共產黨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之前，蔣介石絕不願意冒險與蘇聯締結軍事互助條約。因爲，如果蘇聯繼續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蘇聯軍隊依照條約進入中國，受其益者必是中共無疑。這也就是爲什麼蔣介石此後曾斷言：「俄非不可聯，但須我們淸共後」[34]。顯而易見，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三日突然致電鄧文儀，要他立即停止談判，而後又致電正在柏林準備開始軍事談判的陳立夫，立即改變與蘇聯政府秘密談判的計劃，轉道歐洲回國，都是爲此。當然，蔣介石並沒有放棄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計劃。開始於莫斯科的國共兩黨談判雖然告一段落，國民黨在國內尋找共產黨直接進行談判的過程卻由此而開始了。蔣介石顯然相信，他完全可以撇開蘇聯自己來解決共產黨問題，一旦共產黨問題得到解決，他還可以同蘇聯談判互助條約問題的。

還在鄧文儀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團進行秘密談判之際，陳立夫手

下的曾養甫已經通過諶小岑與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和呂振羽接上了關係，並轉述了國民黨方面關於政治解決的基本條件。據周小舟隨後的報告稱，當時中共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八一宣言〉(〈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所列之十大綱領，核心乃在要求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40]。國民黨方面明確表示，可以考慮承認共產黨在組織上的存在與獨立，乃至釋放政治犯等，甚至可以劃定一個特別區域來供共產黨人實驗諸如集體農場之類的理想，但共產黨必須同意：㈠協助聯蘇；㈡紅軍改編，蘇維埃改制；㈢幫助蔣先統一，後抗日[41]。這裡的核心之點，其實始是一句話，即：紅軍改編，蘇維埃改制。而改編改制的標準，只能是依據國民黨的軍隊和政權的形式，即把共產黨的軍隊和政權統統統一到國民黨的軍隊與政權中去。從以後的事實看，南京方面此後條件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但中心要求皆不外如此。

隨後奉派前往陝北蘇區轉達南京政府政治解決中共問題願望的董健吾、張子華二人，其實轉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只不過，他們只用了兩個字來概括此意，即所謂輸誠。他們說：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劃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但實際負責的全是 CC 系曾養甫及其背後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目的僅在於了解中共可能輸誠的條件。若中共肯於向南京政府輸誠，則蔣可同意「甲、不進攻紅軍；乙、一致抗日；丙、釋放政治犯；丁、武裝民衆；戊、頃（傾）蔣尙有款。」[42]

儘管中共北方局與南京政府接觸在先，而董健吾、張子華來陝在後，但因北方局此時與陝北中共中央尙無電報聯繫，聯絡十分困難，因此，中共中央只是到董、張二人於二月底到達陝北之後，才第一次了解到南京方面謀求政治解決兩黨關係的消息。不管中共這時對蔣方針如何，他們顯然把這種接觸看成是向全國各方活動，並得與全國群衆見面的千載一時之機[43]。中共中央這時淸楚地知道蔣介石關於輸誠

要求的實質在於:「取消蘇維埃紅軍, 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 引進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 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 接受南京節制, 以最後瓦解紅軍」[14]。這當然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他們的條件與此則格格不入。這就是:

甲、停止一切內戰, 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乙、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丙、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

丁、釋放政治犯, 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戊、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之改革。[15]

以上條件的中心之點, 同樣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主張演化而來的。在林育英傳達的國際指示中, 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被規定爲統一戰線最廣泛與最高的表現。因此, 堅持這一主張無疑成爲中共此一階段談判條件的關鍵要求所在。北方局的最初條件是如此, 中共中央的最初條件也不出其右。這裡唯一的變通僅僅在於, 中共中央已經決定:「爲了成立國防政府, 主張先開國防會議」, 亦即「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是首先由全國各黨派 (包括國民黨在內) 推舉代表組成代表大會, 在此基礎上成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但這一會議召開的前提在於:「在會議前必須實現㈠取消一黨專政, 容許一切黨派的自由活動, 釋放一切政治犯; ㈡取消一切禁止抗日反賣國賊運動的命令, 保障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㈢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討蔣。㈣凡願意抗日反賣國賊的政治的、社會的民衆的團體與武裝隊伍, 有公開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國防會議的權利。㈤確實保障參加國防會議代表言論

行動的自由與生命的安全。」[16]

隨後的接觸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底至五月中旬。當時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在剛剛到達天津的劉少奇的指令下再度前往南京與國民黨方面談判, 要求南京軍隊停止對山西紅軍的進攻。經反覆商談之後, 國民黨方面於五月十五日第一次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爲兩黨進一步談判的基礎。這四項條件是:

一、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 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 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二、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組, 加入抗日分子, 肅清漢奸。

三、對日實行宣戰時, 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

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之責任, 並促進聯俄。[17]

從蔣介石關於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中心要求來看, 國民黨這四項條件可以說是它此前此後所提條件中, 在統一軍隊和政權的形式問題上讓步最多的條件了。這或許是因爲紅軍東征所表現出來的戰鬥力, 使蔣多少有些擔心紅軍仍有重返內地之可能, 因此極力想把紅軍進一步向北引至靠近外蒙邊境地區, 以遠離中國腹地。如能勸說中共和紅軍進一步北去外蒙邊境地區, 則在改制、改編的時限上都可推延至抗戰發生之後。顯然, 因蘇蒙這時剛剛訂立了互助條約, 蘇聯必欲保護外蒙不受日本進攻的意圖已畢現, 而國民黨這時又有情報證明日本既將首先對內蒙甚或對外蒙不利, 此舉既可使紅軍進一步遠離內地重要省區, 又可促使紅軍以外蒙爲依托而與日本衝突, 進而引發蘇聯干涉及參戰, 結果使日本再也無力南侵, 可謂一舉多得。

可是, 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得到輾轉送來的這四項條件, 已經到了

六月中旬。當時恰好是西南事變爆發，西北大聯合計劃緊鑼密鼓地籌劃準備之際，中共中央對此明顯不感興趣。毛澤東一言以蔽之：曾養甫等人的信件及條件，「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48]。

國共雙方最爲接近的一次談判是在七月初。這次仍舊是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出面與國民黨方面曾養甫、諶小岑具體商談的。所不同的是，這次北方局提出了一個與前有明顯不同的談判方案。其內容包括下列各點：

一、爲求中華民族之生存，C方確認：(1)立即發動抗日戰爭保衛中國華北、內蒙，並收復東北失地；(2)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及人民，共同奮鬥，嚴厲制裁漢奸；(3)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並釋放一切政治犯；(4)與日本斷絕交涉，並廢除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實行聯合蘇聯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認並確行第一條各項政策時，C方放棄敵對K方的行動，K方停止圍剿與封鎖紅軍和蘇區。

三、C方確認抗日戰爭須要有統一的領導與指揮，C方提議在最近期間召集全國各黨及人民團體（不論已立案否）共同討論具體實現抗日聯合戰線之一切問題，例如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名稱，紅軍及其一切抗日部隊當然要服從這個政府的指揮。在K方決行第一條各項政策時，C方贊成K方在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中占有指導地位。

四、C方在今天無意考慮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之提議，C方也不要求K方及願意抗日的其他各派變更原有的政治軍事地位。但在將來，依據抗日戰爭的需要，C方贊成全中國眞正民主的統一。[49]

這個方案的提出看來事先並沒有取得中共中央的認可和同意。但它無疑爲中共此後的談判打開了一種新的思路。在這裡所提議的在最近期間召集全國各黨及人民一切團體共同討論具體實現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名稱，表明中共完全可以放棄他們一向所要求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外在形式；這裡所稱目前無意考慮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但將來依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將會贊成全中國眞正民主的統一云云，同樣在某種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放棄蘇維埃與紅軍的外在形式，同意改制改編。更重要的是，這個方案甚至沒有再堅持以蘇維埃爲中心和國共兩黨必須平等地實現他們之間的合作的想法，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將來政府及抗日聯軍中可以由國民黨占指導地位。這些無疑使雙方的談判條件第一次開始有了接近的可能。經過雙方代表的多次商談，終於達成了這一階段兩黨談判中的第一個被雙方代表所接受的書面的談話記錄草案。該草案如下：

一、KC雙方一致確認，爲求得民族之生存，須立即實現民族之聯合戰線，共同抗日。

二、爲使聯合戰線之鞏固與實現，應先消滅國內現有之矛盾，集中力量。

三、C方提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K方在原則上接受此提議，但C方須承認K方之主導權，C方代表認爲K方在原則上接受此提議後，承認K方現形勢下應該而且可能成爲抗日之主導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則下，尤其在第三點上相互以文件承認後，K方將在事實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圍剿紅軍，紅軍亦停止進攻的軍事行動。同時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動與宣傳的條件下，K方承認立即停止破壞C方組織，及逮捕C方人員與群衆，並於暗中保護愛國運動（指在K方權力範圍以內，冀察不在此限度內）。之後C方公開發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雙方於履行第四點要求後，共同組織一混合委員會，討論具體實現抗日聯合戰線之政治形勢及統一經濟、軍事、外交等問題（例如在國防政府成立後，C方須改變蘇維埃之政治形式而統一於國防政府之下），以及聯俄諸問題。[50]

上述文件顯然肯定了統一戰線成立後蘇維埃改制的必要性，但它卻沒有明確地肯定紅軍改編的必要。因此，正式記錄形成後，陳立夫進一步對文件進行了修改，在經過蔣介石的認可之後，就形成了第二次國民黨方面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書面方案。七月四日，陳立夫通過曾養甫和諶小岑正式向周小舟提交了這一方案。該方案內容如下：

一、K方爲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願意參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裝力量，不論黨派，在同一目的下，實現指揮與編制之統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張，應於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並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於統一指揮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並商定其武裝隊伍之駐紮區域，與以其他國軍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決意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即以K方爲主體，基於民主的原則，改善現政治機構，集中全國人才，充實政府力量，以負擔民族革命之任務。[51]

在這裡，蔣介石關於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要求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儘管，這個方案最終送達陝北中共中央的時候，恰好已經在共產國際政治指示到達之後，但要中共在這種條件下與南京政府取得妥協，仍舊是難以想像的。因此，中共中央這時幾乎沒有對這個方案作出明確的反映。不過，在中共中央根據在北方局六月方案制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部分地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條件。比如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問題，以及部分地放棄過去的政治主張等。該草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甲、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爲。

乙、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並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面調動進攻紅軍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面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給以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安心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經過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紅軍不向國民黨部隊攻擊，承認在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制，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丙、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改革現行政治制度，撤廢一切限制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並承認以後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

丁、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在全中國未召集與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爲著實行眞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召集基於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舉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之必要，此種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有決定一切抗日救國方針與方案之權。

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爲著實行眞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迅速建立統一全國的軍事指揮機關（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及由此機關採取眞正對日抗戰的一切實際軍事步驟之必要。中國國民黨承認，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選派代表參加全國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之必要，並保證該代表等順利進行其工作；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的地位。[62]

從上述國共雙方談判方案的演變來看，可以看出，國民黨的方案就其本質而言，大致沒有明顯的變化，只是其五月條件更容易叫中共接受而已。但當時中共還沒有得到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抗日反蔣」方針的政治指示，加上西北計劃正在緊張準備之中，因此沒有抓住這一機會進行談判，以致兩個月後南京政府初步解決了兩廣事變，條件再度退了回去。

與國民黨相比較，中共的條件變動就比較大些了，特別是九月會議以後的條件，很明顯地逐漸接近了國民黨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共從最初明確反對蘇維埃改制和紅軍改編，到這時已經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蘇維埃可以改制，紅軍也可以改編。雙方這時的距離在於，蔣介石國民黨堅持要以南京政府爲正統，而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提議，形式上仍主張應當首先組織經過普選產生的國會，成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進而產生一個新的政府。而事實上，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中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情況可知，對於放棄蘇維埃和紅軍形式問題，中共中央的條件其實只是要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以及黨對政權與紅軍的領導權而已。換言之，只要國民黨同意保證蘇區政權及紅軍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中共中央最終是可以承認以南京爲正統，並以此爲基礎實行改制與改編的。比較鄧文儀在莫斯科時所提條件，五月十五日曾養甫所提條件，以及七月四日陳立夫所提條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國共兩黨之間的立場到九、十月間已經極爲接近了，如果以後的情勢不發生重大變動，在此基礎上通過談判達成妥協應該是完全可能的。中共中央最初多半也正是這樣認爲的。因此，當他們決定實行「聯蔣」方針之後，就爲同南京方面達成全面妥協而展開了猛烈的統戰攻勢，力爭迅速談判成功。

從九月一日起，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僅毛澤東與周恩來二人就致書國民黨及各界軍政要人、社會名流近三十封之多。由於八月二十七日，作爲國共兩黨這時聯絡代表的張子華攜國民黨電臺呼號密碼及曾養甫邀請周恩來外出談判的信件再度前來陝北，中共中央最初還特別決定派周爲中共全權代表前去國民黨統治區與陳立夫等直接談判。因

此，周恩來九月一日有信給陳立夫、陳果夫二兄弟，稱：

> 黃君[53]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爲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爲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爲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爲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叙，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54]

當然，中共中央這時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仍舊難於寄予幻想。因而對兩黨談判前途的看法，也多少有些矛盾。因此聯繫到對周恩來之外出問題，不能不有許多顧慮。中共中央這時曾有專門電報給國民黨方面，它清楚地說明了中共中央的擔心所在。電報稱：第一，寇進甚急，我方願以全力爲助，希望寧方堅持民族立場，不做任何喪權讓步。第二，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攻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第三，欲圖和議談判早日實現，請蔣暫時以任何適當名義停止軍隊進攻，以便開始談判，若一面進攻，一面談判，似無此理[55]。

中共這時顯然不能理解：南京方面既然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爲何不能停止軍事進攻？如果繼續用軍事方式來對付共產黨，那麼，又有誰能相信國民黨確有和平誠意，周恩來外出談判又豈能保證人身安全？

因此，還在八月三十日周恩來給曾養甫的覆信中，中共方面實際上就已經改變了立即派周前去談判的立場，提出：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願負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可作爲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爲策劃[56]。

進一步延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多數與會者更主張對蔣持較嚴厲的批評態度，並應保持足夠的警惕性，故會後周恩來又有專函致蔣，強硬地表示：紅軍之主張和平談判，「非不能與先生周旋者，十年戰績，早已昭示國人。特以大敵在前，亟應團結禦侮。自相砍伐，非但勝之不武，抑且遺禍無窮。……天下洶洶，爲先生一人。」「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願先生變爲民族英雄，而不願先生爲民族罪人」[57]。同時周恩來九月二十二日再給陳立夫二兄弟的信，則一改前約，說明必須首先「委潘漢年同志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58]。其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

中共中央轉而持更加謹慎態度，同這時的軍事形勢變化有關。因有情報顯示：「蔣決心肅清赤匪，七月爲期，命胡宗南主持，共給十師，現三十個團已陸續入陝，隨後十五個團可調動」。而另外的情報也說明：蔣明確表示，對紅軍仍不變更其抗日剿匪政策，「張楊等急盼紅軍對中央軍關（麟征）胡（宗南）等師一重大打擊，以減輕對他們之威脅，否則蔣系氣焰更高漲，他們環境則更困難」。有鑒於此，中共中央一方面仍舊謀求盡快與南京方面進行具體談判，但另一方面則更加看重其外圍影響工作。周恩來這時親自寫信給胡宗南，力誡胡：在我三個方面軍已經聯成一氣的情況下，「兄率孤軍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順，即以勢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無視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則徒損國力，相持則坐使日寇收漁人之利。西北再失，則同陷浩劫，同爲奴隸，尚

何勝負可言!」[59]而毛澤東則接連寫信給在野之各社會名流宋慶齡、章乃器、沈鈞儒等，請他們利用各種名義開始具體實際之活動，以促進南京當局改變其政策。同時又致書各反蔣派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蔡廷鍇等，要求他們與中共一道向南京呼籲:「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並對南京錯誤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督促批判，責其更新」[60]。

此時中共統戰工作已經更加開展。成績最爲顯著的是對閻錫山的工作，這時除了中共中央的代表彭雪楓外，朱蘊山、張友漁、楊秀峰、李寶森等分別也進行了游說。這些統戰工作逐漸打消了閻錫山對中共和紅軍的恐懼，並鼓動閻錫山利用被捕出獄的中共人員爲骨幹，於九月十八日公開成立了以守土抗戰爲號召的「犧牲救國同盟會」，提出了「鏟除漢奸，武裝抗敵，犧牲救國，不分黨派，不論貧富，不分性別，凡不願做亡國奴者均可成爲會員」的較激進的綱領。閻並且向中共代表明確表示：他贊同中共提出的主張，並願意推動南京政府抗日。他的環境非常惡劣，除非抗日決難生存。儘管目前尙非聯合紅軍之時，一旦日軍攻綏，即派正式代表與紅軍聯絡，公開提出與紅軍聯合。那時尤其希望能夠得到國際的援助。

這時中共對傅作義也有較爲成功的工作。南漢宸、謝晉生等已先後與傅作義及其機要秘書王丹九進行了密談，據中共北方局報稱，傅作義明確表示「願意與我們作親密合作」。目前因上面有「婆婆」（指蔣介石、閻錫山），外面有日寇，暫時不能公開同情紅軍，但在日軍侵綏時，他必定歡迎紅軍入綏抗戰。甚至，現在如果紅軍要經過綏遠去抗日，只要不深入綏遠腹地，走大青山以北地區，他亦可在給養等方面提供幫助。

在與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聯絡方面，這時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對劉湘，有李允生（馮雪峰）等數人進行工作，劉湘堅決表示：只要蘇聯之路可靠，他決加入西北之聯盟。他並提出一個紅軍、東北軍、川軍三方面的軍事合作協定，主張紅軍不進入四川，四川的零星游擊隊歸川軍收編或遣送出境，紅軍不得已要入境時須預商區域，三軍可爲抗日和除奸而共同行動或分擔軍事任務。而在廣西李宗仁處，除中共正式代表雲廣清外，還有宣俠父、胡鄂公、劉仲容、劉子華等衆多中共黨員在進行工作。李濟深和李宗仁等已先後派劉仲容及錢壽康等前來陝西尋找中共建立密切關係，並帶來「廣西省政府省黨部及第五路軍代表與蘇維埃共產黨及紅軍代表之協定草案」，要求雙方共同簽定遵守。經中共中央略加修改後，復交由錢壽康帶回廣西簽字。其要點不外在各自獨立和相互平等的基礎上共謀建立各黨各派代表組成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盡快召集普選國會、組織國防政府，實現全國範圍的抗日聯合戰線，並開始對日武裝抗日[61]。

中共中央顯然對於此一協定相當滿意，因此它幾乎同時將這一協定定名爲〈抗日救國協定〉，分別送給蔣光鼐和張學良，明確表示願意聽取他們關於此協定內容的意見，並願意就此與正在重建中的十九路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正式簽約，共同遵守[62]。

中共這時的工作甚至已經做到了南京政府內部。因爲有情報顯示，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明確表示他們贊同中共國防政府的主張，不滿南京對日本的消極態度。包括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等一批老國民黨人，這時也向與中共有秘密關係的胡愈之說明，他們希望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當然，在與各派關係當中，中共與張學良的關係仍舊是最爲牢固和可靠的。在毛澤東轉給張學良的〈抗日救國協定〉上，他甚至還沒有得到張的答覆意見，就直接代表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因此，在勸說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方面，中共中央除對身爲國民

黨中央委員，但始終秘密地支持著共產黨的宋慶齡抱以期望以外，眞正寄予多少期望的也就是張學良了。在得知張學良願意代爲中共冒險向蔣說和之後，毛澤東立即親自打電報要劉鼎告訴張學良：「毅任斡旋甚好，迅速達成和平統一，(乃)國家民族之福」。當張學良來電表示：他決定電蔣說明有要事面商，要葉劍英用毛澤東名義寫一信給他「以作根據」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修書一封並派專人以最快速度送給張學良，以便利張學良向蔣說和。函稱：

>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贊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採取游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歷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敵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63]

隨後，毛澤東又公開發表談話，表明紅軍願意單方面首先停戰之意。宣布：「(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採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我繳獲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願當紅軍者歡迎；(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制止任何妨礙舉動，並須給以一切可能之援助。」[64]其意也仍在爲張之勸蔣和共助一臂之力。

第三節　兵敗黃河

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的政治指示很大程度上使中共開始日漸處於一種十分困難的境地。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驟，西北發動已經箭在弦上，各地反蔣派的聯絡工作也已經取得初步成就，他們估計，一旦西北發動成爲事實，紅軍與東北軍相互配合接通外蒙、新疆，取得蘇聯軍事援助，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繼而宣告成立，揭起抗日旗幟，各地反蔣派勢必趨之若鶩，南京政府勢將陷於四面楚歌，那時不僅共產黨政治軍事地位極大鞏固與提高，就是蔣介石多半也不得不放棄一黨專政，轉而與西北達成妥協，最終必不難實現中共關於以西北爲中心，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設想。但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放棄「抗日反蔣」方針之後，西北發動事實上已失去政治基礎，沒有人能夠想像這種發動可以在不反蔣和不與南京軍隊發生全面對抗的情況下順利進行。即使如兩廣事變一樣，打出「請蔣抗日」的旗幟，也必須另立政府以號召軍隊與群衆，結果仍舊是與南京相抗衡，戰爭仍舊不能免。可是，放棄西北發動，紅軍與東北軍的公開合作就失去了一切可能性，到頭來，如果與蔣介石南京政府不能很快達成妥協，紅軍就將不得不獨自面對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軍隊的大舉圍攻，那時不僅紅軍會重新變得勢孤力單，而且與紅軍秘密聯盟的東北軍也將處於極爲困難的境地，甚至最終不能不刀槍相對，使前此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戰關係毀於一旦。

在轉而實行共產國際新方針之後，擺在中共中央面前一個可能更爲緊迫的問題是，二、四兩個方面軍這時也已經進抵甘南，正向甘北推進，可依據陝北甘北的客觀環境，近十萬大軍不僅生存無靠，而且

周旋不易，在國民黨重重圍困和反覆圍攻之下，難免不受嚴重損失。而事實上，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迅速爭取蔣介石一著不抱太多幻想。其一切工作，都是從「逼蔣抗日」的角度出發，準備做長期打算。而「逼蔣」妥協的辦法，除了繼續爭取與聯合各反蔣勢力以外，最重要的其實還在迅速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的軍事援助。

從八月下旬開始，中共一面迅速開始按照共產國際的新的策略展開對南京方面的統戰工作，一面繼續爭取與各反蔣派結盟。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不論是要「逼蔣抗日」，還是要與各反蔣派秘密結盟，共產黨都必須要盡可能地以自己背後的蘇聯爲後盾，並盡快使自己也具有足以與蔣介石抗衡的相當的實力基礎。中共中央相當清楚，包括張學良在內，與中共聯絡的各個反蔣派別，眞正重視其實都是中共背後蘇聯的作用，都寄希望於蘇聯能夠支持自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和抗日戰爭的行動上扮演角色，想依靠蘇聯的支持來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相反，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即使是與中共的關係發展到相當的深度，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敢輕易與中共站在一起，來同蔣介石對抗。因此當形勢變得對紅軍嚴重不利的時候，一切都可能變得像共產國際所預言的那樣糟糕。再加上紅軍所在之陝北及甘北地區，人煙稀少，糧食匱乏，沒有蘇聯的直接援助，紅軍只好靠不斷的擴張和戰爭來謀求解決之策，結果也仍舊是內戰不斷。因此，無論是戰是和，要想保持中共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害，尋求蘇聯的直接幫助都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爲此，當共產國際改變統戰策略的政治指示於八月中旬剛一到達，中共中央當即意識到問題之嚴重，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立即於八月二十五日聯名致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陳說利害，叮囑王明務必懇切要求蘇聯方面正式給予援助。其電文扼要如下：

一、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爲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二、爲著避免與南京衝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爲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如此，（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陝甘寧蘇區；（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丙）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係的可能；

三、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爲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我們除在九月以下三個月中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須解決一個具體的作戰問題，因爲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

四、這一地帶的特殊地形條件是爲黃河沙漠草地所束縛著的一個狹長地帶，而且其中滿布著爲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在時機上進取這一地帶僅能利用冬季黃河結冰之時，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

五、軍事部署大致可定爲：(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十二月開始渡河，先占領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數城寨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之；(乙)以四方面軍十二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爲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於夏季達到肅州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建立蘇區，並使之與陝甘蘇區相聯繫；

六、以上是基於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爲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此方針爲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有關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主要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後使用的問題；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西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或紅軍久攻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65]

中共中央的電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擔心之所在，形勢看起來對紅軍相當不利，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那麼從生存角度考慮，紅軍必須要向內地發展，結果自然是內戰，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共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及謀求國內和平與一致抗日局面的設想，統統都將成爲泡影。無論是從希望紅軍保持在蘇聯、外蒙邊界附近的立場出發，還是從希望國共兩黨能夠早日達成妥協，一致抗日的角度出發，蘇聯方面顯然都不希望發生這種情況。

實際上，自從斯大林提出不反對紅軍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議以來，共產國際和蘇聯就一直沒有停止考慮具體援助中共和紅軍的問題。因此，當中共中央的援助請求正式到達之後僅兩週左右時間，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就已經取得了斯大林和蘇聯軍方等各個方面的支持，進而於九月十一日致電中共中央，明確表示同意援助紅軍，並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奪取寧夏和甘西的行動計劃。電報稱：

>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66]

共產國際的來電，無疑是一個讓中共盼望已久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很顯然，共產國際看來並不擔心此舉會對國共兩黨談判產生何種影響，事實上這種談判也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斯大林肯定更清楚，加強紅軍的軍事力量反而將有助於推進談判的進程並使中共在談判桌上得到更多的東西。不過，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這時看來都忽略了一個必須克服的嚴重障礙，即來自南京軍隊的阻截和進攻。也許是因爲這時在陝甘的蔣系部隊爲數甚少，威脅不大，總之，在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電報中，對於軍事上的困難只突出強調了缺乏奪取寧夏、甘西境內城寨堡壘的技術手段。直到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電之後，中共中央雖然注意到胡宗南部已經開始對中共實行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產生威脅，但他們仍舊沒有對同蔣系軍隊的作戰難度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們對這個姍姍來遲的援助明顯地有些迫不及待了，他們主要擔心的仍舊是攻取和占領寧夏、甘西的城寨堡壘問題，

因而新的決定是：全力以赴地攻取寧夏，暫時放棄甘西，等待接取援助之後再圖甘西。至於對胡宗南，只要四方面軍略加攔截，不使其過快推進就可以了。因爲這是千載一時之機，他們必須排除那些已經存在和可能出現的困難，爭取一擊成功。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將此一消息迅速通知了一、二、四方面軍，並提出了具體的行動計劃。電稱：

> 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爲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
>
> ㈠一方面軍主力九、十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開始從同心城、豫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
>
> ㈡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進，並相機打擊之，十月或十一月初進取靖遠、中衛西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十二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
>
> ㈢二方面軍在陝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部於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四方面軍互相策應，並聯絡陝南游擊區；
>
> ㈣由陝北派出游擊支隊經關中蘇區出至涇水以南活動，牽制胡宗南之側後。

電報特別說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並不妨礙爾後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當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陝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任務。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67]隨即，中共中央提出了組織「靜（寧）會（寧）戰役」計劃，要求二、四方面軍全力北上，與一方面軍合力奪取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實現三個方面軍的會合。至此，從一九三五年夏季即開始計劃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終於開始具體實施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紅軍一方面軍全部二萬一千餘人除少數配合約六千地方部隊守衛陝北甘北蘇區外，其餘二十七個團約一萬八千人全部集中於鹽池、定邊至同心、豫旺堡一線，向南推進。二、四方面軍三十七個團約五萬六千人也已進至甘肅中部的通渭、隴西一線，集力向北。儘管紅軍這時武器殘缺不足，彈藥尤其困難，二方面軍甚至疲勞到難以作戰的地步，但三個方面軍的會合一般說來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了[68]。

這時，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比較複雜。根據八月底中共中央軍委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以及九、十月間來自東北軍的通報，可知大致情況如下：

㈠「陝西東北部爲蔣介石進攻紅軍蘇區的主要方向，以其嫡系陳誠爲指揮（本人現往廣州），湯恩伯縱隊爲領導的共七個師一個旅，合計廿四個團」。其中湯恩伯第四、第八十七師及晉軍七十二師和二〇九旅已於五月底由山西渡河，占據吳堡、綏德、瓦窰堡之線築堡修路。八月初已進至葭縣（不含）、吳堡、綏德、清澗之線及無定河下游兩岸，續修綏清公路，並繼續逐漸向南向西推進。另外高桂滋之八十四師駐綏德以西，高雙成之八十六師散駐葭縣、米脂、神府、榆林、橫山、石灣、安邊各地，聯成封鎖。

(二)「十七路楊虎城部有兩個師、五個警衛旅、兩個特務團、一騎兵團，計其他直屬部隊，合計步兵廿六團，騎兵一團。楊之主力現在洛河下游左岸，直達黃河，向北封鎖清剿」。其中，第四十二師原在延長、延川、宜川之線以東地區，十七師原在鄜縣以東宜川、韓城之線，第五旅原在三原、蒲縣之線，警衛第一旅原在臨眞鎭、平陸堡之線。這時已陸續接防東北軍原在蟠龍、膚施、甘泉、鄜縣之防地。另外，其第二旅分別在耀縣、柞水、鎭安，第三旅在郃縣、澄城，特務第一團在西安，第二團在白水，騎兵團在邠縣。

(三)「東北軍在西北者有三個步兵軍，一個騎兵軍，計十五個步兵師，五個騎兵師，一個炮兵團，合爲步兵五十一團，騎兵十九團。」其大部正在陸續從陝北調至甘北及西安至蘭州大道附近的過程中。何柱國之騎兵軍主力駐固原一帶，于學忠部部分主力由蘭州進定西，五十七軍部分主力則集中慶陽一帶，王以哲之六十七軍主力及獨立第一〇五師則漸進至平涼一帶防守。

(四)「寧夏兩馬計有二個師，一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二個特務團，合爲步兵廿團，騎兵八團」。其中，馬鴻賓之三十五師在固原、黑城鎭、李旺堡一帶，馬鴻逵之新編第九師在黃河兩岸中衛、金積一線，其新編第十旅在一條山一帶，騎兵第一旅在吳忠堡及寧夏各一團，騎兵第二旅在磴口、平羅一帶，騎兵第二師兩個旅在五佛寺及中寧一帶。

(五)「鄧寶珊之新編第一軍計兩個旅，合四個團，在靜遠、會寧、靜寧、隆德布防」。同時，甘南毛炳文、王均兩部含第八師、第二十四師、第十二師、第七師及魯大昌新編第十四師，合計二十八團，分別進至武山、武都、文縣、成縣、康縣、西固、岷縣、臨潭，與二、四方面軍周旋。如上土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駐西寧及甘、涼、肅三州的第十師、第三五旅、第二九八旅九個團，以及山西已經西渡黃河占

據黃河西岸部分蘇區的一個縱隊，整個陝甘寧三省已有國民黨軍隊約二百個團，近四十萬人之多[69]。

與此同時，南京方面由長沙等地調援西北主持圍剿的胡宗南，率十個師三十餘團約六萬人，九月下旬也已先後入陝並陸續西運至天水、秦安、靜寧、會寧、定西地區，關麟征四個團約五千餘人也在九月底由山西運抵寶鷄。在此前後到達的還有四十九師、五十一師、一百四十師等四個師另一個旅計兩萬餘人，分別進駐略陽、徽縣、兩當、西鳳、隴縣、寶鷄各地，配合駐守蘭州附近的朱紹良部圍堵紅軍。這時縱使不計山西、綏遠之敵，紅軍主力所直接面對的敵人也已超過自己五倍以上。更何況，國民黨還有近二十個團的兵力正源源不斷地向陝甘兩省開來。紅軍要想成功地實施寧夏戰役，完成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此時談何容易。

所幸在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即將會合之際，張學良大約四十個團的東北軍已基本完成西調，成爲防堵三個方面軍會師的主要軍力，紅軍三個方面軍主力之會合已經不成問題。可是，胡宗南部之迅速到來漸漸開始讓中共中央感到擔心了。國民黨中央軍畢竟在裝備、戰術、訓練以及士氣方面都與地方軍閥的部隊有明顯的不同，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紅軍無論如何不能被其咬住，更不能與其進行決戰。與此同時，由於張學良與紅軍的結盟在東北軍中並未完全公開化，多數部隊並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張學良在軍事調動上與紅軍的配合將變得十分困難甚至將成爲不可能。如此，不僅紅軍會合行動受到箝制，尤其是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將大受威脅。爲此，毛澤東等再三電告張國燾等：四方面軍主力宜在兩三天內進占界石鋪及其以西地段，否則胡軍乘汽車將在兩三天內控制此地，紅軍有被切斷之虞。「機不可失，千祈留意」[70]。爲確保無虞，中共中央同時命令第一師迅速向界石鋪推

進，並相機占領之。

由於張國燾與中共中央因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和其後另立中央所造成的各種問題實際上還未得到解決，張國燾對於三個方面軍的會合仍舊有所猶豫，而對以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與胡宗南作戰，更是頗多顧慮。特別是爲等到十二月黃河冰凍，保證一方面軍渡河，四方面軍將不得不在西蘭大道這一交通線上幾面受敵，與超出自己幾倍的胡宗南等部鏖戰兩個月之久，其結果頗難想像。爲此，張對奪取寧夏的方針和靜會戰役的計劃，都有所懷疑。九月十七日，張國燾致電毛澤東等，一連提出八個問題：

一、向寧夏及甘肅西部，發展重點在甘肅抑在寧夏？
二、如我軍攻寧夏，城仍爲敵所占，是否地區狹小不便活動？
三、寧夏通外蒙有那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車？
四、衣服單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過？寧夏到西部須多少天？
五、不結冰你們有無辦法造船過河？造船速度如何？
六、如四方面軍不在西蘭路箝制胡敵，一方面軍能否順利渡過黃河？黃河何時在何段結冰？
七、如四方面軍經河州附近過河搶占永謀，箝制蘭州，是否便利一方面軍轉移寧夏和甘肅西部？
八、陜北甘北糧食能供一、四方面軍吃多少時間？[61]

對此，毛澤東等迅速答覆稱：

一、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說甘西。
二、我軍只要能占領寧夏之鄉村，靠近賀蘭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三、外蒙寧夏間有許多路通汽車，過去蘇聯即從這些路接濟馮玉祥。
四、寧夏氣候比綏遠、青海、陜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且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後，應待明年春暖後再行攻打甘西，同時我們將爲你們製備一批冬衣。
五、攻寧須待結冰，無造船把握，結冰從陽曆十二月開始，靖遠以下至蘭州不結冰，靖遠以上均結冰。
六、因馬鴻逵有二十餘團，湯恩伯、何柱國、高桂滋、高雙成等軍在我軍側後，一方面軍單獨攻寧有顧此失彼之慮，如使胡宗南確實占領靜會定區域，會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計劃失敗，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領寧夏，方免此失。

毛澤東在電報中最後特別提醒張國燾注意：「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站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拒止胡軍把一、四兩個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緊迫，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62]

終於，張國燾在一陣猶豫後，在四方面軍領導人的會議上贊同了實施靜會戰役的計劃，「決定四方面軍全部向定西會寧靜寧線間開進，以會合一方面軍，夾擊與迎擊胡部爲目的」[63]。鑒於雙方意見趨於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據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建議，提議由毛澤東、彭德懷、

王稼祥與朱德、張國燾和陳昌浩組織軍委主席團，集中於同心城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的軍事行動[74]。不料，張國燾與陳昌浩於九月二十日赴前線了解敵情和地理條件後，再度改變主張，認定照中央方案與一方面軍會合，將使四方面軍背腹受敵，陷於嚴重困境，故下決心單獨西進甘北黃河以東地區，與一方面軍形成犄角之勢，確保四方面軍安全。其九月二十二日電聲稱：估計到一、二兩方面軍能夠牽制的敵力和四方面軍的實力，目前與胡宗南之一路軍在靜會這一四面受敵之地區決戰是不利的。寧夏地區狹小，一、四方面軍集中寧夏不免後有黃河沙漠之險，前有敵人封鎖，如在該地區作戰，須停留六個月，物質補充不便，萬一決戰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敵人時，則將陷紅軍於不利地區。爲迅速實現奪取寧夏和甘肅西部的戰略方針，和實現全國紅軍大會合目的，我們提議：四方面軍以基幹兩個軍迅速由蘭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並搶占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一個軍暫在河渡口附近活動，兩個軍暫留漳縣一帶吸引胡敵，然後三個軍也全部轉進涼州、永登一帶，以一部向靜遠、中衛活動，配合一方面軍由靖遠寧夏段渡過黃河[75]。

隨即，張國燾下令四方面軍立即開始準備西渡黃河，正在北上的部隊主力當即轉向西進。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國民黨軍已經形成強大優勢力量的情況下，此舉自然置準備很快進攻寧夏的一方面軍於孤軍奮戰的不利地位。因爲一方面軍爲堅守鹽池、豫旺一線和準備照原計劃占領海固地區轉攻金積、靈武，進而進攻寧夏，所要對付之敵僅馬鴻逵部即有二十餘團兩萬餘人，且據有堅固城寨，加上湯恩伯、何柱國等約三十個團直接威脅其東北和西北兩側，他們已經很少有力量能夠顧及其南面新增之胡宗南，而事實上張國燾的計劃中留在西蘭大道附近吸引敵人的兩個軍也只是暫時性質，其軍力與胡宗南部相比，

也起不到眞正的阻遏作用。因此，中共中央極爲擔心即將展開的寧夏戰役因此受阻。爲此，他們決定改變原定計劃之第一步，以主力南下，先以三個方面軍之力打擊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脅。進而，他們又電告張國燾：胡宗南部在咸陽尚未到齊，「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道，不會有嚴重戰鬥」，一、二方面軍均將前後策應，對四方面軍不會構成嚴重危險。但張國燾還是反覆去電，堅持認爲其西渡黃河有充足理由，並斷言四方面軍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軍，打亂敵軍堵截計劃，又可造成紅軍東西兩面夾擊黃河兩岸寧夏段敵軍之勢，順利接應一、二方面軍占領寧夏，防止紅軍陷於狹小地境被強敵所制。且張國燾相信，如此行動，一、四方面軍至多一個月就能在靖遠、中衛附近會合了。因此，他反要中共中央「勿使全黨全軍對會合失望」[76]。

不過，西渡計劃畢竟與國際指示從寧夏提供援助和反對紅軍進入新疆的意見相左，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產國際發生了正式關係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正式承認，再度分庭抗禮，已不合時宜，萬一發生嚴重後果，張國燾更是難逃其咎。因此，思前想後，張國燾終於不敢獨斷獨行，其一方面堅持己見，擅行西進，另一方面則又接連致電表示：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提議，請張聞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77]。但我們認爲，西渡計劃確係站在整個紅軍利益的有偉大意義的正確計劃，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停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78]。

既然張國燾表示承認中央權威並願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協商態度，決斷決行。其於九月二十七日下達命令如下：

> 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告一、二、四方面軍首長：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一、二、四方面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路線之下，爲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79]

時至於此，張國燾不能不表示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並於二十九日制定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計劃，決心：

> 迅速進到於通渭、莊浪、會寧、靜寧、界石堡地區，迅速與一方面軍會合，相機消滅胡敵一部，鞏固擴大甘陝寧抗日根據地，爭取抗日友軍，擁護外蒙蘇聯……。[80]

九月二十七日，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通知蘇聯只能從外蒙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明確提出需要飛機、大炮等各種武器物資的清單，同時再度說明了紅軍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通過寧夏接取援助的困難，要求蘇蒙軍隊幫助運送和保護盡可能的深入到中國境內來，以確保紅軍能夠接運成功。但十八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中央：

> 你們對於你們實際上所能得到的給予你們的幫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確，我們已找一家外國公司，他同意責給需要的貨物，並把貨物送到外蒙邊境，但不能超過外蒙古邊境一百公里以外。

> ……同時，這家公司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送到你們指定的地點。但貨物並不像你們二日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重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既不能負責擔負護送貨物到你們部隊中去的責任，也不能加入反敵統一戰線，否則將等於對某國戰爭的開始。因此，你們自己應當設法派出先遣部隊制服德王及其他軍閥的騷擾，並保證汽車隊不受空軍的襲擊。爲此，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81]

不管蘇聯方面對於運送援助物資的方式和數量與中共中央的想法有多少不同，自從共產國際九月二十七日確定從定遠營方向提供援助之後，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改變原定十二月待黃河冰凍之後再攻取寧夏的計劃了。在三個方面軍都已經集中到甘北黃河以東狹小的地區來以後，要想持續抵抗數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達兩三個月之久，無論從作戰角度、糧食等後勤供應角度，還是從與張學良東北軍的統戰關係的角度考慮，那樣做幾乎是極端困難的。事實上，對於張國燾所擔心的一旦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軍向寧夏和甘西行動的意圖大明，國民黨軍將全力圍堵並構成嚴密封鎖的情況，中共中央這時也已經注意到了。同時，毛澤東注意到：「胡宗南還在隴縣一帶，我二方面軍將於一星期後轉移至渭水以北，據李富春報寧夏群衆很好，馬部恐慌，除少數據點外，大部圍寨可不戰而定，並有搶奪渡船之可能」，「如果四方面軍之渡河技術能保證迅速在靖遠、中衛地段渡河，則自以早渡爲妙」。因此，他們很快便下決心提早舉行進攻寧夏的戰役行動，一面迅速派人兩批前往定遠營偵察該地道路、房屋、關隘及一切情況，一

面不等黃河冰凍，立即奪船並造船渡河。

十月三日，四方面軍遺失「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張國燾決定改變原定行動部署，主張除繼續下令部隊兼程趕至在一方面軍控制下之會寧、界石鋪，與一方面軍會合外，應立即以四方面軍主力進占黃河東岸之靜遠地區，搶占渡口，爭取渡河，避免與胡敵決戰。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這一建議，只是要求四方面軍「在甘谷、莊浪一線配置必要兵力遲滯胡敵」，並接防會寧、界石鋪，以便一方面軍前鋒轉置隆德、靜寧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區，防堵固原、平涼之敵，避免被國民黨軍切斷後路[82]。

十月八日，國民黨方面在得到四方面軍遺失的「通莊靜會戰役計劃」之後，擬定了「通渭會戰計劃」，準備各部隊分別從秦安、隴縣、隴西、定西進擊，並在平涼、靜寧、莊浪、固原防堵，決心與紅軍主力決戰。當日，張學良急忙將此情況經劉鼎通報了中共中央，說明：

> 因四方面軍通莊靜會戰役計劃暴露後，現擬組織通渭會戰。其部署如下：胡宗南由秦進，毛炳文由隴西進，關林中（麟征）由寶鷄轉向隴縣，于學忠抽兩師由蘭州向定西，王以哲在平涼靜寧防堵，董英斌集兩師於固原策應，莊浪口先派一團固守。●

張學良表示，他將在九日飛蘭州部署各軍行動，盡力推延部隊行動時間，但同時請一方面軍佯攻靖遠，威脅蘭州，抑留于學忠部守城。請二方面軍在現地活動箝制關麟征部。請四方面軍迅速通過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會合執行寧夏戰役。另請佯攻固原，以阻止蔣調王以哲部前去平涼作戰。據此，毛澤東立即通知了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同時專門覆電張學良，說明：二方面軍在外翼不利，已經決定集中內線作戰，四方面軍目前已經通過西蘭大道，開始實行寧夏戰役。但為執行爾後戰略行動之便利，應設法使王以哲駐固原指揮，將堅持不與中共發生關係並堅決進攻紅軍的何柱國部南調，而東北軍主力宜集中平涼地區，蔣既有意調固原兩師南下，正好執行此令。特別應設法遲延胡宗南之進攻，使我在十一月五日以前保持西蘭大道於手中，便利二、四方面軍休息整理，順利執行作戰任務。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立即重新部署了部隊的行動。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了相應的作戰部署和具體實施寧夏戰役的行動步驟。此一部署的要點是：

> 一、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十一月一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其主力在通渭、馬營鎮、靜寧和會寧地區就地休整，並派支隊進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之敵，爭取在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中。
> 二、二方面軍進至通渭、馬營鎮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休息數日後轉進至靜寧、隆德線以北地區，準備爾後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以北之防禦任務。
> 三、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樞紐地段豫旺堡於手中。
> 四、攻寧部隊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之，攻寧時間依造船情況而定，至遲不得超過十一月十日。[83]

儘管作戰綱領提議三個方面軍主力利用現有條件進行必要的休

整，以便準備攻寧，四方面軍此時卻並無任何休整之條件了。由於紅軍這時渡河意圖已明，蔣介石急令西蘭大道一線之胡宗南等部北進，固、平、隴一線的東北軍西進。隨後，他又親赴西安，嚴令各部三面出擊，要求於短期內聚殲紅軍於黃河以東，「勿任竄過」。蔣甚至還親飛蘭州督戰。一時間，國民黨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四方面軍所在的靜寧、通渭、會寧地區猛進，戰爭全面展開，至二十三日，國民黨方面已經占領了華家堡、會寧、通渭、靜寧、界石鋪等地，西蘭大道已失。形勢轉瞬間即變得對紅軍極端不利。但四方面軍畢竟搶先一步通過了西蘭大道，其先頭部隊三十軍十月中已經進抵靖遠及打拉池一帶，並業已做好了渡河的準備。據此，朱德、張國燾於二十三日下令四方面軍之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二十四日晚，三十軍渡河成功，二十五日，九軍跟進，接著，四方面軍前線指揮部也於二十六日過河。寧夏戰役就此全面展開。

渡河行動開始的當日，即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緊急致電共產國際，要求蘇方立即準備實施援助計劃。內中特別說明：

> 自接你們同意我們北上占領寧夏並給我們以物質上援助的覆電後，我們即根據這一方針部署紅軍行動。現三個方面軍已集中陝甘大道以北，四方面軍一部已開始在靖遠附近渡河，我們正在動員一切力量實現我們的既定方針。

考慮到紅軍步行數百公里在草原和沙漠地帶掩護運輸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再度請求蘇方能夠將汽車隊盡可能遠伸到定遠營一帶。同時請求提供錢的幫助，以便紅軍能夠解決部隊冬衣的嚴重不足並在國內購買部分武器彈藥[85]。毛澤東等並指示在打拉池前線就地指揮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三十軍、九軍渡河後，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86]。但因胡宗南部推進快，威脅大，張國燾又積極主張四方面軍渡河避戰，彭德懷於二十五日提議首先集中四方面軍全部及一方面軍之四師在郭城驛打擊胡宗南之一路，並爭取以一方面軍進占定遠營。毛澤東於次日同意彭關於集中在河東岸的四方面軍以打擊胡宗南爲中心的考慮，但指出：張國燾的關鍵是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而目前則以打胡敵取定遠營兩著爲最重要，故同意以四方面軍之四、五、三十一軍和二方面軍全力打胡，惟仍應以已經渡河的九軍占領定遠營，因爲「這是接物攻寧的戰略樞紐，不應以一方面軍去占，不便利不失時機」[87]。

二十七日，朱德、張國燾和彭德懷商定，先以四方面軍河東之四軍、三十一軍集中郭城驛一帶準備誘殲胡宗南輕敵冒進之先頭部隊。二十八日，朱、張並命令四軍和三十一軍脫離四方面軍建制，直接歸紅軍總部和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指揮。當日，根據河西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朱德和張國燾又建議三十一軍仍應渡河，因爲以四軍、三十一軍兩軍很難保證完成擊破胡敵的任務，不如以一個軍擔任牽制，另一個軍過河以加強河西之力，爭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軍主力能達到占領定遠營和寧夏地區之目的」。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對此表示同意。但因前線總指揮彭德懷堅持三十一軍應留在河東參加作戰，軍委遂又於三十日電令三十一軍停止西渡，在河東作戰，勝利後直由中衛渡河。毛澤東並特別強調：「方針先打胡敵，後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把握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十月三十日，朱、張遵令執行。同日，因胡敵逼進打拉池，留守河東看護渡船的五軍被迫隨船西渡。次日，國民黨部隊推進到郭城驛、大廬子地區，並控制了靖遠

附近的河岸。至此，紅軍渡河攻取寧夏的行動被迫中止，河西與河東的部隊被切爲兩段。戰爭形勢對於紅軍變得更加嚴重。儘管彭德懷指揮河東前線部隊仍舊節節抵抗，尋找機會給國民黨軍以重大打擊，以便再度實施渡河攻取寧夏戰役的計劃，盡快接取援助。但事實上，由於七萬多紅軍有將近三分之一被截在黃河以西，河東紅軍力量已經大大削弱，並且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甘北地區陷入國民黨軍的強大包圍，迴旋餘地越來越小，除非有重大勝利，否則，再度攻取寧夏，將成爲不可能。故毛澤東這時不能不接連致電正在西安之葉劍英與劉鼎，要他們「問毅當此國難關頭，他有何辦法停止內戰？」「寧夏計劃蔣介石正積極破壞中，我方正想對策，請毅亦爲我籌之」。

十月三十日，中央軍委委婉地通知了共產國際書記處關於紅軍渡河作戰失利的情況，說明因胡宗南等部敵軍七十餘團齊頭猛進，已推進至海原、靖遠，我現處南北夾擊中間迴旋困難，不得已，在一萬七千部隊已經渡河的情況下，必須暫時停止渡河，轉而打擊南面追敵[81]。但就在中共中央發出此電幾天之後，它突然意外地在十一月四日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援助地點的電報，內容扼要如下：

> 在詳細研究之後，我們堅決認爲從外蒙幫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爲(1)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2)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有無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通知接收辦法及你們將採用何種具體方式運輸？[82]

蘇聯突然改變援助方向，在某種程度上是同紅軍渡河作戰失利有關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卻並不在此。電報上羅列了他們考慮必須改變計劃的三點理由，可顯而易見的是，前兩點困難早在蘇聯方面決定通過定遠營援助紅軍的時候已經存在了。更何況，蘇聯人很清楚，經過甘西前往哈密，即使只是前往安西，紅軍所要克服的嚴寒與沙漠遠比經寧夏去外蒙要多得多。而且最初也是蘇聯方面堅持不讓紅軍過於接近新疆，而決定從定遠營進行援助的。很難說明究竟爲什麼，蘇聯人和共產國際在改變自己已經作出的決定的時候，總是習慣於爲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藉口，甚至把責任推到中共的身上去。事實上，在這三點理由中，最重要的其實只是最後一點，即他們擔心此舉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的可能。

値得注意的是，蘇聯最初決定從定遠營方向援助紅軍時，也並非不了解日本正在策劃進攻綏遠的情況。還在九月六日，中共軍委即發報說明：

> 七八兩月來，日寇指使僞蒙軍隊入綏東與傅作義部迄在對持中。其先頭爲王英匪軍，德王則在東蒙募兵向察北徒步集中。日軍有二連隊已開張北。又雲已達五千以上。日軍（機）初則在包綏線上飛航，繼則伸入寧夏。八月三日日航空院更派井田等乘機至阿拉善旗，聲言擬定遠營爲總站，於甘寧青綏各設分站，定期飛行，並運往大批汽油等物，以經營整個西北，切斷中蘇蒙聯絡爲目的。[83]

蘇聯方面在得知這一情況之後，仍舊選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遠營爲蘇聯援助的主要地點，很明顯是準備冒點風險的。它或者是不相信

日本人會很快逼近定遠營，或者是決定捷足先登，先將紅軍裝備起來，給西進的日本人以某種威懾，總之，它沒有料到紅軍的作戰會遇到極大的困難，而日本人又如此迫不及待。當紅軍還在寧夏南端奮力拼殺之際，有日本軍人支持的僞蒙軍隊已經在進攻綏遠傅作義的軍隊了，全國抗戰的呼聲已經迅速高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停止從定遠營進行援助事實上不可避免。蘇聯方面沒有及時地停止原定的援助計劃，多半僅僅是由於紅軍的作戰行動已經全面展開。紅軍渡河失利終於爲他們放棄這一冒險計劃找到了機會。在著名的百靈廟戰役[91]開始的前兩天，蘇聯最終作出了停止走定遠營這條路線進行援助的決定。事情很清楚，在綏遠抗戰開始之後，讓紅軍在得到全國各界熱情支持下浴血奮戰的國民黨軍背後發動進攻，這在政治上幾乎是一種自殺行爲。蘇聯和共產國際當然不能引導中共和紅軍去這樣冒這種巨大的政治風險。

好在蘇聯方面的突然變卦來得也正是時候，如果紅軍已經經過了重大犧牲奪取了定遠營，這封電報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而如今，中共中央的反映只能是無可奈何。其十一月八日的覆電稱：

> 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並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爲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92]

寧夏戰役失敗了。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明確承認：本來打寧夏就是沒有多大把握的，只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現在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先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後根據情況再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準備在外線作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再設法返回西北地區。換言之，爲了生存，內戰將不可避免地延續下去，而紅軍又將面臨著一次新的長征。當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說明了這一決定。但同時通知後者確實準備援助物資，因爲他們將命令河西部隊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93]。

第四節　暗渡陳倉

無論是勸蔣和共，還是支持中共打通國際路線，對張學良來說，都是極冒風險的事情。但張學良畢竟身處一種十分矛盾的境地，不勸蔣吧，蔣是中央政府的化身，是軍隊的最高統帥，他雖堅持內戰，拒絕抗日，然而其目的在於求得中國之統一，且統一後未必不抗日。不顧一切，驟然翻臉，不僅成事如何未可知，而且可能使整個蔣系自絕於抗日門外，造成更大範圍的對立與衝突，屆時中國抗戰之成功，更加難以預料。可勸蔣吧，蔣一向對日妥協，強調量國力而行，每每表示非等國際上對日本問題有一徹底解決，中國自己無力收復東北失地，縱然統一實現，蔣爲求得其有效統治範圍之穩固，和等待不知何年何月的國力之強盛，又如何可能爲滿足東北人的願望而冒險與日本拼一死活[24]？因此，不論於公於私，顧及眼前還是放眼長遠，張學良無法對蔣介石抱以幻想。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支持中共打通國際路線，在張學良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因爲，在整個中國，只有中共是最激烈最

堅決的抗日運動的鼓吹者，也只有中共才有可能得到蘇聯的援助。張學良顯然相信，在中國，無論是誰，要想最終收復東北，都需要得到蘇聯的支持。事實上，由於蘇聯、外蒙與中國東北地區有著上千公里的共同邊界，由於蘇日之間圍繞著中國東北的權益始終存在著嚴重的衝突，由於日本並不滿足對中國東北的占領，而且正在虎視眈眈地覬覦著蘇聯的遠東地區，蘇聯從一開始就支持中國東北的抗日鬥爭。基於這一切，張學良當然有理由相信，一旦中共得到蘇聯的援助，成爲中國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國的抗日運動將會極大地發展起來，並促成抗日戰爭的爆發。結果，蘇聯必定會因支持中共和反對日本占領中國東北而支持他張學良收復東北的鬥爭。相反，如果中共和紅軍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並且歸於失敗的話，很可能抗日戰爭將不會爆發，東北的收復將更加遙遙無期。

張學良不是不知道支持中共打通國際路線所要冒的風險有多大。鑒於西南兩廣事變以及隨後廣西當局與蔣介石的對抗相繼被蔣瓦解，特別是國民黨中央軍大舉進入陝甘之後，整個西北方面的反蔣熱情已經消停了許多，影響到西安城裡也是人心大動、東猜西疑。據劉鼎、劉向三、張文彬、梁明德等報告說：楊虎城在廣西反蔣失敗後，與中共聯合之事已不再提起，就是前此簽訂的通商、聯絡、交通等事也擱在一邊不談了。就連王以哲，雖經多方工作，至少表面上仍舊時時表現畏縮，沒有以往的勇氣。早先與紅軍有過較多交往的東北軍幾個師的師長，如今情況下也盡可能地少與紅軍發生關係了，說是「有問題可與副司令去電，他即聽命，不必派人到他處」。唯有張學良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決心。他先是對國民黨省黨部的反對置之不理，以查無實據爲由，於十六、七兩日接連將先前被省黨部捕去，又被他轉押軍法處的劉瀾波、馬紹周、孫達生等一併釋放。而後將葉劍英接至西安，安排在警衛營營長孫銘九家中，作爲中共中央派駐西安的正式代表。同時，張爲準備意外，集結他的部隊，特地將他在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的抗日講演印成小冊子，在軍內散發，以作萬一中央若對付他時，可在政治上戰勝中央的武器[95]。當葉劍英告訴張，紅軍目前經費困難已極，冬衣解決更難，莫斯科雖可援助，但不能應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借款三十萬元時，張一口答應，但表示西安只能辦到五萬，多不可能，其餘二十五萬可考慮到上海去辦。棉衣可提供一萬套，由西安送蘭州，請紅軍半路去取。而在軍事部署和戰役行動上，張學良更是積極配合，並出謀劃策。凡有他能夠辦到的，他幾乎無不盡力去做。比如，十月中旬，毛澤東、彭德懷電告張：「何君柱國至今不理解團結抗日之必要，屢與敝方爲難」，「難免衝突」。「董軍長聞正西進，亦祈善爲說詞，免生誤會」[96]，張即很快將何柱國調離前線，並要董英斌暫緩西進。不過，爲了瞞天過海，並便利勸蔣和共，避免蔣介石生疑，張學良在公開場合仍要大講絕對擁護、絕對服從之類的場面話。像他在十月三日對英國記者的談話，很顯然就是這種敷衍的典型例子。

在這次公開發表的談話中，張學良聲稱他必須鄭重聲明三點：

> (一)外報前傳西北四省有獨立及聯俄之說，純屬謠諑。(二)本人及西北諸將領絕對擁護領袖，擁護統一，一致對外。(三)個人及西北諸將領絕對服從中央命令，甚願效命於國防第一線上。

但同時，他還是隱喻地表示，他希望南京與紅軍達成妥協，認爲「少損一分元氣，即增一分國力」[97]。

一方面是張學良的堅定態度，一方面是蘇聯方面正式批准紅軍具體實施打通國際路線的戰役行動，準備大舉援助中共，使得十月以後

東北軍的部分高級將領又漸漸重新變得積極起來。這裡最突出的是騎兵軍副軍長，時任王曲軍官訓練團教導長的黃顯聲。他先是將剛剛被釋放的劉瀾波收到麾下做秘書，而後又明確向葉劍英表示：紅軍有何軍事問題或器材需要，他可儘量幫助。王以哲離開西安，剛一到達甘北指揮部，也重新恢復了與中共中央直接的電報來往，同時一〇五師劉多荃師長也開始與在甘北前線的彭德懷建立了直接聯絡的關係。紅軍與東北軍將領又開始了具體的合作。比如，張學良十月十三日得蔣急電，要其派援軍前往李旺堡解馬鴻逵部二〇七團之圍。葉劍英當即報告毛澤東：毅迭奉急令救李旺堡二〇七團，毅委劉多荃師長辦理。顯聲兄與多荃已商妥來接。請准騎十六團進李旺堡並放出二〇七團[●]。

十三日，騎十六團前往李旺堡，在紅軍配合下將被圍之二〇七團救出。與此同時，劉多荃師長有意將騎十六團撤回，將李旺堡交給紅軍。故王以哲亦致電彭德懷加以說明，並要求今後進一步相互照顧。電稱：張先生已暫調何軍長離開固原，以劉師長多荃暫爲代理。劉師長已於十三日到達固原，並將李旺堡守軍撤回，此節於十二日已電周恩來同志，諒荷察及。現在，靜寧以東地區爲敵方部隊，尙希轉知前方負責同志，免生誤會，俾各保持抗日力量是要至盼。因此，騎十六團接出二〇七團後很快又順利地撤了出來。

同樣，當王以哲電告東北軍一部遵命需要向硝河城、將臺堡推進時，紅軍前線司令員彭德懷也根據具體環境，痛快地表示同意。

由上可知，紅軍和東北軍這時軍事上之配合與互助，漸漸變得相當默契了。

這種默契這時還表現在統戰工作方面。十月間，因日本人對綏遠心懷不軌，僞蒙軍與傅作義部磨擦衝突頻繁，閻錫山頗感有抵抗之必要，故有心向蔣請援。張學良很快主動表示願意出兵相助，參加綏遠抗日。閻錫山爲此致信張學良表示感謝，信稱：「敵對綏遠，勢在必取，得兄慨允協助，弟膽壯多矣。抗戰而勝，國家之幸，抗戰而敗，我輩亦可了矣。」[99]同時，閻錫山亦向張派去的高級將領戢翼翹表示，對過去與紅軍打仗頗感後悔。見閻頗有抗日和共之意，張學良藉前往洛陽給蔣介石祝壽，專程飛往太原，向閻說明目前陝甘剿共戰爭之危害，與閻相商，共同勸蔣停止內戰，「與共妥協以抗日」[100]。據張學良告訴葉劍英說，二人會談極佳，閻決定乘蔣十月來陝之際，向蔣介石說明他的意見。據張學良告訴葉劍英說，閻錫山這時的態度是：

一、請蔣領導聯紅抗日。
二、請中央撥款加強綏遠國防工事。綏、寧、晉請酌增十師。
三、如蔣不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東北軍、紅軍，全力抗戰，並將綏遠之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給紅軍，同時支持宋哲元抗日。

但是，閻錫山最關心的是蘇聯的態度和紅軍能否合作。他明確問張學良：第一，蘇聯能否批准紅軍到綏遠並聯絡外蒙？第二，蘇聯能否接濟紅軍、東北軍、晉軍？第三，聯合作戰紅軍能否聽指揮[101?]？

儘管葉劍英等已經做了十分肯定的答覆，毛澤東仍舊很快致電葉劍英等，要其迅速經過張學良進一步向閻說明如下：

一、完全同情晉綏當局及其軍隊對日抗戰捍衛疆土的決心與行動，他們的這種決心與行動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將竭力以全力以爲之助。
二、我們十分盼望與晉綏當局成立諒解，以至訂立抗日協定。

三、只要晉綏當局眞正抗日而不與日本妥協，紅軍在未得到晉綏當局同意之前，決不冒險向晉綏開進。

四、在雙方諒解之後，紅軍依約進入劃定之地區與防線，擔任一定戰鬥任務，並服從統一之指揮，紅軍不干涉晉綏當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102]

從以上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並沒有回答閻錫山提出的最核心的問題，即共產國際和蘇聯是否願意援助紅軍以外的中國軍隊，以及它們是否同意照閻所說，讓紅軍到綏遠去聯合外蒙直接與日僞交鋒。因爲這樣的問題確實也是中共中央這時所不能貿然代國際回答的，只有蘇聯自己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同時致電共產國際，說明：

> 張學良與閻錫山前在太原會面，閻對張云，要求蔣介石領導聯紅抗日，如蔣不幹則聯合紅軍、東北軍單獨行動，劃出五原、包頭、安北、固陽、臨河五縣給紅軍，但不知國際允許紅軍出綏遠否？並與外蒙聯繫否？不知國際願意援助晉綏軍、東北軍否？不知紅軍聽其指揮否？……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問的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已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了。[103]

隨後，中共代表同宋哲元談判的報告送達，中共中央又再一次致電共產國際說明宋哲元願意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並準備派代表赴俄接洽的情況。電報再次詢問蘇聯對於南京以外的各地方實力派究竟採取何種方針？由於有謠傳李杜一行赴蘇被拒，中共中央顯然開始懷疑蘇聯對南京以外的各個地方實力派是否均採取一概拒絕的方針了。

沒有資料表明共產國際就此來電說明過自己的立場。至少，看不出中共方面開始改變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相反，這時直接負責與中共中央通報的中共代表團王明等，這時也相信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談判是騙人的，「是他們內部的把戲」，擔心蔣介石會利用胡宗南將張學良與紅軍分隔開，分而擊之。因此，王明等發來電報，要求中共中央務必對南京的所謂談判保持高度警惕，盡可能贊助一切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和同情這一方針的各黨各派，包括同情自己的地方實力派的活動，以此來逼迫蔣介石放棄對紅軍的軍事進攻計劃。來電明確說：

> 我們確切地知道，蔣介石在民衆運動的逼迫之下，表面上與紅軍進行關於統一戰線的談判，實際上準備包圍和消滅紅軍的實力。蔣介石不久前曾下令各部圍剿紅一軍團和紅二十五軍於金積堡至海原、固原地區，務必阻止紅軍南下，或去東北方向。因此，……你們應盡力贊助一切抗日統一戰線運動和同情者的活動，只有如此才能逼迫蔣介石放棄進攻紅軍的軍事計劃。[104]

蔣介石究竟怎樣打算對付共產黨，中共中央自然比中共代表團和共產國際知道得更清楚。的確，當蔣一面命令胡宗南進攻紅軍，一面派陳立夫尋找共產黨代表談判之際，中共中央確曾對蔣介石的眞實意圖不甚明瞭。張學良最初也認爲：蔣不過「先打而後和圖得便宜而已」。十月十七日，負責與南京聯絡的張子華到達西安，報告從國民黨方面帶來與國民黨的通電密碼、諶小岑給周恩來的信等，約周恩來去廣州談判。其電報稱：

一、粵方請到廣州會面，時十月底，我有粵行營護照六張，陳誠曾電西北總部。

二、與曾（養甫）訂有密碼，擬使用剿匪總部電臺，待與晏道剛交涉，如不去粵即與伊另訂地點。

三、我可電伊派人來陝接洽會商問題，有無必要。

四、寧方態度以我黨活動、蘇區存在及參與國民會議皆無問題，惟軍隊番號須與南京一致，目的似相當改編。[105]

與此同時，十九日已到上海之潘漢年也有電來，說明國民黨方面明確表示，兩黨談判「決不能有對等地位的條約」，最好的解決方法即「照收復廣西辦法云」。而所謂廣西辦法，就是軍隊全部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編，受南京政府的統一指揮。二十日，上海方面又有電來，稱「陳果夫找開（即潘漢年）兄談判甚急」。可另一方面，西北這邊國民黨中央軍全面進剿，大有不消滅紅軍不止之勢。對此中共中央頗感費解，以致不能不要求西安方面將「蔣之確實企圖查明即告」。

但在蔣介石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到西安與張學良等談話之後，不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張學良，都已經看得清楚，蔣介石的本意其實是要徹底取消紅軍。改編云云，恐怕都是誑言，根本做不到。根據中共很快得到的情報，蔣剛到西安就與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談話，其中明確說：「他們抗日是假的，騙事的，既然要抗日，中國有中央政府，爲什麼還要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要停止進攻紅軍的唯一辦法就是紅軍立即投降，「一部分一部分或整個的收編都可以，收編後待遇同國軍待遇一樣」。另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這時的日記記載，張學良在蔣到西安後，確曾力勸蔣和共抗日，強調對共產黨問題如不採取政治方法以謀共同抗日，專意進剿，不僅必爲日、共所苦，社會人民更不相諒，並且前途殊爲危險。不意蔣斷然對張說：「共黨能無條件的交槍受編乎？否則不論矣」。即使「共黨當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也」[106]。葉劍英和劉鼎這時也接連報告說，蔣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直截了當地宣稱：「赤匪爲近敵，日本爲遠敵，目前唯一任務爲剿匪，否則爲反動」。因爲現在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進而張學良也親自告訴葉劍英等：他勸說蔣聯俄容共一致抗日已完全失敗，當他說明當前首先應當抗日，爲抗日必須聯俄，要聯俄不能不容共時，蔣介石斷言：「匪日皆應打。國際叫他（中共）和中央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反對降（屈從於）俄。因此匪如不（答）應，決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決不聯俄」。

十月三十一日，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徐永昌等再赴洛陽爲蔣介石慶祝五十大壽，行前，黃顯聲主張以綏遠抗戰形勢緊張，東北軍抗日要求強烈爲由，要求蔣批准東北軍增援綏遠，一旦綏遠抗戰成爲事實，則西北剿匪自然停頓。張學良亦贊同此意。不料，到洛陽後，華蓋如雲，連單獨進言的機會也沒有，相反到不能不聽蔣介石在軍校講演大罵共產黨，蔣甚至威脅說：共產黨是當前最大的敵人，誰主張容共，誰就不是人。因此，張學良回陝後告訴葉劍英等：在洛陽實在「不得任何機會提出意見」，「滿腔抗日熱忱，無處說也」[107]。

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已經不能不做好長期與蔣介石打下去的準備了。他們一邊將蔣介石來西安大談匪不剿滅決不抗日的情況上報共產國際，一邊告訴蘇聯方面：「紅軍主力一般說來將不得不轉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尋求發展」。「惟目前還要堅決同蔣介石在現地區作戰，但物質方面萬分困難，特別是已經分文沒有，又不能發票子，張學良那裡也沒有錢借了」。

據中共中央報告說，中共至此總共已向張學良借款達六十萬元。

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黃河以西近六萬紅軍每日所需之大量食糧、彈藥和藥品的消耗外，僅解決棉衣一項，即需費甚巨。難怪張聞天焦心如焚地再三致電共產國際，聲稱：「你們多延遲一天，則紅軍凍死餓斃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但由蘇聯寄巨款至中國大城市之銀行，再轉陝甘並送到紅軍手中遠非易事，共產國際雖想盡辦法，立即籌措了三十五萬美元，並迅速從美國分兩批匯款十五萬美元和五萬美元至上海宋慶齡處，緊接著他們進一步告訴中共中央，蘇聯方面還準備直接援助中國紅軍八十萬美元以上，可是所有這些在時間上都不能滿足中共中央所需。第一批匯款到達時已經是十二月上旬了，第二批匯款一九三七年二月才到。因此，爲解紅軍燃眉之急，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從張學良那裡再借十萬元以救急[108]。中共和紅軍得張學良幫助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中共中央很清楚，經濟危機可得張學良之幫助，軍事危機要指望張學良卻是不可能的。隨著紅軍渡河作戰失利，軍事形勢已變得極端險惡。十一月八日，毛澤東等正式提出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新的作戰設想，其要點在於：第一步，爲解決紅軍給養困難，將紅軍分南北兩路軍，一路由南向東，走鎮原、西峰、合水、正寧、寧縣、同官、耀縣、宜君、洛川、鄜縣、韓城、宜川、延長、達黃河東岸；一路由北向東，經靈武、鹽池、安邊、橫山、榆林、瓦窰堡、延川，達黃河東岸。第二步，爲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同時亦爲解決西北生存發展困難，以一至兩年爲期，再度揮師東征，占領同浦鐵路，出至冀、豫、魯之交，準備於可能時出至直、魯、豫之交，再經皖、豫、魯之交，鄂、豫、皖之交，鄂、豫、陝之交，爾後轉回西北地區。在此期間，西渡黃河之徐向前、陳昌浩部組成西路軍，以一年爲期，在河西創立根據地，打通新疆，接取援助[109]。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紅軍發展方向問題。毛澤東明確承認打寧夏本來就沒有多大把握，現在必須要讓蔣軍停在西蘭大道上，但這只能靠張學良、靠全國形勢的變化與順利解決糧食問題，而這些目前都不能解決。至於與蔣介石達成妥協，更是沒有把握，他不簽字是不算數的，因此更是等不得。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或者向東南，經四川去京漢鐵路一帶；或者向東、過黃河，逼閻錫山妥協，去河北方向。從反對內戰和主張抗日的角度出發，向東過黃河是比較便利的。與會者一致贊同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下一步「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不過，有一點是應當特別提到的，這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已經在談判條件問題上做出了明確的決定，即：「照廣西辦法解決，我們是同意的」。毛澤東指出：現在與南京妥協的範圍縮小到紅軍怎樣處理的問題，焦點就在這裡。最近他們要我們照廣西的樣子，服從中央，改紅軍叫國民革命軍。這與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們應準備重實際，應該承認他。這在政治上是勝利的。雖然穿件白軍衣服，但更便於進行白軍接洽，便於改白爲紅。這一方針的確定，很顯然已經符合了蔣介石前此確定的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解決原則。然而，中共中央並不了解，張子華所帶來的條件，這時又被蔣介石給否定了。蔣的新條件正如他對張學良所說，就是要共產黨「交槍受編」，否則統統消滅。

此時，新一輪國共談判已經在上海開始。

十一月十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正式會面。陳並不理睬潘漢年所說中共關於兩黨合作條件的內容，直截了當地代表蔣介石提出了南京方面的具體條件，這就是：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目前紅軍可暫時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領袖一律出洋，半年後召回按

材錄用，黨的及政府幹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潘漢年當即質問：「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的均非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爲甚目前有些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爲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相信）磋商合作條件當非其時！」陳立夫也承認，以目前條件，雙方的談判恐一時難於成就。但他認爲，如果中共方面能夠派周恩來出來，或許蔣介石可以同意紅軍保留的軍隊數目由三千擴大到一萬也未可知。總之，「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據陳誠對他人稱，共黨目前困難已極，如國軍再給一嚴重打擊，則將來妥協條件更低。蔣決壓迫紅軍全部過河，趕到外蒙去由蘇聯來解決，否則便設法將紅軍困在寧夏邊境苦捱，自趨滅亡，「那時看共產黨還有什麼條件可提？」[110]

由於潘漢年已經半個月左右沒有得到中共中央新的談判指示，仍舊按照十月上旬所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規定的有關條件與陳立夫談判，因此，當十三日中共中央收到潘漢年發回的電報之後，立即通過國民黨方面的電臺通知潘：

> 南京對紅軍究竟容納至何限度，望詢明電告。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據張子華謂，曾養甫先生云：一、黨可公開活動；二、政府繼續存在；三、參加國會；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個別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爲一致對外，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談原則協定。[111]

十一月十七日，潘到南京，陳立夫已帶著中共中央電報前去洛陽請示蔣介石，到十九日始回。陳到當天，雙方再談。陳一上來就說明：「蔣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並聲稱「張子華所述養甫意見，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人講到關於談判的條件，想係張子華一面之辭」。雙方至此無法續談，陳堅持讓潘把蔣之條件報告陝北中央，並請周恩來出來解決問題。當日晚，潘用國民黨方面的電臺再將蔣介石的條件具體發了回去，然後乘晚車返回了上海[112]。

國共兩黨之間的談判，這時事實上已經走入死胡同了。中共方面的讓步可以說已到極限，但蔣介石突然將「改編」變爲「收編」，已使中共再無退路可尋。中共中央十二日曾將張子華所帶來的條件電告共產國際，提出「爲一致對日，早停內戰，我們覺得在不變更紅軍組織和領導的原則下，可以承認彼方要求」。但共產國際的回電明確認爲，對蔣介石目前的談判不能抱以任何期望。

> 陳果（立）夫、曾養甫與我們的談判是否爲國民黨特務的一種手腕呢？如果蔣介石仍然堅決反對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那麼陳果（立）夫等實際上有什麼辦法呢？周恩來去見蔣介石有何意義，而且安全有什麼保障呢？我們應當向國民黨要求以實際停止其進攻紅軍的軍事行動作爲其談判誠意的第一步的表示。[113]

共產國際的指示毫無疑問距離兩黨關係這時的實際狀況相差太遠。在西北大聯合計劃取消之後，特別是接取蘇聯援助的寧夏戰役失利之後，自身的生存已經受到嚴重威脅的紅軍究竟靠什麼來要求蔣介石停戰呢？在紅軍主力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困在狹窄而且窮困的甘

北地區之後，蔣介石還有什麼必要去向共產黨表示和平的誠意呢？當然，中共中央也同意共產國際所提出的談判原則，即「重要的爲保存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分，並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在對日武裝鬥爭的條件之下，才可以同意成立統一的指定蔣介石作總司令的總司令部，服從其指揮。且統一只是指在一定的戰線上，爲完成總的對日作戰計劃而服從統一的指揮這個意義以內而言的」[114]。但目前第一位的是蔣介石根本不想和共產黨談判，除非共產黨放棄自己的軍隊，「交槍受編」。至於保存領導、組織、在一定範圍內服從指揮等等，他壓根兒連談都不談。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也不再抱什麼希望了。他們不能不懷疑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抗日反蔣」的決定是否正確。很明顯，如果當初沒有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政策的那個政治指示，這個時候西北大聯合計劃可能已經發動起來了，至少在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過程中，東北軍可以公開地助一臂之力。甚至，駐守蘭州的于學忠部自己就可以直接前往新疆去接運蘇聯的軍事援助物資。如果到那時候，即紅軍和東北軍已經完成公開的大聯合計劃，並因得到蘇聯援助而在軍事上變得異常強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韓復榘、劉湘、李宗仁等等都趨之若鶩之際，再來與蔣談判合作問題，情況必定與現在大不相同，不愁蔣介石不妥協。可如今的情況卻變得如此糟糕。當葉劍英於十一月上旬返回陝北保安，帶去張之親筆信件，再度提出國際是否同意西北發動問題時，中共中央雖不能明確回答，但仍舊一面向張學良建議：「李忠（于學忠）最好西行辦貨，且以愈快愈好」，一面就此再度詢問共產國際。當然，在張學良方面，由於暫時不能公開與紅軍的關係，是無法採取這一行動的。對此，中共中央十分清楚。其實，中共中央這時確實是傾向於再度提出西北發動問題的。蔣介石決心消滅紅軍是內戰，紅軍必欲突破重圍轉戰內地也是內戰，何以西北大聯合計劃就不能實行呢？況且，一旦紅軍突圍而去，一切友軍及援助全不存在，孤軍鏖戰，成敗勝負均未定在天，是否一定就對中國革命有利呢？因此，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提出：

甲、蔣下決心消滅蘇區與紅軍，陳立夫告小開，蔣意紅軍留三千人，餘遣散，師長以上出洋，一面令胡、王、毛各軍向紅軍猛攻。

乙、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均盼望蘇聯援助與紅軍聯合對日，蔣則極力破壞之。你們對西北獨立局面又不贊成，因此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

丙、究竟西北獨立局面還有考慮的餘地否？西北局面應如何解決？均請探詢見告。因蔣軍現在已逼近定邊、鹽池，定、鹽一失，我軍主力在現地區即難於作戰。[115]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說明：「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有關談判事，「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與之談判」。當前最主要的問題只能是從各方面想辦法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迫使蔣介石先把剿共戰爭停止下來。「國共十年對立，今求聯合，完全是也只能是爲了對日抗戰，挽救中國於危亡地位，……彼方之同意談判，其出發點當亦不能外此。然如皓電所言，殊不見有任何之誠意，無誠意則失去談判基礎，只好停止以待他日」[116]。

此時紅軍軍事上之被動已極其明顯。三個方面軍，四方面軍一萬

二千人，二方面軍一萬人，一方面軍一萬八千人，共計約四萬人，全部被國民黨軍壓在定邊、鹽池以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南的狹小地段，幾乎無法周旋。而國民黨方面，不僅胡宗南部節節進逼，王以哲部也被迫隨胡部前進，只是國民黨方面的每一行動均在中共中央的掌握之中，並且張學良也叮囑部下不要過於冒進，紅軍暫時尚無嚴重危險。張學良這時努力配合紅軍的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對何柱國及其所屬部隊的處置。他不僅有意把總是與紅軍衝突的何柱國調到身邊施以政治影響，而且對其部下不聽勸告者，頗不客氣。十月底，紅軍突然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彭德懷迅速指揮反擊，一舉圍殲了將近兩團騎兵，事後方知爲何柱國騎兵軍騎六師第十六、十七兩個團，除十六團團長及少數人等走脫，該兩團人馬幾乎全部被俘。彭德懷事後電告王以哲、劉多荃：「何軍長不諒，逼人過甚，上月卅日敝軍與騎六師衝突，事出意外，其人馬來敝軍者，擬令其歸回騎六師，原隊槍彈因敝部甚爲缺乏，擬暫時借用，特此奉告」。張學良得知此事後，一面派車去接回俘虜，一面表示全不介意，正好以爲對外宣傳之用。十月八日，彭通知王以哲：已令十六、十七兩團人馬僞裝逃脫，歸還建制。然而等十二日十六團團長等將部隊如數接回後，張學良卻以瀆職罪將該團長執行槍決，這其中固然還有其他原因，但懲戒之意也很明顯。

張學良這時因無法公開與中共和紅軍的關係，因此在軍事配合方面已經相當困難。而特別重要的是，由於張已表明希望停戰和共的態度，南京行營方面事實上已經常越過代總司令的張學良，直接以西北剿匪總部的名義向西北各路軍隊下達行動命令，張很大程度上難以確實掌握東北軍的作戰行動，雖再三叮囑負責協同胡宗南部北進的王以哲部注意與紅軍切實保持你退我進的協商關係，卻又不能不叮囑王行動上務必小心聽命，避免胡宗南及南京方面抓住破綻。在這種情況下，

張學良自然深感爲難。故劉鼎屢有報告說：王以哲率六師北上，意欲與我軍接近，張學良對此現特憂慮，恐我前進困難，並一面要求中共諒解，一面再三詢問中共中央當如何布置。好在王以哲此時每日向彭德懷通報國民黨甘北各部行動部署及其前進路線，其雖難以主動配合紅軍製造戰機，但至少也爲紅軍尋找戰機，打擊胡宗南部提供了較好的情報來源。

自十月下旬以來，紅軍在甘北節節後撤，千方百計捕捉戰機。但將近一個月下來，只有兩次較大的作戰行動取得了勝利，一次擊潰了馬鴻賓、白鳳翔冒進之一部，俘獲人槍馬匹各千餘，一次就是打了東北軍的騎六師兩個團，而這兩次最後爲了統戰關係都將人馬放了回去。當然，此舉確實發生了積極作用，據王以哲告訴彭德懷：此舉已使其受到教訓，馬鴻賓已傾向我方，不再與紅軍爲難。可是，對於威脅最大的胡宗南，紅軍一直還沒有找到有利的作戰機會。且彭德懷認爲：「目前戰役已成一種正式決戰形勢，在地形、敵情與物質條件均無絕對勝利的把握」，必須「抓緊敵人一切矛盾，爲持久的戰略方針，疲憊敵人，尋求有利的戰役堅決消滅敵人」，因此他早就決定「調胡、毛、關、王均北進中寧、中衛及金積南境，王以哲到豫旺堡以北時，我主力繞出突出之」⓱。故一路上，雖胡敵跟進較緊，但考慮到胡敵行動謹慎，部隊齊頭並進，很少孤立前突，加上王以哲幾乎與胡並駕齊驅，對紅軍也有威脅，彭德懷始終沒下攻擊胡的決心。他特別強調，要想打擊胡敵，首先必須做好王以哲的工作，使其主動緩進乃至不進。因王以哲畢竟只是過於擔心暴露關係，適當勸說總會見效，加上王部始終與之協同前進，並通報胡敵情況，彭事實並不擔心沒有作戰機會。

十一月十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懷：他奉令率五個師協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進，東北軍在右翼，胡宗南部在左翼。彭德懷及周恩來十

一日覆電表示歡迎，但說明豫旺堡一帶戰場適合作戰，紅軍準備在此扼阻胡敵，希望王部暫停前進，以免誤會。可王當日覆電強調有軍令在上，實在不能不進。其電報稱：「總部原令敝部於十五日前進至靈武附近地區，且有違誤即以軍法論罪之語，但弟深知兄方困難，故一再托詞延宕。但爲不使他人猜疑計，又不得不稍行前進。相知在心，弟當盡可能範圍極力延宕並停止。」

十三日，王以哲通報，胡宗南本日已至同心城，經石峽口、石崗子分途前進。爲避人耳目計，東北軍將不得不相隨同進，準備左路十日進至虎家山，十六日進至豫旺堡，右路至十五日進陳家堡。此舉頗讓彭德懷爲難，考慮到胡部進速較快，戰役準備不及，彭德懷次日覆電表示同意，並很快部署了部隊撤離豫旺堡的行動，於十日通知王以哲速即進占。不過，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去電說明，紅軍此次並非不打，而是因毛澤東電令「勿使將軍左右爲難」。惟對胡敵作戰在所難免，務請兄部務必顧全大局，全力協助，盡量拖延前進。彭德懷還特別強調說明，倘使紅軍受蔣軍壓迫至甚大不利之時，東北軍處於孤立前途將受同樣不利，故凡能贊助弟方者，務請委曲求設法。胡軍本來輕視他軍，兄部緩緩前進，彼亦未必見怪，務祈明察。

由於這時蔣介石督戰甚急且嚴，王以哲這時確實非常擔心被胡宗南識破自己與紅軍的秘密關係，因此，他之所以緊隨紅軍其後，完全是爲了掩人耳目。王以哲也深知此舉難免惹得紅軍不滿，因此不得不再三說明自己的苦衷，以求彭德懷諒解。到十七日，王以哲因再得命令，要其務必於二十日進至山城堡、環縣一帶，並揚言違誤即軍法拿辦。王以哲確實進退兩難，不得不再電彭德懷告以不能不進的理由，稱：爲保存抗日力量，軍職均不足惜，但兄我關係未明朗化前，耳目不能不避，即弟部只能緩進，不能不進，是不可能也。弟部於十六日全部到豫旺堡，本擬即時前進，茲以兄囑，特電令緩至十九日由該處出發，勉副尊意。

不過，王同時告訴彭德懷，胡部慣不按指定路線行進，其必緊跟紅軍身後急進，只是王擔心紅軍與胡軍作戰很難有獲勝可能，因此明確電告：「爲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無謂犧牲」。但此戰紅軍等待已久，決不可能輕易放過。王部一下子緩進三天，使胡敵孤軍暴露在紅軍的面前，是非打不可的。況且紅軍一方面軍對國民黨中央軍也向無張國燾或王以哲那樣的畏懼之感。戰機迅速被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共軍委當即下令在山城堡一線進行戰役準備，對胡敵三路首先集中打擊右路由西家原進向山城堡的丁德隆師，然後再打中路之詹師。毛並告彭：「王以哲十九日開始從預望(豫旺)堡東進，計程三天可達，但我們必須阻滯之至七天以上」，以便紅軍主力能從容作戰⑩。

二十日，蔣介石下令胡宗南迅速向定邊、鹽邊推進，以丁德隆、周祥初兩師側後掩護，更爲紅軍提供了作戰條件。毛澤東於是再電彭德懷稱：「蔣介石令胡軍向定鹽急進，丁周兩師爲斷備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中全力放手作戰，消滅丁德隆」。彭德懷也立即通知王以哲務必率部在李家懸岩、馬家大山一線及其以西地區盤環數日，以利紅軍用戰。結果，不出所料，丁德隆師當日即突向山城堡，立即遭到紅軍將近兩個軍的打擊，突前的一個旅首先中伏被殲，增援之另一旅亦被紅軍阻擊部隊擊潰，丁師迅速全線敗退萌城一帶。此戰開創了紅軍首次痛殲胡宗南一個旅的戰績，無疑極大地振奮了紅軍各部的士氣，也挫了胡宗南的銳氣。中共中央頓時感到壓力驟減，相信再打一大仗即可基本穩定戰局，停止胡敵進攻。

對於紅軍的勝利，張學良也相當滿意，當即發來賀電。不過，在張看來，對胡宗南也不宜一味硬打，而應施以政治攻勢。故他電報中

強調:「對胡軍勿結仇敵,應盡力爭取一切政治工作,曾施之於何柱國及東北軍之被俘者,合應施之於胡軍」。如果胡宗南能夠接受中共統戰影響,中共何樂而不爲。問題是要做胡宗南等國民黨中央軍將領的工作,在軍事優劣如此巨大的情況下,幾乎難以想像。周恩來、徐向前等已多次去信聯絡感情並說明主張[119],毫無作用。紅軍派代表前往胡軍,更是屢屢被拒。因此,毛澤東非常清楚,對中央軍的策略只能是先打後和,非消滅其一兩個師不能使其重視紅軍。當然,毛並非不同意張的看法,他覆電稱:「對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爭取之,彼不再進決不打他,僅在彼向鹽池進攻時準備消滅其一二個師,但打後仍進行統一戰線政策」。

坦率地說,紅軍這時雖然僅僅打掉了胡宗南的一個旅,不能根本改變當前的困難局面,不過,這一仗對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機,仍舊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緩解作用。胡宗南吃驚地電告王以哲跟在紅軍後面要小心行事,據報蔣介石也萬分焦慮。終於,正在南京舉行的國共兩黨談判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蔣介石的談判條件又相當放鬆了。在十二月初,陳立夫再次緊急電召在上海的潘漢年去南京談判。在九日的談判中,陳立夫明確告潘,蔣先生已做出重要讓步,不再堅持一定要收編和師長以上幹部出洋半年回國按材錄用等,同意接受紅軍改編,只是人數要限制在三萬以內。但潘此時已得紅軍對中央軍作戰勝利的通報,故對蔣介石刻意削減紅軍一半以上人數的做法仍然表示不能接受,堅持紅軍必須如數實行改編。雙方仍舊沒有能夠談出一個結果來。不僅如此,由於軍事上的勝利,中共中央十日得知談判情況後,也明確地表示支持潘漢年的態度。毛澤東、周恩來並且進一步宣言:爲達保存全部紅軍之目的,「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做無原則讓步」[120]。很顯然,由於國共雙方的戰爭局勢出現了某些重要的變化,紅軍重新有了挫敗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可能,事情的發展較前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微妙變化。

注釋

1.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轉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86-87頁。
2.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同上注,第84-85頁。
3. 王明:〈目前中國政局的出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救國時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王明在這篇文章裡不點名地批評蘇聯《消息報》這時關於中國的西南事變多半有日本人在背後指使的報導,聲稱:「兩廣抗日反蔣事變,絕非受日寇指使」,「新內戰之主要發動者爲蔣介石,並非西南」,「西南派與南京派今天之鬥爭,至少客觀上代表著人民的抗日意志與賣國賊的降日行爲之間鬥爭底一部分」,因此,「中國人民應群起反對新內戰的禍首——蔣介石」。
4. 王明:〈答反帝統一戰線底反對者〉,《救國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
5. 這次會議所表現出來的態度頗爲矛盾。一方面肯定「反蔣必先討蔣不正確」,一方面又強調「不要放鬆每件具體事實揭破他們(南京政府——引者)」。同時在規定「將來要做」的事情中,特別提出了「反蔣統一戰線」一項。可見會議並沒有根本改變反蔣的態度。並見〈蔣介石自絕於國人〉、〈除三害〉等,《救國時報》(社論),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二十九日。
6. 〈王世英給中央的信〉,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7. 關於潘漢年七月間與張冲接上關係,並由張冲引至南京見陳立夫,而陳立夫卻以潘漢年沒有取得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負責方面正式代表資格等理由拒絕與他見面的情況,潘自己在一九七〇年六月曾有過回憶材料。
8. 〈中共代表團會議記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

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❾ 同注❺；並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78。

❿ 〈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同注❽。

⓫ 〈王明在代表團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同注❽。

⓬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轉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 86-87，84-85 頁。

⓭ 〈總政治部關於召開白軍工作會議規定今後工作方針的建議給彭德懷等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周恩來在與此同時的另一封電報中幾乎是一字不拉地重複了這裡引述的話。這說明，總政治部和周恩來所表述的這段話都是從中共中央的一份正式決定中引用的。

⓮ 參見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73 頁。

⓯ 參見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74 頁。

⓰ 前引〈總政治部關於召開白軍工作會議規定今後工作方針的建議給彭德懷等電〉。

⓱ 〈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80-81 頁。

⓲ 前引〈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討論中國問題的發言〉。

⓳ 同注❾；並見〈米夫在代表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同注❽。

⓴ 〈洛、恩、博、澤致朱、張、任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前引《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438 頁。

㉑ 〈中央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問答〉，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86-103 頁。

㉒ 〈毛澤東、彭德懷致洛甫電〉，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關於聯蔣抗日的一組電文）。

㉓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17-22 頁。

㉔ 〈洛、育、恩、博、稼、懷、凱、澤致朱、張、任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㉕ 前引《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435-436 頁。

㉖ 參見〈林育英爲統一戰線之實質給四方面軍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92-99 頁。

㉗ 前引〈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㉘ 〈陳誠爲轉報馮庸所述之張學良抗日主張呈蔣介石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22-1023 頁。

㉙ 張學良：〈爲陳明抗日主張致蔣介石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21-1022 頁。

㉚ 〈陳誠致蔣介石電所述之張學良致陳誠「養」機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24-1025 頁。

㉛ 根據文件標明的日期，發表應爲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但當時最早提到此一文件的時間其實是在九月一日。因此，多半可以認爲，這一文件的起草日期爲八月二十五日，實際確定其文字及內容的時間應該稍晚幾天。

㉜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83-84，87 頁。

㉝ 《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 622 頁。

㉞ 《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 537，599-600 頁。

㉟ 關於陳立夫和鄧文儀奉派分別赴莫斯科和柏林進行中蘇軍事互助條約談判與國共關係談判的情況，在這兩位當事人晚年的回憶錄中都有過簡略的說明。但兩人對於這次赴柏林和赴莫斯科的時間，以及任務的性質，事情的經過與進程中斷的原因等等，均已記憶不清。有些重要情況則完全搞錯了。鄧文儀甚至把他與王明的談話時間記成了一九三六年三月，並且已經不清楚他

因爲什麼中斷了正在進行的談判。參見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一期;鄧文儀:《冒險犯難記》,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三年版,第67-70頁。

㊱ 〈王明與鄧文儀談判記錄〉,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76。

㊲ 〈王明與鄧文儀談判記錄〉,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同上注。

㊳ 《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九卷,第35-38頁。

㊴ 《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九九三年出版,轉見蔣永敬:〈有關西安事變新資料〉,《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㊵ 〈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最早形成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經共產國際批准後,最初提出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核心之點即在於向全國各黨派提出了共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提議。王明代表中共提出這一主張的確切時間是在八月七日的會議報告中,但作爲正式的中文文獻發表的日期其實是十月一日,當時發表在中共代表團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此一文件很快被簡稱爲〈八一宣言〉。其中並且提出了未來國防政府應當遵循的「十大綱領」,包括「抗日救國收復失地」、「廢除苛捐雜稅」、「實行民主自由」,沒收日本及其漢奸一切財產等項。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等十卷,第518-525頁。

㊶ 〈周小舟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這次談判的當事人呂振羽和諶小岑七十年代末均對參與中共北方局與國民黨CC系主持的談判有所回憶,但記憶中同樣錯誤甚多,且兩人的回憶在時間、內容等問題上就有許多出入。呂振羽甚至連周小舟參加談判的情況都已記憶不清了。諶小岑更是將幾次談判的條件完全搞亂了。參見呂振羽:〈南京和談始末〉,《群衆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三期;諶小岑:〈西安事變前一年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抗日問題的一段接觸〉,《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並見拙作:〈關於一九三六年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經過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一期。

㊷ 〈博古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致洛甫、毛澤東等電〉,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㊸ 〈周恩來致洛甫、毛澤東等電〉,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見拙作:《失去的機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第9頁。

㊹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14頁。

㊺ 〈洛、毛致博古等電〉,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組電文)。

㊻ 〈洛甫致周、博、鄧電〉,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洛甫致周電〉,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

㊼ 前引拙作,《近代史研究》一九三六年第一期。

㊽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54頁。

㊾ 同注㊶。

㊿ 同注㊶。

51 同注㊶。

52 〈洛甫、毛澤東二同志致朱、張、徐等同志電——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287-290頁。

53 黃君,即黃續,張子華此時的化名。

54 〈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函〉,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253-254頁。

55 〈毛澤東致葉劍英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595-596頁。

56 〈周恩來致養甫兄函〉,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轉見《團結報》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第二版。

57 〈周恩來致蔣介石函〉,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105-107頁。

58 〈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函〉,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前引《周恩來書

信選集》，第 103-104 頁。

59 〈劉致中央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

60 分別見〈毛澤東致宋慶齡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致章乃器、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致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致蔣光鼐、蔡廷鍇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前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70-75 頁。

61 其要點如下：

一、在抗日救國爭取民族生存之共同要求下，中華民國廣西省政府、省黨部及第五路軍代表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與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及紅軍代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互矢最高之誠信與決心，一致努力於下列偉大而艱苦的革命鬥爭：

甲、對日武裝抗戰。

乙、實現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聯合戰線。

丙、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二、爲力求以上政治任務之完成起見，協定之雙方應各在其軍事政治所及之區域及全國一切可能範圍之內，對於下列諸項鬥爭作一致之實踐：

甲、用一切努力進行全國停止內戰（停止進攻紅軍）之運動，促成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中國國民黨及蔣介石軍隊在內）實行眞正之抗日戰爭。

乙、普遍的組織並發動工農商學兵各界人民群衆之抗日救亡運動。

丙、用一切努力推動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爲建立眞正民主共和國而鬥爭，迅速召集基於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組織全國國防政府。

丁、徹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三、雙方同意在最近將來之適當時機向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提議，共同發起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及全國各民衆團體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之總鬥爭綱領，並產生聯合之戰鬥機構，在召集此種大會之前先開發起人會議，完成大會召集之一切必要準備。

四、在抗日作戰時，雙方軍事力量各擔任一定戰線，取得互相聯繫與協同動作，以此去配合全國抗戰力量在統一指揮下之一致的堅決的動作，完成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任務。

五、雙方相互保證不得在各該合作對方政權下及部隊中作違反本協定各條之宣傳與行動，但雙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組織上之獨立性。

〈抗日救國協定〉，一九三六年九月；〈李允生報告〉，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62 見〈毛澤東致蔣光鼐、蔡廷鍇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280-281 頁。

63 〈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函〉，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前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78-79 頁。

64 〈毛澤東關於停戰抗日之談話〉，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集》（中），第 291 頁。

65 〈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 573 頁；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66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澤東、洛甫、恩來、博古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同注65。

67 〈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軍事部署問題致朱、張、任三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68 根據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軍委致國際電〉，及九月一日〈朱張致黨中央及軍委電〉可知三個方面軍兵力如下：第一方面軍（含一軍團八千人、十五軍團六千人，各直屬部隊七千二百人，地方部隊六千人）總計兩萬七千人；二方面軍（二軍七六四三人，六軍四〇五九人，卅二軍二六七七人）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人；四方面軍（四軍五七〇〇〇人，五軍四六〇〇人，九軍九六〇〇人，卅軍八〇〇〇人，卅一軍五〇〇〇人，方面軍直屬隊五〇〇〇人，總直屬隊四六六四人）共計四萬二千五百六十四人。另一方面軍步槍一萬餘枝，輕機槍五百餘挺，重機槍一百餘挺，迫擊炮四十門，山炮兩門，正規部

隊每槍平均有子彈四十發，地方部隊每槍平均有子彈十餘發。二方面軍步槍六二六八枝，輕機槍一百六十挺，重機槍一百二十九挺，迫擊炮四門，山炮一門，平均每槍有子彈四十發。四方面軍有步槍一萬五千三百枝，駁殼槍及手槍二千九百枝，輕重機槍四百九十五挺，迫擊炮二十八門，每槍平均有子彈三十發，人平均有手榴彈一枚。

69 〈軍委致國際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70 〈毛、周、彭致朱、張、任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581 頁；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21 頁；《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關於紅軍北上抗日方針的十八封電報）。

71 〈朱、張、陳致毛、周、彭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第 141 頁。

72 〈毛、周、彭致朱、張並任、賀〉，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22 頁；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73 〈朱、張、陳致林、毛、洛、周、彭、徐電〉，十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74 〈英、洛、恩、博、稼、澤關於組織軍委主席團事致朱、張、徐、陳、任、賀、劉、關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22 頁。

75 〈朱、張、徐、陳致毛、周、彭並賀、任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76 〈朱、張、徐、陳致毛、周、彭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77 〈朱、張、陳、徐致英、洛、澤、恩、博等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78 〈朱、張、徐、陳致賀、任、關、肖、劉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79 〈黨中央命令——給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告一二四方面軍首長〉，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80 〈朱、張、徐、陳關於通莊靜會戰役計劃致英、洛、澤、恩等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1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82 〈毛、周、彭關於同意渡河計劃致朱、張、徐、陳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3 〈劍、年致周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84 〈十月份作戰綱領〉，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5 〈中央書記處致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6 〈毛、周關於準備襲取定遠營事致朱、張、彭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7 〈毛關於打胡取定遠營的戰略部署致彭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專題論文選輯）。

88 〈中央軍委致共產國際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實際應爲兩萬二千人，中共中央十一月八日的電報對此有所進一步的說明。

89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90 〈軍委總司令部致王明同志轉戰士同志電〉，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前引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91 日軍與僞蒙軍此前已占據百靈廟，並進一步進犯綏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傅作義部在中央軍參與下開始進行反擊，向百靈廟發動進攻，最後收復了百靈廟。是爲百靈廟戰役。

92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93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3。

94 蔣介石在東北淪陷後多次表示：「東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軍勢力所能達到」。「東北事變有其特殊之性質，……蓋百年來之東北，本為帝國主義者角逐之場，其根深蒂固，久已構成一極複雜錯綜之關係，打破此種關係，斷非如十七年之統一東北，一舉而得者之簡單而便易。東北問題，早成歷史上國際之問題。中正昔年上革命策略一書於總理，嘗曰：『東北問題，非東北之單純問題，當留待東亞問題全部之解決』。意即如此。」分別見蔣中正：〈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攘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蔣中正：〈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蔣總統集》（一），第 624，722 頁。

95 〈劉鼎報告〉，一九三六年九月；〈劉向三報告〉，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96 參見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26 頁。

97 見〈張學良與英記者談話〉，《申報》，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導有兩個版本，其中在關於對紅軍停戰問題上的說法有所不同。《申報》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是：「假如赤匪能覺悟自新而投誠，服從中央命令，使統一工作早日完成，少損一分元氣，即增一分國力，當然亦所深望者也」。安危根據英文記錄譯出的報導稿則稱：「如果共產黨能夠在中央政府領導下，誠心誠意地同我們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敵，這個問題，也許會像最近『西南事變』一樣，得到和平解決」。轉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98 轉見陳力：〈葉劍英同志在西安事變前後〉，《中共黨史資料》，第九輯，第 179 頁。

99 轉見李蓼源：〈西安事變前張學良促閻諫蔣抗日的史料〉，《山西政協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100 轉見蔣永敬：〈有關西安事變新資料〉，《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一期。

101 陳力前引文，第 180 頁。

102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01 頁。

103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104 〈王明、康生、陳雲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105 〈張子華致周恩來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106 蔣永敬前引文。

107 陳力前引文，第 180 頁。

108 中共這時還從宋慶齡處借款五萬元。

109 〈張、毛、周、博、林致朱、張、彭、任、賀五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652-653 頁。

110 〈潘漢年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黨的文獻》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111 〈潘漢年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上注。

112 同上注。

113 〈國際書記處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114 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115 〈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116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12 頁。

117 邱路前引文。

118 邱路前引文。

119 徐向前信為毛澤東擬稿，見前引《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451-452 頁。

120 〈毛周致李毅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19-620 頁。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紅軍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的失敗，不僅使紅軍陷入嚴重困境，而且也使張學良進退維谷，左右爲難。

張學良一向愛護部下，特別對是大批背井離鄉追隨他入關，並且忠心耿耿、拋頭灑血的幹部，更是特別倚重。張後來回憶，在剿共戰爭中他的一個營長負了重傷，得不到撫恤，回不了家鄉，就曾使他深受刺激❶。可是這時，他竟不得不親自下令槍斃了騎六師十六團的團長。同樣，由於南京行營催逼甚嚴，王以哲部不得不節節推進，此種情況使本來就極端困難的紅軍更形被動，以致中共領導人曾明確批評王（以哲）劉（多荃）不識大體，被迫決定於不得已時以武力拒阻之，因而使得十一月下旬以後，雙方部隊屢次發生接觸，並有所傷亡。對於此種嚴重情況，中共中央也屢屢向張學良說明，但張卻明確表示毫不介意，相信如此更便於掩護雙方關係。對自己的部下懷有濃厚感情的張學良竟讓部下白白做出犧牲，若非自身處境極端困難，實難想像。

要知道張學良爲什麼這麼做，只要看下面這則資料就可略知一二。

十一月十七日，即在張學良下令槍斃十六團團長的第三天，劉鼎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其中的原因。電報稱：十六團團長被槍決很多人非常驚奇，但據張學良私下告之，此一決策實因該團長暴露秘密頗著，

無可掩飾，不得已而殺之。

前已述及，何柱國部在張學良各軍中與紅軍的關係最不融洽，雙方不僅沒有直接聯繫，而且何部完全遵命而行，毫無商量餘地。特別是由於部隊長期駐紮甘北地區，張學良也未曾向其透露過雙方的秘密關係，故何幾乎不了解東北軍與紅軍關係的實際狀況，往往仍把紅軍當敵軍對待。因此，當王以哲等部從陝北調來之後，騎兵軍各部已漸知王部與紅軍暗通關節。尤其是十六團曾受命前去接引被圍困在李旺堡的馬鴻逵部，後又受命主動退出李旺堡給紅軍駐紮，其團長對此更漸知其詳。此次十六團出擊兵敗致全團被俘，最終雖因紅軍寬大而人馬盡歸，該團長內心卻頗不平衡，回來後四處張揚王以哲部與紅軍的關係，以致「暴露秘密頗著」，令張學良無可掩飾，遂招來殺身之禍。但封一人口易，封衆人口難。被釋放回去的十六、十七團中許多人事實上已經對此有所了解，不免議論紛紛。而且，胡宗南這時也通過繳獲的中共文件，發現紅軍熟悉東北軍內部情況太快太深，懷疑東北軍內部上層有人暗通紅軍，爲此也專門告誡張學良嚴加注意，這同樣讓張學良倍感緊張與擔心。故劉鼎進而報告說，此次回來的許多俘虜都親眼見到某團副在與紅軍進行接洽，並公開傳說，這件事讓張學良及其知情將領頗難應付，而胡宗南繳獲的文件更讓他們感到不安。因此他們明確提議，今後不僅雙方聯絡要特別小心，各種文件要格外謹慎，而且俘虜一般也不要再放回來，一切總以注意不暴露雙方關係爲原則。

爲了不暴露雙方關係，雙方這時在軍事方面的配合顯然也大不如前。十一月中旬以前，紅軍在甘北的迴旋餘地還略大一些，因此中共雖對王以哲部跟進過近常常抱以怨言，仍盡量配合。到十一月下旬，紅軍已退至環縣、曲子、洪德城、鹽池、定邊一線，被擠入甘北死角，西有胡宗南，東有湯恩伯，鹽池、定邊一失即再不能在甘北立足，必須開始實施南進計劃，向國民黨軍隊身後揷進，重演一年前之長征。但這時紅軍本身尚未做好進行新的長征的準備，特別是剛剛經過長征來到甘北的紅軍二、四方面軍尚未從極度疲勞中恢復過來。考慮到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明確決定要保持定、鹽在紅軍手中一、二個月的時間，以便長途跋涉的二、四方面軍能夠得到休整與恢復。意想不到的是，胡宗南部受到打擊已向後退卻，王以哲部卻仍舊得到剿總命令要繼續推進。十一月下旬兩軍出現某些軍事接觸和傷亡事件，其原因也即在於此。

十一月二十二日，王以哲再度通知彭德懷，稱現奉令必須於二十四日中午以前推進至環縣及山城堡一線，上峰嚴催譴責備至，實在無藉口可推延，務請諸兄迅即通知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賀（龍）所部火速撤退，以免誤會。可是，這時曲子鎮、木鉢、環縣之線駐有紅軍大學近四千人，一時「無地可移，無糧可就」，而紅軍主力爲保定邊、鹽池不失，盡量休整部隊，推延實施南進計劃，也必須確保此線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彭德懷、周恩來乃至毛澤東再三電告王以哲，張學良，懇求他們「本友軍之誼，成全弟方之戰略方針」。對此，張學良雖答應盡量拖延，但亦明告時間長則不可能。作爲下屬的王以哲更是明確表示困難，說：環縣、洪德城乃上峰命令指定到達地，無論如何也必須到達。並以事實關係，此線紅軍也無法長期堅持，故弟諒兄也不致始終不讓，所差者不過時間問題。與其遲讓數日，讓弟過於爲難，不如早讓弟部到達此地。現張先生仍堅持認爲弟部以到達指定地點爲宜，此中實不無意義也。良以胡部既退，而弟部一切補給又均充足，機關備齊，弟如仍不前進，實難掩人耳目。一句話，這件事其實並非王以哲所使然，背後指揮者乃張學良矣。

由此似可認爲，毛澤東等這時批評王劉不識大體，其實是冤枉了

王以哲、劉多荃。在他們背後起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張學良的意志。所謂剿總的命令，說來說去還不是張學良的命令？據王以哲這時告訴彭德懷說：張先生意如過於延緩，於各方也似不便，總以於協同之中間能不露跡象爲當。一切的一切，說到底都是爲了掩人耳目、不露跡象。此中用心之苦，頗可想見。

爲了達到某種重要的政治軍事目的，比如像當初準備發動西北大聯合計劃，刻意掩人耳目、不露跡象而做出某種犧牲，無論從任何角度出發，均無可厚非。問題是，張學良這時想幹什麼？他是在爲了他那個「要幹就徹底幹」的西安事變做最後的準備嗎？張學良後來一再解釋說，他這個人是想起就作，「要幹就幹」，做事從不加考慮❷，事實上這話可能多少說得過頭了一些。說張學良是那種不幹就不幹，要幹就徹底幹的人，多半是對的。張學良四月上旬尙未下決心實行反蔣，半個月之後即決定準備著與蔣介石撕破臉打一架，拉上東北軍與紅軍一同聯俄抗日反蔣，組織獨立的西北國防政府，揚言要幹就徹底幹，可見其性情之直率魯莽。但這並不等於說，張學良是自己所說的那樣，毫無城府，做事完全不加考慮，興致所起就要幹的人。張之所以從一開始就提出「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捧大老板登峰造極」，「牽延到十一月就起變化」❸，無疑是一種考慮，而且還多少有點兒像是那種深思熟慮。此後，張學良一面公開表示擁護蔣介石，一面秘密聯絡中共與蘇聯，準備在西北發動反蔣，自然也並不是毫無心計的表現。如今在西北發動計劃基本取消，打通國際路線失利，紅軍面臨嚴重危機之際，爲隱蔽自己與紅軍的關係，千方百計製造假象，也不能說完全不是其三思而後行的結果。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儘管張學良早已下了反蔣的決心，開始了反蔣的準備，但他在實際進行反蔣發動的問題上，始終表現得有些猶豫不決。用劉鼎的話來形容，就是「半推半就」，「又戀新又捨不得舊」❹。因此，在中共突然單方面改行聯蔣策略之後，張不僅毫無怨言，而且反而給人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甚至還自告奮勇地要承擔起勸蔣和共的使命。當然，眞到要勸蔣和共時，張學良的心理負擔還是很重，以致舌頭還是有點兒打短兒，先要反覆表示自己對蔣擁護服從之誠意，說到關鍵處也不敢過於直截了當，至於聯合共產黨的要求更是一句沒敢提。這一方面是懼於蔣的權力與勢力，另一方面也是受傳統的正統思想的影響。很顯然，既然在張學良下決心參加反蔣運動的時候其內心都有相當顧慮，到了這個時候他更不可能變得毫無顧忌了。至少在十一月間，他所以極力掩人耳目，不露跡象，充其量只是爲了不使蔣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起疑心而已，其中恐怕絲毫不包含有準備在西安發動事變的意思。

從目前所有的資料看，發動西安事變的最初提議無疑是張學良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對劉鼎談話中提出來的。但張學良當時所考慮的事變是一種什麼形式，並無明確的說明。其具體提到反蔣的方式，僅僅表述爲「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幹就徹底幹」。這裡的「硬幹」、「徹底幹」、「打一架」，多半無政變的意思，就是要公開結盟紅軍，與蔣分裂和準備著與南京進行公開的軍事對抗。具體怎麼實現這個分裂與對抗，張似乎沒有提到過。或者可以認爲，在那個時候，張學良還沒有後來在西安扣蔣的想法❺。

具體提到用後來西安事變的方式來發動事變，即採取扣押蔣介石的方式來發動事變的問題，最早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即張學良等在西安和洛陽勸蔣和共失敗之後。關於這一情況，張後來在其〈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曾有過這樣的記述：

關於停止剿匪，團結抗日，楊（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蔣

> 公進言，以期早日實現，節省雙方消耗。迨至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談及蔣公難以容納余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發有怨言，並問計於楊，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敦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反問良，是否眞有抗日決心？良誓志以對，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沈默未語，彼露有懼色，良即撫慰之曰：「余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❻

按照張學良的這個說法，最早提出在西安通過扣蔣來發動事變的主意的，並不是張學良自己，而是楊虎城。這看起來很可能是屬實的。因爲有關這一點，目前也可以通過當時留下的文獻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只不過，時間要比張學良回憶中所說的還要早幾天，即是在蔣來西安之際，而不是在張學良從洛陽回來以後。

蔣介石來西安的時間是十月二十二日，走的時間是二十九日。其間由張學良等陪同在華山住了幾天。在蔣介石離開西安的當天，正在西安的葉劍英和劉鼎曾有電報報告張學良勸蔣和共結果及西安各方對蔣此行的看法。電報稱：

> 蔣張會談結果亟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誰以紅軍打（勸）他，他不准誰剿匪。此路已絕，張將無能作爲。……此間人士對蔣之張主（主張）大爲不滿，正醞釀反對言論。……楊于也毅（於謁）蔣時爲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及（至）今沈悶，有主駐蔣說。❼

在這封電報裡，錯發錯譯之字較多，但主要內容還是比較清楚的。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就是說明楊虎城見蔣後有所不滿，「有主駐蔣說」一句。「駐」是停、留的意思，本身雖無主動成分，但用在役使結構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種強迫的意味。故有的學者乾脆直接把這裡的所謂「駐蔣」理解爲「捉蔣」，大致應該也是說得通的❽。從這裡或者可以證實張學良上面的說法，即是說，確是楊虎城在勸蔣停止剿共受挫後提出，乾脆把蔣捉起來算了。

楊虎城與紅軍的關係，至少在中共中央看來，始終有些若即若離的味道。由於在長達將近一年的時間裡雙方幾經接觸，秘密協定也成就了幾個，可具體落實的其實只有停戰與交通兩項，而交通還不能運貨，只能過人。再加上楊虎城堅持不與中共發生直接關係，其態度又閃倏不定，時好時差，因此，無論是就當初的西北發動而言，還是就紅軍的主要統戰對象而言，中共中央幾乎從來沒有把楊虎城及其十七路軍放在突出的地位。即使在楊虎城九月上旬與中共正式達成秘密協定之後，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變。因爲此協定的範圍僅限於交通、聯絡、通商、情報等幾個具體問題，且在實際操作方面雙方關係與前並無明顯變化。雖然，在九月上旬的談判過程中，楊虎城自己曾主動提出在西北發動反蔣的軍事行動，召集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三方會議，共同組織抗日政治核心組織。但中共中央的代表張文彬當時就懷疑楊的勇氣，中共中央此後也因反蔣策略的放棄而未就楊的建議作出任何具體答覆。因此，楊此時的這種態度，顯然頗讓中共方面感到意外。葉劍英、劉鼎隨後特別就楊虎城態度的突然激進向中央報告說：西安空氣大有變動，因爲張之態度逐漸改變，前此所謂落後分子已大有變動❾。

這裡所說的「前此所謂落後分子」，指的自然是楊虎城。所謂「大

有變動」，無疑與前面提到的楊虎城的「駐蔣說」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楊虎城九月上旬與中共代表談判時，一方面提議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聯合反蔣，一方面又曾對中共過分倚重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表示某種擔心，懷疑其革命的可靠程度，而這時他卻不是首先與中共代表就此進行秘密接觸，妥商對策，反倒是一反其向來的小心謹愼的作風，在張學良及其東北軍少數高層軍官的圈子裡，不止一次地表示對蔣嚴重不滿的情緒，鼓動張學良等發動事變。這反映出，楊虎城此時對蔣的政策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要具體說明楊虎城此時急於對蔣採取行動的內在原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除了此時他同樣具有抗日的強烈願望以外，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楊虎城這時明顯地感到蔣介石將會對他不利。還在九月上旬，廣西問題尙未完全解決之際，楊虎城就已經「甚覺形勢急迫」，擔心蔣會在兩廣事變解決後，轉而對西北採取行動，不僅對自己而且對張學良不利。及至兩廣事變徹底平息，楊乾脆一度以治病爲名遠離陝西靜觀形勢發展，因蔣介石來西安才不得不急忙趕回拜謁，結果進一步證明蔣對他極冷淡，這就更加加重他對蔣意圖之懷疑與對十七路軍前途的焦慮。楊虎城問題的關鍵與張學良一樣，也是不想與紅軍作戰，但楊與張不同之處則在於，張學良東北軍原本就是外省人，究竟是在陝西還是在其他的地方，對他們並不十分要緊。可是，作爲陝西地方的中心勢力，保持自己在陝西的中心地位和對西安及其周圍主要地區的實際控制，對楊虎城卻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因此，楊虎城不能不對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之後，把手進一步伸到陝西來高度敏感。當蔣介石藉剿共之機，陸續調集大軍入陝，明顯地要控制包括西安在內的隴海鐵路和西蘭大道及其沿線各戰略要點之後，楊虎城已經再淸楚不過地感覺到蔣介石要奪取陝西的實際控制權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楊虎城爲什麼在這個時候表現得如此不同尋常，態度又如此激烈。

那麼，張學良這時對楊虎城的提議做何反應呢？沒有人了解張楊當時具體談了些什麼，問題是，事情絕不會像張學良後來所說的那樣簡單，楊虎城冒冒失失的就提出了要把蔣介石扣起來的建議，而張學良對此全不以爲然，所謂「聞之愕然，沈默未語」，好像是壓根兒不贊成。試想，如果張學良此時對蔣沒有較爲激烈的表示，依著久於世故的楊虎城那一向極端小心謹愼的個性和對張學良可靠性的頗多顧慮，他如何會毫無顧忌地提出這般激烈的建議。其實，葉劍英、劉鼎上述電報說得清楚，這時無論是西安的空氣也好，還是楊虎城的態度變化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爲張之態度逐漸改變」而引起，並非空穴來風。也就是說，正是因爲張學良此時對蔣之態度已全然不像前此之猶豫不決，並有頗較爲激烈的表示，楊虎城才敢於當其面提出所謂「駐蔣」之議。從張學良將楊虎城之提議告訴葉劍英與劉鼎，而未加任何評論看，說張當場「聞之愕然，沈默未語」，進而明確拒絕，聲稱「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屬實。從十一月十二日張學良秘密地在東北軍抗日同志會的大會上宣布其政治主張的情況看，可以肯定他此時確已態度大變，並且因其態度漸趨明朗，以致東北軍較爲激進的年輕軍官們言詞更爲衝動，逼得張不得不下決心宣布政見。據劉鼎報稱：十二日夜，張學良召集同志會大會，宣布政見，聲言他的主張是：㈠抗日；㈡聯合各黨派。當然，他同時在會上仍規勸下屬，目前切勿公開與中央挑戰。從這裡不難看出張學良及其周圍親信軍官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反感有何等之強烈。

抗日同志會是張學良自己爲建立東北軍內部領導核心，實現其深刻改造東北軍而組織起來的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人數不多，主席即

張學良，以下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進，並深受張學良信賴的少壯派軍官。這些軍官年輕氣盛，血氣方剛，早就不滿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對張學良之妥協態度也動輒直言批評，毫不客氣。蔣介石在西安充滿威脅的講話，以及不聽張學良等勸告的情況，更是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少壯軍官，其情緒及其主張一時間變得異常激烈。這種激烈態度中，毫無疑問地包含有要對蔣採取激烈行動的意見。張學良專門召集同志會大會，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張，無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決心，以求同志之理解。當然，在另一方面，張學良這樣做，也是想勸告他們暫時不要公開與南京對立，以免落人把柄，影響大局。但這裡所謂「勿公開與南京挑戰」，其意自然並不否認有聯共抗日之目的達不到時，有秘密準備反抗南京之必要，否則他斷無以安撫這些他所信賴和依靠的少壯派。不過，至於怎麼與南京對抗、攤牌，採取什麼方式，恐怕張學良自己這時也未必完全清楚。

十一月五日，葉劍英離開西安返回陝北保安，張學良曾有親筆函件轉致中共中央，其中不僅詢問中共下一步行動計劃，而且特別對中共接取蘇聯援助的情況，以及蘇聯對援助西北抗日軍隊的態度表示關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許不難了解，看起來張學良鑒於勸蔣無效，楊虎城乃至同志會中人又一致主張激烈，他已經不能不考慮向蔣介石做最後之抗爭了。問題是，萬一自己與蔣翻臉，蘇聯能否給予他所需要的援助?

對於張學良的來信，毛澤東等直到十一月中旬才看到。十六日，毛澤東、周恩來答覆張學良稱，他們對張的想法極爲理解，但此時紅軍西路軍要跨越甘肅河西走廊，接取蘇聯從新疆給予的援助，存在相當困難，故毛澤東等人的意見是，如果可能，最好是張學良派駐守蘭州，靠近甘西的于學忠部就近協助紅軍西路軍前往新疆「辦貨」，並且

愈快愈好。

應當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即在紅軍實行寧夏戰役前後，中共中央曾不止一次地提議讓于學忠部就近向新疆方向接取蘇聯援助，但均爲張學良婉拒。事情也很清楚，在雙方尚未公開結盟與蔣對立之前，這樣做是不可能的。而這次的情況已完全不同，張學良絲毫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相反，他只是告訴中共中央，他認爲目前蘇聯方面提供的援助還不能令人滿意，因此尚不值得爲此冒險。其覆電關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忠兄可西行，惟貨尚不能滿意。弟環境十分艱難，但決不爲其懼。化兄近況如何，甚念。

這裡所說的「化兄」，應爲華兄，即張學良親自送去新疆前往蘇聯，化名楊鼎華的中共中央代表鄧發。之所以要問到鄧發，顯然是因爲張學良仍舊急切地希望了解蘇聯方面對他的態度究竟怎樣。另外，他認爲蘇聯目前提供給中共的軍事援助物資，還不能滿足大規模戰爭之需。

蘇聯這時準備的貨單具體內容怎樣，嚴格地說，不僅張學良不知道，就是中共中央也不清楚。在確定從定遠營方向援助紅軍的時候，即十月中旬，蘇聯方面準備的軍事裝備和彈藥等，只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左右。而後因改由新疆哈密方向進行援助，即十一月初的時候，這些物資的總重量增加到了一千噸左右。不過，一千噸武器彈藥即使對於當時還有大約七八萬人的紅軍來說，也是一個不很大的數目，平均到人頭上也只有十多公斤。何況，共產國際來電明確說，裡面並沒有中共中央所希望的飛機大炮[10]。既然如此，張學良當然不能滿意。張學良希望的是更大規模的援助，特別是在蔣介石已經把東北軍原有的炮兵部隊大部分控制在手之後，要想同南京對抗，非有空軍和炮兵不可。如果確實能夠得到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援助的話，張學良看來已經做好了採取行動的思想準備了。這也就是說，張學良確實已經在暗

下決心向蔣挑戰了。至於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其本身並不重要。問題僅僅在於，張學良相信，如果沒有蘇聯的切實援助，依目前的條件發動事變還不十分成熟。

至少，在整個十一月裡，張學良還沒有考慮好究竟應當走哪一步。至十一月中旬，當毛澤東詢問張學良有無對策對付蔣介石的進攻時，張學良提出的方法仍舊是純粹防禦性的，絲毫不包含進攻的成分。他這時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問題確實進行過反覆思考，據他告訴劉鼎說：對蔣介石破壞紅軍寧夏戰役計劃，他尚無好的辦法。他考慮到的出路有三：第一爲出神木；第二爲直趨綏遠；第三爲經徐海東老路線再兜圈子回陝北。三策中，直趨抗日前線爲上策，暫保實力爲中策，步步退讓爲下策。但他又叮囑劉鼎不要以此正式電告中共中央，因爲他還認爲這些辦法都還不成熟，他要再思索云云⓫。

不難看出，張學良這時至少不滿意紅軍目前的戰法，即節節退卻，認爲這是下策。他相信紅軍解除目前困境的最好方法，是出兵綏遠，直趨抗日前線，打出抗日旗幟，使蔣打無藉口。可是，張學良清楚地知道，這樣做同樣也有問題，因爲事實上這時在綏遠的傅作義並不歡迎紅軍到那裡去，況且陳誠及其所率中央軍也正在那裡打仗，他們更不可能歡迎紅軍去，紅軍冒險入綏，反而有可能被認爲是威脅抗日軍隊，從而造成綏遠抗戰的停頓，而將內戰引入綏遠。更何況，即使紅軍如數開上抗日前線，依目前的軍事裝備及兵力情況，結果如何也頗難預料。如果南京仍不能諒解，全國抗戰局面不能出現，對紅軍也未必有利。因此，張學良雖爲紅軍設想種種，終究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只好叮囑劉鼎不要將他的話當成是他的正式意見告訴中共中央。不僅如此，張學良對於雙方軍事關係的狀況也越來越感到擔心，以致不能不再三告誡如此協商進退的方法困難極大，要求中共中央就此早決大計，以求根本解決。其二十五日電即明告中共中央，爲遲緩前進，他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現局勢下永不進展實難辦到，現在他只能設法將進剿改爲封鎖辦法，以延時機。但無論如何，都請內中早決大計。

張學良這時的處境無疑極端困難。一方面必須盡可能滿足紅軍的需要，避免紅軍被中央軍所打敗，從而使自己借助蘇聯援助收復東北的願望付諸東流；一方面還必須聽命於蔣介石南京政府，部隊必須節節推進，避免爲蔣看出破綻，轉而對自己下手。但是，在紅軍已經退無可退的情況下，這場戲越來越演不下去了。

逼不得已，張學良直接上書蔣介石，再度提出調東北軍前往綏遠參加抗戰的要求。這是一個一石多鳥的好辦法。一方面，如果能夠派東北軍北上抗戰，就很可能使西北內戰因東北軍十三萬人大舉北移而暫時停頓下來；另一方面，東北軍全力投入抗日戰爭又可以滿足東北軍內部強烈的抗日情緒。同時，東北軍轉入綏遠，既不會與紅軍隔絕，又可以便利接通蘇聯及外蒙，使紅軍未能成就之戰略目標可以比較順利地實現。爲此，張學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正式上書蔣介石，強烈地「請纓抗敵」。書稱：

> 今綏東事既起，正良執殳前驅，爲國效死之時矣。日夕磨礪，惟望大命朝臨，三軍即可夕發。蓋深信鈞座對於抗日事件，必有整個計劃與統一步驟，故惟有靜以待命，無煩喋陳，乃彼大軍調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達到；而寵命迄未下逮於良，繞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爲個人盡一分之前衍，爲國家盡一分之天職。……今者前鋒既接，大戰將臨，就戰略言，自應厚集兵力，

一鼓而挫敵氣，則調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時。[12]

張甚至明確警告蔣介石，若再不允許抗日請求，今後東北軍將再難統率馭使。書稱：

就馭下言，若非及時調動，則良昔日之以時機未至慰抑衆情者，今亦疑爲曲解，萬一因不諒於良，進而有不明鈞意之處，則此後之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蓋用衆貴有誠信，應戰在不失時機。[13]

張學良在這裡並非危言聳聽。事實上事情遠比張學良在這裡講述的情況還要嚴重得多。還在蔣介石十月末剛在西安王曲軍官訓練團講完「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顚倒」的第二天，同志會成員、少壯派軍官苗劍秋就言詞激烈地在王曲軍官訓練團公開發表反蔣演說，聲稱：

昨天有人在這裡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內患之害甚於外敵，要我們不去抗日，不去收復東北，要我們做亡國奴，爲他們打內戰，打共產黨，這簡直是放屁！現在，我們東北被占領了，我們東北人變成了無省無家之人，可是我們所有的東北軍軍官們竟然如此怯懦，難道我們連一個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沒有嗎？[14]

苗劍秋的言論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它代表了東北軍相當一部分年輕軍官的想法。張學良得知此事後，當即將其看管，並很快責令苗劍秋遠去北平，以避人耳目，並設法穩定軍官們的情緒。但這並不

等於說其他的少壯派軍官或其他的東北軍軍人不想當苗劍秋所說的那種「英雄」。爲了實現東北人回到東北去的理想，很多熱血軍人確實無所顧忌。

可惜，正如張學良回憶所稱，他的請纓抗戰願望再次落了空，此時反而又因此等事再種「惡緣」，因各方對東北軍軍紀及戰鬥力有頗多非議，結果「援綏之軍，未派有東北軍」；「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唐生智而無良，把良置於後方，爲預備隊隊長，此事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15]。正在這時，張學良又得知蔣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種反對剿共和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救亡報刊。此舉更進一步反映出蔣介石對國內各界抗日要求的敵視態度，張學良對此焦心如焚，竟不惜單機一人緊急飛往洛陽面見蔣介石，力陳愛國無罪的道理，懇求蔣介石立即釋放被捕之人，被蔣嚴詞拒絕以致張憤憤而言：「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亦毫不示弱，稱：「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16]

時至於此，張學良到底忍無可忍了。他張學良再不考慮根本解決的辦法，軍心幾乎不可收拾。終於，他下定決心要採取行動了。不過，直至十一月三十日爲止，張仍舊沒有確定事變的方式和最後行動的時間表，還想再等一兩個月再動手。據劉鼎這一天來電稱：對於中共方面強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隊停止繼續推進的問題，張學良同意盡量使軍隊停止下來，只是又強調不能長期停頓，還請紅軍盡速設法。但同時張學良又表示，從各方面看，一二月內定有變動，紅軍只要能設法牽延一二月，則西北之聯軍可成矣[17]。

這裡所說的「西北之聯軍」指的是什麼，應當是再清楚也沒有的

了。問題是，此電之前面半段話的意思仍是如前此一樣地告訴中共，因命令所關，變動困難，處於被動地位的東北軍長時間不進兵是不可能的。好像戰爭無法因他張學良的努力而長期停止。因此，它很容易給人以某種印象，好像後半段所說的一二月內定有變動云云，也並無張學良將要採取主動的意味。中共中央看來就是做了這般理解，它對於電報中關於不久將會出現組織「西北之聯軍」的形勢的提示似乎完全沒有留意。在次日毛澤東等人給彭德懷等人的電報中，他們對張學良電報內容的解釋是：

> (甲)李毅承認盡力使全線停止，但又謂無法長停，似蔣尚不願取長期守勢，我軍仍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定了。
> (乙)一二月後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可能，李毅建議我軍熬過一二個月。[18]

在中共中央解釋之後，作爲原電最關鍵的「西北之聯軍」這幾個字被忽略了，一二個月內定有變動一句，也被理解爲因綏遠抗戰爆發，西北乃至全國形勢可能在一兩個月內有較大變動。因此，穩定大局的方法，根本上還要靠紅軍「再打一仗」。也就是說，中共中央絲毫沒有看出，張學良有自己主動變動政局，造成前此西北大聯合計劃中的西北抗日聯軍的想法。由此不難想見，那種認爲中共中央事先已經通過葉劍英了解到張學良有政變企圖，甚至知道張要「捉蔣」，進而明確電告張學良對此「要慎重」的說法，是不那麼可信的[19]。也正因爲如此，毛澤東等並沒有特別地重視張學良的這封電報，在當天的覆電中，也完全沒有提到愼重與否的問題，只是強調：如進剿軍取守勢，我軍決

休息訓練一短時期，以待時局開展，同時準備新步驟。這裡的所謂新步驟，毛澤東在電報中沒有說明，但提到爲商量新步驟，擬令葉劍英再去西安一行，約一星期後成行。可實際上，直到十二月十日，毛澤東才再度致電張學良，說明葉劍英十二月九日才離開保安，最早也要到十二月十五日才能抵達西安。很明顯，毛澤東所說的「新步驟」與張學良計劃的政變無關，並且在時間上也並不感覺十分迫切。

張學良究竟打算如何「變動」時局，打算何時「變動」時局，這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頗難判斷的問題。張學良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打算採取「捉蔣」的政變形式呢？從上述所說的情況來看，並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爲要想「捉蔣」，最主要的條件必須是蔣介石要再度親臨西安，而在當時的情況下，蔣剛來西安不久，除非蔣本人認爲有此必要，否則沒有人能夠讓其一個月之後再到西安來，即使張學良也未必有此把握。有人相信，張、楊早蓄劫持的陰謀，蔣是因此被張有意騙來西安的。臺北李雲漢先生即明確肯定：「張學良於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陽晉謁蔣委員長，聲稱西安將有變亂，情勢已迫不及待，請求蔣公親臨撫慰」，蔣對此深信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大陸張魁堂先生更繪聲繪色地描寫道：當時談話中蔣介石聽了張學良的批評，勃然色變，厲聲說：「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張學良回答說：「東北軍的士氣，打日本可以，打內戰，難；除非蔣委員長去訓訓話，安慰和鼓勵他們」。蔣介石聽後即對張學良說：「我可以去臨潼每天請一桌客，藉此機會輪流和東北軍將領談話」，他自信，「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20]。

姑且不論張學良如此做是否確有把握，僅以十一月三十日張尚無立即發動事變的計劃，還打算再等一段時間尋找適當機會的想法而論，說張學良兩天之後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立即誘蔣而擒之，也頗

不合情理。事實上，根據劉鼎這時的報告，張之再赴洛陽面蔣，仍是爲了當面陳述其十一月二十七日請求援綏的理由，並無請蔣來陝之意。而且，李雲漢及張魁堂先生這裡均沒有舉出任何有說服力的史料來證明他們的說法是可靠的。並且，從李雲漢所舉出的兩則史料來看，恰恰都只能證明：再赴西安的決定是蔣介石根據自己對情勢的估計做出的，並非張學良的請求。李雲漢先生的舉證如下：

其一，爲蔣介石十一月二日見張學良後當日的日記，內稱：

> 東北軍之兵心，爲察綏戰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或將功虧一簣，此實爲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余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而挽危局，蓋余個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21]

其二，爲蔣介石在事變後所寫之《西安半月記》中一段話，其中說：

> 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結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念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詰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胄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爲統帥，教導有責，此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十二月四日由洛入關，約集秦、隴剿匪諸將領，按日接見，諮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剿匪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之階段，勖以堅定勇往迅赴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剿方略，親加闡示，實覺諸將領皆公忠體國，深明大義，絕不應有其他。[22]

細讀上述兩段文字，可以看出，蔣張二人於十一月二日的談話，仍不出張學良十一月二十七日電報的內容，張本意仍在用東北軍將士已憤懣不已，必欲援綏，否則難以駕馭，易生變亂爲由，勸說蔣同意調東北軍離開剿共前線，前往綏遠參加抗戰，其間並無請蔣赴陝之意。反而是蔣自己堅持不允張學良所請，並因擔心「剿赤之舉，或將功虧一簣」，相信：「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故明知此行或有某些危險，也要冒險進駐，親自督陣，不僅相信「剴切詰諭，必能統一軍心」，而且要藉機召集會剿將領會議，「親加闡示」追剿方略，力爭實現「最後五分鐘成功」，雄心勃勃地準備只用二星期（至多一個月）時間成就其八年剿共之全功。上述文字，或寫於事變之前夕，或寫於事變之將過，如果張學良確是事先有意勸誘蔣介石赴陝，致使蔣介石上當受騙，蔣事過之後又如何會不將其據實寫出，說明張確早有陰謀，爲何反要爲張學良隱瞞開脫？

張學良十二月二日赴洛陽並無誘蔣來西安意圖的情況，也可以從其他的一些史實中看出來。

十二月一日，張學良得到毛澤東十一月三十日電，得知葉劍英將再來西安商量兩軍行動「新步驟」。儘管他明知葉計劃在一週之後才從保安動身，到達西安很可能要到十二月中旬之後，但他顯然並不介意，僅覆電表示「雨蒼（即葉劍英）兄來甚歡迎」而已。從後來臨近發動事變前夕張學良急電要葉劍英火速前來商量政變行動的情況來看，可知，如果他這時已有誘蔣來陝發動事變的具體打算，他決不會對葉的行期毫不介意。

十二月二日，即臨行前，張曾囑劉鼎電告中共中央自己赴洛意圖，

同時詳告劉鼎蔣介石關於圍剿部隊行動之新的部署情況。說明胡宗南部將沿左翼向定邊、鹽池推進，曾軍接替豫旺堡、甜水堡防務，王以哲軍進豫旺堡、甜水井、白臺子一線，關麟征師集結靖遠、打拉池，中衛以下河防交十五路軍負責，新一軍駐防蘭州至靖遠一線，五一軍守蘭州並協助新一軍河防，青海馬家軍向西壓迫紅軍過河部隊，十二月十日各部應部署完畢。張學良提請中共方面「立即準備作戰，並馬上部署定鹽城防及大水坑、萌城至定、鹽之地形偵察」。此電亦說明張學良這時仍估計十二月中旬以後包括東北軍在內的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圍攻還不會停止下來。換言之，張此時尚不存在立即對蔣採取行動，使進攻迅速停止下來的明確打算。

由此，不難判斷，蔣介石十二月三日親赴西安，鎮懾督戰的決定，多半出乎張學良的意料之外。張早就曾懷疑蔣介石「對他開始了惡意的布置」，始終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如今，在他公開表明了只想抗日，不願剿共的政治歧見之後，蔣突然決定親赴西安督戰，這又豈能不使他對蔣介石的眞實意圖感到嚴重擔心？換言之，多半正是蔣介石的赴陝決定把張學良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

第二節　破釜沈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等人陪同下來到西安。緊接著被蔣介石電邀到西安來的還有軍政部次長陳誠，豫鄂皖邊區主任衛立煌，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豫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陳繼承，軍事參議院議長陳調元，二十五軍軍長萬耀煌等重要軍事將領。而隴海路上更是戰車滾滾，蔣鼎文、樊崧甫、萬耀煌、裴會昌等各部十幾個師這時均受命西進。

可以肯定，蔣介石此次來陝，確實包含著可能對張不利的一面。本來，蔣早就聽說「張漢卿與共妥協」之消息，南京軍委會也早就做過準備，「擬調該軍(東北軍)到潼關以東，俾與共隔，得便×××(解決之)」，但因蔣頗爲自信，只把東北軍暗通中共看成是某些下屬的問題，並不十分相信張有背叛嫌疑，此一計劃並未得其正式批准。而此次蔣之敢於冒險前往西安，仍舊是基於對張學良之信任，相信「東北軍通共已爲不可掩事實，在張漢卿指揮下尚不至爲國家害」。甚至直至西安事變爆發之前兩天，蔣還是認爲，張的問題僅僅在於，其爲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並無其他[22]。儘管爲防萬一，在來西安之際，蔣介石仍做好了萬不得已時替換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必要準備，但臨陣換將仍爲兵家大忌，故直至事變爆發爲止，蔣始終沒有下定決心。其在十二月九日曾親筆寫信給邵力子，密囑他將下述消息交《大公報》駐陝記者發表，即：

> 蔣鼎文、衛立煌先生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爲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爲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謁蔣，聞蔣令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各部隊。[24]

蔣介石刻意外洩這一西北人事變動的消息，其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可以非正式地給張、楊以警告，逼二者就範；二是在張、楊仍不能痛下決心全力剿共的情況下，則不惜斷然將兩軍調離。而其基本意圖仍想盡可能說服張學良和東北軍服從命令。因爲，在東北軍人心燥動不安的情況下，斷然調其南下，不僅頗具危險性，而且勢必造成相當混亂，使西北剿共計劃的完成受到嚴重影響。這也就是爲什麼，蔣在信中明確要求此信只送非官方的《大公報》，不送中央社及《中央日報》，

而且直到西安事變爆發，即此一手諭寫好三天蔣仍猶豫未決，而未送出。不過，無論蔣介石如何處置，有一點可以肯定，蔣及南京方面已經在考慮將東北軍調離西北的消息，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張學良等對此或者早有風聞，或者還有更嚴重的估計[25]。

從好的方面估計，假定蔣只是把東北軍調走了事，那麼，西北剿共計劃有可能順利進行，紅軍或者嚴重受損，或者照原計劃轉入內地，使內戰更長時間綿延不絕，結果，東北軍固然得已保全，但其通過聯俄聯共推動抗日，盡快收復東北失地的願望將再無實現之日。因為，消滅了紅軍，也就得罪了蘇聯，蘇聯政府豈會輕易地善罷干休，不作計較，反而轉過臉來積極助蔣抗日？況且，國民黨剿共多年，紅軍豈是那麼容易能夠一舉殲滅的？蔣介石不清楚紅軍的行動計劃，張學良心裡明白，若紅軍真的再度分途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向內地轉移而去，內戰自然牽延不決，蔣仍得以共產黨為頭號敵人，抗日之事照樣遲遲提不上日程，那時東北軍就是忍無可忍，再想聯俄聯共發動抗日，因其與紅軍隔絕，紅軍又與蘇聯隔絕，也全無可能了。而且，他張學良因儘量順從蔣之願望，已久受部下及同鄉的批評指責，綏遠抗戰正在異常強烈地激動著多數東北軍將士的抗日復仇心理，蔣介石拒絕東北軍就近增援，投入抗戰，已使他和東北軍相當部分幹部深受刺激，這個時候若再遵命南下，遠離抗日前線，他有何顏面面對自己的部下，今後又將如何統馭他們？

從壞的方面估計，假定蔣不把東北軍調走，而是親自指揮督陣，逼迫東北軍參加會剿，不僅張學良，就是諸多已經同紅軍有著秘密妥協，保持著友好關係的東北軍各部，或者完全無法作戰，繼續「通共」而被蔣識破，受其「毒手」；或者不得不為著確保東北軍上層不受蔣之「毒手」，在軍事上盡力敷衍，結果必定會因紅軍退無可退而使雙方統

戰關係嚴重破裂，不僅在中央軍和東北軍聯合進攻行動中，東北軍注定要成為紅軍首要的打擊對象，因而遭受嚴重損失，而且他張學良和東北軍也將因此失去中共的信任，進而完全喪失爭取蘇聯信任和支持的可能性，其盡快發動抗日，及早收復東北之望，更加無從實現。

顯而易見，請神容易送神難。如果蔣介石不來，張學良日子反倒還好過一些，總還可以照他原來所想的再等上一兩個月，看準時機再說。可現在，蔣介石來了，而且並無很快離開西安的樣子，其不僅集中軍政要員部署大舉剿共方案，而且頗有親自指揮督陣，必欲一舉竟其剿共全功之勢。況且因蔣之到來，南京方面軍、警、特、情各系統也必蜂湧而至，不要說曾經在自己保護下被抗日宣傳掀動起來的西安救亡運動將因此而大受其害，就是東北軍、十七路軍與中共紅軍的秘密關係也將因此迅速曝光。難怪張學良這時緊張異常，對蔣出必相隨，幾乎寸步不離呢！與其說，這是張學良為蔣安全擔心，實恐他人生變，倒不如說，這是近來越來越害怕秘密外洩的他，擔心會有宵小之輩乘機告密。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學良後來憶及他當時被迫發動事變的原因時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蔣來西安後幾度單獨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致良同楊虎城發生疑懼」[26]。

走也走不得，打也打不得，張學良已再無他法可想了。他這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使盡渾身解數勸蔣和共，一是破釜沈舟，發動政變。但第一條路顯然走不通。據張學良記憶，事變之前，張學良曾兩次與蔣在華清池正式談話，甚至不惜對蔣哭諫，勸其務必和共抗日，雙方情緒都十分激動。關於這兩次諍諫的時間，大致可以肯定在十二月七日和十二月九日[27]。特別是第二次諍諫的結果，給張學良印象尤深，以致張學良於事變剛剛發生和事隔幾十年之後，都在反覆地公開

強調這一次談話給他的刺激。

這一次談話發生在一次學生遊行之後。第一天，正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一週年。西安學生藉紀念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一週年，舉行示威遊行，向省政府和住在臨潼的蔣介石請願，要求實行抗日，竟遭警察開槍阻攔，傷學生一名。張學良得知後，急赴西安至臨潼路上攔截勸阻。面對群情激昂的學生，想到遠遠近近的種種苦惱和憤懣，他可謂百感交集，以致當場發表演講，明確表示：他「決不做走狗或漢奸，誓死收復東北」。結果，「張與學生等聲淚俱下，轟動一時」，學生大受感動，退回西安，沒有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藉著當時的氣氛，張學良當晚再赴臨潼面蔣，痛切陳詞，不想，蔣介石卻把他罵了一頓，說對這些學生應該用機關槍打，這使張感情上異常衝動。幾天後，張學良竟三次公開陳述當時的情況和他強烈的感受。他說：

> 學生走向臨潼後，我不顧一切挺身而出，幸而把學生勸回來，而蔣委員長卻怪我沒有武力彈壓，而且竟公開明說是他叫警察開槍，假如學生再向前進，他便下令用機關槍打！我們的機關槍是打中國人的嗎？我們的機關槍是打學生的嗎？蔣委員長有了以上……表示，楊主任，其他西北將領和我本人，就都斷定了他的主張是絕不能輕易改變了。㉘

很明顯，如果僅僅從張學良自己的上述說明看，或者可以認爲他是在十二月九日以後才下最後的決心，要發動事變的。但確切地說，事情恐怕並非如此。

張學良最初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要發動事變「捉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如前所述，張學良事實上始終沒有確定事變的形式和時間。張學良最終不得不選擇劫持蔣介石，即「捉蔣」方式，是在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的幾天時間裡。問題是在哪一天？有人認爲十二月七日下午張學良勸蔣失敗後，一回西安就決心「捉蔣」，八日即與楊虎城「初步確定兵諫計劃」㉙。有人認爲十二月十日下午張、楊「研究了捉蔣方案，做出了最後的決定」㉚。有人認爲十二月十一日晚張、楊才秘密會談，決定對蔣實行兵諫的㉛。但從七日下午張學良急電邀請葉劍英火速前來西安相商大計的一封電報可以看出，在七日張學良勸蔣前後，他就已經準備對蔣採取斷然行動了。電報稱：蔣來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來此。

自毛澤東十一月三十日電說明葉劍英一週後可來西安後，已知張學良當時對葉之到來在時間並不著急。十二月五日，葉劍英又有電報給張學良，說明他將陪同前去西安轉往新疆赴蘇聯就醫的王稼祥於八日從保安動身，十三日左右到達西安。張學良的這封電報表明，他這時已經迫不及待了，急於要葉立即趕來西安，以便相商「要事」。此「要事」者何，今天的人一望便知。可是，中共中央當時仍舊沒有意識到其中奧妙，以致葉劍英出發的日期反又因爲一些並不十分要緊的事情後延了兩天，致使葉劍英等直到十日才離開保安。故毛澤東電告張學良，葉十五日才能到西安。但無論如何，這一情況足以說明，第一，張學良最初下決心在幾天之內發動事變，並採取劫持蔣介石的這種「捉蔣」方式，是在十二月七日左右。第二，張學良剛決心採取這一行動就迅速通知了中共方面，要求其速派代表前來相商㉜。只是因爲張決心下得較晚，保安至西安需時近五天，加上中共中央未能從電文中了解張學良急於要葉前去的原因，致使張學良事先與中共代表相商行動計劃的想法未能實現。

那麽，爲什麽張學良不在電報中說得更明白一些，甚至將計劃中的行動大致通知中共中央，以便直接與中共方面具體相商呢？這顯然是因爲，此事畢竟過於重大，稍有不愼就會造成嚴重後果，張必須非常謹愼。中共中央此時與張學良的電報聯絡，固然十分安全，密碼被破譯的可能性極小，但因張之電臺才建不久，使用的波長、呼號均與前王以哲在六十七軍軍部與中共中央聯絡的電臺一致，很容易爲王臺所截收，故張絕不能利用他的電臺向中共中央通報此一重大行動計劃，即使是上述語意含混的短電，雖然精心措辭，也還是有相當風險的。

那麽，爲什麽張學良不將此一行動的設想通知劉鼎，與之相商，而非要捨近求遠地等葉劍英來討論呢？這則是因爲，王明等人此前已兩度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對劉鼎出獄及被捕後的表現有所懷疑，堅持不應讓劉鼎在張學良身邊工作。中共中央雖然通過與劉鼎的交談特別是劉鼎在張學良處工作的長時間考察，不相信王明所說的情況，但終究不能不多少有所顧忌，其派葉劍英來張學良處做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因此，隨著葉劍英就任中共中央代表，並確定劉鼎此後只負聯絡之責，張學良一切重大問題自然只能同葉劍英進行商討，而不再與劉鼎相商。因此，儘管張學良七日決定發動事變之後急於與中共代表取得聯絡，劉鼎卻遲遲沒有得到通知，甚至在事變即將發生的幾天時間裡，張學良一次也沒有找過劉鼎。劉這幾天裡雖仍有四、五封電報給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間接得到的一般情報。對於西安城裡緊鑼密鼓地秘密醞釀著的軍事政變活動，劉鼎幾乎是毫無察覺[33]。

中共中央固然沒有得到張學良的有關通報，但是否可以認爲中共方面曾或多或少地對張學良最後的決定起過某些作用呢？顯然，張魁堂先生是傾向於認爲中共中央的電報曾經對張學良決定十二月十二日發動事變，起過某些促進作用。他明確講，張、楊決定在十二月十二日採取行動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張、楊已得知蔣介石將要在十二日頒布全面剿共命令，一個是中共中央於十日電告張學良國共談判有了波折，難以繼續[34]。換言之，如果此時中共中央通知張學良兩黨談判已經找到重要的突破口，正在取得積極進展，剿共戰爭有希望迅速停止，張學良有可能放棄至少是推遲發動事變的計劃。此說或者不無道理。

張魁堂先生提到這封電報的內容是人們所熟知的。其關鍵在於以下這段話：

> 陳立夫第三次找漢年，談紅軍留三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復稱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

在此，中共中央態度之強硬，顯而易見。儘管事實上蔣介石已經從堅持要求收編轉而同意進行改編，條件上做了相當的讓步，但他仍然堅持要削減紅軍的人數，而中共中央對此明確反對，堅持紅軍可以實行改編，惟利用紅軍目前困難處境，千方百計地削減紅軍，斷難接受。如果蔣堅持這樣做，那麽，「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做無原則讓步」。可以想見，這樣一封態度強硬的電報，清楚地表明戰爭將必不可免地要繼續下去。它當然會堅定張學良發動事變的決心。

幾乎所有的著作和回憶錄都肯定，張學良確是在十二月十日之後

（有些著作說是十一日）正式決定於十二日發動事變的。不管這是否純屬巧合，我們仍可以把中共中央十日來電看成是堅定其發動決心的一種因素。問題在於，張學良爲什麼要選擇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天來發動事變。有那麼一種說法聲稱，這是因爲蔣介石準備十二日離開西安，他爲此已經在十一日晚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故當宴會之後，張學良便急急忙忙地趕到楊虎城將軍的司令部去，於午夜時分召集了所有軍級將領，決定了發動事變的時間和具體步驟，然後迅速調集部隊開始行動[35]。很難使人相信這種說法是準確的。因爲就連蔣介石自己也否認其十一日晚的宴會是一次告別宴會，他明確說：當晚的宴會是他爲「商議進剿計劃」而安排的一次行轅會餐。況且，說蔣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蔣介石來陝前已明確認爲，這次剿共行動一旦部署就緒，「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可是此時，新的圍剿計劃尚未安排，張、楊兩部的問題亦未解決，加上張學良態度未稍轉變，蔣必不能將指揮此次剿共軍事之責托付於張，或者須另擇他人指揮，或者乾脆自己親自指揮督戰，這一切均未最後部署停當，蔣介石又如何會突然間一走了之呢[36]？

還有一種說法雖然否認蔣介石第二天要走，但認爲張學良決定十二日凌晨發動事變的時間是在十一日午夜前後。原因是蔣介石十一日晚宴時與張學良等商定，第二天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故張、楊當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宴會後決定了次日凌晨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並分頭部署[37]。同上面的說法一樣，此說也仍有讓人生疑之處。試想，十一日晚張學良等赴臨潼參加蔣之會餐，除了吃飯之外，還要「商議進剿計劃」，當時西安至臨潼乘車即要半小時以上，再加上商議的時間和吃飯的時間，即使蔣介石的晚宴於傍晚六時以前開始，張學良等回到城裡至少也要到晚上八、九點鐘了（孫銘九回憶張回到城裡的時間是晚八時許，多少接近）。而這時城裡，以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人的名義也舉行了一個較大規模的宴會，宴請來陝各軍政大員。因此張學良等參加蔣會餐的將領，趕回城後還要參加城裡的那個宴會。如此下來，等到張學良要與楊虎城商量兵變事，亦必至午夜時分（邵力子回憶他參加張學良的宴會，十二時許才回省政府後樓就寢，當屬可信）。此後距事變之發動至多不過三、四個小時，又要與楊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將領開會說明，又要向下級軍官布置行動步驟，又要調動軍隊由城裡前往臨潼……，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將使當晚的行動落空。因此，說張學良事到臨頭才匆忙決定發動的時間，毫無疑問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事實上，比較合乎邏輯的說法是十日晚說或十一日白天說。據張、楊兩部當時比較了解內情的孫銘九、劉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回憶，均可爲此提供一些佐證。如張學良當時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回憶稱：十一日上午張學良告訴他說，已與楊虎城商妥次日行動。張之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也明確講，張學良是在十日晚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主要行動負責人，具體部署行動計劃的。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的回憶更具體一些，他說：「十二月十日晚，張、楊對於扣蔣的意見，已完全一致，並已決定於十二日拂曉立即行動」。到十一日上午，張、楊二人又在張學良官邸商量兩次，至下午確定了共同行動的具體部署[38]。由於此一行動十分重大，且須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兩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絕非一時興起，幾小時內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籌劃、部署、動員及行動過程的。因此，說張、楊十日確定了行動日期，之後至十一日白天曾幾度秘密具體商議完成行動部署，似較合理。

關於這一點其實還可以證之於十一日晚發生的兩件事。一件即是十一日晚張學良、楊虎城邀請來陝中央各軍政要員赴宴之舉。考慮到

第二天凌晨即將發動事變，如果以爲頭天晚上張、楊舉行這樣的宴會純粹只是一種巧合，怕是難以想像的。兵不厭詐，這是兵家常用之計。在臨發動事變幾個小時之前通過這種方式麻痹對方，同多數兵家刻意把突然襲擊的日期選在節假日裡，其實多半都是出於相同的考慮。另一件是張學良當晚在應蔣意外之召赴臨潼面蔣時態度之尷尬與緊張。張、楊有意在西安城內排了十一日晚的宴會之後，突然得到蔣介石赴宴邀請，這不免使張、楊感到格外緊張。楊虎城、于學忠兩人之所以都藉口西安的宴會不去臨潼參加具有「商議進剿計劃」這樣重要內容的行轅會餐，多半也是以防萬一的一種準備。儘管如此，張學良還是有些不安，其緊張之態甚至連蔣介石都有所覺查。蔣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爲異」[39]。不難判斷，如果照十一日夜蔣之宴會後張才趕回西安與楊商定次日晨發動事變的說法，張此時當如前此一樣神情自若，不致給人以緊張之感。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由於張學良十餘小時之後就要發動事變，蔣介石這時竟意外召見，其言行舉止難免有些不自然，故給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的印象。

無論如何，在十二月九日晚爲學生遊行問題發生爭論之後，張學良已經開始了發動事變的緊張布置。十一日晚雖因蔣介石突然召見令人有些神經過敏，畢竟是有驚無險，一切進展順利[40]。十一日午夜過後，張學良、楊虎城已分別做了動員，並指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有關各部，開始依照預定計劃分別開赴指定位置，準備對臨潼和西安市內各處規定目標發動襲擊。根據目前已經被普遍接受的說法，張學良與楊虎城事先規定的統一行動時間是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六點，而部隊實際的行動時間遠比計劃時間提前了兩三個小時之多，大約「凌晨三時左右，東北軍外線部隊在灞橋以東和驪山附近進入陣地，包圍了華清

池。四時許，內線部隊衛隊第一營一連迅速解除了駐在華清池外院禹王廟一排憲兵的武裝，繼之與白鳳翔、劉桂五和衛隊第二營先頭部隊一同衝入二道門，與守衛內院的蔣介石的衛隊約三十多人展開槍戰。」戰鬥很快結束，但蔣介石已越牆逃出約半公里路程，經過一段時間的搜索，才將蔣從驪山半山腰的一塊大石頭後面找到帶回西安。整個事變五時以前順利結束[41]。這也就是說，東北軍從進攻華清池到最後從驪山半山腰找到逃出半公里之遙的蔣介石，前後只花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顯然，這一點和過去一般著作所說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人們幾乎一致肯定，部隊實際行動的時間在凌晨五點左右，蔣介石被找到時天已大亮[42]。之所以如今人們幾乎一致肯定部隊實際行動時間大大提前，而蔣介石在凌晨五點以前已被找到，其原因就是因爲當天凌晨張學良致中共中央電報的公開發表。這一電報的主要內容如下：

> 吾等爲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43]

此電之落款時間寫的是「文寅」兩個字，文爲十二日的代字，寅爲凌晨三至五時的代字，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此電發電時間在十二日凌晨三至五點之間。加上電報中有「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的字樣，於是，似乎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蔣介石於張學良發電時已經被俘。由於有了這樣一封電報，加上幾乎所有當事人都記得事變之初確被蔣逃脫而四處尋找，因此人們遂相信，部隊行動時間至遲不超過凌晨四點，俘蔣時間則應在寅時結束

之前。

但僅憑張學良電報中「今已將蔣……扣留」一語，是否就足以斷定張學良發電時蔣已被俘呢？難道就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張學良當時自覺夜半偷襲，強兵圍堵，穩操勝算，加上急於告之中共其行動計劃與目的，故攻擊行動剛一準備停當即致電中共中央，並已認定自己的行動必然成功？很明顯，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恐怕在邏輯上、情理上，都遠較五點以前找到蔣介石的說法更接近於歷史事實。

根據之一，人們目前依據張學良發報時間來推論蔣被俘時間，這本身就存在著一種誤解。要知道，第一，張學良之「文寅」電的那個「寅」字，確切地說並不是三至五時的意思，而是五時的意思；第二，張學良選擇凌晨五時發電，也並非是因爲當時行動已經結束，而是因爲凌晨五時是張學良和劉鼎與中共中央規定的守聽和發報時間。凡多少了解一些電臺聯絡工作的人都應當懂得，電臺聯絡一般是不可能每小時、每分鐘都在進行的，這種聯絡必須事先規定好雙方的守聽時間，雙方也只是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發報和收報。而最初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通電，甚至是隔日守聽的，以後才改爲每日守聽。但每天的守聽時間這時也只有三次。根據事變前的約定，雙方這時的守聽時間分別是凌晨五時，下午一時和晚上九時。因此，凌晨五時發電只是按照約定的時間發報而已，並不能因此就推論張選擇這一時間發報是因爲事變已經開始並且取得了成功。

根據之二，蔣介石於事變當時摸黑逃上驪山約半公里之遙，又棲身於石穴草叢之中，東北軍攻擊部隊進攻華清池已花去相當時間，又如何能夠在黑燈瞎火的情況下，只花去很少的時間就在無路可尋的驪山東側找到蔣介石[14]？

根據之三，當時親身參加捉蔣行動的東北軍軍官也都清楚地記得，攻擊行動結束後，天已漸明，蔣介石仍未找到。如當時最主要的兩個參加者，張學良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均回憶：「天色微明，驪山上下盡是搜山戰士」；或直到「天色即將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隊才大舉搜山。更爲重要的是事後不久蔣介石和蔣貼身侍衛蔣孝鎮對此的說明。蔣孝鎮事後不久即說明，當他和蔣介石逃出華清池登上驪山半山腰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而後張學良衛隊搜山幾次經過二人藏身之地均未發現。蔣介石自己也有同樣的說法，稱他從華清池越牆出來，行約半小時，藏身驪山東隅半山腰一岩穴中，直到天已漸明尚未見有搜山行動，至天大亮約九時許才見東北軍四出搜索，很快被發現押解西安[15]。

根據之四，劉鼎十二日同樣於凌晨五時根據張學良的要求通報中共中央，說明「西北全部武裝暴動，意圖俘虜賣國頭子，舉起抗日義旗」，但內中並無張電中關於已將蔣介石扣留的字樣，且明確肯定當時只是「意圖俘虜」蔣介石而已，尚未成爲現實。故而在當天早晨找到蔣介石後，張學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以他的電臺於下午一時按約定時間再度發報給中共中央，進一步轉告中共中央：「蔣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蔣鼎文、朱紹良等十餘高級將領均扣留」。而後，當毛澤東等於事變當天晚上九時再度來電詢問事變詳情時，張學良等又有電報稱：「十二日六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虜」[16]。顯而易見，如果張學良發報時確實已將蔣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個內容相同的電報通知中共，也不會在當晚告訴中共說早晨六點俘虜蔣介石等。

由上可以肯定，當日凌晨五時前後張學良和劉鼎先後發報給中共中央，只是按照約定發報時間緊急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之計劃與目的，此時部隊行動不過剛剛開始，並未捉到蔣介石。

那麼，十二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在西安和臨潼開始採取軍事行動的時間究竟是幾時呢？能否說，這一行動原定六時，實際提前了兩三個小時，發生於當日凌晨三、四點鐘呢？

在這裡，首先必須說明的是，第一，關於張、楊預定清晨六點爲統一行動時間，而部隊卻毫無根據地提前行動近兩三小時，這是說不通的。對於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張學良等曾反覆叮嚀並嚴格督促，加上此一行動數路並進，時間上要求十分嚴格，不論東北軍或十七路軍軍紀鬆馳到何種程度，沒有特別重大的突發性事件，參戰部隊及其現場指揮人員絕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動達幾小時之多。而遍查所有事變參加者的回憶，也幾乎都沒有提到因突發事件致使實際行動時間較計劃行動時間嚴重提前的情況，故完全可以推斷，事實上並沒有所謂預定十二日六時共同行動，而實際行動時間意外提前的情況存在。

那麼，關於當日凌晨三、四點鐘部隊開始行動的說法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查關於這一行動時間的說法，大都出自於幾十年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當時事變之經歷者。他們幾乎都肯定，實際行動時間在十二日凌晨四、五點鐘。

如事變發生時與張、楊等同在西北綏靖公署的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總第四處處長盧廣績，回憶聽到槍聲的時間爲凌晨四時左右。同爲十七路軍，當時擔任西安市內行動任務的特務營營長宋文梅，回憶部隊行動時間爲四時三十分左右。當時負責指揮西安市內十七路軍行動的第十七師第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回憶行動時間爲凌晨五時許。當時爲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擔任副官，隨同白鳳翔一同前往臨潼執行捉蔣任務的常國賓，回憶向華清池進攻時爲凌晨四五點。當時負責華清池外圍警衛的張學良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回憶，他在凌晨四時許命令部下發動進攻。另外，東北軍夏時回憶參加現場指揮衛隊二營扣蔣行動的一〇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率部進攻時間爲五時左右[17]。其他重要當事人，如孫銘九雖回憶他是在凌晨二時三十分到達攻擊部隊宿營地部署行動並進行動員的，但並未說明部隊向華清池具體的進攻時間。時任東北軍騎六師十七團團長的汪椿雖回憶參加扣蔣行動的劉桂五對他說，部隊進攻華清池的時間是凌晨約三時許，但因汪椿當時不在現場，聽說和記憶均不足爲憑。因此，事實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幾乎所有的當事人回憶當中，多數人確實記憶事變發生於凌晨四、五點鐘左右[18]。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認定上述說法一定成立呢？在這裡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上述說法全部出自於事變發生幾十年之後，而多數研究者並沒有特別重視事變發生當時的文獻和事變剛剛發生後一些當事人的記述。應當肯定，這樣的史料固然有限，但遠比人們幾十年後的回憶更具價值，也更應當加以重視。

比如，上述十二日當晚張學良向中共中央通報的事變詳情曾肯定事變發生的時間應爲早晨六時。中共中央曾將這一電報的內容一字不拉地轉報給共產國際，並於第二天以軍委主席團名義向全軍通報。其內容如下：

> 十二日六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虜，蔣孝先、邵元冲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受傷，馬志超及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全部繳槍，除蔣死衛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內衝突小，可謂完全勝利。已宣布政治主張及十大政綱。[19]

細讀此電，可知內中固然沒有具體提到行動時間問題，但從第一

句中關於六時已將蔣介石等全部俘虜的表述中，可以得出兩種解釋。一種是以晨六時爲結束全部戰鬥行動的時間，即是說，事變統一發動時間早於六點，至六點鐘不僅解決了城裡的所有憲兵警察，俘虜了全部中央大員，而且粉碎了華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動，還抓住了蔣介石。但此種說法有很大疑點，至少關於早六時以前找到蔣介石的說法即難以令人相信。因爲西安地處中國西北，十二月的早六時仍是漆黑一片，這與找到蔣介石時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說法明顯不一致。另一種解釋則更合理一些。即是說，這裡所說的六點實際上是事變統一行動的時間。儘管這裡沒有說明蔣介石一度逃走的情況，但這並不難於理解，因爲完全沒有必要在如此短的電報中具體解釋和說明這種唯一例外的情況。電報中所要強調的其實只是一點，即事變發動一切順利。而這是以除蔣介石外，所有行動都在部隊採取統一行動的一瞬間取得成功爲根據的。蔣介石雖屬例外，但也只是一時漏網，並未影響整個行動的成功。故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爲，除蔣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員都是在晨六時的統一行動中被俘的。

可以進一步印證這一情況的是同爲當事人的蔣介石和蔣之衛士蔣堯祥事變後不久的記述。蔣介石事變後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記》是按日記方式逐日記錄事變過程的親身經歷的。其成文固可斷定已經過事後修潤加工，但其基礎仍爲蔣當時之日記應爲不虛，其記述之一般經過因無損蔣之形象相信也無須捏造，加上此爲事變後不久即發表之文件，自然要比其他當事人幾十年以後的回憶更加可信。在這裡，蔣自己記述說，他是在凌晨五點半聽到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的，當時他已經完成床上運動，正在披衣[50]。根據蔣介石侍從官們的介紹，已知蔣向有早起的習慣，並且一向十分守時，按部就班，通常均在凌晨六時前後開始起床並做床上運動[51]，因此可以相信蔣此言基本可信。固然，蔣當時於匆忙中未必一定看過錶，估計的時間未必十分準確，但就其較爲固定的生活習慣而言，他斷不致突然間在三點多起床，床上運動後於四點鐘聽到槍聲。其在五點半起床，六點左右聽到東北軍進攻華清池的槍聲，應當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而蔣堯祥回南京後給上峰的書面報告則有這樣的說明。他寫道：「竊士（蔣堯祥自稱）與翁自勉爲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時至八時委座寢室外之衛兵。士守西門，翁自勉守東門，官長值班者竺侍衛官（培基）。當事變發生時，係六時二十五分左右。初聞汽車開動之聲，未幾拍拍之槍聲破空而起，士即出槍警戒，並即報告竺侍衛官及翁自勉。當奉竺侍衛官命令迅馳下面查看，急行抵貴妃池後面（即華清池櫃門外），即發現張部之衛隊七八名……」[52]。蔣堯祥這裡所說的時間與蔣介石有所不同，前後相差近一小時，相同者均在六點前後。由於蔣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槍聲驟起未必當時注意過時間，因此，蔣堯祥的記述應該更準確些。因蔣堯祥晨六時上崗，絕不可能提前半小時之多。至於說蔣上崗後是否一定是過了二十五分鐘聽到槍聲，則未必十分準確，重要的是他六點鐘上崗後不久即聽到槍聲，並親眼見到東北軍士兵衝入華清池院內。

另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從蔣介石和他的貼身侍衛蔣孝鎭事後的說明中證實事變多半發生於當日早六點左右，而不是凌晨四點鐘。因爲如前所述，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孝鎭均已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和蔣介石爬到驪山半山腰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從華清池後牆越出來至蔣藏身的半山腰有多遠？僅五百米左右。十二月的西安早晨何時開始晨光微熹？大約在七時半左右。即使是從驪山上遠望，相信也不能早於七時左右。那麼短的距離，又是逃命，試想，蔣與他的衛士有可能花了兩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才爬到那裡嗎？唯一可能的解釋就

是，事變發生時是早六點多，蔣與其衛士翻出後牆，花了大約一個小時爬到驪山半山腰，這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根據以上的分析，似不難斷定，西安事變的突然爆發，完全是在張學良、楊虎城預定的計劃和指揮之下實施的。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各部隊已經開始分別向預定目標運動之後，即凌晨五時左右，張學良首先用自己的雙臺[53]向中共中央通報了事變的消息，同時也進一步通知了劉鼎，劉鼎因此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也用自己的坤臺[54]向中共中央通報了此一消息[55]。之後，各部隊先後到達指定位置，並在清晨六點左右開始了突然的軍事行動。整個行動比較順利，除蔣介石一時走脫，其餘各處均很快按預定計劃完成任務。而至天明時分，蔣介石也被發現藏匿於驪山半山腰之草叢中，很快被帶回西安。整個事變發動的軍事行動因此而大功告成。除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蔣鼎文等國民黨中央軍政高級官員被扣押以外，僅蔣孝先、邵元冲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受傷，西安警察局長馬志超潛逃，蔣之衛士死亡二十多人，其餘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全部被繳械，西安城沒有更大的衝突。

二十世紀一場左右中國命運的重大事變就這樣拉開了它的帷幕。

第三節　戰耶和耶？

張學良和劉鼎十二日晨給中共中央電報，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時收到，如今還頗難具體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共中央一直到這一天晚上，仍舊在問張學良：「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這也就是說，因張學良扣蔣，整個西安城裡的軍民已經像開了鍋似的喧騰了一個白天之後，中共中央似乎還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眞的發生了這回事？

當然，中共中央還在中午以前就已經收到張學良和劉鼎的通報了。他們幾乎立即就此作出反應，一面於當天中午十二點將張學良的來電照轉共產國際書記處，一面迅速提出，應當把蔣介石與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領導人區別對待，爭取與那些具有抗日誠意的國民黨領導人達成政治軍事協議，並準備應付因此而出現的危險局面。中共中央爲此還給它在上海的談判代表潘漢年發出電報指示，明確要求：「不可將陳立夫、張冲、鄧文儀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誠意與蔣介石之無誠意混爲一談」，「須誠懇公開的建議於陳等，不可以民族國家之利益遷就蔣氏一人，應以一個大政黨的代表勇敢堅決地出而與另一個大政黨站在救國圖存共同反日反漢奸的立場，談判與簽訂政治軍事的協定」。特別是要「極力注意並準備抵抗中國漢奸勾結日本侵略滬、寧、青、濟及華北、西北」[56]。這兩封電報表明，中共中央當天白天並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經發生什麼。

問題僅僅在於這一切太讓人吃驚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竟很長時間難以相信，事情眞的會如此順利。他們一邊迅速就此做出反應，一邊卻不能不再三想辦法核實這一消息的準確性。而根據前此約定的聯絡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規定守聽西安電臺時間一日僅三次，西安方面守聽時間主要又只是在晨五時與晚九時。所以，直到當晚九時，中共中央才有機會再次與張學良通報，提出他們的疑問。同時提議：㈠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將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由紅軍擔任箝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務。㈡必須將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內，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緊急時應做斷然處置。㈢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協商大計。

當晚，中共中央收到了張學良關於事變情況的更確切的通報。張

學良同時特別詢問了葉劍英爲何還沒有到西安，並同意周恩來盡快到西安來。據此，中共中央於當晚二十四時正式通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稱：

A、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在西安。

B、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立即前去。

C、我們的計劃：㈠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織三人委員會，以葉劍英爲參謀長主持工作。㈡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準備半個月內召開會議。㈢組織抗日聯軍，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晉綏軍四支軍隊爲主，爭取陳誠領導的蔣系軍隊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進攻。㈣以林森、孫科、馮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陳立夫等暫時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親日派勾結日本進攻上海與南京，準備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㈤爭取蔣介石全部軍隊。

D、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㈠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㈡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㈢蘇聯積極援助中國。[57]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亦進一步向北方局通報了這一情況，並緊急提出更具體的工作方針，明確主張爭取南京及各地方實力派支持事變，揭發蔣介石的罪狀，以及爭取罷免蔣介石的宣傳任務。這包括：

㈠揭發蔣介石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衆與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擁護張、楊等之革命行動。

㈡號召人民起來，要求張、楊、南京及各實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會，在西安開會討論抗日救亡大計。

㈢號召人民及全國軍隊，積極注意日本與漢奸之行動，防止並準備抵抗他們乘機侵犯上海、南京、青島、華北與晉綏。

㈣推動南京及各地政權中之抗日派，響應西安起義，並嚴重對付親日派。

㈤穩定 CC 派、黃埔派，推動歐美派、元老派及各實力派，積極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㈥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人民審判。

㈦推動宋子文、孫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爭取英、美、法三國諒解與贊助。[58]

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領導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正式討論對於此一事變的估計與對策。毛澤東首先報告，肯定這一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和它的綱領都是積極的，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有歷史功績，應該擁護。毛澤東評價說：其實，蔣介石最近的立場嚴格說來還是中間性的，並非投降的或親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立場對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這樣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變已經發生，「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因此，目前我們應以西安爲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當然，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問題，需要考慮，但設法使東北軍、十七路軍不僅在政治上與我們一致，而且使他們在組織上與我們一致，這是要下功夫做的工作。但多半是由於在是否成立政府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會議上竟沒有具體提出關於組織所謂三人委員會和抗日聯軍的

問題。

要不要在西安成立政府的問題，在會議上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周恩來主張：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的形式，可以考慮在西安召開抗日救亡代表大會和成立抗日援綏委員會之類的組織，但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更爲有利。張聞天更明確強調：「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的組織，還是應當「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但必須改組南京政府。但張國燾卻提出：「我們說到要以西安爲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爲政權中心的意義」。西安事變的意義，「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在反蔣問題上對南京方面就應考慮一下，張學良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我們的態度亦須表示。再在反對獨裁上，亦要聯繫到南京政府存在問題」。「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討論的結果，會議沒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顯然，正如博古所說，國際指示全國抗日一定要爭取蔣介石部隊的大部甚至全部，我們現在不能變更這一策略，對西安事變，只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不好看成是反蔣的旗幟。但西安事變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蔣的意義呢？與會者對此認識不一。很明顯，張學良文寅電第一句就是：「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他是爲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慮對蔣採取行動的。這本身就包含著某種反對蔣介石個人的意味。而不論中共前此政策如何，既然蔣介石已經成爲階下囚，難道他還能重新成爲國家的領袖與軍隊的統帥？既然蔣介石是改組統一戰線政府的關鍵障礙，難道除了除掉蔣介石以外還有其他的解決辦法？進而言之，一旦除掉蔣介石，那麼取消了蔣介石地位的南京正統和南京中心是否還能存在？因此，毛澤東總結說：這一事變的處理，最後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蔣又不反蔣」，結果在政府

問題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話都不好說得太絕對了。無論如何，在堅持爭取南京及各派贊助西安事變的前提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這一方針是確定了[59]。

十三日中午十二時，中央軍委主席團正式向全軍發出關於西安事變情況的通告。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亦開始大力宣傳將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的主張，保安亦召開軍民幹部大會聲援西安義舉，聲討蔣介石的罪惡[60]。毛澤東與周恩來更聯名致電張學良，表示祝賀。他們提醒張學良，只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衆運動的基礎上，才有勝利可能；而迅速向全體官兵宣布蔣介石的罪狀，則是最緊急的任務之一。至於軍事上，當前最重要的是「劉峙指揮河南集團進占潼關極大可能，似宜提起楊虎臣（城）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關而堅拒之」[61]。毛澤東隨後還告訴張學良，周恩來一行二十人擬定於十六日趕到延安城外，請派飛機去延安接運，並告延安楊虎城部下負責保護。

但十二日晚，南京方面對西安事變作出強烈反應之後，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局面已經再難出現。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在當晚緊急召集的臨時聯席會議上，通過了兩項強硬的決議，決定「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而「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62]。與此同時，受命奪取洛陽的東北軍炮兵旅旅長黃永安早早就向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告了密，奉命向潼關運動抵抗中央軍推進的十七路軍之馮欽哉部也已開始秘密與中央軍接洽，準備倒向南京方面，以致中央軍樊崧甫部搶先進駐了隴海線的戰略要地潼關，內部之董釗師更進占了陝西之華陰，國民黨中央軍進入陝西之大門因此而洞開，加上何應欽強烈主戰，甘肅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軍又隨時可以從背後發動進攻，西安方面明顯地處於背腹受敵的不利態勢。張學良十四日專門向中共中央通報了此

一情況，說明孫蔚如部、馮欽哉部、董英斌部、劉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帶，王以哲部留平涼、固原，于學忠部集中蘭州，請紅軍主力監視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並準備派飛機前往延安專程迎接周恩來共商大計。

鑒於軍事情況頗爲緊急，中共中央十四日決定急變原先之提議，公開成立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統一軍事組織，以穩定西安方面之軍心，並切實做好迎戰之準備。爲此，中共中央再電張學良、楊虎城，開始明確提出組織抗日聯軍的問題，要求後者務必「將全部精力注意於集中與團結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上面來」，並且要警惕馮欽哉部之叛變。電報同時主張：

>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之組成，以張學良爲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東北軍編爲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第一集團軍，張學良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十七路軍編爲第二集團軍，楊虎城爲總司令；紅軍編爲第三集團軍，朱德爲總司令。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以三個集團軍高級將領爲委員，每集團軍三人至五人，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三人爲主席團，張爲主席，楊、朱爲副，統一軍事政治領導。以上組織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聯席會議名義向全軍全國宣布。此外，極力爭取閻錫山先生及全國其他愛國將領加入，推閻錫山先生爲全國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
>
> (二)目前軍事步驟：抗日援綏聯軍三部主力應集中於以西安、平涼爲中心之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內，由楊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張兄所部及弟部擔任野戰。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內到達西峰鎮，爾後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況決定；弟軍一部則在定、鹽、環箝制胡敵，另一部則在慶、甘箝制湯敵。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禦胡敵，于學忠部仍守蘭州。只要打得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戰局，即有若干失利，亦於大局無礙。[63]

當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提議野戰軍應速開西峰鎮，因爲「南京已發動大規模內戰，全力對付張、楊，主力由潼關進。」而「張、楊內部有許多不穩定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楊打張，紅軍與之靠攏，(可)壯其膽而振其氣」，同時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於對付胡宗南的進攻，一方面也便於就近應付西安方面的各種事變。

但鑒於此時國內各方面對西安事變的不良反應開始接踵而來，蘇聯方面也有不利於張學良之公開廣播，中共中央十五日又迅速改變了前一日的提議，決定一方面繼續在公開場合保持第三者姿態，呼籲並力爭和平解決事變，一方面嚴格隱蔽紅軍主力的作戰意圖，以達到攻其不備的目的。爲此，毛澤東十五日中午再度致電張學良，說明「昨電組織抗日聯軍，對外請暫勿發表，惟對內似宜宣布，以一軍心」。因國內多數不良反應目前均把事變歸結爲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於張學良解釋其發動事變的眞實原因，也不便於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張和平。爲了向外界表明共產黨之立場，中共中央一改十三日政治局會議關於不輕易發言的決定，公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於十五日發表通電，堅主停止內戰，要求南京方面「自別於蔣氏」，接受張、楊主張，聯合各黨各派組織統一戰線政府，「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64]，既是爲張學良、楊虎城撐腰，也是要藉此表明自己與西安事變之發動原本並無瓜葛。毛澤東等同時還致電陳立夫，要其從中斡旋，並向張學良提

議，可利用其前顧問端納來西安的機會，與南京方面接洽停戰。

如果以爲中共中央要求張學良暫勿發表關於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聯軍組織系統，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共十五日通電中的要求很明顯比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激烈得多。而毛澤東通過軍事手段來將事變進行到底的決心，無疑也比張學良、楊虎城要堅決得多。

張學良並不希望戰爭，共產黨也不希望戰爭，他們的目的說到底其實都是一個，即要「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能通過和平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何樂而不爲？但毛澤東其實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蔣介石，並且逼迫改組南京政府這一行動本身，無異於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因此它絕對不是當前在南京當權的那些人所能輕易接受的。如今事態的發展更進一步證明，不論張學良對蔣介石如何處置，在南京方面與張、楊之間沒有妥協的任何可能性，中央軍的大舉進攻不可避免，大規模的戰爭已經成爲一種必然。

十六日，就職討逆軍總司令的何應欽開始指揮大軍由潼關向西安迅速推進，中央軍的大批飛機開始輪番轟炸潼關至西安線上的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毀房上千，炸死軍民數以百計。至此，和與戰的前途已經明擺在那裡，不擊退中央軍的進攻，停戰與和平完全無望。因此，毛澤東這時考慮的其實並不是設法保持第三者地位的問題，而是如何通過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共同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方法來停止戰爭的問題。也正是因爲如此，毛澤東越想越覺得像張學良部署的那樣單純擺出一付被動挨打的架式不是辦法。根據紅軍的作戰經驗，不趕快打幾個勝仗，不設法使自己盡快轉入主動地位，本來就不穩定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勢必要被南京方面所分化，結果事變必然歸於失敗。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一邊提醒張學良加強和平攻勢，一邊又很明確地對張學良指出，只要蔣仍在人世，各方猶豫觀望不可避免，張對此應有足夠估計，不應因此而動搖，應「堅持到底，集結部隊，提高士氣，發動民衆，防止反動」，要「幹到底膽大些，要趕快消滅敵人」。故毛提議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取守勢，而「紅軍應以進攻防禦的姿勢打擊敵人」，強調只有蔣系軍隊被嚴重打擊後，國內各派才更好脅迫南京抗日。他主張：紅軍主力迂迴敵後直取鄭州甚至威迫南京。因此，就在紅軍將領發表所謂第三者通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卻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直電彭德懷等，明確提出：

> 決將西峰鎮集中計劃廢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徑迂迴至敵主力後之鄭州等地，並發展至直迫南京。在此總方針下，或渡兩道黃河直取鄭州一帶，或渡渭水下流，截擊潼關一帶。在某種必要時，也可渡涇水下游至邠乾一帶，有幾個戰略戰役之機動，因此改向延安集中。[illegible]

對於這種極其大膽的戰略設想，不僅張學良頗感猶豫，即使是彭德懷等中共軍事領導人也不十分贊成。彭德懷與任弼時很快覆電中央軍委，提出：我們目前戰略方針應迅速停止內戰，發動抗日戰爭，找機會爭取寧夏，鞏固蘭州，一部東出綏遠，與傅作義聯合抗日。若野戰軍立即「出河南取進攻姿勢，這樣可能延長內戰，失去固原、蘭州及陝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時間上來不及增援西安」。一旦胡宗南等對我實行南北夾擊，很可能隔斷我與蘇聯以及同西路軍之間的聯繫，使我無法取得外援。劉伯承這時也致電軍委，認爲目前不宜出河南，而應盡力掌握全甘肅，並以相當兵力乘黃河結冰期奪取相關之戰略要點，攻取寧夏，以援綏遠，接通外蒙[illegible]。對此，毛澤東明確解釋說：「無論

軍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須擊破敵之要害。敵之要害，不是寧夏或甘肅，而是河南與南京。敵已奉行大規模內戰，我們對戰爭是後發，不是先發。然在敵主力向西安進時，我軍應奉行大的戰略，迂迴並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如此才能使戰爭停止下來[67]。

毛澤東的這個以主力打出外線的大膽的戰爭設想，其實是他慣用的戰法和最重要的軍事思想之一。只是，這樣的設想在這時很難讓張學良所接受。張學良首先擔心的就是西安和蘭州的鞏固問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這時均已出現部隊倒戈的情況，部隊兵力已有不足，作戰能力也頗讓人擔心，紅軍主力一旦轉入外線，陝北必定形成眞空地帶，甘北王以哲部一部已抽調南下，剩下的三個師絕不可能獨力對付胡宗南和湯恩伯兩個中央軍主力，萬一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進一步發生倒戈或分化，西安的局面必定轉瞬間即變得不可收拾。那時外線的紅軍遠水救不得近火，必然成爲可望而不可及的力量。因此，張學良始終不認爲這是一個好辦法，仍舊堅持：「貴軍主力在環縣、預（豫）旺以北地區，一部在膚施、甘泉附近，對胡、毛、曾、湯等，不使其連絡，並極力向北壓迫，以掩護本軍後方之安全。」此點雖經毛再三解釋，說明：「弟認胡宗南、湯恩伯均不過一支隊，各以一部箝制之可也，敵之要害在南京與京漢、隴海線，若以二、三萬人之戰略迂迴部隊突擊京漢、隴海，取得決定勝利，則大局立起變化」，卻始終未能得到張學良的贊同[68]。直至周恩來到西安時，因南線軍事情況嚴峻，張之計劃才又有某些改變。

十七日下午，張學良派劉鼎乘坐他的飛機前往延安將周恩來等接到西安。雙方很快舉行了秘密會談。張學良首先向周恩來通報了當前的軍事形勢，據周轉報中共中央稱：「劉峙已以五個師入潼關，圍華縣，逼渭南，如急進，應戰無把握。張擬以楊部控制西安，東北軍主力集

渭水北備戰，決戰必須紅軍參加」。在東北軍方面，「劉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國兩個師需一週內方能集中，沈克師已開動，王以哲三個師留固原、平涼，擬壓迫沈久成師離會靜。十三師離咸陽經華陽趨漢中，十七路（軍）向西安潼關線集中。」張學良仍堅持，紅軍主力參加對胡宗南部作戰，一部接防延安、甘泉。但相信在胡宗南北退後，紅軍主力必須迅速南下出渭水下游北岸，側擊由潼關向西安推進之國民黨中央軍，參加決戰。兩人據此商定，紅軍主力仍先開慶陽、環縣一帶，一旦胡宗南部北退即南進，同時以至少一個軍的兵力接防延安、甘泉之線，並準備南下策應[69]。

根據張學良通報的近幾天與南京方面接洽的情況，周得知蔣介石的顧問，過去也做過張學良的顧問的英國人端納已於十四日飛來西安，其帶來宋美齡親筆信，內中有「寧抗日勿死敵手」的話[70]。據端納告訴張學良，他亦明確勸蔣不要過於堅持過去的主張，不妨與張、楊具體商談，求得一個比較有利於國家前途的解決方法[71]。多半因爲這些因素，蔣介石已同意下令讓南京方面暫時停止進攻和轟炸，以便雙方進行必要的接觸與商談。蔣鼎文受命於當天上午飛洛陽轉赴南京傳達蔣之手令，宋子文及于右任已答應明天來西安進行具體談判。雙方因此討論了與宋子文談判的條件問題，一致同意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上可以與南京達成協議。這些條件是：

㈠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㈡下令全國援綏抗敵。

㈢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㈣成立抗日聯軍。

㈤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衆，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

> 開籌備會。[72]

對於蔣介石的處置問題，無疑是一個相當敏感和棘手的問題。張學良自事變之日起，就反覆強調此次行動只是「暫請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妄加危害」，「我們這種舉動對蔣委員長是絕對無損的——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爲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73]。顯而易見，張學良在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與中共方面的罷免和公審的主張，是有不小的差距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張學良並非不了解，依蔣介石此時之地位、聲望與性格，要想依靠武力的強迫與威逼來達到勸說的目的，是未必有效的。因此，他也知道，答應保蔣安全，說到底也只是一種策略，並非就是他這次行動的目的。所以，當周恩來進一步轉達中共方面的意見之後，張學良並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雙方並就此達成一致認識，即：「爲緩和蔣系進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周恩來並且明確電告中共中央：他一再強調，一旦證明南京政府內親日派陰謀得逞，戰爭不可避免，就應當準備對蔣採取最後手段並下作戰決心。討論後，「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74]。

十八日，儘管蔣鼎文攜蔣令已經洛陽到達南京，中央軍劉峙部仍開始圍攻華縣，但東北軍士氣甚高，三個連守軍頂住了一個團的進攻，而東調的兩個師更是一晝夜趕百餘里馳援渭南，準備抵抗中央軍之進攻。加上蔣介石這時態度事實上也已遠非此前之強硬，在張反覆向蔣保證將設法送蔣回寧之後，蔣已多少改變態度，表示他可以將西北及

紅軍問題日後交張學良處理，並且同意派蔣鼎文持他的停戰手令前往南京，讓何應欽把進攻暫時停下來，因此張學良對於事態之發展似乎並不特別擔心。他甚至致電毛澤東，宣稱「此間諸事順利」，他對堅持到底已有相當信心。同樣，楊虎城這時也對事變的進展情況表示滿意。他雖因部分部隊不穩而焦慮，並不像張學良那樣對堅持下去充滿信心，但他對作戰反應積極，強調「開火可團結內部，失利可放棄西安，以甘（肅）爲後方」，仍可鞏固部隊。只不過，他這時已一反過去的猶疑態度，注意到借助中共根本改造其部隊的必要，要求中共派軍政幹部前來協助他作部隊的改造工作了。

然而，毛澤東遠不像張、楊那樣樂觀。十七日，中共中央已得到情報，楊虎城之馮欽哉部密派其副師長到華陰見中央軍二十八師師長董釗，表明效忠南京，待命討逆之意。毛澤東當即通報了張學良。十七路軍的不穩，使毛澤東對東線的防務要遠比西線擔心得多。故在十八日晚，毛澤東再度提出的紅軍第一步至西峰鎮，第二步出涇川、長武，以便於保持戰略機動，而後或出河南、或出長安，或進行抵禦胡宗南的作戰的建議，可張學良、楊虎城與周恩來連夜討論決定：第一步驟，仍以張、楊兩軍主力迅速集中於渭河下游，東擊劉敵，以一小部協同紅軍伺機打擊胡宗南，以一小部監視天水、漢中之敵；第二步驟，如打胡宗南得勝，或胡敵退寧夏，則迅速集中張、楊與紅軍主力於渭水下游與劉敵決戰。爲防不測，西安方面目前即須開始武裝民衆，部署守城事宜。同時還應做好西安不守時的後撤工作，張學良主張讓開隴海路以西北爲後方，楊虎城主張西撤甘肅，堅守西蘭大道。周恩來提議，張、楊兩部以蘭州、平涼、西峰、洛川一帶爲後方，紅軍守慶陽、合水、膚施、甘泉、鄜縣、宜川、延長，張、楊表示可以考慮。依據十八日晚的討論結果，張學良於十九日正式向東北軍、十七路和

紅軍下達命令如下：

一、據報胡、關、曾、毛等軍有進出天水、寶鷄一帶威脅西安企圖。

二、聯軍爲鞏固後方予敵以大打擊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除令十七路軍一旅附騎團警備鳳縣、寶鷄、隴縣固守外，著五十一軍抽二師駐定西連繫王（以哲）軍相機擊破胡敵；

乙、六十七軍以主力守固原、平涼，與于（學忠）軍連繫，協擊胡敵；

丙：紅軍仍竭力抑留敵人，如敵南侵跟踪追擊，則相機殲滅之。[75]

張學良同時提議，黃河西岸的紅軍應暫時停止西去新疆，而以一部東出靖遠威脅胡敵，並協同河東各軍側擊胡敵，並可接近蘭州與東北軍打通，張可以從于學忠處撥彈藥以援助西路軍，同時派一騎兵團向靖遠游擊與之配合。

顯然，毛澤東這時仍舊相信紅軍首先東出更爲機動有利。十九日，毛澤東一面以軍委主席團名義命令紅軍主力分數路縱隊取直徑南下，限十天內趕到涇川、長武，二十天內趕到西安，首先參加東線對劉峙作戰，取得勝利後再西打胡宗南，一面接連數電給周恩來，要周進一步向張學良說明紅軍首先東進之必要。毛電稱：「目前時局正在發展，一方面（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南京右派）極力製造內戰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中國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國際和平國家）正在結合，反對內戰，擁護抗日」。蘇維埃共產黨目前

的方針是迅速召集和平會議，爲反對內戰，團結抗日而鬥爭，西安友軍亦應本此共同之方針而努力。「堅決消滅進攻之敵爲執行此總方針之重要手段」，故「紅軍決向西安集中配合張、楊首先消滅東來之敵」。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堅守渭南、臨潼、西安線二十天，紅軍必可趕到，參加決戰，擊破東線之敵，如此則西敵不成問題矣。因西線胡、毛、曾、關各部準備集中天水，此舉將空出甘北，對聯軍方面並無不利。且胡宗南從海原轉至天水須時一月，到後必疲勞而不能馬上投入大規模作戰，有王以哲三個師和紅軍一部扭打不難暫時阻敵前進。而特別重要的是，紅軍盡快東進不僅是要配合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消滅進攻之敵，而且是要迅速穩定十七路軍，因馮欽哉倒戈後指望十七路軍頑強抵抗東來之敵確有嚴重問題，故目前「爭取十七路全部穩定於抗日反內戰立場是當前重要一著」。但當周恩來同一天將張學良的命令電告中共中央後，毛澤東還是決定尊重張學良的意見，不再堅持自己的看法，於二十日覆電表示同意，稱「紅軍主力第一步集結慶陽，如胡宗南南下則決消滅之，王以哲軍應固守固原、西峰」。隨後，毛澤東復以軍委主席團名義，再度下令紅軍主力遵照張學良命令行動。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同時在甘北的紅軍主力也據此開始集中慶陽、環縣一帶，準備協同王以哲軍打擊胡宗南。可是，二十日，華縣失守，三個連的東北軍盡遭槍殺，南京方面並沒有切實按照蔣介石的停戰令實行停戰，此舉使張學良頗受震動，並且開始意識到東線防務確較西線更爲危險，故應接受毛澤東十九日提議的先東後西的作戰計劃。二十二日，張學良明確向周恩來提出改變前此計劃，誘敵深入，首先進行東線決戰的建議。經討論後，雙方共同決定：除紅軍以一部尾隨胡敵牽制其行動外，紅軍主力全部由慶陽、西峰經正寧、邠縣在咸陽過河轉到藍田、商縣以南地域，在此期間，東北軍和十七

路軍盡力遲阻劉敵於臨潼、渭南，等東北軍主力集中，紅軍到達指定位置後，即與東來之敵進行決戰。張明確提出：此役之「決定關鍵在紅軍」，紅軍務必盡快於十天內集中長武、邠縣，再十天趕到咸陽、興平補充被服、子彈。周恩來據此電告毛澤東：「此間力求堅守渭南、臨潼線，待紅軍來會戰」[76]。毛澤東得電後，於二十二日迅速覆電周恩來，說明：紅軍正向南急進，二十天內準可集中咸陽，羅炳輝、蕭勁光、謝嵩三部箝制胡宗南，必要時宋時輪亦加入[77]。

至此，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聯合對國民黨中央軍作戰的局面迅速形成。因西安事變而引起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似乎不可避免了。

第四節　孰進孰退?

關於張學良扣蔣初衷及其在謀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在事後曾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十二月十四日「日記」中記述的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了。據蔣說，當日晨張學良涙流滿面而來，半晌無語，自行退去。正午又來，再流涙稱：

> 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太簡默，如余以身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78]

按照蔣介石的這一說法，張學良自事變之次日，即十三日就已經讀過蔣介石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在秘密準備抗日，因而開始悔悟，決心全力保護蔣介石並千方百計要將蔣安全送回南京。由此，又衍生出這樣一些說法，比如張學良一再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與楊虎城不同；張學良當時主和，楊虎城主戰；張學良竭力保蔣安全，楊虎城堅持扣蔣甚至試圖對蔣不利[79]。

蔣介石事變前所記關於秘密準備抗日的日記內容如何，迄今未見其詳；而上文所說之「重要文件」，亦僅見於個別人之回憶，且不明究竟[80]。此等說法雖有張學良五十年代發表之〈西安事變懺悔錄〉等可爲參照，但因蔣、張兩文均係事後在特殊背景下所作，且曾由專人協助整理，不免有某些人爲加工修飾之可能，未必可以全然以爲第一手的史實根據。況且，縱使眞有蔣介石準備抗日之日記及相關之文件存在，其對張學良思想觸動如何，亦值得懷疑。這是因爲，其一，還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81]，張學良不會不知道。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有關於「最後關頭」的報告，張學良回西安後曾因此動搖過反蔣決心[82]，這說明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情況張學良其實完全了解，不大可能因讀了蔣準備抗日的日記而有突然間感動得涙流滿面。其二，如前所述，蔣介石關於實行抗日行動的「最後關頭」，和他自信所能達到的抗日目標，都是以現實國力所能允許的範圍爲基礎的，因此，張學良固然知道蔣介石有抗日要求與決心，但他更清楚依靠蔣介石所準備的抗日行動，並不能滿足東北軍和東北人關於收復失地，重返東北的強烈願望。在這方面

兩個人之間觀念上理想上存在的差距，遠不是蔣介石決心抗日與否所能彌補的。其三，即使搜查中得到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日記與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樣也得到了蔣介石寫給邵力子的那封密謀驅使張學良部南調的親筆信，該信表明，不論蔣是否有過一個準備抗日的軍事計劃，張學良的東北軍事實上也不受信任，不僅一時不會被派上用場，而且很可能越調離抗日前線越遠[83]。

其實，說張學良自事變第三天就因為看到蔣介石的日記等轉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問題上錯怪了蔣，以致與楊在和戰及對蔣問題上態度衝突，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第一手的文獻史料所記述的情況是完全矛盾的。至於說張學良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之間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十七日周恩來等來到西安，態度「又突趨強硬」[84]，更是離事實甚遠。根據第一手的文獻史料，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張學良絕不是那種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魯莽到完全不計後果的人。同樣，我們也可以很肯定地說，張學良在整個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也不曾有過所謂猶豫動搖，以至對自己的行為悔悟自責，痛不欲生的情況。張學良自始至終都很清楚，其扣蔣行動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做了最壞的打算，這既包括積極準備為自衛而戰，也包括準備不得已時對蔣「取最後手段」，甚至「自殺」，或「入山為匪」[85]。

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我們在這裡不得不將張學良從十二日事變爆發之初至二十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戰與對蔣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眞實的記錄，相信要比那些事後整理過的和幾十年後的回憶更加可信和可靠。

十二日晨，在張學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他就明確宣稱蔣介石是「反革命」，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首先

打擊胡宗南[86]。

同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衆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於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故「為國家計，為民族計，不得不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87]。

十三日下午五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鎭壓愛國運動，強調「這次舉動，對於國家民族將要發生什麼影響，我們眞是再三再三地考慮，假如無便於國家民族，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幹，反過來說，我們一定要幹！」「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88]

十四日晚八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臺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89]

十五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同樣，「精誠團結，固為必要，但必須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團結」。相反，若「政

府拂乎民意，壓迫群情，必難存在」。因此，此一事變「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衆之覺悟如何。如大衆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國之理」[●]。

十六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說明自己與蔣介石「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爲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爲（所）樂爲」。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

十七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覆電程潛等，仍堅持認爲他們只是「不忍見國家之地致覆滅，萬不得已，始有文日之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爲身謀」。至於放蔣，除非蔣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尙難辦到」。不僅如此，張學良第一次公開表示贊同容共之論，並且開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提議，當內戰爆發，西安被圍時，對蔣「取最後手段」[●]。

十八日，張學良覆電孔祥熙、何應欽等，強調：「救亡無方，空言商洽，非弟本意」，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尙待商榷」。張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

十九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說：「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諸度外。爲自衛計，爲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南京既然早已敵視此間，不惜國家與民命，「弟等雖惜，亦復何用！」「如中央必欲造成內戰，弟等亦惟有起而自衛」[●]。

二十日，張、楊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更是下定

破釜沈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故一面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爲名行欺騙之實，一面號召兩軍將士準備決一死戰。書稱，綏遠抗戰，中央只派出兩個師，閻錫山要求調二十萬大軍援綏，中央答覆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在綏遠的抗戰中，中國飛機半架也沒有，據中央說是天氣太冷，而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轟炸，再不管天氣冷不冷了。「這是抗日嗎？這是眞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四省，察北六縣，我們的冀東二十二縣，什麼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張、楊更批評蔣介石的準備抗日論，稱這是自欺欺人，我們準備到五分，日本已準備到十分了，況且他們也不允許我們準備，必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種各樣的枷鎖把我們束縛得死死的，教我們動彈不得，我們如何能夠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來準備？張、楊明確認爲，西安事變的行動正是因爲他們不信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騙，至少也是敷衍民衆的一種手段，所以才以極大的熱誠勸蔣委員長變更他的錯誤政策」，以至不得不武力制止之。我們這樣做，「目的在對外，絕對不造成內戰，並且極力避免內戰，但是如果有違反民意的漢奸，用武力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爲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這不是我們造成內戰，而是實行抗日救國的清道工作」[●]。

在以上所列各種電報和講話之中，我們完全看不出張學良有過任何退縮的表示。不僅周恩來到西安之後其態度日趨強硬，就是在周恩來到西安之前，張的態度也是同樣的堅定。僅以張學良十四日晚在廣播電臺的強硬表示與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所記張十四日中午痛不

欲生的悔悟談話相比較，就不難讓人對蔣介石事後的說法產生嚴重的疑問。事情很清楚，在十四日晚上張學良的公開講演中，我們不僅完全看不到蔣介石後來所說那種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對張學良始終強調的絕對保證蔣介石個人安全的問題上，其態度也是不那麼確定的。張學良在講演中含蓄地表示，無論是對整個事變之解決，或是最關鍵的處置蔣的問題，他都主張「一切辦法，決諸公論」。至於對可能到來的戰爭，張學良這時的態度更是再明白不過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張將不惜視之為「全國之公敵」而與其「誓死周旋」。換言之，張將不再承認其為正統，而必欲將此全國公敵推倒之。試問，說張學良在十四日中午對蔣痛哭流涕，悔悟自新，當晚又對全國民衆慷慨激昂地公開宣告，決心與敢於褫奪其權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準備將蔣之命運「決諸公論」，這是否能讓人信服呢？再對照張、楊二十日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其為達到事變目的，不惜以戰爭為抗日「清道」的態度，與其十四日之態度事實上不是如出一轍嗎？有什麼理由說，張學良曾經因讀蔣介石的日記或文件改變過自己的主張？又有什麼根據說，張學良曾經在事變過程中有過明顯的動搖和悔悟？

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正如張學良自己所說，他所爭的是政治主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慮」，正是因為他堅信此舉對國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決心「一定要幹！」因此，他既不是魯莽行事，也不會輕易放棄。主張實現，捐七尺之軀亦在所不惜；若主張不能實現，縱使因此爆發內戰，對蔣「行最後手段」，戰敗「自殺」、「入山為匪」，也義無反顧。認為張學良在事變過程中並無固定的政治主張，因而事變後因情勢與想像不同而左右搖擺，是完全說不通的。

張學良想要實現的抗日主張和行動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一點，我

們不難在張、楊事變當日向各方的公開通電中看到其究竟。該公告除了強烈批評蔣介石的誤國政策以外，特別提出了如下八項政治主張：

㈠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㈡停止一切內戰。
㈢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㈣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㈤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㈥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㈦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㈧立即召開救國會議。[illegible]

用不著具體解釋上述主張的政治含義。這些主張事實上正是近一年來共產黨人一直在積極爭取和要求的。它的目的已不僅僅局限於一般的抗日要求，而帶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廢止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聯俄聯共等項重大政治革新的內容。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學良在很大程度上把蔣介石稱之為「反革命」，並且在內部從不把西安事變稱為「兵諫」，而是稱之為「革命」的原因。聯繫到張早就在考慮是共產主義救中國，還是法西斯主義救中國這樣的大問題[illegible]，願意了解並加入共產黨，可知張在政治上這時事實上已經把共產黨的主張同樣地看成自己的主張了。也就是說，張學良提出或者同意這樣一些要求，既非心血來潮，一時興起，也並非是為了爭取蘇聯同情，單純地以此來標榜自己。張學良顯然相信，蔣介石國民黨的那些辦法已經行不通了，法西斯主義的辦法更不是前途，相反，目前不僅是要抗日，而且還要救國，不論是要抗日，還是要救國，歸根到底

都必須實行這樣一些根本性的政治變革。而這些政治改革之所以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張學良已經清楚地看出，僅僅指望或者逼迫蔣介石來領導抗日，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試想，依蔣介石那樣在內心深處就把東北地區看成是「域外之地」，非今日國力所能及，「我們的東北四省……什麼時候才收復回來?」縱使蔣一時答應迅速開始抗日部署，也「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因此，要想徹底抗日，要想貫徹收復東北四省的抗日決心與行動，張學良非依靠政治上的變革不可，非根本改造充斥著親日派和妥協勢力的南京政府不可，非將中央政府置於全國各抗日黨派團體的革命監督之下不可。這也就是爲什麼張學良在事變中始終堅持改組政府等政治主張，並且堅持不達目的不止。因爲他確信，放棄這些主張，收復東北必將是一句空話。

當然，正因爲這些具有重大革新意義的政治主張是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過去統治方式的相當程度的否定，因此張學良也不能不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準備著與頑固堅持既定方針，不惜以武力貫徹其方針的南京政府當權派拼個魚死網破。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聯繫自然更加緊密，他對蘇聯同情和援助的期望值自然也就更高。

張學良十分清楚，事變的成功解決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結爲軍事同盟；第二、蘇聯的同情與援助；第三，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張，或者衆多地方實力派同情並贊助其主張。沒有中共和紅軍的參加與合作，事變雖可發動，卻無論如何不能支持下去。這不僅因爲作爲缺少政治鬥爭經驗的軍人，張學良自知「良部及楊部之無能」，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難免「彷徨束手，問策無人」[15]，而且因爲他清楚地了解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遠不及紅軍能征善戰，且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之鞏固，也需要有紅軍作爲核心骨幹加以支撐。若沒有紅軍的積極參與，一旦南京中央軍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不要說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軍事上將難以抵抗，內部鞏固上恐怕也很難不走上兩廣事變的覆轍。況且，在中共與紅軍同情與支持的背後，更重要的還關係著蘇聯的同情與援助問題。沒有中共與紅軍的同情與參加，自然也就談不上蘇聯的同情與援助。而沒有蘇聯的同情與援助，國內各實力派勢必會借鑒兩廣事變的教訓，置身事外，甚至乾脆站在南京正統一邊，反其道而行之，陷張學良於不義。如此則事變必將陷入長期僵持甚至長期戰爭的局面，結果必難成功。即使是退一萬步，蔣介石屈服於武力壓迫，南京方面也迅速妥協，若此舉不能取得蘇聯信任，中國的抗日，特別是東北的收復，也仍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至於蔣介石與南京政府的屈服與衆多地方實力派的同情，卻是兩者居一即可的事。若蔣與南京屈服，自然大功告成，一切順利。縱使蔣不屈服，南京公然斥諸武力，若有衆多地方實力派取中立甚至同情立場，有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和蘇聯的暗中援助，西安等重要戰略城市和交通要道雖然開始時可能不守，但在除掉蔣介石以後，政治上軍事上群龍無首的南京方面未必能夠在軍事上占到什麼便宜。這也是可以預料的。

問題是，在上述三個致勝條件上，張學良最初占了幾個呢?

中共與紅軍的支持是確定無疑的。蘇聯方面的態度，張最初顯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開反應強烈，各地方實力派也頗不贊成扣蔣行動，這多少也在張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非降非合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南京除「親日派」外，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張調和，其內部之分化已顯而易見[illegible]。如此算來，在上述三條件中，張學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蘇聯且爲未知數，地方實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區別，事實上並非眞的就支持南京「親日派」之強硬立場，

因此，當周恩來到達西安之際，張學良的估計相當樂觀，相信「此間諸事順利」，唯一希望的就是盡快得到蘇聯的消息了。一旦蘇聯暗中同情並支持，實際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的確，蘇聯的態度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前途將有最爲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張學良這時自然格外關心蘇聯方面對他的「革命」義舉反應如何。他不僅親自打電報詢問毛澤東：「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乞告。」並且在周恩來至西安後，更反覆說明，他極願聽中共中央的意見，「尤願知國際意見」[100]。

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如何，這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蘇聯《眞理報》十二月十四日指責張學良利用抗日名目製造分裂的社論，早已盡人皆知[101]。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十二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電報指示的內容也已經公諸於衆。可是問題在於，中共中央究竟什麼時候得到來自蘇聯的指示，而張學良對於蘇聯的態度又有什麼樣的反應？時至今日，這兩個問題仍舊沒有眞正得到解決。

中共中央究竟什麼時候得到來自蘇聯的指示呢？關於這個問題，人們的疑問其實主要只是集中在中共中央是否較早地收到過一封斯大林的電報指示的問題上。有關這封電報指示的情況，最流行的傳說有兩個。一個有關斯大林電報的傳說來自於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一本一九五七年發表的《紅色中華散記》。其中介紹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與宋慶齡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得知宋慶齡在西安事變時「曾轉送過斯大林給毛澤東的那份電報，電報聲稱，中共必須運用他們的影響釋放蔣，否則莫斯科將把他們譴責爲『土匪』，向全世界公開批判」，並與他們斷絕關係。一些著作顯然認爲，宋慶齡曾經利用她的電臺向陝北的中共中央「轉發」過斯大林的這封電報[102]。

要證明這個傳說的不確切應該說並不十分困難。這是因爲，斯諾之所以相信斯大林通過宋慶齡轉送電報指示一說，是因爲他不了解中共中央當時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有著直接的電報聯繫。否則的話，斯諾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釋，斯大林爲什麼要捨近求遠，不通過他們與中共中央的直接電臺來發布命令，而要轉經遠在上海的宋慶齡來向中共中央送交這一高度秘密的政治指示？很顯然，包括斯諾在內，凡相信此說者在這裡都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是不了解中共中央與蘇聯有著直接的通訊聯絡，完全沒有必要捨近求遠；其二是誤以爲宋慶齡這時與中共中央保持著秘密的電訊聯繫，因而相信斯大林這時除了採取這種方式向中共中央傳送指示以外，沒有再快的途徑了。可實際上，宋慶齡這時與中共中央並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絡。

中共中央早期或許曾經試圖與宋慶齡的電臺建立通訊聯繫，但由於中共中央和宋慶齡的電臺功率均不大，這樣的聯繫始終未曾建立起來。當時中共中央駐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馮雪峰）自五月到上海開始工作以後，始終要靠寫信向陝北中央報告工作情況。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潘漢年自十月到上海開始與國民黨接觸並談判以來，也始終在爲不能及時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絡而苦惱和焦慮。當時潘在上海與中共中央進行聯絡只有兩條途徑，一是靠張學良設在上海公館裡的電臺，一是靠國民黨爲便利其談判而提供的一個專用電臺。前者需要中經西安張學良的電臺轉發，但遇張學良不在時，電臺即不能使用，聯絡十分不便；後者雖因功率較大，可直發中共中央，卻很容易洩露秘密，潘漢年急於匯報談判策略及工作情況，每每願意使用這一電臺通報，以致十二月上旬中共中央曾幾度嚴令其停止用國民黨電臺報告「家事」。顯然，如果當時存在著一個自己可用的電臺，如宋慶齡的電臺可以與陝北中共中央直接通報，自然不會出現這許多困難與麻煩。因爲這時李允生和潘漢年都與宋慶齡有著十分密切的工作關係。也正是因

爲不存在這樣的電訊聯繫，因此，中共上海組織一直在千方百計地建立工作電臺。可見，此電臺雖經在上海的外國友人協助建立起來，並從九月以後即開始調試，卻因陝北電臺電力太弱，根本叫不通，因此在西安事變之前未能發揮作用[103]。既然宋慶齡這時與中共中央並無直接的電報聯繫，所謂斯大林打電報給宋慶齡令其轉發陝北的說法自然不可信。

其實，只要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稍具常識者都可看出，所謂斯大林通過宋慶齡轉電中共中央的說法在邏輯上全然不通。斯大林這時何許人？堂堂蘇聯黨、蘇聯國家，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領袖，試想，以斯大林的身分，這時如何會親自打電報給一個中國的秘密黨員。儘管，宋慶齡是由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發展入黨的，但宋慶齡從來也只與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發生關係，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及共產國際遠東局上海機關被破壞的情況下，個別時候出面爲共產國際做些工作[104]。宋慶齡即使有幸得到來自莫斯科的電報，也只能是共產國際有關部門負責人的電報，而不可能是斯大林本人的電報。事實上，斯大林親自打電報給中共的情況，只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後才開始出現。但那已經是到了在共產國際早已解散，而季米特洛夫也已經離開，再沒有人有資格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直接通電的時候了。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情況下，不論是在一九三六年，還是在以後，莫斯科發給中共的指示，從來都是以執委會書記處的名義，或者以負責中國問題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個人的名義發來的。說斯大林這時會破例親自給宋慶齡發電報，完全不可想像。

再者，宋慶齡這時雖爲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並有電臺，但她畢竟還不是中共正式黨員，與中共中央沒有直接的組織上的聯繫。而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久，並且仍在與莫斯科保持聯繫的中共中央代表

潘漢年卻正在上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共產國際有電報給宋慶齡，說明莫斯科的意見，宋慶齡也必然要首先告訴潘漢年，可是在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間潘漢年並沒有向陝北中央轉述這樣的電報內容。更重要的是，潘直到十六日之後才有電報談到此事，而他所用的電臺卻是國民黨的，並非宋慶齡的。由此可知，並不存在宋慶齡轉發斯大林電報一事，即使有過共產國際給宋慶齡來電的情況，也絕不會是在事變發生後的最初兩三天裡，多半不會早於潘漢年給中共中央去電的時間[105]。

另一個傳說見於當時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的回憶中，據張國燾回憶：

>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內容分爲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裡，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爲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106]

張國燾聲稱，據後來王明回來說，這封電報正是斯大林本人草擬

的。

在這裡應當明確指出的是，根據有關的檔案文獻記載和近年來一些研究者的具體考證[107]，多半可以肯定，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中共中央沒有收到共產國際或斯大林關於西安事變問題的任何一份電報指示。

根據一，張學良於十二月十七日曾專門致電毛澤東，詢問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張學良在這一天以及第二天上午與周恩來的談話中也再度提到希望盡快了解蘇聯的態度。毛澤東十七日回電曾明確告訴張學良，蘇聯方面尚無電報到來。電稱：

> 我們對遠方（即指蘇聯——引者注）政府已作幾個報告，尚無回報。兄令劉鼎將每日民衆運動情形電告一次，若遠方知此次事變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民衆聯繫的，估計當寄以同情。惟遠方政府目前爲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108]

周恩來十八日也就此致電中共中央，說明他已告訴張學良還不知蘇聯意見，並請中共中央得到蘇聯回電後立即電告。周電稱：

> 宜極願知我們意見，尤願知國際意見，彼衷心甚慮因此內戰綿延，有礙抗戰。我已明告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漢奸硬要挑起內戰，我們只有在堅決防禦堅持抗日動員，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戰，並連接到抗戰上去。……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109]

考慮到三天以後中共中央在得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之後，立即向張學良作了轉達，有理由相信，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時的說法是確實的，即中共中央至少在十七日還沒有收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有關電報指示。

根據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直至十六日才就西安事變發出專門的電報指示，從電報第一句「作爲對你們來電的答覆」的表述中，不難判斷這確是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幾個報告的第一份電報指示。但此電以及另外一封差不多同時發來的電報卻沒有能夠被譯出來。中共中央十八日曾就此給共產國際發電稱：接連兩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

如何看待中共中央十八日的電報，在一些研究者中顯然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有人懷疑，是否眞的存在電報譯不出來的情況？是不是毛澤東，因爲自己前此對策與蘇聯不同，因而有意利用這一點搞了一個「時間差」？其實只要多少了解一些當時中共中央內部分工的情況和電訊方面的情況，就能夠看出這種懷疑是缺少根據的。

就當時的中共中央內部分工來說，需要弄清楚的是，黨的總負責人還是留蘇學生出身的張聞天，而非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也是由張聞天負責的。況且，這個時期也不存在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發生意見分歧的情況，這一點與四十年代以後毛澤東因爲與共產國際發生意見分歧，不得不嚴格控制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聯聯絡電臺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這個時候絕不可能出現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被個別人扣押起來而拖延向政治局傳達的事情。而事實上，從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十六日來電後一連幾天沒有對其政策進行重大改變的情況也可以看出，並沒有人在這裡利用所謂的「時間差」來表明自己的正確。

至於這個時候的電訊工作，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在整個一九三六年，從已知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共這時的電訊工作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困難和問題。這是因爲，電訊聯絡，在這時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工作。無論是電臺的選擇、使用、維修、零配件的購置補配，還是發報、接收，譯電，等等，沒有一項不需要一定程度的專門知識與技能。但當時的中共和紅軍，電臺多半都是從國民黨軍隊中繳獲來的，型號不一，大小不一，電池以及各種零配件補配困難，從而造成電臺使用上經常出現問題。而中共的電訊人員，除極個別在蘇聯或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時受過專門培訓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半路出家，文化水平也較低，因此錯發錯譯，搞亂電碼之事時有發生。再加上當時使用的電臺一般功率較小，其電臺多半又都是靠柴油發電，故而一旦天陰下雪（雨）或油料告罄，電臺聯絡往往即告中斷。因此種種，在電訊聯絡方面，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包括接收環節配合不當，以及收電或譯文混亂不清的情況，在這時的國內電報聯絡中可以說經常出現。一般說來，這時的國際電訊聯絡工作，因爲中共中央較爲重視配備人員較強，因此錯誤率相對要少一些，但也並非不出問題。更何況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絡方面，除了存在與國內通訊幾乎同樣的問題以外，還存在著密碼種類過多（林育英、閻紅彥、劉長勝、潘漢年均帶回密碼），使用上容易出錯的情況。七月間，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即因電臺缺油而一度中斷。雙方自六月直接通電之後，其間已知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個別電文因不知用哪個密碼翻譯一時譯不出來，和個別電報譯文中許多字譯不清楚的情況。因此，共產國際十二月十六日來電偶然出現搞亂電碼和譯不出來的情況，應當是可信的[110]。

根據三，中共中央十九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度討論對於西

安事變的方針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講：「國際指示還未到」，因此新擬定的公開通電等暫時還不能發，要等兩天再說。二十日，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重新發來的電報指示，二十一日覆電後者稱：「來電於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採取了這種方針」[111]。這裡，「來電於二十日才收到」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正式收到共產國際電報指示的日期。

當然，中共中央在十二月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並不意味著它對西安事變的方針在此之前沒有變化，或者這種變化沒有受到過蘇聯態度的影響。據說，中共在陝北能夠接收到蘇聯政府的電臺廣播，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它應當能夠得知十二月十四日以後蘇聯《眞理報》發動的對西安事變的嚴厲指責。不過，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已經知道了來自蘇聯的這種批評。我們目前看到只是十七日中共中央收到的潘漢年利用國民黨電臺發來的一封電報，其中譯介了莫斯科《眞理報》和《消息報》十四日和十五日的兩篇指責西安事變和張學良行爲的社論。另外，潘漢年在隨後的一封電報中也明確提出：中共中央對事變的態度應保持愼重，切勿採取與張、楊同樣之行動。因此，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中央至少十七日已經得知蘇聯報刊的評論。只是，中共中央這時還懷疑這只是蘇聯外交上的一種需要罷了，未必是其眞實意圖。因此，在當天毛澤東回覆張學良的電報中，顯然不是毫無目的地通知張學良說：「惟遠方政府目前爲應付外交，或尙不能公開贊助我們」[112]。

但中共中央更清楚地了解或者說更清楚地理解蘇聯態度的日子，看來還應當再錯後一至兩天。這是因爲，中共中央在十八日給國民黨中央的通電，事實上仍站在張學良、楊虎城的立場說話，通電中雖然已經開始承認可以保蔣安全，恢復其自由，前提卻仍舊是必須「召集

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並且仍不願承認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強調「不願以蔣氏一人而致中華民族以萬劫不復的病患」[113]。而在二十日之後，中共中央的通電則明顯地站在第三者立場說話，向西安和南京，雙方提出建議，而其建議也不再爲保蔣安全問題設置前提條件了，甚至張、楊所提議的改組南京政府、召集救國會議、釋放一切政治犯等項條件也不再提了，建議的主旨只希望南京政府能夠同意停止進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會議，來討論抗日救亡及蔣先生的處置問題[114]。這兩個通電在落款時間上其實只差一天，但其要求相差之大，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爲什麼這兩個通電的內容會有如此明顯的差別？這裡的原因不難判斷，那是因爲，十八日晚和十九日白天，南京政府已經在通過電臺反覆廣播蘇聯《眞理報》嚴厲指責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社論。這個廣播，不僅陝北中共中央聽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聽到了，就連地處甘北前線的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也都聽到了。周恩來當天即打電報給中共中央，特別提到了這件事，電報稱：「聞《眞理報》批評西安事變無形中幫助日本侵略之發展」。同樣，在中共中央當天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也明確提到了這一消息，說：「蘇聯《眞理報》兩次的評論，對西安事變認爲等於兩廣事變一樣」。二十日，彭德懷、任弼時也來電報詢問：「南京新聞謂《眞理報》載西安事件是挑撥內戰之煙幕彈，將來利於日本進攻，張學良之舉動乃投機行爲云。中央對西安事件意義及前途估計請詳告，張之扣蔣乃逼不得已之行動，應告國際」[115]。由上述情況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此之前還並不是十分清楚莫斯科的反應與態度的。

多半正是因爲有了南京政府新聞社的廣播，中共中央於十九日當天緊急召開了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了對於西安事變的方針問題。討論中，與會者一致同意，事變發生後沒有估計到南京方面以及各地方實力派中會「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以致形成一個擁蔣潮流，使大規模內戰的前途空前嚴重。鑒於此，張聞天明確認爲前此的方針有問題，指出：「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而當毛澤東批評蘇聯對事變的態度，宣稱：「日本說蘇聯造成，蘇聯說日本造成，雙方對於事變的實質都有抹煞」時，張則認爲：「對蘇聯的輿論應該解釋的，蘇聯因爲日本的造謠，只能這樣說，同時蘇聯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與南京對立，這樣的輿論自然對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礙的」。儘管，我們自己不能採取這樣的態度，但我們今後的做法在實質上還是要與蘇聯相一致。

應當指出的是，十九日會議較之十三日會議在兩個重要問題上取得了進展，一個是否定了任何反蔣的可能性，承認對蔣生命安全的任何明顯的威脅都只能造成嚴重的內戰前途；另一個是明確否定了在西安成立政府的任何設想，承認任何否定南京正統的作法也必然地要使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當然，關於如何結束內戰危險問題，會議上仍未能夠找到行之有效的具體辦法。毛澤東總結說，變國內戰爭爲抗日戰爭有兩種方法，一是文章調停，一是武裝調停，內中是很複雜的，要轉很多彎子的。特別是在南京和西安兩方面，我們固然應當爭取南京，但更要爭取西安。言外之意，不論蘇聯態度如何，一旦在南京和西安兩者之間出現無法調解的衝突時，共產黨事實上仍舊要站在西安一邊，甚至不惜用武裝調停的辦法支持西安來把內戰停止下來。這樣一種態度，即使在中共中央二十日接到共產國際指示電之後也沒有改變。

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發出的黨內指示當中，中共中央第一次在

肯定事變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批評事變因爲「採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妨害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但指示仍舊明確規定，中共與紅軍仍要「同情西安的發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軍事上的與政治上的），使之徹底實現西安發動的抗日主張」，甚至要「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給『討伐軍』以嚴重的打擊，促其反省」[116]。這種決定說明，中共中央在支持張學良的問題基本上沒有改變原先的立場。

了解了中共中央在什麼問題上轉變了自己的做法，自然也就比較容易了解張學良因爲蘇聯的態度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不能否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在相當程度上是寄希望予蘇聯的同情與援助的。因此，蘇聯輿論的公開的反對態度，不可避免地會使張學良感到不滿。但簡單地根據這一邏輯關係來判斷張學良的反應，甚至說什麼張學良因此對共產黨也開始表示不滿，卻未免有些武斷[117]。

應當了解的是，張學良因爲高度重視蘇聯方面的反應，並且與上海有直接的電臺聯繫，因此，還在他十七日打電報給毛澤東詢問「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的時候，多半就已經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開反應了。之所以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當然不是依據幾十年後某些當事人的不那麼可靠的回憶，而是因爲我們注意到張學良在詢問國際反應時所用的「批評」二字。張學良本來在這裡有許多字眼兒可以選用，像「意見」、「指示」、「看法」、「反應」、「態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選用了「批評」二字。這很有可能是他在聽說了蘇聯輿論的公開批評之後，所做出的一種本能的選擇。但一切細心的讀者恐怕不應當因此就得出結論說，張學良由此對蘇聯「最感煩惱」、「表情憤懣」。仔細讀一讀張學良的這封電報我們就會看到，張學良並不是那種輕易地會被表象所迷惑的人。試想，如果張學良這時已經對蘇聯表示憤懣，他還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證實這種消息嗎？而且，我們在電報中也看不到張學良有任何憤懣和煩惱的表示，相反，他表現得相當樂觀，宣稱此間諸事順利。試想，如果張學良把蘇聯的反應看成是決定一切的關鍵，他還會有這種樂觀的表示嗎？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張學良對蘇聯報刊的公開反應固然重視，但他更重視的其實還是內部的意見。也就是說，他並非不了解，外交關係與黨的關係其實是兩回事；他同樣很清楚，「遠方政府目前爲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的道理。這也就是爲什麼，張學良在這封電報裡並沒有問遠方政府的意見如何，而是特別選用了「國際」一詞，希望了解「國際……有何批評」。

張學良什麼時候了解到來自國際的指示呢？確切的時間應當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八時。毛澤東在前一天曾經在這個時間通過住在張學良公館內的周恩來向張學良通報了共產國際當天來電的內容，後者似未收到，第二天這一時間再發，周、張始有覆電表示收到並贊成國際來電。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來電與毛澤東通過周恩來向張學良通報的電報內容，有一點重要的不同。即毛澤東轉述的電報刪去了季米特洛夫原電中的第一段的內容，這段話是：「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於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段話在實質上與蘇聯報刊上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變具有任何積極意義。它區別於蘇聯報刊宣傳的唯一之點，就是它固然仍舊不能相信張學良，但並不認爲張學良的這次發動帶有《眞理報》社論所說的日本陰謀的背景[118]。不難想像，如果張學良得知共產國際與蘇聯政府在對事變的

評價問題上如出一轍，其感受必然會相當複雜。問題是，毛澤東刪去了這段足以讓張學良感到不舒服的話，只將下面這些內容告訴了張學良：

> 既然發動已成爲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應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
> (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
>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
> (丙)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 (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113]

我們從上面這段文字和建議中能夠看到什麼呢？第一，共產國際未必完全贊成發動這樣的事變，但它並沒有否定這次事變，相反，它贊成通過這次事變來達到某些積極的政治目的。第二，共產國際贊成張、楊所提八項政治主張的基本內容，即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保障人民權利，聯紅聯俄（儘管不要公開提出這一口號）共同抗日。讓我們實事求是地、並且是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這樣一封國際的來電，對這時倍受外界討伐之聲困擾的張學良，究竟是一種寬慰呢，還是一種沈重的打擊呢？結論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發展至此只有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中國共產黨人放棄了多少有些情緒化的關於公審或除掉蔣介石的要求，重新準備在承認南京正統的基礎上解決事變了。除此之外，一切並未發生明顯的改變。從周恩來的覆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西安的所作所爲，也

只是在處置蔣的問題上策略將有所改變，其餘對策一概照舊。覆電稱：「來此四日，中心抓緊在反對和推延內戰，要求改組寧府，鞏固三方聯合，加緊戰爭準備。對取斷然手段，故覺不利，今得國際電當更照此方針做去，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而與張、楊討論結果，他們現在也「更懂得堅持有利」，準備加緊向各省活動，以推動改組政府，並且相信要「促進南京分化，與紅軍合作，仍宜先從西北做起」，而西北「欲停內戰，除政治活動外，戰爭勝利亦可促其反省」。基於這一認識，「西北聯合局面張、楊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堅定內部，影響國內。其辦法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前此之提議，此事因毛澤東後來顧及外交及爲延緩內戰，一度提出暫緩發表，但考慮到紅軍現在正在向西安附近集中，遲早必須宣布，因此，在徵求張、楊意見後，周明確提議：

> (甲)紅軍過邠縣後，即應對外發表宣言。
> (乙)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面亦應聯合宣言，說明聯合抗戰保衛西北的意義，並堅決抗拒企圖侵占西北、破壞統一戰線的任何敵人。最後宣布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軍政委員會，並推舉張爲總司令統一指揮。……
> (丙)抗日聯軍西北軍政會我方推毛、朱、周、彭、賀、劉、宋、宋。
> (丁)紅軍即爲抗日聯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朱。
> (戊)軍政會參謀長擬推劍英（張要他）。
> (己)軍政會下各種組織，我方應準備伯渠、尚昆、瑞卿、季壯來參加。
> (庚)紅軍加入抗日聯軍後，其給養薪餉補充應有初步改變，並

由西北軍政會統籌。

(辛)地方武裝一概以抗日義勇軍名義出現，其供給仍由地方籌給。

(壬)在全國民主政權未建立前，蘇區政府仍舊，只名義上冠以抗日字樣。

(子)紅軍在抗日地區行動的政策請……速定出宣布。

(丑)在抗日聯軍宣布後，共產黨應在群衆中公開活動。[120]

顯而易見，在得知共產國際的指示之後，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中央的關係不是變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鞏固了。張、楊「聞紅軍東來均甚高興」，並催紅軍快來，希望盡快公布西北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張學良並且明確告訴周恩來，現僅西安城內，就存有現金和鈔票一千八百餘萬，此地每月僅開支二百五十多萬，武器彈藥也有大量儲存，如果南京方面堅持不妥協，堅持幾個月絕無問題。

注釋

❶ 〈張學良憶談東北軍兩三事〉，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轉見《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85 頁。

❷ 轉見《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76，1179 頁。

❸ 參見前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❹ 同上注。

❺ 栗又文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致史永信（存全國政協）中曾提到是張學良首先想到「捉蔣」的政變方式的。據栗又文說：在八月間，栗又文去新疆之前，曾問張學良：「蔣介石不贊成抗日怎麼辦?」張說：「我可以勸」。栗說：「你勸他不聽呢?」張說：「可以再勸」。栗說：「他還不聽呢?」張一拍大腿說：「除非他不到我部隊中來!」即是說張八月間已想到再三勸蔣抗日不聽的話，他就要乘蔣來西安之際把蔣捉起來。但此說有一點明顯的錯誤，即八月間張學良尚處於積極準備實施「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過程中，說他當時已轉而主張勸蔣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段回憶所提到的時間頗可懷疑。轉見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 194 頁。

❻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轉見注❺，第 1200-1201 頁。

❼ 這裡「楊于也毅蔣時爲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一句中的錯字，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可將「楊于」理解爲兩個人，結果此句可整理爲「楊（虎城）、于（學忠）也因謁蔣時爲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一種則將「于」字理解爲是發報人當時誤將其後面的「也」字錯誤顛倒所致，並非指人，如此可照筆者注明者，整理爲「楊也於謁蔣時爲提停止剿匪事碰釘子」。筆者如此判斷，是因爲考慮到以下兩點，其一，楊、于雖均見蔣，但于學忠爲東北軍將領，其對張學良之意圖也不甚明了，很難想像于會與楊一同勸蔣停止剿共，更不要說提出「駐蔣說」；其二，就電文本身來看，此句中並無漏字情況，但如將「于」理解爲人，則句中明顯地還缺一個「於」字或「因」字。〈劍、劉致中央電〉，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❽ 見張學良問題研究專家畢萬聞先生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致筆者信所附複印件上之旁注。

❾ 實際上葉、劉二人關於西安空氣大變曾兩度報告，一次是在十一月一日，一次是三日。前一次電文關於張主張的內容似乎說得更明確些，可惜這次的電文幾乎完全譯不出來，有關張的前半句只剩下了「西北空氣大有武，因爲張主圖……」等十二個字。張主張或張意圖做什麼，均未譯出。

❿ 邱路前引文。

⓫ 〈國際書記處致澤東、洛甫、恩來、博古同志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國際書記處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2。

⓬ 《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0 頁。

⑬ 同上注。

⑭ 「二、二六」事件，指以村中孝次爲首的日本少壯派軍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東京發動的軍事政變，其目的在於清除元老、重臣、軍閥、官僚等「破壞國體之元凶」。見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第四冊，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 322-335 頁。見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 23 頁；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第 83 頁。

⑮ 《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99 頁。

⑯ 參見張學良:〈對總部全體職員的訓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的講演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65-1066，1079-1080 頁。關於張此次單機一人赴洛的時間，一般均認爲是十二月二日，如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 390 頁等。另李雲漢先生在《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一書中稱「張於十二月三日飛往洛陽晉謁蔣委員長時，曾當面要求釋放沈鈞儒等『救國領袖』」，顯係筆誤。因著者在同書另外兩處提到張學良此行時，均又說「張於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陽晉謁蔣委員長」。很難想像張曾在兩天裡兩度飛往洛陽。故李雲漢先生這裡所說的「三日」或應爲二日之誤。

⑰ 邱路前引文。

⑱ 〈毛、周、朱、張致彭、任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⑲ 根據張魁堂所著《張學良傳》引述的《葉劍英傳》（未刊稿）的內容，可知在《葉劍英傳》裡有這樣的敍述：在葉尚未離開西安之際，張學良曾對葉談到他準備發動事變的想法。據張學良說，蔣介石逼他執行命令剿共，形勢很嚴重。張說：「許多天我都沒有睡覺，內戰我是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 Coup d'Etat 即政變的音譯）」。當時葉的答覆是：「這關係到國家命運，一定要慎重。蔣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認識，抓他起來，會出現全國大分裂。人民一時不了解我們，會使我們孤立。更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機會」。葉隨後立即電告中央請示，中共中央覆電，令葉轉告張學良，對此事要慎重。張學良表示同意。轉見張魁堂:《張學良傳》，第 191-192 頁。

⑳ 見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 26 頁；張魁堂:《張學良傳》，第 194 頁。

㉑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第 360 頁，轉見李雲漢前引書，第 41 頁。

㉒ 蔣中正:《西安半月記》（引言），轉見李雲漢前引書，第 42 頁。

㉓ 《徐永昌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九九二年版，轉見蔣永敬:〈有關西安事變新資料〉，《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一期；《蔣介石日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轉見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第 45 頁。

㉔ 西安華清池五間廳展出之蔣介石給邵力子的親筆函手跡。

㉕ 據李金洲回憶，當時東北軍中已盛傳蔣要將東北軍「調往安徽及蘇北整理訓練」。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第 25 頁。另據王化一回憶，十二月一日何成濬十一月初去洛陽爲蔣祝壽時，即得知蔣有調東北軍出陝意圖，他轉而告訴了王化一，王十二月初將此事通知了張學良。王化一:〈我在西安事變前的一些經歷〉，《西安事變資料選編》，第二集。

㉖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㉗ 關於張學良在蔣赴西安後至西安事變爆發前一週內向蔣勸諫的次數與時間，目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比較常見的爲兩次，如由西安事變領導小組組織編寫的《西安事變簡史》一書即提到兩次，並肯定一次是十二月七日，一次是十二月九日。周毅等主編的《東北軍史》也提到了兩次，但說明第二次是十二月十日，認爲九日當天張並未去臨潼諫蔣。傅虹霖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一書則提到了四次，即七日，雙方談長達三小時；九日，試圖再諫，因蔣脾氣太壞，未深入；十日，再次勸蔣，被臭罵一頓；十一日晚，再勸，甚至聲淚俱下，被拒絕。米暫沈著《楊虎城將軍傳》只提到一次，但肯定張學良最後一次勸蔣是十二月十日。另外，王菊人回憶也只是一次，時間在八日。不過，據張學良自己一再強調：自十一月以來，他曾幾次用書信或當面「諍諫」，而自蔣至西安後，正式與蔣談話僅兩次，可知張並非時時「諍諫」，特別是因

爲張始終感覺「蔣委員長氣太盛，我的嘴太笨」，因此他們的這種正式談話不可能很頻繁。且張事變後不久即肯定地說明，他同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兩次談話中「尤以十二月九日夜爲甚」。自此次談話後，他和楊虎城及其西北諸將領均不再對勸蔣抱以幻想，是以知道九日之後張已再無諫蔣之心，而是一心準備發動事變了。故此後雖不免仍有相關談話，但張已不認爲是正式的諍諫了。因此，筆者傾向於同意兩次正式的談話當發生在九日以前。而對於八日之說，因距九日太近，加上當日正是蔣介石依次接見東北軍將領，不讓張參加之日，張正爲此不安與緊張，似亦非談話之時。故筆者基本贊同另一次談話時間應在七日。至於七日勸蔣也有晚上勸蔣和下午勸蔣兩種說法，如《西安事變簡史》認爲是下午，同樣參加《簡史》寫作的張魁堂在《張學良傳》裡卻認爲是晚上，似對整個事件的研究不甚重要，姑且聽之。

㉘ 張學良：〈對總部全體職員的訓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又一次見張學良〈在西安廣播電臺的廣播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內稱：「十二月九日，西安學生遊行，完全出於自動、愛國的精神，並無擾亂秩序的地方，蔣委員長竟主以武力彈壓，並申斥必須以機關槍掃射，才能停止這些青年愛國」。另一次見張學良〈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的講演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稱：「因爲一二、九西安學生運動，我同蔣委員長在言語上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我認爲學生請願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處置的辦法，只有和平勸導，和使學生也可以說使一般民衆滿意的事實來答覆。而他卻說：『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1066，1069，1080頁。

㉙ 見《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36頁；張魁堂：《張學良傳》，第197頁。另米暫沈：《楊虎城將軍傳》也認爲「他們初定發動兵諫當在八日左右」。見米書，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118頁。

㉚ 周毅等主編：《東北軍史》，第394頁；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45-46頁。李雲漢書認爲：「就史料顯示的事實判斷，張學良可能係在十二月九日夜晚或十日上午，與楊虎城密商後，

始作『決行強諫劫持之謀』的最後決定」。

㉛ 見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187-188頁。

㉜ 一般史書均認爲，張學良發動事變之初並未通知中共方面，張自己也回憶說此一發動「對於共黨方面並未徵詢商議」。《西安事變簡史》一書也只是認爲，張學良只是到了採取行動的十二日凌晨才通知了劉鼎，要其轉知中共中央。參見《西安事變簡史》，第41頁；張魁堂：《張學良傳》，第202頁。

㉝ 已知在十二月四日蔣到西安後至十二月十二日一週時間裡劉鼎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有四封。兩封是八日的，一爲蔣介石召集各軍師長談話的簡要內容，說明東北軍各軍師長一致要求先抗日，回老家，有人主張聯俄聯紅共同抗日，蔣堅持不消滅紅軍，絕不可聯俄聯共云云；一爲蔣調動部隊來陝的情況。另兩封是十一日的，一爲西安學生一二、九遊行，被張學良攔阻的情況；一爲有關聯絡人員進出蘇區的問題，以及蔣加調部隊來陝，張學良之西北剿總頗感緊張的情況。只是在這封電報中，即十一日中午，劉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東北軍上層的氣氛有些恐怖的味道。

㉞ 張書原文表述不確。其原文稱：十日，「中共中央向張學良通報國共談判的情況，即蔣介石已將雙方停戰抗日的談判改爲收編紅軍的談判，談判有了波折」。作者顯然不了解兩黨此前談判的一般過程與變化情況。中共中央十日通報的只是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判的情況，前兩次陳立夫與潘漢年談判時，確可說蔣已將兩黨合作談判改爲收編紅軍的談判，但第三次談判則恰恰相反，蔣事實上已經再度同意了過去早期兩黨接觸與談判中的紅軍改編方案，所談已不是收編紅軍問題，雙方的分歧主要只是紅軍的人數問題。張魁堂：《張學良傳》，第199頁。

㉟ 見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第187-188頁。

㊱ 何況蔣九日寫好給邵力子關於散布調張、楊離陝，委陳誠、蔣鼎文以西北剿匪重任的密函此時還尚未發出，待發出後也還要假以時日看張學良之反應如何才能最後決定對張之態度，蔣如何會第二天就離開呢？參見蔣介石：〈西安

半月記〉，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附錄一，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㊲ 邵力子：〈西安事變追憶〉，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第 90 頁；張魁堂：《張學良傳》，第 199 頁。另外《西安事變簡史》也支持這種說法，稱「十一日，蔣介石召集中央軍將領和張學良、楊虎誠、于學忠等商議軍事計劃，……並定在十二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十一晚宴後，張、楊決定十二日凌晨動手。第 40 頁。

㊳ 見孫銘九：〈臨潼扣蔣〉；劉多荃：〈扣蔣前夕〉；王菊人：〈憶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第 193，166，81，71 頁。

㊴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㊵ 王菊人的回憶記述了當天晚上楊虎城等待張學良回城時的緊張狀況，可為參考。見王菊人前引文。

㊶ 前引《西安事變簡史》，第 42 頁；前引張魁堂書，第 202 頁。張書明確說：「攻擊華清池的時間比預定的為早，找到蔣介石是在五時前」。

㊷ 參見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第 37 頁；李雲峰：《西安事變史實》，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 226 頁。

㊸ 〈李宜致東、來兄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轉見《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3-1054 頁。

㊹ 幾乎所有參加攻擊華清池的軍官都回憶說當時受了激烈的抵抗，不少回憶還肯定結束戰鬥時已至清晨六時或七時許。王玉瓚：〈扣蔣回憶〉；孫銘九：〈臨潼扣蔣〉；蔣介石：〈西安半月記〉，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第 190，198，272 頁。

㊺ 參見王禹廷著：《細說西安事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 296-297 頁；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㊻ 根據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的有關西安事變詳情的通報的記述，應該是「十二日六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虜」。〈軍委主席團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文獻和研究》公布此電時記為十二月十二日，似不確。)

㊼ 王菊人前引文；盧廣績：〈西安事變親歷記〉；趙壽山：〈西安事變前後的回憶〉；常國賓：〈白鳳翔臨潼扣蔣〉；王玉瓚：〈扣蔣回憶〉；宋文梅：〈西安事變〉；夏時：〈唐君堯參加扣蔣的經過〉；汪榕：〈劉桂五扣蔣紀實〉；孫銘九：〈臨潼扣蔣〉等，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第 73，100，169，176，180，189，208，170，184，195 頁。

㊽ 只有晏道剛回憶他聽到槍聲時是凌晨二時許。晏道剛：〈西安事變親歷記〉，前引遠方書，第 129，184，195 頁。

㊾ 同注㊻。

㊿ 同蔣介石前引書。

51 據蔣介石貼身侍從副官翁元的回憶，蔣介石一向早上五點起床，且從來嚴格守時，按部就班做床上運動和其他盥洗動作。轉見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參考消息》，一九九四年二月三～四日。

52 轉見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九十四輯，第 84-85 頁。

53 張學良所用與中共中央通報之「雙臺」最初啓用時間是九月二十五日，但至十月底「尚不通」，十一月才眞正開始收發電報。

54 劉鼎所用「坤臺」九月二十日左右開始啓用，十一月十三日起才正式開始通報。

55 可以看到的劉鼎談論這一情況的資料分別有兩件，一件是劉鼎〈談西安事變〉，一件是張魁堂根據劉鼎七十年代末自己記述的西安事變追記筆記所整理的〈劉鼎在張學良那裡的時候〉。在這兩次談話和記述中，劉鼎自己關於這一情況的說法就大有出入。在談話中，劉鼎肯定地說，張學良是在十二月十二日零時告訴他要發動事變的消息的，他當時即趕回去給中共中央發報，「但此時停電了，我就從金家巷走到南院門電料行買電池，電池買回時，蔣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在筆記中，劉卻說，張學良告訴他事變決定時已過十二點，他並沒有回去發報，而是在張學良處發的報，「清晨兩點

多，彭紹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電臺。搜山尋獲蔣介石後，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略去這裡的十二點(零點)和十二點已過這個細節不論，上述兩種說法中仍有相當的矛盾。其一，談話中劉鼎提到的發報機是自己的，故有回去發報和發現沒有電池一說，而筆記中所提到的發報機則是在張學良處，因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停電和沒有電池而要自己去買電池一說。但同時，筆記中的說法又自相矛盾，因其所說「彭紹坤接通了中共中央的電臺」指的又是自己的發報機和報務員，並不是在張學良處。後面更明確講:「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似乎張學良自己並無電臺與中共中央聯絡，張學良的電報都是通過劉鼎發的。顯然，這完全不合事實。其二，談話中講得很肯定，即強調張學良告訴他之後，因沒有電池，他專門由金家巷跑到南院門去買電池，回來時蔣介石已經抓到了。這一來一回花了多少時間呢？也就是說，當他將張學良告訴他的消息發出去的時候是凌晨幾點鐘呢？據他在談話中講，蔣抓到時是「天已大亮，八點多鐘」。即是說，他零點得到消息，因沒有電池，從金家巷跑到南院門去買電池，來回用了將近八個小時之久，回來時蔣已抓到，天已大亮。而在筆記中，他卻告訴人們說，他並沒有去買電池，因此零點以後得到消息，即開始發報，接通中共中央電臺時是深夜兩點多(《西安事變簡史》則進一步肯定其爲「兩點三十分」)，此時自然尙未抓到蔣介石。此兩說相距之何止十萬八千里。可以想見，根據這樣一些完全不確定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回憶來推斷劉鼎向中共中央發報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足爲信的。事實其實很清楚，張學良和劉鼎當時各有電臺與中共中央通報，張學良用不著通過劉鼎的電臺來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的決定。張之所以通知劉鼎此一消息，只是因爲劉鼎這時還是中共中央派駐西安的聯絡員，有必要在正式行動之時將此消息通知劉鼎，這並非是張自己不能通報而需要通過劉鼎來通報的緣故。同樣，旣然張學良自己有電臺與中共中央聯絡，他也絕不會於正式行動五個小時以前即通知劉鼎，讓劉鼎先發報，而自己反而要等到凌晨四、五時再發報。更爲重要的是，張學良與劉鼎均與中共中央有約定的通報時間，劉鼎回憶所稱的種種時間，都不是約定的通報

時間，在他所回憶的零點、半夜二點多或其他時間，事實上是不可能通報的。

56 〈中共中央關於談判問題給潘漢年的指示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57 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0。

58 〈中央書記處致胡服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315-316 頁。

59 轉見張培森等:〈張聞天與西安事變〉，《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參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60 《紅色中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版。

61 〈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62 轉見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第 76-77 頁。

63 〈毛澤東等致張學良、楊虎城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64 〈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319-320 頁。

65 轉見宋毅軍:〈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軍事歷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但宋文這裡把軍委主席團十二月十五日關於取消西峰鎭集中計劃的電報指示的時間搞錯了，誤以爲該指示的日期爲十三日，因此有關這一戰略設想的形成及取消過程的情況完全搞錯了。

66 宋毅軍前引文。

67 〈毛致彭、任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685 頁。

68 〈毛澤東致張學良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69 〈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⑳ 另據事變後博古關於事變解決經過的報告，宋美齡捎給蔣的話具體內容是：「變中有變，戲中有戲，寧可抗日而死，不可讓人暗傷」。

㉑ 據張學良講，端納見蔣後，蔣當即問端納：「你是否是來同生死的?」端納回答說：「不是。我是英國人，不懂得中國這種事情，英國人與皇帝是沒有這種關係的。他們主要是忘不了敵人。中國現在已經亡了東三省幾年了，大家都要抗日，只等蔣先生的命令，爲什麽中國人自己幹自己，而不用力對付敵人呢?」

㉒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㉓ 參見〈張學良致孔祥熙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致宋美齡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對總部全體職員的訓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6-1057，1067 頁。

㉔ 同注⑲。對於中共中央這時對處置蔣介石的主張，一般史書都迴避了或否定了中共中央在態度上有一個轉變過程的歷史情況，甚至說，周恩來剛一到西安，就批評張學良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是軍事陰謀(如張魁堂著《張學良傳》，第 210-211 頁)，主張說服蔣介石抗日，擁護蔣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如《西安事變簡史》，第 81 頁)。只是在極個別的論文中，才有關於這一態度轉變過程的具體介紹，提到毛澤東最初有緊急時「誅之爲上」的電報，這時周恩來也明確提到在內戰不可避免時必須除掉蔣介石的意見，肯定中共開始階段的策略實際上是要罷免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的「除蔣」策略（參見張培森等：〈張聞天與西安事變〉等；張魁堂著《張學良傳》一面斷言周恩來批評張學良兵變，主張擁蔣抗日，一面也不能不注意到周恩來十七日給毛澤東電文中所提到的勸張「行最後手段」的文字，因而也提到周恩來十七日與張學良談話中提出過必要時應除掉蔣介石的建議)。

㉕ 〈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685 頁。

㉖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㉗ 宋毅軍前引文。

㉘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㉙ 關於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事變期間在和戰以及對蔣處置問題上立場矛盾的說法比比皆是。除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屢有關於張私下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述說事變皆因楊催促再三而起，楊一度反對停戰，反對釋蔣的文字外，張學良自己以後也在〈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有類似的說法。其餘如蔣鼎文的回憶，李雲漢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王禹廷著《細說西安事變》等，也都認爲張「於了解蔣公抗日計劃後，內心實有愧悔，因而有心保護蔣公脫險」，楊虎城「不願和談，意欲決裂」，並且「態度惡劣，不願釋蔣公回京」。

㉚ 迄今所見公布之蔣介石決心抗日的文字，僅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手書「期於十年內湔雪國恥」等極少數文件，日期均遠在西安事變數年以前。相信這數件早期文件，蔣當不會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仍帶在身邊。另這裡所說的「重要文件」亦僅見於唐君堯的回憶中。唐君堯回憶中稱他在搜查蔣於華清池的房間時，發現蔣親筆所擬「對日抗戰計劃」一件，但「計劃書」內容如何則隻字未提，只記得其中有新編部隊序列表一件，內定蔣爲「最高統帥」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張學良爲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馮玉祥爲第三方面軍總司令……。轉見王禹廷：《細說西安事變》，第 299 頁。

㉛ 轉見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日記，蔣永敬前引文。

㉜ 前引潘漢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報告。

㉝ 關於蔣介石不信任東北軍的情況，還可以證之於徐永昌的日記。徐日記稱，十月九日，閻錫山建議徐向蔣介石建議「拉東北軍入綏」抗日，徐謂：「東北軍作戰力薄弱，而軍紀太壞，若久戍而敵不至，失盡民心，是用之則所得不償失」。閻堅持不可，仍要徐請示於蔣。十月十七日，徐到杭州見蔣，詢以閻先生擬東北軍守綏事，蔣當場否定，稱此議不妥。蔣永敬前引文。

㉞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第 98，104-105 頁。

㉟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㊱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3-1054 頁。

87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6-1057 頁。

88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66-1067 頁。

89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70 頁。

90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73，1075-1077 頁。

91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80-1081 頁。

92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88 頁。

93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89-1090 頁。

94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96-1097 頁。

95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02-1103 頁。

96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55 頁。

97 前引周恩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給中央的報告，其中周轉述張學良的話說：「國民黨完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一條法西斯蒂」。

98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99 〈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100 〈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101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 46-47 頁。

102 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 2-3 頁。傅虹霖的《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不僅以斯諾此說爲依據，而且明確肯定這一過程是：「斯大林的電報發給了上海的孫中山夫人，然後由她轉發給毛澤東」。見傅書，第 237 頁。

103 參見〈李允生報告〉，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周恩來致劉鼎轉漢年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周恩來致小開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等。有關中共曾經在上海依靠外國友人幫助建立過一個電臺的情況，還可以參看路易·艾黎著〈西安事變前後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一文，內稱在他家的頂樓的小房間裡，曾「設置了共產國際中國組的秘密電臺，由甘普霖負責。有兩個

德共年輕的女黨員維特·瑪亞和菲莉·瑪亞協助他工作。我們通過這部電臺，與在國內一些地方進行長征的紅軍保持通訊聯繫」。路易·艾黎所說的這個甘普霖叫亞歷克·甘普霖，是位英共黨員，公開身分爲上海電力公司職員。關於這一回憶的具體細節可能還有一些需要詳加考證的問題，比如回憶中說這部電臺是「共產國際中國組的秘密電臺」，顯然令人懷疑。因爲路易·艾黎始終不曾參加過共產國際的任何工作，且艾黎與史沫特萊關係密切，劉鼎即是史沫特萊送到艾黎家藏起來的。可是共產國際這時對史沫特萊的政治背景深表懷疑，對劉鼎也不信任，再三告誡中共要對他（她）們保持警惕，因此很難想像共產國際中國組（事實上共產國際也沒有這樣的組織）會毫無顧忌地在與此二人關係密切的艾黎家裡設置秘密電臺。當然，從回憶的內容看，這部電臺多半像是存在過的，只不過，它多半不是共產國際的電臺，恐怕正是李允生在上海努力建立的那部電臺。從回憶內容也可以看出，這部電臺與陝北並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繫。

104 廖承志曾回憶宋慶齡代表共產國際與他接頭的情況，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105 畢萬聞先生在〈斯大林宋慶齡與西安事變〉一文中斷言斯大林十三日曾有電報給宋慶齡轉發陝北中共中央，根據有三：其一是宋十二日晚見孔祥熙時還支持張學良發動事變，十三日即態度突變，要勸說張學良放蔣了。其二是說宋慶齡與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共都有密切關係，斯大林有理由通過她轉發電報。其三是說張國燾回憶斯大林來電時間正與宋慶齡所說時間相同。但其根據僅爲回憶文章。

10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一年版，第 333 頁，深信張國燾這一說法的有關西安事變問題的著作有吳天威的《中國革命的轉折點》，和李雲漢的《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

107 爲這一問題的提供了重要考證的文章主要是丁雍年的〈有關西安事變史實的幾個問題〉（載《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和張培森等〈張聞天與西安事變〉。

⑩⑧ 〈毛澤東致張學良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⑩⑨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⑪⓪ 可以相信中共中央十八日電報所言不虛的理由還有一點，即這時分工負責與共產國際電報聯絡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從半年來已知的大量與共產國際來往電報的署名看，由毛澤東署名或參加署名的致共產國際的電報只有八月二十五日一封，其餘去電署名絕大多數爲「洛甫」（即張聞天）或由張起草，署名「中央書記處」，另有少量署名「林武」（用林育英帶去密碼）。且這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報聯絡，也不存在四十年代後期由任弼時一人掌管，直接向毛澤東個人負責，非經毛澤東同意，不向政治局傳達通報的情況。這時，共產國際凡有重要指示，中共中央還從來沒有不集體討論並加以貫徹的。

⑪① 丁雍年前引文。

⑪② 同注⑩⑥

⑪③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實際日期應在二十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⑪④ 張培森前引文；〈彭、任致主席團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⑪⑤ 張培森前引文。

⑪⑥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實際日期應爲二十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⑪⑦ 根據當時曾經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人回憶，一些研究者向我們描述說：當時「最使張學良煩惱的是蘇聯的態度」。「張學良原以爲發動兵諫是爲了抗日，可以取得蘇聯諒解，盡釋中東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聯蘇的願望，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問劉鼎：『蘇聯廣播爲什麼罵我受日本人指使?』劉答：『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以後蘇聯連續抨擊西安事變，十六日，蘇聯正在廣播，張對劉說：『聽見了麼?』表情憤懣。張以爲他背了比『九一八』事變時更大的黑鍋。蘇聯的抨擊使張學良對中共也有點懷疑。一次，張學良拿著內容載有蘇聯評論事變的新聞記錄下樓，宋黎在樓梯下面給他讓路，聽見張學良似乎自言自語，說：『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前引張魁堂書，第 208 頁。

⑪⑧ 蘇聯政府的眞實態度應該說是同這裡所說的內容相一致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十五日接見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時就明確表示：「我不認爲張學良是與日本人直接勾結採取行動的，我更傾向於這種推測：張是受了某些人心懷叵測的惡意唆使」。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 48 頁。

⑪⑨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 78 頁。

⑫⓪ 〈周恩來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公開發表此電文時誤注爲二十三日。）

第五章　從「革命」到「兵諫」

第一節　皆大歡喜

十二月二十日前後是西安事變最微妙的階段。此時，何應欽及討伐軍前線總指揮劉峙殺氣騰騰，中央軍步步進逼，西安已籠罩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之中。西安方面不得不迅速結成軍事同盟，張學良、楊虎城更是信誓旦旦，公開宣言不惜一切犧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惡勢力，紅軍、東北軍因此火速趕往西安附近，準備與中央軍決一死戰。南京與西安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一觸即發。至二十二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又接連致電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明確主張必須迅速宣告成立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此舉一旦成爲事實，毫無疑問將使西安與南京之間本來就極其緊張的對抗形勢更加具有爆炸性。

在已經得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必須努力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電報指示之後，張學良等人的這一要求頓時使中共中央陷入到一種十分爲難的境地。不同意吧，這顯然會使張學良、楊虎城對中共和紅軍的動機產生懷疑，動搖對自己的信任；同意吧，此舉勢必會取消中共目前所極力爭取的第三者地位，並在事實上加劇南京與西安的對抗。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再度就此進行了緊張的討論。毛澤東明確講：張學良提出成立軍政委員會，以鞏固軍心民心，我們本來主張對內宣布，對外不宣布，但我們去電後，他卻急於要宣布。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

等於成立事實上的政府，如果對外宣布，我們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可是現在中心問題是張、楊已處在相當緊張的環境之中，不參加這個政府又不行。他考慮再三，認爲還是實際參加，暫時在內部宣布，並做公開宣布的準備，一旦打起來，就應公開宣布的好。這個問題很自然地在中共中央領導人內部形成了不同意見。多數人都認爲，現在完全可以公開宣布，沒有必要迴避與張學良、楊虎城結盟的事實，這不僅是爲張、楊撐腰，而且也是爭取和影響西南、四川等地實力派同情西安事變的一種手段，宣布利大於弊。而另一些人則認爲，現在最要緊的是要停止內戰，公開宣布不僅不利於我們站在第三者地位對南京方面進行和平工作，而且容易給親日頑固派以藉口，加劇緊張局面，甚至有人認爲，即使對內宣布也不應當，因爲在陝甘軍政內部宣布，實際上也就等於是對外宣布了，因此，還是實際參加而對內對外都暫時不宣布的好。經過反覆討論，會議最後的結論是，採取實際參加，暫不公開宣布的辦法，在未與南京全面衝突之前，自己仍努力保持第三者地位以便於進行轉圜❶。

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正式答覆西安方面稱：一方面爲爭取全國同情，便利外交，另一方面爲鞏固軍心民心，爭取戰爭勝利，堅持已成局面，決定：「(甲)包括紅軍在內的抗日聯軍組織，對內立即發表，但對外暫時不發明碼通電，不發廣播，準備於紅軍實行參戰時發表之。(乙)包括我們名單在內的西北抗日軍事政治委員會立即組織，並實行工作，但對外均暫時不發表，何時發表有利，依情況定之。(丙)此時只發表張、楊聯合宣言，張、楊及我們聯名宣言，立即準備好，發表時機稍爲等一下。(丁)我們與東北軍、西北軍聯合幹到底的基本方針是確定了的，實際的軍事政治工作是立即共同一致地做的，僅爲顧到爭取南京、山西、四川、廣西、河北、山東及蔣系軍左派中派起

見，把對全國宣布一事稍微遲緩一下，至張、楊對東北軍、西北軍及陝甘內部應盡量宣布聯紅聯共之方針，以振軍民之心，則是毫無疑義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具體去電說明，中共方面準備以朱德、彭德懷、賀龍、葉劍英和徐向前五人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周恩來和林伯渠暫不參加以便於對國民黨進行工作，要求周恩來等務必向張、楊說明：「共產黨爲爭取全國各派應採此方針，對張、楊亦是有利的」。當然，中共中央在實際上還是做好了一切準備，一旦南京堅持不與西安妥協，全面戰爭打響，中共和紅軍還是要公開地站到西安一邊來的。到那時候，什麼第三者地位，怕是統統都不需要了。毛澤東爲此明確電告西安：中共的原則是，「力爭好的前途，同時也準備對付壞的局面」。但中共中央不能不感到擔心：在張學良明確表示需要中共公開支持的時候，只在私下裡做出保證，「張、楊是否會因此不滿意?」❷

眞是再湊巧也沒有了。就在中共方面還在爲如何在保持第三者地位與公開支持張學良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深感不安的時候，和平的可能性已經在西安降臨了。張學良很快就看到了另外一種、多半也是他更希望看到的，在目前情勢下更便當、更穩妥的解決辦法。

就在戰爭的烏雲伴隨著南京當權者的電閃雷鳴，一陣緊似一陣地壓向西安城的關鍵時刻，在南京方面湧動著的逆向而行的和平暗流也迅速形成勢力。此股暗流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宋美齡和宋子文等人。宋美齡作爲蔣介石的夫人，強烈擔心武力威迫的結果，反而會將張學良等逼上梁山，最終害了蔣介石。因此，她不顧一切地力挽南京主戰派掀動的戰爭狂瀾，堅持通過和平方法來解決爭端，即使蔣介石爲此顏面上要受些損失也在所不惜。蔣之顧問端納飛赴西安及勸蔣之態度，即與宋美齡有直接關係。同時，宋子文作爲蔣介石的姻親，自然也全力以赴地站在他姐姐的一邊，搖唇鼓舌，四處遊說，甚至不顧何應欽

等人阻攔，獨自飛往西安，進行和平勸說的工作。當然，宋子文這麼做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

宋子文曾經是南京政府地位顯赫的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但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宋子文始終主張政府應當在對日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並且反對蔣介石爲剿共軍事大舉國債，結果，宋子文日漸明顯地與蔣介石和汪精衛發生了意見分歧，最終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宣告辭職❸。以後，宋雖一直被蔣介石摒棄於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決策圈之外，卻仍舊試圖在抗日及和共問題上發揮作用。南京方面最初與中共中央的秘密接觸，宋子文就曾積極參與和提供幫助。對於兩廣事變，宋子文也始終站在同情的立場。甚至對於共產黨提出的建立國防政府的主張，宋子文同樣在背地裡表示贊成。對於深受共產黨政治影響的沈鈞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國會，宋子文更是大力支持並秘密捐款以協助其開展活動。以致共產黨在上海的代表，乃至中共中央都認爲：「宋子文表現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領導人當中，可以說是「最好的」❹。因此，此次西安事變的發生，對於宋子文來說，未必不是一次重新出頭的機會。他之所以不顧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冒險代表宋美齡於二十日飛抵西安進行調處，其目的大抵也是爲此。如果蔣介石能夠順應大勢，就此改變政策，他宋子文自然可以重新發揮重要決策作用，實現其政治抱負。

宋子文到達西安當日，即與張學良、楊虎城見了面。毛澤東因得知宋子文同情事變，立即打電報給周恩來，要他設法見宋，以第三者身分提出和平解決事變，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意見。但據張學良事後告訴周恩來：宋子文確實對中共有好感，但不敢見，擔心寧方知道會對他不利。張學良並且說：「宋子文來，南京多方阻難，對其他抗日中委亦限制其自由，懼他們來西北創新局面」。張曾勸宋子文出面召集

救國會議，協助改組南京政府，宋子文表示，因目前尚無響應事變者，現在出頭不大可能，且以南京目前態度，亦不能表態，但他「對義舉同情」，相信「堅持日久必有變化」。

雖然出於安全考慮，不能不謹言愼行，但暗中同情西安事變，希望藉此重登政治舞臺，實現政治抱負的宋子文，能夠輕易放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僅僅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和順從的態度來向蔣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嗎？儘管蔣介石在他事後整理的《西安半月記》中，關於宋子文第一次來西安的情況，只記錄了其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三次見蔣的簡短經過，和幾句生死離別的談話❺，其餘概無所記。但據張學良告訴周恩來，宋子文確曾從側面勸說蔣介石不妨對張學良他們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協，設法轉圜，蔣也確實有所答覆。只是蔣介石這時仍不承認張、楊的政治主張，只同意：「張楊主張交蔣提三中全會，東北軍可援綏，陝西交楊」❻。顯然，張學良、楊虎城對此並不滿意，他們堅持蔣必須就他們所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做出明確的妥協與保證，否則問題仍舊不能解決。對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蔣介石已有所讓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繼續做下去，他將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齡來西安，一方面繼續勸蔣讓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緩內戰，促進南京及黃埔系內部的分化。

宋子文這時的態度和談話，未必毫無策略手段在內。但以宋前此與蔣介石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嚴重矛盾而論，說宋子文這時會如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所記述的一樣，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堅決抵制張學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張❼，這無論如何不合邏輯。要知道，如果蔣介石因此順利獲釋，重登統治寶座，內外政策一無所變，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備受青睞，再入政府決策圈，結果也還是要因其政策主張與蔣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轍，即進去了也還要是再出來。當然，在這

樣一種極爲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勸誘蔣介石多少改變政策主張，聯繫到前此兩人已經存在的嚴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會給蔣一種落井下石的的感覺。因此，宋子文做起來恐怕也很困難。沒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裡究竟是怎樣勸說蔣介石的，後人能夠了解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險親臨西安與反叛者接洽談判，最終成功地使蔣介石獲釋的宋子文，照理勞苦功高，事變之後應備受信賴，委以重任，可是回南京後宋卻仍舊備遭冷落和不信任，時間長達四年之久❽。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的所作所爲，並非讓蔣介石那麼滿意，否則，蔣介石怎麼說也不會這樣對待這位冒死救駕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蔣過程中究竟做了些什麼呢？通過宋子文在談判過程中的言論主張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的談判，正式開始於二十三日。毫無疑問，蔣介石同意進行這種談判，宋美齡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齡是在宋子文、蔣鼎文等陪同下，於二十二日飛來西安的。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透露宋美齡二十二日下午到後，曾力勸蔣「應先設法脫離此境，再言其他」❾。至於宋美齡所建議的方法是什麼，蔣自然無隻言片語之吐露，但聯繫宋美齡前此即曾有過「寧抗日勿死敵手」的勸告，不難判斷宋美齡這時會說些什麼。不僅如此，還在張學良接宋美齡由機場回西安蔣介石住處的路上，宋美齡就曾經明確告訴張學良：「她力主和平與抗日」❿。因此，宋美齡到後，蔣介石的態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張、楊意料之外的重要轉變。據周恩來談判當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訴他們，蔣在經過了端納、宋子文以及宋美齡的勸說之後，這時已最終同意可以對張、楊的主張做某些讓步了。這種讓步表現爲：「蔣暗示宋，改組政府，三個月後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⓫。

「暗示」云云，在這裡大有文章。所謂暗示，說白了就是蔣介石其實並沒有直接答應什麼或肯定什麼。根據諸多接近蔣介石的人回憶蔣的談話習慣，可以想像，一切很可能只是宋子文或宋美齡提出種種建議，蔣或者默認，或者不置可否而已。但如此一來，上述種種讓步，說來說去不過是宋子文或宋美齡的建議，具體上究竟哪些蔣同意，哪些蔣不同意，最初卻未必十分明確了。因此，從這一天談判的情況看，與其說是宋在代表蔣進行談判，事實上更多的可以看成是宋子文個人在與張、楊、周三人交換意見。

據周報告說：談判分兩部分，首先是周恩來代表張、楊向宋子文介紹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項條件，然後就是宋子文提出具體辦法並進行討論。最値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對改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來就提議：

> 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將何應欽、張群、張嘉璈、蔣鼎文、吳鼎昌、陳紹寬趕走。推薦孔祥熙爲院長，宋子文爲副院長兼長財政，徐新六或顏惠慶長外交，趙戴文……長內政，嚴重或胡宗南長軍政，陳季良或沈鴻烈長海軍，孫科或曾養甫長鐵路，朱家驊或俞飛鵬長交通，盧作孚長實業，張伯苓或王世杰長教育。⓬

宋子文想藉蔣落難之機達到怎樣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問題是蔣介石對此將會作如何感想，如此傷筋動骨地變動政府內部成員，縱使不考慮它對蔣介石今後在權力運用上的妨害，難道不會嚴重地損害蔣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嗎？時至今日，大概已經沒有人能夠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圖大志究竟帶有多少一廂情願的色彩，但從事情以後

的發展結果來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這一問題上的熱心與期望看來是有些過高了。蔣介石多半並沒有賦予他具體討論改組政府人事的權力。

但宋子文這時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過分的樂觀情緒深深感染了他的談判對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組政府的問題已經談到如此程度，難道其他問題還不容易解決嗎？對於蔣突然表現出來的這種轉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可以說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談改組政府的具體構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給人一種「革命」即將大功告成的強烈感覺。張、楊理所當然地要對此表現出極大的熱忱，他們也開始積極就新政府人事問題提出建議，比如提議以邵力子長內政，並且同周恩來一道，力主讓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並委杜、沈、章等人爲次長。張學良更明確提議，現在即可考慮改編西北紅軍，照國軍待遇，實現合作抗日的問題。討論中，他們甚至對於是蔣下令撤兵之後即放蔣回京，還是撤走中央軍，釋放救國會領袖之後再放蔣的問題似乎也不那麼特別在意了，儘管他們仍舊堅持蔣介石必須滿足他們提出的六項條件，同意西北組織三位一體的軍政委員會和抗日聯軍組織，但他們看起來似乎毫不擔心，確信如今這些要求在蔣介石那裡都不會成爲問題。一切障礙都因蔣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許諾一風吹了。周恩來更是急忙打電報詢問中共中央：「在蔣同意上述辦法下，我們（將）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項條件）」，「你們準備在何種條件下許蔣回京？」[13]。這說明，即使是周恩來，這時也已經開始相信，蔣介石很可能會迅速承認六項條件，並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既成事實，釋放蔣介石的問題馬上就要提上議事日程了。

西安方面新提出的六項條件包括以下各點：

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

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除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

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14]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六項條件除了在比較敏感的國民黨領導地位問題上，即在改組南京政府的形式問題上較之原來的八項條件略有退讓外，總的要求不是比八條減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這也就是說，在事變進行到最後階段時，張、楊方面不是如蔣介石、宋美齡事後所記述的那樣，幾乎放棄了前此的條件，或者全面妥協，而是在相當程度上使其條件變得更激進了。

比較張、楊事變之初所提之八項條件，可知新的六條只放棄了「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的要求，原八條中第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四條已合併爲「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一條。原八條中第二條（停止一切內戰），則根據現實情況修改爲「停戰，撤兵至潼關外」。原八條中第八條關於召開救國會議者沒有變化。而原八條中之第七條（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則擴充爲兩條，即「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特別是這後一條，不僅是對蔣介石既定國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張學良、楊虎城決心與中共同進退的堅定態

度。

西安方面條件之修改，當然有共產國際指示的因素在裡面，但這並不等於說張學良、楊虎城完全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不論是張學良，還是楊虎城，都有著極強的個性，遠不是那種容易受人擺布的人。所謂「周至此時，儼爲西安之謀主」[15]，恐怕也只能解釋爲周更能言善辯，更具有判斷力而已。但堅持事變不達目的不止，大概作爲事變眞正主謀的張學良，還要遠勝過周恩來許多。除了前述張學良公開的各種表示以外，即使是在蔣介石事後透露的很少的幾次談話內容當中，我們也可以隱約地看到張學良爲實現其政治主張態度之執拗[16]。甚至，中共中央於二十一日根據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正式提議修改張、楊前提之八項條件，主張只需要在增加幾位抗日分子進入南京政府；中央軍退出潼關；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紅抗日；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國家合作等五項條件基礎上即可與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7]。張、楊對此也並未輕易首肯。特別是爲了盡可能快地與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達成妥協，中共中央的條件中刪去了張、楊原來八條中直接涉及到關於在南京政府中「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抗日救國」和「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的要求，甚至連其十九日通電中所提出的和平會議的建議也取消了，對此張學良和楊虎城明確表示不能同意，他們只同意取消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的要求，仍舊堅持保留召開救國會議這一條。這種情況淸楚地說明，張學良和楊虎城仍舊有著自己的政治目標。難怪這時張學良認爲中共的態度太軟，而某些中共領導人反過來認爲張學良的要求有些過左呢[18]！但實事求是地說，對於不惜犧牲個人一切來發動此一重大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而言，這樣考慮也確有其充分的理由。試想，僅僅同意保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領導地位，而沒有建立起一種具有影響力的全國範圍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比如救國會

議之類），並以此來對南京政府進行必要的監督，有誰能夠保證在蔣回到南京之後，在槍口威逼下形成的西安事變的成果眞能得以貫徹呢？有誰能夠保證張、楊自己及其那些積極參予事變的部屬日後不因此而遭受報復呢？這也就是爲什麼，儘管張、楊對蔣介石的暗示十分滿意，但在談判中仍舊堅持蔣必須同意保持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組織在事實上的存在。這裡的原因很淸楚，要想使東北軍、十七路軍事過之後不受懲罰，非如此不足以對蔣形成約束。

不過，隨著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關於決心繼續保持第三者立場，希望暫不公開西北三位一體的電報的到來，張、楊及中共中央三者之間顯然開始出現了更明顯的不同意見。一個突出的跡象是，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得到中共中央上述電報不久，很快就通過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齡擔保下，蔣如下令停戰撤兵，允許回南京後實行我們提出的六項條件（見二十三日十二時電），是否可放蔣回寧？」周同時告訴中共中央說：「張、楊、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這裡，特別値得注意的是西安方面突然間放棄了白天談判中所提出的三項重要條件。把「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即六項條件）」，要蔣當面允諾，改成了只要兩宋擔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愛國七領袖），改成了只要蔣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蔣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組織一條根本取消，只要兩宋允諾實現六條即可。沒有任何直接的資料能夠確切地肯定西安方面釋蔣條件的這種突然的變化，一定與中共中央上述電報的到來有關。問題是在周恩來當天中午十二時就上午的談判結果發出電報之後，至當晚十一點周再發出西安方面修改解決條件的電報之間，並沒有出現任何其他重要變故，使張學良有必要改變剛剛取得的談判成果和他們已經確定了的解決問題的具體條件，只有中共中央的這封電報能夠對張學良等形成較大的衝擊。因爲，既然

中共中央不同意公開宣布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的組織，繼續堅持要蔣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組織，自然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既然中共堅持站在第三者地位，堅持事件的和平解決，不大願意公開地建立西北三位一體的政治軍事組織，而如今，和平契機又處於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19]，有什麼必要糾纏於一兩條具體承諾而使自己背上戰爭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幟交給他人呢[20]？張學良即做如此考慮，事情遂由此而急轉直下了。

二十四日，根據周恩來報告，張學良稱，蔣就二十三日宋子文轉述西安方面之六項要求，本日具體「答覆張」，保證：

(子)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

(丑)委託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

(寅)蔣先回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

(卯)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

(辰)蔣意開國民大會。

(巳)他主張聯俄聯英美。[21]

張學良當日是否見了蔣介石，而蔣是否當面對他作出上述許諾？無論在蔣介石《西安半月記》，或在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皆無蛛絲馬跡可尋，甚至連當日蔣與張見面的事都未提及。從周恩來的報告中也不能看得很清楚，電報中只有「今日蔣答覆張」六個字。至於這究竟是蔣自己答覆張，還是兩宋轉述蔣的答覆，也不得而知。當然，這並不是說有必要懷疑張學良以上所言不是事實。聯繫二十三日夜周恩來轉述的西安方面的要求，可知在宋子文和宋美齡的直接擔保下，取得蔣對以後實行六項條件的允諾，至少還是西安方面是否放蔣的重要條件。張學良無論如何不會連這一點也棄之不顧，否則其堅持事變至今還有什麼意義？況且張學良不能，也沒有必要假傳聖旨，因為次日與兩宋的談判必然要建立蔣的這些承諾的基礎之上。問題只是在於，無論周恩來，還是楊虎城，此後都沒有能夠照原議「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周雖於二十三、四兩日見過宋美齡兩次，並於二十五日見過蔣介石，但蔣介石親口就西安方面六條做出保證者，恐怕僅此一次，而這一次卻又恰恰不能得到確切的證實，這就使得這一問題長期成為歷史的懸案，惹得後人爭論不休。

二十五日上午，在前一日張所說的蔣介石的答覆的基礎上，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最後與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商談。據周恩來當日報告談判結果如下：

(子)孔、宋組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丑)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隊已退）。

(寅)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卯)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辰)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然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巳)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午)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未)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22]

這次談判看樣子進行得相當順利，費時甚少。宋子文私下表示：「蔣過去是在抗日、親日以外走第三條路，西安事變是粉碎了蔣之第三條路，蔣不願降日，只有抗日」。他要求中共和張、楊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並希望三方能夠「爲他抗日反親日派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23]。但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周恩來等人似乎忽略了一點，就是前一日蔣介石所承認的「西北軍事歸張、楊負責」的問題，在這次談判中並沒有得到兩宋的明確保證。這在以後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麻煩。

上午談判後，蔣介石第一次接見了周恩來，因蔣病臥在床，談話很簡短。據周報告稱，蔣表示：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丑)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

(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24]

關於蔣介石在事變中曾與周恩來見面的問題，在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同樣一無所記。但此事在張學良恢復自由之後，已經兩次親口證實確有其事。儘管他的兩次說法多少有些矛盾之處，如第一次講到這件事時，稱「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但談話內容「對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不應出自我的口，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而第二次他卻乾脆講：「周恩來見蔣是我領他去的，那時蔣先生身上稍微有點傷，他們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實在外面很大的是謠傳，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他問候蔣先生，蔣先生也見到他，他自承是蔣先生當年的部下，可說三個人並沒有談什麼」[25]。一次說談話內容不能講，一旦透露，就有可能傷害到他人，一次則強調三個人沒有談什麼，特別強調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這種矛盾實在太明顯了。看起來，正如張學良所說，他人雖然已經自由，但涉及到這個問題，仍有不能講的苦衷。此事出自他人之口自然無妨，若出自他的口，則必然要傷害到他所不願意傷害到的人。

張學良究竟顧慮什麼呢？一共就三個人的談話，張學良怕傷害到誰呢？這次談話又有什麼樣的內容不能從他的嘴裡透露出來呢？一旦由他透露出來，又有誰最容易受到傷害呢？其實，這多半是一個用不著太多解釋，甚至簡直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因爲這次談話內容的外洩可能受到傷害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蔣介石。就周恩來而言，有關這次談話的報告早已公開，其言雖不盡詳細，但這次談話本來就時間不長，基本內容相信也不過爾爾。張學良再透露多少，也只能是更具體、更詳細一些罷了。何況宋美齡早對自己兩次見周的談話有過詳盡的介紹，若確有對周形象不利的談話，相信宋亦絕不會爲周加以掩飾[26]。因此，張學良再透露多少，對周都已無傷大雅。但對蔣介石就不同了。自事變之後，蔣一直否認自己曾經在西安做過任何違心的承諾與讓步，因而對自己在西安見周一事更是諱莫如深，周恩來與蔣談話報告及內容的公開披露，很顯然否定了蔣前此的說法乃至國民黨方面就此所作的宣傳。但孤證不立。只要蔣不承認，張亦不開口，周恩來的說法就永遠只能是個無法完全證實的謎。這也就是爲什麼張學良對此頗多苦衷和顧慮的原因吧？張學良出面證實周恩來確曾見過蔣介石，已經使蔣處於不利的境地，如果他再進一步證實周恩來所說基本屬實，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未做任何讓步和妥協的說法

自然完全不能成立，其過去宣傳形象受損害之大，由此實在很容易想像。這也就難怪張學良在第一次談及這一問題之後，要趕快否定自己的說法了。張畢竟與蔣還是有相當的友情，不願因此而有損於這一作古的「手足」[27]。

但不論張學良今天是否準備證實周恩來當年報告的具體內容，張對周恩來見蔣一事的肯定，已經使人們在這件事上如今更容易相信周恩來，而不那麼容易相信蔣介石了。至於蔣介石是否曾做過政治上的讓步，是否曾當面對周承諾，或蔣具體作過哪些承諾，事實上不需要張學良的進一步證詞，也可以找到足夠的文獻和證據來加以證明。這裡最明顯的證據之一，就是二十五日當天下午四點張學良幾乎是迫不及等地送蔣回京之舉。試想，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張學良早已信誓旦旦地反覆聲明：「非至抗日主張實現，殊難送委座南歸」。在頑強堅持了將近十四天之後，他又如何會在主張尚未實現的情況下，自食其言，輕易答應兩宋在臨近傍晚時分急匆匆地用飛機送蔣回京呢？

二十五日上午，因宋子文、宋美齡與西安方面面對面正式敲定一切，蔣介石又親自接見了周恩來，向周做出重要承諾，無論張學良、楊虎城還是周恩來，均認爲事變的目的已經達到。既然談判雙方均已就此達成共識，是否還有必要推延蔣回京的時間呢？鑒於二十三日晚周恩來報告「張、楊、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周恩來也曾兩度表示他認爲這樣做「是可以的」，立即送蔣回京應當沒有多少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張學良與周恩來和楊虎城之間再度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在宋子文堅請西安三方面信任他，「要蔣(介石)、宋(美齡）今日即走，張亦同意並願親身送蔣走」之後，周恩來和楊虎城卻「認爲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看起來多半是同中共中央二十四日深夜對周恩來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有關。在這個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必須堅持在下述三個條件下放蔣。第一是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第二是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第三是開始部分的釋放政治犯。中共中央強調，沒有這些條件的保證而放蔣，對於西安的地位、張、楊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安全，都將是相當危險的。相反，爲了得到這些保證，挾蔣在手還有文章可做，即使打起來，只要打幾個勝仗，就可奠定勝利的基礎[28]。

中共中央的這一考慮自然有它的道理。俗話說得好，口說無憑。僅僅根據兩宋口頭擔保和蔣的許諾，有誰能保證蔣回去不變卦？但問題是，如果蔣想變卦的話，迫使他在西安發表了公開文件，是否就不會變卦？應當看到，以武力方式逼使蔣讓步，對蔣本來就羞辱已極，蔣能在私下裡平心靜氣地作出如此讓步已屬萬分不易，再要蔣公開承認一切並要南京也隨之作出保證，豈不使蔣顏面掃地，日後何以服人？多半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張學良、楊虎城二十三日夜才明確提出可以由兩宋出面擔保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兩宋如今既已出面擔保，蔣又私下承諾，再事拖延並提出新的解決條件，特別是必欲強蔣所難發表政治文件，不可避免地會使剛剛化解的矛盾再度尖銳化起來，蔣介石今後是否會在強力下被迫簽署這屈辱的政治文件尚且不論，關鍵是拖過二十五日，很可能會引發中央軍的全面進攻，大規模戰爭將不可避免。事實上，在武力脅迫下的書面保證並不比口頭保證更有效力。何況張學良已經向兩宋許諾只要他二人擔保即可放蔣，如今僅僅爲了這一紙書面保證就推翻自己的許諾，以後的交涉又如何能夠繼續？因此，儘管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楊虎城轉而積極贊同中共中央的提議，張學良卻不以爲然。雙方當晚甚至就爲此起了爭論，至二十五日談判

結束後，三方意見仍未完全統一[29]。結果，下午周恩來再度主持有關會議就此進行討論，多數意見仍舊贊同中共中央的觀點，周恩來據此又去通知張學良，並試圖再做張的工作，「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多少讓周恩來感到可以告慰中共中央的是，蔣介石在臨行前專門召見了楊虎城，講了一些頗有誠意的話。據楊事後告訴周恩來，蔣曾當面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因此，周恩來報告中共中央說：「估計此事，蔣在此表示確有轉機，委託子文確有誠意，子文確有抗日決定與改院布置。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30]。

平心而論，西安事變得致如此結果，至少到這時為止，在各方面看來，多少都算得上是皆大歡喜。南京政府、社會輿論乃至一般民衆，對此均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則認為：「在五個條件下，恢復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儘管放蔣沒能設置先決條件，但他們同意周恩來的看法，相信「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31]。而在西安方面，雖然楊虎城因張學良走，蔣無確實保證而多少有些擔心，但據周恩來報告：「張陪蔣走後，東北軍頗團結，更接近我們，十七路軍楊、孫亦好」，「願聽我們意見」[32]。至於張學良，此時更是頗多樂觀，其雖有「負荆請罪」之想，不惜「以七尺之軀，換得主張之實現」，但確信蔣既然肯於承諾，自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實現各項承諾不過時間問題。加上宋子文一再擔保蔣決不會為難自己，必使他迅速回陝，因此他並不十分擔心個人前途。相反，他自信自己已經成就一番大事業，為此他不無自豪地公開宣告：「『雙十二』事件是我們國家存亡絕續的分野，我們自相砍殺的內戰，是要從此絕跡了，我們抗敵復土的光榮戰爭，

是馬上就要見之行動了，我們民族與國家已有了復興的希望，這顯然是我們中國劃時代的一個事件，不獨使我們可以期待著國策轉變適合了民衆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塊巨石於國際深潭，忽然飛沫四濺，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與夫野心帝國主義者的憧憬與迷夢」。他明確告誡東北軍將士說：「抗日復土的光榮責任，已經加在我們的肩頭了！……我親愛的將士們！這當然是你們無可逃避的責任，我希望你們能夠眞幹！就幹！就是我自己，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必會與東北軍的將士們共同殺敵，我本分內所應做的種種任務，我絕不絲毫忽略稍稍放鬆。關於這一點，你們務必放心，努力去幹，不要有任何的躊躇和疑慮」。很淸楚，張學良確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已經達到了他所期望的基本目的，整個國家乃至他自己，從此都已步入了「民族解放鬥爭的開端」，踏上了「民族復興的起點」[33]。

第二節　風雲突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等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往洛陽。自此，歷時近十四天之久的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宣告和平解決。此時此刻，張學良的心情想必格外複雜。在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之後，為實踐自己關於「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的公開承諾，張學良不能不出此下策，親自護衛蔣介石出險並準備接受南京當局的任何處罰。此舉就張學良而言，實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事變之初，張學良其實並無此種主張，但事變發生後，國內各方面曲解誤會之深有口難辯。迫於無奈，在北平大學校長蔣夢麟等致函張學良，強調其必須立即「衛護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可自贖於國人」之後，張就下定決心，為

證明「弟等此舉，任何方面皆爲對事而非對人，尤確信其節極端純潔，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爲身謀」，一旦蔣介石改弦更張，即「束身歸罪，誓所不辭」[34]。正因爲如此，張學良於二十六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蔣介石，表示此次「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35]。

但張學良之放蔣乃至負荆請罪，絲毫不等於說張學良對自己發動事變之行爲有任何悔悟之表示。張學良之請罪，請的是「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並非自認事變和主張有何等之不妥[36]。三十一日，張學良被交付南京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庭會審時，曾再度明白宣稱自己對發動西安事變並不後悔。他在法庭上仍堅持認爲，他發動事變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說：「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不斷地將我們的意見報告給蔣委員長，一切都出於正當的愛國的目的，但我們無法勸說蔣委員長改變此種政策，甚至蔣委員長還命令警察向愛國學生開槍，所以我纔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要知道，「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希望，也就不作此事了」。問題是沒有。張學良特別強調指出，他至今不認爲自己這樣做有什麼不對。他聲稱：除了對自己違反紀律、損害領袖尊嚴表示承認並願意領罪外，「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37]。

既然事變是必要的，政治主張是正確的，張學良當然不認爲自己結束事變是出於一種對錯誤的懺悔。恰恰相反，張學良在期待著，他相信他已經通過事變成功地改變了蔣介石的政策，現在盼只盼蔣介石能夠實踐允諾，具體施行新政策了。張學良最初顯然把事情考慮得過於簡單了。因此，當他到洛陽及南京後，發現蔣介石所言所行與前並無明顯不同，而南京政治空氣依舊十分惡劣，其內心很顯然感到不快。

儘管他能夠理解蔣介石這樣做的苦衷，蔣介石也繼續在私下裡向他保證不會食言，但他很快就不那麼樂觀了。到南京的第二天，即二十七日晚，他在寫給楊虎城的親筆信中表現出了一種頗爲矛盾的心境。他指出：「京中空氣甚不良」，「委座在京之困難，恐有甚於陝地者」，因此，「委座爲環境關係，總有許（多）官樣文章，以轉還（圜）京中無味之風」，好在「子文兄及蔣夫人十分努力」，並且對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鄭重告弟，必使實現，以重信義」[38]。直至三十一日，南京政府雖判張十年徒刑，因蔣介石向他擔保很快會下特赦令予以特赦，宋子文也明確保證張學良只需要再等五天即可特赦返回，張學良仍舊對蔣力踐其諾抱以多少期望，並自信很快能夠再回西安。他在前一天給毛澤東的信函中特別說明：「弟在此盡力奮鬥，雖多困難，尚可（屬）順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幾天即回」[39]。其送回西安發表的告東北將士書，也表明了同樣的期望與信心[40]。

不過，如今張學良已經捏在人家的手中，南京又是這樣一種的空氣和環境，蔣難道不會受其影響而重蹈覆轍？還在張學良決心送蔣回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來就已經預言：「蔣目前在西安環境中有抗日願望，但南京環境不改，他又將回到動搖中去」[41]。因此，事變剛剛結束，西安方面的領導人就頗多懷疑與擔心。爲此，二十五日下午張送蔣走之後，楊虎城第二天就找周恩來商量應將蔣之承諾公之於衆，周也表贊同。由於此前與兩宋的談判並無任何文件與記錄，二十四日蔣介石答應張學良的六項內容在二十五日談判中已有改動，二十五日兩宋的擔保內容也只是在一種討論的形式中大致確定下來，因此如何將蔣之允諾歸納成文字，成了一件頗爲複雜的事情。周恩來提議，可以具體歸納整理爲五條公開發表。據周恩來當日中午的電報可知，周恩來歸納的五條是：

(子)停戰撤兵，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

(丑)改組南京政府。

(寅)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釋放愛國領袖，保障民主。

(辰)改變外交方針，聯合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42]

但周恩來的上述歸納，不論是楊虎城周圍的幕僚們，還是這時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認爲未能準確概括二十五日談判的成果。結果，經過楊虎城、王菊人等修改後正式公開的文字，以及經過毛澤東重新整理概括的文字，都與周恩來概括的五條有著一定程度上的明顯差別。西安二十七日《解放日報》正式公布的條件已成爲六條，將停戰撤兵及西北軍歸張、楊主持一條改爲三條，將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內容取消，相關要求併入改組政府和停止內戰的條款內。其具體文字如下：

(一)明令中央入關之部隊於二十五日起調出潼關。

(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

(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之國家。

(五)釋放上海各被捕領袖，即下令辦理。

(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43]

而毛澤東於二十八日公開發表的文件，則將這些條件概括爲：

(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44]

對照二十五日西安三方與兩宋談判結果，可以看出，上述兩種概括都有其根據，但前者盡量迴避可能引起麻煩的政治敏感問題，著重於停戰、改府，特別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對西北軍政的實際控制；而後者則盡可能突出談判結果的政治變革特點，強調改組政府、釋放政治犯，特別是聯合紅軍與召開可以決定大政方針的救國會議。相比較而言，由於兩宋擔保的條件中並沒有涉及到西北軍政問題，相反卻較多地肯定了政治變革的必要，因而後者的概括看起來更接近兩宋答應擔保的內容。

不過，在事變剛剛結束就把得到蔣介石私下承諾，由兩宋秘密擔保的讓步條件捅出來，策略上是否妥當，卻是值得考慮的。事情明擺著，蔣介石之所以不曾做文字上的和公開的政治承諾，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爲，這樣做的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從根本上嚴重損害其政治的形象和統治的權威性。因此，儘管蔣介石事實上在西安做出了重要的承諾，他一離開西安，就迫不及等地把陳布雷叫來，搞了一個〈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的訓詞〉，大談此次事變中自己始終未曾妥協，「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簽一個字也會使國家歸於滅亡[45]。其目的就是要避免人們會因爲他的突然獲釋而懷疑他有所妥協。這固然純粹只是張學良所說的「官樣文章」，但對保持蔣的威信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楊虎城，甚至中共方面準備承認和擁護蔣來領導中國的統一與抗日

的發動，並寄希望於通過蔣介石來實現他在西安所做的承諾，自然也應當設法爲蔣暫時保守這個秘密，而不是去張揚它，使蔣處於尷尬的境地。很明顯，如果西安方面保持一種比較策略的靈活態度，使蔣得以保持其尊嚴，那麼，蔣若有心實踐其承諾，將比較容易借用各種藉口來實行之。反之，如果西安方面不給蔣留面子，公開張揚其在西安所做的承諾，這只能使蔣在言論上和行動上都不得不極力否認，以致轉而堅持強硬態度，以便證實自己從未屈服。

匆忙公布蔣介石所謂承諾的不利後果幾乎立即就表現出來了。在上海的潘漢年很快來電，說明：宋子文曾專門告訴他，「蔣宋責備我們宣布西安協定無信義」。宋子文和宋美齡甚至爲此大發脾氣，要宋慶齡轉告中共代表：第一，西安不顧信義，宣布秘密承諾，已使他（她）們難以出面說項；第二，無論如何不得再宣布他們的談話內容，否則他（她）們將退出調停工作；第三，如今改組等事已相當難以進行，必須待以時日，須秘密策動英美輿論醞釀時局。正因爲如此，共產國際也很快就來電批評中共，聲稱「不要老是叫喊蔣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麼保證」，而中共中央自己也日漸意識到，過早地公開蔣介石的承諾，在策略上是不妥的㊻。

不難想像，楊虎城急於公開蔣介石在西安所做出的承諾，多半是基於對蔣和南京的嚴重不信任，寄希望於用公開蔣的承諾的方法來加強輿論對蔣的壓力，避免蔣及南京可能的報復。但就中共中央而言，公開蔣的承諾固然包含有對蔣的某種不信任，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們最初對事變所取得的成就估計過高，相信西安事變使自己獲得了足以逼迫蔣就範的強有力資本。中共中央這時認爲，西安事變取得了五個重大的勝利，一是結束了國民黨的對日妥協的錯誤政策；二是結束了十年的內戰，開始了抗戰的階段；三是迫使蔣介石國民黨下決心聯俄聯

共；四是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的地位，降低了蔣介石的威信；五是建立起以共產黨爲實際領導的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中心。因此，中共中央確信，內戰已經基本結束，抗戰即將開始，蔣介石已經承認了西北的地位，承認了紅軍的地位，再也奈何自己不得。徹底實現抗日任務，結束蔣介石的動搖，固然還需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但「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所許諾的條件，即停止內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共產黨，召開救國會議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與實行對日抗戰等條件」，是完全可能的㊼。可以看出，由於對西安事變後的總體形勢估計過於樂觀，中共中央這時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開蔣介石的承諾，將是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就範的一種有效的形式。

中共對形勢的這種樂觀估計，在事變過後的一段時間裡，表現得十分明顯。如蔣介石二十七日發表〈對張楊的訓詞〉，儘管只是一篇官樣文章，毛澤東仍於次日迅速發表尖銳批評文章，警告其不要食言㊽。如二十九日周恩來與博古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宋子文改組政府，張學良回陝指日可待，應立即準備討論新形勢下全國及西北工作的各項問題，包括「準備政府改組後我方去南京談判之綱領」、「宋登臺後我方去滬人選及所要接洽各問題」、「救國會及救國會議促成會在全國活動問題」、關於西北三方政治軍事合作的共同綱領、國防計劃、防區劃分、聯合參謀團、聯合軍校及兵工被服糧秣交通器材各工廠之設置，儲蓄與交通運輸之計劃等。他們還特別強調，即使是孔祥熙、宋子文照約定改組的政府，仍「應當以過渡政府看待」，「我們應與他每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因此，目前的方針應該是：「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爲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派」，而使局勢開展的一個重要的中心環節就是鞏固西北，「將西北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

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爲現實性」。進而「以西北爲中心，以抗日爲目的和條件，爲推動南京向左之力量」，使自己不僅在西北，而且在全國，成爲「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49]。至三十一日，雖得到張學良二十七日信，周恩來等仍舊認爲，南京方面總的形勢是好的，張學良形式上雖被審判，但很快被特赦放回，改組政府的進行也不會因此而停頓。其電稱：「蔣回南京後，黃埔、CC 均聽命無動靜，親日派頗活躍並引日寇自重，宋氏兄妹在奮鬥中，張須待特赦令下始回，蔣宋今回奉化，似有促進政變可能」[50]。

但張學良被判刑的消息傳來之後，特別是南京電臺三十一日關於「剿匪、除奸、禦侮」三項方針宣布以後，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終於開始發現，事情的發展趨勢遠不是像自己最初想像的那樣順利。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晚，周恩來得知南京有以王樹常取代張學良之訊，何應欽似乎正在部署軍事，威脅東北軍將領受命，並逼使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各起分化，試圖造成局部內戰，以內亂爲名解決西北。據此，他深感必須急謀對策，因而主張：應以團結西北，保持和平，完成統一爲口號，要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通電蔣介石，請令張學良速回西北，主持一切，同時軍事上要有必要的準備。毛澤東也進一步得到破譯的南京軍隊內部電報，得知十二月三十一日何應欽已命令劉峙將東撤各軍原地停止，舉行演習。一月一日何應欽已電示李默庵部，稱張、楊已與紅軍聯合，形勢緊急，李軍應以演習爲名，秘密向陝西雒南推進。毛澤東當即判斷情況有變，因此指示周恩來：「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下臺，有最後掙扎，扣留李毅，進攻西安之危險」，「政局已起變化，請立即如下處置：

甲、與楊、王等商團結對敵。

乙、秘密通令東北、西北兩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

丙、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雒南、商都、藍田之陣地爲堅守計。

丁、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

戊、加緊晉、綏、川、桂、直、魯之活動，反對內戰。」[51]

當然，中共中央絲毫不想因此而重新捲入戰爭。爲此，他們一面進行部隊動員，進行防禦作戰的準備工作，一面則爲避免何應欽以紅軍挑釁爲名找到進攻口實，再三電令前線部隊不得與南京軍隊進行任何接觸，並勸告王以哲對胡宗南之進攻亦採取同樣態度，甚至不惜讓出部分防地。毛澤東爲此還特別致電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接洽，說明「紅軍全部已集結訓練，靜待劃定防地，準備抗日，絕無擾亂中央軍及侵入國民黨統治區域之企圖」，請陳立夫等務必出面活動，商洽挽救危局之方法。而考慮到張學良被扣於南京，東北軍乃至西北軍處此嚴重關頭，難免內部意見分歧，以致出現動搖與分裂，他們也特別告誡在西安的周恩來等，在爭取左派，肅清右派，速謀張、楊、我三軍之團結，力保西安勝利的前提下，亦應做好消極準備，爲此應把工作中心放在爭取張、楊兩部某些部隊掌握在可靠者手中，以防不測[52]。

一月二日，西安方面更加證實：張學良原住宋子文處，三十一日被審後押入孔祥熙宅即失去自由。潼關以東中央軍業已回師，藉口是西安方面至今不允通車，陰謀赤化。周恩來亦據此估計說：「南京親日派在製造政治陰謀，軍事威脅，以演成西北內亂，便於武力解決，使張無法回陝」，目前必須一面堅持呼籲和平，反對內戰，一面加緊軍事準備。因此，周恩來與楊虎城以及王以哲、于學忠、董英斌等商定，一面由楊虎城等領銜分別致電蔣介石、宋子文等，促張速回，一面鞏

固左派勢力，推動上層將領，密切三方關係，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加緊備戰，同時並速調紅軍主力南下栒邑、淳化，做好參戰準備。

一月三日，南京方面用電話通知西安楊虎城等，提出南京政府準備給楊以革職留任的處分，另以孫蔚如代理陝西省主席，王樹常爲甘肅綏靖主任，要求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將領發通電表示擁護。四日，南京方面再度用電話通知楊虎城，中央已決定派顧祝同任西安行營主任駐陝，並要求東北軍立即恢復西安事變以前的位置，十七路軍主力立即開回陝北。南京此舉顯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東西大道，進而拆散西北三位一體，否定西北特殊地位。這自然與張學良轉達的蔣二十四日關於「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即使是與二十五日兩宋保證的「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的條件也不相符合。無須說，在做了這樣一件令世人震驚的「犯上」、「謀反」的大事之後，西安方面，特別是楊虎城和諸多東北軍中高層軍官，最爲擔心的就是蔣介石的報復。他們清楚地知道，保持三位一體，是他們避免遭蔣報復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一旦三位一體被拆散，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很容易被分而治之，那時即使不施以武力，所有參加事變並負有直接責任的將領，都難免不受到嚴厲懲罰。楊虎城對此更是再清楚不過了。因此，對於南京的做法，楊虎城從一開始就採取了堅決的抵制態度，準備「爲自衛計，爲貫徹主張計，誓必與之周旋到底」。楊虎城在電話裡明確告訴南京方面，張學良不回來，西北的一切政治軍事問題都不能解決。楊並於南京政府準備對張學良頒布特赦的一月四日致電宋子文稱：「我兄前電曾謂漢公可於五日離京返陝，現此間一切亟待主持，漢公一日不返，則軍民一日不安」[53]。

四日是南京方面準備宣布對張學良予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這一天，西安方面卻已經斷定：「寧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間

分化而便（於）用兵」。因此，周恩來、葉劍英、楊虎城、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等當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開會詳細討論了作戰問題，擬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該計劃包括以下內容：

㈠估計南京中央軍正在調集二十五個師以上的兵力，組成十四個縱隊，準備向西北抗日聯軍（東北軍、十七路和紅軍）發動進攻。

㈡西北抗日聯軍以萬不得已時決以一部箝制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集團，集中主力首先消滅由潼關西進之敵，停止其進攻。

具體計劃：東線從渭南赤水至長安構築七道防線，配置六個師的兵力鞏固正面。同時集結步兵三個師以上及騎兵兩個師於渭北，準備向南實施堅決突擊，殲敵於渭河以北黃河以西。爲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藍田、商縣一帶，以一部兵力依托秦嶺，以運動戰與游擊戰，遲阻北來之李默庵縱隊。紅軍主力秘密集結於淳化、栒邑地區，準備能以三天行程，經三原趕到高陵的機動位置，依情況參加渭北決戰，或經藍田突擊李縱隊，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迴。西線，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學忠兩部對胡宗南東西兩側形成威脅，紅軍一部尾隨胡敵箝制之。北線，則主要以孫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線，紅軍一部警戒瓦窰堡、清澗一線。會議並且決定，由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組成秘密的三人團，以爲領導核心（張學良未歸時由何柱國或王以哲代），張學良爲總指揮，目前則根據張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楊虎城統一指揮[54]。

中共中央這時的估計與西安方面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也同樣認定：「南京親日派當權，改組政府暫時無望，李毅被扣，撤退之兵重新西進，隴海路又斷，西安又處戰時狀態」，但「南京報復派現在沒有政治口號，只能偷偷摸摸的幹，希望嚇一嚇，把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等嚇得就範，然後慢慢宰割，孤立紅軍。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眞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

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因此，他們明確表示基本同意西安方面所商定的作戰計劃，主張一方面速發「擁蔣迎張通電」，一方面迅速部署作戰行動[55]。

在一月四日以後，迎張之議已明顯地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這一天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張學良所處十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將張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56]。交軍委會云云，實際上也就是由蔣介石處置罷了。蔣對張之難予諒解，並必欲藉機控制西北，至此已昭然若揭。蔣的計劃在他隨後給顧祝同的電報中講得很明白。他指示說：「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軍能有一部和平進駐西安城，然後相機再用根本解決是上策；其次使東北軍能離陝入隴，『赤匪』旁觀中立，俾楊逆孤立心寒，然後攻之亦不失爲中策。望照此意運用進行」。

宋子文對此看來毫無準備，其保證張學良回陝都不能做到，前此「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云云，自然更是成爲一廂情願的白日夢。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懇求也好，威脅也好，結果如何，可想而知。更爲重要的是，兩天後，即六日，西安方面已經得到南京關於整理陝甘軍事的具體辦法如下：

一、顧祝同爲西安行營主任。
二、王樹常爲甘肅綏靖主任。
三、楊虎城爲西安綏靖主任。
四、馮欽哉爲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
五、楊虎城、于學忠自請處分，從寬處理，撤職留任，帶罪圖功。
六、中央軍萬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萬鐘各部及李縱隊分駐潼關、朝邑、渭南至西安、寶雞至天水一帶，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等部仍駐現地。
七、十七路軍及直屬各警衛旅等，移駐正寧、栒邑，淳化、耀縣、永壽、靈臺、寧縣、長武、邠縣等地。孫蔚如師移駐甘泉、鄜縣，中部、宜君等縣。馮欽哉部另編第二十七路軍仍駐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陽、韓城、宜川等縣原防。
八、東北軍一律恢復十二月十二日前之原位置，即全部駐防甘肅。

南京方面的這一處置更進一步表明，蔣介石絕不打算將西北交給張學良和楊虎城，他不僅決心全面控制陝西及其貫穿陝甘兩省之主要交通線，將東北軍置於甘北與中央軍雜處，將十七路軍置於陝北，使其夾在中央軍與紅軍之間，並且再不準備讓張學良回東北軍。爲達此目的，蔣這時並有電報給顧祝同、劉峙等，提醒他們：「對陝策略，應以政治爲主，軍事爲從」，「又望以軍事威脅爲手段，而達到政治解決之目的」。因此，西北的形勢益形緊張。

自從被押入孔祥熙寓所，失去行動自由以後，張學良已開始意識到蔣有食言之可能。其間，宋子文雖仍舊向他保證可以很快特赦回陝，張也只能是將信將疑。四日南京政府將其無限期交軍委會嚴加管束後，張憤懣之情，溢於言表[57]。張學良此前明顯地沒有估計到蔣最終會有這一手。在成就了這番大事業之後，他始終對蔣在西安時的誠懇態度表示抱以信任，相信自己所作所爲純爲國家社稷著想，又勇於束身歸罪，蔣對此已充分諒解並承諾在先，且有兩宋擔保，依蔣之領袖胸襟，當不會對自己怎麼樣。至洛陽、南京後，知蔣公開講話毫無政治革新

之意，張已經頗感意外，但宋子文頻頻擔保，又考慮到蔣必須維護自身形象，故相信這多半只是一種必要的官樣文章。至十年判決書下達，行動自由盡失，張更是頗多不滿，但此時宋子文、孔祥熙均保證他將很快獲得特赦，至遲一月五日即可回陝，張不免仍存有某些幻想。然而四日政府令下，張恍然明白自己實已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蔣不僅不會允許自己再回東北軍，重掌兵權，而且恐怕還要對其東北軍有所不利。張內心之沮喪，可想而知。

但是，張學良畢竟仍舊年輕，且剛剛陷入如此逆境中，難免不會再生多少幻想。一月七日，蔣介石派戴笠送信給張學良，張學良被告知，他之交軍委會管束，純爲國府開會時多數意見，「中此時正在休假，不便於明令甫頒之際，向中央頻頻陳述」，好在「主權已赦，此節將來不難補救」，「稍緩即爲續請」。儘管蔣在信中軟硬兼施，一面聲稱願意約張前去奉化家鄉同遊，告其中央對陝甘善後問題的處置「全在於政治，而不用軍事」，一面威脅張務必勸告東北軍集中甘肅，十七路軍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餘均駐防陝北，否則即爲抗命，斷言「國家對抗命者之制裁，決不能比附於內戰」。但張學良從蔣介石的解釋與垂顧中仍舊感覺到自己尚有釋放的可能，因而「態度轉好，語亦平和，渠亦允派王化一、吳瀚濤持其手書飛陝，晤楊虎城、王以哲、劉多荃等」[58]。在其給楊虎城以及東北軍將領的信中，特別說明蔣並未直接與聞對自己的處理，他「對中央之處置，似亦不滿意，但爲中央威信計，諒亦有爲難處」。但正因爲如此，「此事仍有轉圜辦法」，待自己到奉化後定可設法。他甚至告訴楊虎城說：「委座另囑，彼決不負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達，但時間問題耳，請兄稍忍一時，勿興亂國之機也」[59]。

同一天，張學良更主動向蔣提出甲乙兩案，以爲根本解決陝甘問題的參考。在張寫給蔣介石的信中，他特別寫道：「陝甘問題，良十分憂心，非只慮於陝甘，所慮者大局形勢以內亂延長對外問題耳」。據此，他甚至明確建議說：「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其建議即屬於止火之策。甲乙兩案的內容如何呢？現照錄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整理訓練，擔任國防工程，由良負責調出及整理。

二、請虎城出洋考察養病半年，不開缺，以孫蔚如代理，由鈞座給予充分之款項，對日發動，即召返國。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陽，最好到潼關或臨潼，由啓予或龐炳勛派兵陪同前往，請虎城及各軍長來會商。

乙、匪不剿

一、調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劉經扶爲西北行營主任，以龐（炳勛）、商（震）、蕭之楚、萬（耀煌）等軍駐陝。

二、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良幫助整理完畢，良願去讀書。

關於虎城講話問題，良以爲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協同良到潼關或到馮欽哉防地，請虎城來談。[60]

從上述兩案中，我們不難發現張學良的態度較前有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張已不再堅持反對南京進行剿共戰爭了；第二，張已不再主張保持西北三位一體，力求東北軍能夠遠離中共與紅軍。要知道，僅僅在幾天之前，張學良還給毛澤東去過信，對繼續推行西安事變的政治主張和與紅軍合作，表現出十分積極的態度，而今張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是爲什麼呢？

要具體解釋張學良這種出人意料的態度變化,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分析張學良前後幾封信所表露的心情，可以肯定，張學良如此提議，第一是爲「保東北軍僅有（之）實力」；第二是希望以此取信於蔣，使蔣能夠如其所允，「稍緩即爲續請」政府恢復其自由。爲什麼要保全東北軍的實力，要讓蔣介石同意恢復他的自由，必須要部分地改變他對中共和紅軍問題的態度呢？這裡面的道理其實很明顯。張學良深知，對他的扣押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西安方面與南京軍隊的全面對抗，這種對抗若無中共與紅軍的支持，以東北軍的作戰能力，必然歸於失敗而被消滅；若得到紅軍的支持，戰爭必然長期化，結果亦未必樂觀。這是因爲，統帥多年，張很清楚東北軍將領向來只服從於他一人，離開他的指揮，其內部必然意見分歧，最終難免不出現四分五裂的局面，東北軍同樣會因此而損失殆盡。況且，一旦戰爭爆發，不論勝負，他張學良在蔣介石和南京主戰派的眼裡，如同前此蔣介石在自己手裡一樣，不僅更無返回之可能，而且更是罪無可赦。鑒於這種情況，張無論如何不能贊同西安方面採取反抗態度。他之所以再三告誡楊虎城和東北軍各將領千萬不要發生內戰，其原因也就在於此。他深信，如果西安方面能夠表現出順從的和平態度，蔣多少還會借用他的影響力來加速西北問題的解決，那時「良之出處……即不成問題」。當然，要使蔣及南京方面能夠切實對自己及其東北軍取得諒解，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要與中共及紅軍斷絕關係，使這一問題聽憑政府處置。西北的三位一體存在一天，甚至東北軍與紅軍的友好關係存在一天，蔣介石就一天不會信任自己，因此，要想讓蔣介石不再對自己和東北軍高度戒備，主動建議將東北軍調離西北，使之與紅軍脫離接觸，不失爲一種有效的策略。而事實上，蔣所提方案將東北軍置於邊遠貧瘠的甘北地區，不僅仍使東北軍處於危險之中，使自己難以返回，而且對穩定東

北軍的軍心也十分不利。在自己深陷囚籠的情況下，張深知再也無法左右蔣之政策，爲東北軍前途考慮，南京剿匪也罷，不剿匪也罷，已非自己所能置言者，但盡早把東北軍從陝甘調開，使之徹底脫離內戰危險卻是可以爭取的。

張學良這時對恢復自由仍有頗多期待，自然與蔣介石這時的許願有關。正因爲蔣仍舊注意給他以某種期望，因而使得他不能不格外關心西北問題的處理與前途。從張學良所提甲、乙兩案的具體表述可以看出，張還是強烈地希望蔣介石能夠允許自己在西北善後方面發揮作用的，其目的也是想要通過這種方法證實自己的誠意，求得日後自由之恢復。他當然最希望南京方面能夠允許他恢復軍職，繼續負責東北軍的指揮與整理(如甲案)；次而言之，他至少希望南京方面能夠允許他協助部隊整理，然後恢復其自由，但不再擔負軍職(如乙案)。只可惜，蔣介石並不能夠因此就對張學良增加多少諒解。蔣介石修改後的無論甲案或乙案，均未考慮借助張學良來調動或整理東北軍的問題，更談不上恢復張的軍職的問題了，就連張所請求的以後「願去讀書」一項，也不予批准。蔣修訂的甲乙兩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甘肅。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該路得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

附記：陝西綏靖公署或移設三原亦可。

三、自潼關至寶鷄沿鐵路各縣，歸中央軍駐紮（鐵路線各縣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隊駐紮）。

乙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豫皖兩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陽、襄樊、信陽一帶。

二、以王樹常（或漢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調楊虎城爲甘肅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總指揮，第十七路軍全部調駐甘肅。[61]

從蔣介石修改的甲乙兩案可以看出，蔣仍舊寄希望於西安方面能夠接受南京原提方案。對於張學良所提乙案，並不十分強調，並且也不同意讓東北軍駐在過於靠近京漢路的湖北，主張以駐安徽爲好。從這裡，或可看出，蔣之所以內心並不十分贊成乙案，很大程度上恐怕是不想讓難以信任的東北軍過於接近具有更大戰略意義的比較富庶的中國心臟地區，相信即使存在著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三位一體的結盟問題，讓這些軍隊在中央軍的監視下，處於偏遠貧瘠的西北地區，也比把東北軍整個搬到中國心臟地區來的好。這大概也就是爲什麼蔣這時更希望西北方面接受甲案，只是用乙案來要挾楊虎城痛痛快快地讓出西安至潼關的交通要道，交給中央軍來控制的原因。

可以肯定，甲案既不改變西北三方前此駐軍的大局，又不直接破壞現存的西北三位一體，對於西安方面無論如何要比乙案更容易接受。但西北三方最初顯然不作如此設想。

儘管周恩來等早就估計到張學良不會被釋放，但張學良被公開宣布嚴加管束後，東北軍將領以及楊虎城等仍舊十分震驚。七日，宋子文更進一步致電楊虎城，表示對前所承擔的斡旋事難有所爲，不得不即告退出。此舉更使西北方面對和平感到絕望。不容否認，西安事變之後，西北三方始終在設法保持西北半獨立的局面。特別是中共中央，事變後一直強調要通過三位一體的政治軍事聯盟，將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獨立局面。在得知南京不僅堅持不放張學良回來，而且還要在西安設立行營，不顧前諾堅持要派大批中央軍進駐西北，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後，它自然要堅決表示反對。中共中央明確認爲：「顧來則張、楊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因此，他們專門致電潘漢年，要其務必告訴陳立夫等，「南京採取報復政策，不但於國民黨及蔣氏的地位有損，且絕對無益於西北善後的解決」。「正當解決之先決辦法是撤兵釋張，現兵既復進，對張欲赦又拘，此適足激動西北之軍心民心」。「如蔣氏及陳（立夫）、鄧（文儀）、張（冲）等人仍維持西安商定之六個和平解決條件，便須立即撤兵，並立即釋張」。與此同時，他們確信：「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祝同）迎張（學良）」。爲此，他們明確指示周恩來等，使「張、楊兩軍速築堅固陣地，紅軍擔任野戰，堅決爲保衛西北革命局面奮鬥到底，決不爲南京和平空氣所鬆懈。如此幹法，才能求得和平，廣西前事可證」[62]。周恩來作爲紅軍代表堅持這樣一種態度，對西安其他兩方自然有重要的影響。

當然，對於張學良失去自由，這時在態度上反應最爲激烈的其實還是東北軍的各級軍官。在西安的原東北軍同志會中那些最受張學良信任的激進的年輕軍官不用說了，就是在前線的大批師團營以上的幹部，也都是情緒激昂，求戰心切。就連王以哲、何柱國等高級將領也積極主戰。但值得注意的是，據周恩來多次報告可知，此時十七路士氣不旺，戰鬥力弱，不能用於攻，尤怕飛機，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東北軍師團級將領情緒甚高，急願一戰，士氣甚旺，但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進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因此野戰能力不甚強。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東北軍還是十七路軍，對紅軍到來都極其歡迎，並抱以極大期望，以致兩方都有依賴紅軍心理，對萬一西安不守他們不願設

想。在這種情況下，幾萬紅軍的責任變得異常重大。

紅軍的特長在於野戰，即要靠靈活機動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來克敵制勝。這就要求紅軍在作戰時要有極大的行動自由，要盡可能少地進行純粹防禦性的內線作戰，要隨時準備爲大踏步地轉入外線作戰而放棄已有的城鎮與陣地。所有這些作戰方法，對於在西安以及周圍城市中擁有重要資財、大批家眷和各種重要利益的十七路軍與東北軍來說，都是難予接受的。因此，中共紅軍在作戰方法及其戰略設想方面，一開始就與楊虎城和西北抗日聯軍臨時軍委會的意見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再加上三方軍隊又從未曾協同作戰，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戰鬥力以及部隊內部的鞏固情況又頗難讓人放心。因此，這種聯合作戰事實上面臨很多困難，效果如何也頗難確定。爲此，從一開始中共中央就不能不要求周恩來與楊虎城及西北聯軍臨時軍委約法三章。即㈠不論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彼此間統以抗日聯軍統率下的友軍看待，惟東北軍、十七路軍仍用國民黨旗幟，紅軍仍用紅旗，但番號統稱抗日聯軍，紅軍編爲第三集團軍；㈡在開戰後，原則上一律依照聯軍臨時軍委會命令協同作戰，但紅軍一般的避免與友軍在同一戰場作戰，紅軍擔任單獨的一方面，以免指揮不合拍，勝則見忌，敗則見怪，洩露機密，相形見絀等不利情事；㈢在不與聯軍的戰略意圖相違背的情況下，紅軍保持單獨的指揮系統[63]。因此，毛澤東這時爲紅軍擬定的作戰計劃，仍舊是如西安事變期間的戰略設想一樣，堅持紅軍主力要實行外線作戰。毛的計劃是：一旦開戰，要爭取紅軍主力第一步出商雒，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漢路，以此來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同時留二方面軍在渭北策應友軍的內線作戰，以內線作戰之友軍與紅軍同外線作戰之紅軍主力互相策應，實現戰略上的配合[64]。

至一月上旬末，東北軍、十七路軍已陸續在前線各戰略要點與中央軍發生接觸，兩軍一百餘名軍官更聯名通電表示準備與中央軍周旋到底，西安各界甚至舉行十萬人以上的群衆集會，對南京示威。紅軍主力這時也已進至三原、耀縣、淳化一帶，紅軍十五軍團更隱蔽地越過隴海線，開始向陝南商縣一帶前進，準備必要時更以紅軍主力南下商縣，或配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等會殲進攻藺家鎮、孝義鎮、固市鎮主陣地的中央軍於平信鎮、官路鎮、來化鎮及定通鎮地域，或出潼關、洛陽間襲擾東進之中央軍，實行戰略突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剛剛平息了的全面內戰的烽火，轉瞬間又重新在西北燃燒起來了。

第三節　福兮禍兮?

眼看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西安方面的情況卻突然間開始出現了某些細微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原因多半在於，一月九日這一天，西安方面，特別是中共中央了解到以下這些情況：第一，蔣介石九日有電報給楊虎城，明確保證他將貫徹和平之宗旨，決不至有戰爭行動，且軍事善後辦法仍可與顧祝同詳加商討，要求楊虎城務必約束西北之部隊，保持冷靜態度，不做輕率表示[65]。第二，前東北教育會會長王化一、同爲東北人的國民黨監察委員吳翰濤受命攜張學良一月七日給楊虎城及東北軍各將領的信飛抵西安。張在信中已明確表明反對戰爭的態度，要求西安方面務必堅持和平，「稍忍一時，勿興亂國之機」。第三，潘漢年與國民黨談判代表張冲同到潼關，潘一人進入西安，說明：「蔣召張冲至奉化，告以三事：一、漢卿留京參加工作；二、西北問題政治解決；三、同我方談判根據與周所談基礎續談下去，並要周到奉化密談」。第四，潘漢年曾與蘇聯在南京的代表密談，據對方說：蔣離開南

京去奉化養病前曾數次與蘇聯大使談，蘇聯大使認爲：「蔣之所爲與遠方意合」，只不過蔣估計日本至少在一年內還不會向中國或蘇聯宣戰，因此蘇聯代表認爲：「蔣對我方及西北問題意在拖延時日」，他們極力主張不要因此而形成對立，並「急望我們和平」解決與南京方面的關係問題[66]。

其實，關於西北善後問題的處理，還在蔣介石回到南京之後的第三天就委託張冲等告訴潘漢年，請中共務必暫時靜默，以免外交發生困難及不利，影響雙方的進一步談判。一月四日，當中共明顯地對南京處理西北問題的方式表示不滿之際，蔣介石又特別委託張冲要潘漢年轉告中共中央：關於西北善後，南京決採政治方式解決，但主張漢卿先生暫留南京工作。至於兩黨關係，亦準備根據過去周恩來與蔣先生在西安談話基礎繼續商洽，以求協調。同時，還派張冲前往西安，準備接周恩來南下會商一切。鑒於此，中共中央也明確主張周恩來等在西安只在幕後團結東北及十七路軍，不要太露頭角，強調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的通電務必說明擁蔣眞意，甚至要求西安的報刊宣傳不要過於尖銳，但問題是，中共中央最初確定的目標較高，不僅堅持要張學良回來，而且要爭取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堅決主張拒絕中央軍入陝，強調一定要「眞正的硬一下」[67]，而南京方面又復以大軍西進，西安與南京遂成劍拔弩張之勢。就連周恩來也感到，面對這樣一種嚴峻的形勢，在三位一體軍事政治聯繫如此緊密的條件下，中共和紅軍要想保持調人的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的態度最初始終是與西安兩方的態度完全一致的，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要潘漢年告訴蔣介石的代表：「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但須在下列條件之下：㈠立即撤兵；㈡立即釋放張學良回陝；㈢保證西安協定之實行」。「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張學良去寧已上了大當」，必須「在撤兵釋張改組政府實行後，即證明南京尚願顧全信義時，可去南京一行」[68]。

要堅持上述條件，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南京方面發生衝突，這種情況在一月上旬已經是再明白不過的事了。問題是，在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之後，爲此而大打內戰，在策略上，以及在政治上是否有利？一月九日張學良的信件，以及潘漢年帶來的種種情報都顯示，如果適當忍耐和降低條件，並非完全沒有消弭戰爭的可能。因此，周恩來建議，蔣介石雖對控制西北不會放手，何應欽也仍會試探軍事解決的可能性，但目前仍有和平可能，我們應拉攏蔣、宋，「非至萬不得已，紅軍決不輕易參戰」。就在得到周恩來轉報的上述情況的當天，中共中央也迅速發來電報指示給周恩來，贊成採取力主和平的態度，強調宣傳和平，拉攏蔣宋，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此方針應使楊、何、孫、王、繆、劉、杜、黃及宣傳委員會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傳」。不過，中共中央這時仍舊主張，前此的條件一般不應有太多的變化，只是可以考慮立即寫信給蔣介石，進一步請蔣撤兵、釋張和改組政府，保證「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用全力贊助蔣」。據此，周恩來於十一日專門致函蔣介石，請蔣「力排衆議，堅持前令，盡撤入陝之兵，立釋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聲明如此「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一切人事組織、政府主張、抗戰籌備均將循先生預定之方針前進，統一禦侮大業必可速就」[69]。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信中，雖對撤兵、釋張有明確的主張，對於較爲困難的改組政府問題沒有做特別的要求。

十二日，楊虎城派赴奉化見蔣陳述西北方面意見的李志剛飛回西安，帶來蔣介石十日手書一封。內稱：對於張學良，「稍假時日，必爲之設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機會，以無負其愛國之苦心」。同時再度重

申其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之宗旨，強調「中央處置陝甘，亦必以政治建設為主，絕不至引起戰事」。但蔣介石明確解釋說：

> 目前所以在隴海路上酌置軍隊者，則以一般國人對陝甘情形具非常之惶惑。因人事明令兄等既未接受，而所有組織，如臨時軍事委員會等，至今仍未變更，省府亦未照中央法令恢復原有關係。所有宣傳，其誤謬幼稚，與事變當時一般無二，不但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據獨立之嫌，且亦可見分子異常複雜。故一般國民對陝甘今後之動向，咸抱絕大之憂疑。中央為安慰人心，維持全局，自不能不加以防範。然所望於兄等者，只在接受中央之命令，而軍事善後等具體細目，非無商量餘地。……現在最急要者，在兄等務應擴（廓）清外間之疑慮，表示絕不割據獨立，亦不破壞統一。為示此誠意，勿使外間誤會，則：㈠惟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使一般人了然於兄等擁護國家，完成革命之誠意；㈡將十二月十二日以後之組織公布撤消，所有宣傳均予改正，勿使再如變動當時之情形，以一新內外之觀感，則國人疑慮得以冰釋，而在陝軍民亦可心安。……須知陝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陝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中央離陝西無以建國，陝西離中央無以遂其生存與發展。故必須立下決心，向和平統一之方向做去，迅復事變以前之常態，確立此後努力之始基。⑩

據李志剛介紹時，蔣介石在與他談話時曾十分激動，以至痛哭⑪。

當天，周恩來等即用電報將李志剛轉來的信件內容與南京方面的態度向中共中央進行了匯報。周恩來估計：「蔣中心在分化與壓迫，不成乃運用妥協控制西北，（再）不成（則）改為共管。因此，顧之行營主任及中央軍一部駐西北，乃蔣所必爭」。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拒絕蔣在西安設置行營和中央軍控制隴海路，則和平絕無可能。目前方針，似應力爭和平，但在此基礎上設法達到與南京共管陝甘之目的，承認主要由中央軍控制西安和隴海路交通線，但努力限制其兵力，使實際控制權仍在我手。據此，周恩來與楊虎城等再三商談，終於促使楊虎城等同意了如下辦法：

> ㈠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等接受中央命令。
>
> ㈡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後一切臨時組織。
>
> ㈢張學良回陝，或主西安行營（張正，顧副、楊副）；或主陝甘綏靖公署（張正，楊副，行營主任改駐洛陽，主任仍為顧）。
>
> ㈣東北軍駐蘭州、咸陽、平涼、固原、涼州、天水一帶地區；十七路軍駐西安、涇陽、韓城、華縣一帶地區；紅軍駐延長、延川、膚施、鄜縣、慶陽、涼北一帶地區，一部駐雒南，一部駐涼州以西；中央軍駐潼關、華陰一帶，並可酌派三至四個團對隴海路進行保護。⑫

值得注意的是，楊虎城雖然被說服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上述解決方案，但他仍舊對允許中央軍進駐陝西及隴海路深感擔心，因此他並沒有迅速將此一方案送交蔣介石和南京方面考慮。其十四日給蔣介石的信仍舊堅持接受中央命令及取消臨時組織，必須以南京先釋放張學良和首先撤退西進的中央軍為條件，其中甚至有紅軍問題必須一併解決，因「紅軍亦執前言相詰」之語⑬。直到電報發出後，周恩來才得知其內容。周對此自然認為不妥，因此堅持必須盡快派鮑文樾帶上商

定的方案趕到奉化去，向蔣詳細解釋西安方面新的讓步條件。至此，楊虎城才正式同意將新方案送給蔣介石。

十五日，楊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之一米春霖從奉化返回西安，進一步帶來張學良十三日的親筆函和張學良提出並經過蔣介石修改認定的甲乙兩案。這時，張學良的心情顯得頗爲複雜。他內心雖仍不肯承認有錯，態度踞傲，但爲取得蔣之信任，畢竟也已經做了某些違心的表示。特別是他十三日得到蔣介石的准許，遷至蔣正在養病的奉化溪口，更幻想著可以與蔣就近商量西北善後，乃至向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改組政府及對日問題等重要事項。張並不知道，由於西安方面前此在策略上堅持強硬態度，蔣介石和南京方面已明顯地歸罪於張，斷定正是因爲「張態度踞傲，仍未眞實悔悟，陝甘迄無接受命令之表示，一再倡言須張返陝，而一般對是非功罪之觀念亦極混沌」，故已開始秘密散發關於張學良各種罪惡之材料，組織社會各種團體發表文電進行聲討[74]。放張回陝其實已再無可能。由於張此時仍蒙在鼓裡，他還在積極出面勸說西安方面，盼望西安方面速即討論甲乙兩案，擇一行之，「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陝甘之局」。而他在給東北軍將領的信中，更明確主張選擇將東北軍調出西北的乙案，強調說：對東北軍，蔣保證「始終愛護，決不歧視。但在西北環境，多所不便，如不遵從委座意旨，決難挽此劫運」。「弟滿腹熱淚，一眼望東北，一眼望西北，而流（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於國家者，任何犧牲早已不計。盼諸兄計及國家利害，勿專爲我個人謀也」[75]。

不難判斷，張學良儘管一再要其部下不要爲他個人出路著想，但其極力勸說東北軍將領選擇脫離「多所不便」的西北地區的乙案，目的仍在設法解除蔣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懷疑而獲得自由。可是，西安方面，無論是楊虎城、周恩來還是東北軍將領，多數看來並沒有能夠明

了張學良的這種意圖。米春霖來西安，帶來蔣介石十四日信，內中特別告誡，張學良此時「爲國爲友爲私爲公計，皆無回陝之理」，要西安方面，「勿再以此爲言」[76]。蔣介石這時還特別要顧祝同做東北軍高級將領的工作。他給顧祝同的電報要顧轉電王以哲，勸告說：「即揆之副司令之毅然赴京，其最後決心，亦在力求事態縮小與全局安定，舉國贊許。爲今之計，無論爲何方面打算，惟有速善其後，迅速安定，俾可立即結束現局」。對此，西安三方均明確表示不能接受。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楊虎城、于學忠等同意於十六日首先通電取消一切臨時組織，接受南京革職留任的處分，同時堅決拒絕乙案，基本接受甲案，惟對甲案必須做部分修改。隨後奉命派往奉化的鮑文樾、李志剛等帶去的解決方案，仍與前此方案沒有多少區別，對張學良的意見也未做任何考慮，只是在具體內容上和談判目的上，進一步增加了關於要中央軍退出甘肅，讓東北軍前伸至咸陽，並允許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各一部留駐西安的要求[77]。

十六日，西安方面正式作出妥協。楊虎城等通電就職，並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變期間成立的臨時性組織，同意不再要求蔣介石兌現事變期間的承諾，將自己在西安事變中提出的各項政治主張提交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對西北善後也只集中於要求南京釋放張學良與合理地安排防區分配問題[78]。但問題是，蔣介石的來信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放張幾乎是不可能的。二者能不能相提並論？在西安三方的討論中，楊虎城，包括東北軍的軍官們都強硬地堅持二者必須同時進行，因而會議決定：除努力將一切救國主張提交三中全會外，必須堅持防區分配和釋放張學良同時進行，張不回陝，軍事上就仍取不妥協的姿態[79]。但中共代表明顯地對此感到懷疑，既然以和平解決爲目的，堅持這樣的條件，豈不等於還是要打仗？當晚，周恩來和博古聯名致電

中共中央，要求後者就下列問題做出決定：第一，如蔣對防區讓步，但堅不放張，是否決心打？第二，如蔣對防區讓步，允張在三中全會後任事，是否接受？

周恩來等對蔣可能在防區問題上讓步的估計，是建立在蔣介石等一再表示陝甘軍事善後方案可以具體商討的基礎上的。他們這時顯然沒有看出，蔣介石和南京方面在控制西安及其隴海路的問題上，是絕無讓步可言的。因此，事實上，即使在防區問題上，要想達到西北三方這時希望的水平，也是極端困難的。可是，中共中央這時的估計要比周恩來等人還要樂觀得多。他們明確認爲：「楊、于就職後，南京更加無名，條件略高無妨礙，並可爲爾後留出再讓一步之餘地」。目前內戰對蔣系不利，和平解決趨勢已漸明顯，因此，要求張回和要求陝甘防區保持現狀不大變，此二者「目前不應讓步，在力求和平的總方針下，爭此二者之實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80]。

其實，無論東北軍，還是十七路軍，這時對作戰都沒有勝利把握。楊虎城明確告訴周恩來，前線最多只能守三天。因此，前此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都不願意考慮必要時放棄西安的問題，這時卻已經在考慮這種可能性了。對此，中共中央也並非不了解。可是，如果連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主持一切這一條也放棄了的話，那麼，當初張學良破釜沈舟所做的一切豈不連老本也賠光了嗎？的確，所有對西安事變曾經抱有強烈希望的人們，都很難坐視事情向著這樣悲慘的結局發展下去，都想力爭能夠使事變最終有所獲得。這使得原東北軍同志會的年輕軍官們不顧一切地堅持要與南京進行堅決的抗爭，反對一切妥協的行動。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這種態度卻使張學良簡直如坐針氈。

十九日，張學良直截了當地寫信給楊虎城，告誡他：「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即米春霖)帶去之甲項辦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長夢多」。

「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甘未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爲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81]。這時，張學良之所不再要求西安方面接受乙案，個中的原因多半在於，西安方面已經明確地選擇了甲案。從西安代表的談話中，張已了解到西安方面對於蔣接受修改後的甲案的可能性相當樂觀，事情如果眞能如此解決自然是件好事。但他當即就看出把實行甲案，確定防區和釋放他二者相提並論，在策略上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如果西安方面堅持以他的復職爲條件，甚至不惜爲此與南京衝突，那麼，雖然主觀上是愛他，其實反倒會害了他。因此，他堅決主張西安方面不要再以釋放他爲條件，他相信，如果能使蔣承認修改後的甲案，並照此解決，他就仍有回去的可能。

二十日，形勢再度走到重要關頭。當天，楊虎城接到蔣介石的來函，其態度變得異常強硬。信中堅決拒絕西安方面所提方案，斷言楊虎城等之要求，就是「不許中央過問西安之一切，亦無異使陝甘不爲國家軍令政令所及之陝甘，直欲使西北淪亡爲東北之續，而一方面則以要求漢卿回陝主持爲解決一切之關鍵」。因此，西安方面「一方面以表示就職，掩蓋國人之耳目，一方面則欲更進一步的割裂軍政，破壞統一，以造成西北爲特殊區域。表面雖宣稱一切臨時組織撤消，而企圖割據與罔恤危害國本，乃有加於昔。」蔣介石明白告訴楊虎城等：不僅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要以西北尤其陝西爲北方國防之根據，而且陝甘問題一日不決，漢卿因責任深重，也絕無回去之可能[82]。蔣介石並且特別指出，這已是他「最後之忠告」了，二十五日十二時以前務必要做出答覆，否則戰爭將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要張冲通知中共代表潘漢年說，蔣同意西安方案所提紅軍駐延長、延川、膚施、鄜縣、慶陽、淳化一帶，和一部駐涼州以西的要求，惟一部駐進雒南礙於國防關係暫時難以允許。對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駐地問題，關鍵在於中央軍非駐隴海路全線不可，這是因爲，中央必須經過隴海路接通西南之成都和西北之天水、蘭州，然後接通新疆，因一旦抗戰發生，沿海受困，中國必須經過西北接取國際援助。因此西北國防計劃之實現在整個中國國防事業中占有極大的比重。爲此，不僅中央軍要完全控制隴海路，而且行營也必須設在西安。東北軍只能駐甘肅，十七路軍只能駐外縣（除少量部隊駐西安行使綏靖職權外）。蔣介石聲稱：「如紅軍不願照上述兩法向張、楊部隊勸解，反而與張、楊部隊聯合作難，則不僅周與蔣所談之一切無從實現，且蔣亦不能制止南京討伐行動矣。反之，如紅軍確能顧念國家艱難，爲整個民族著想，力勸楊主任接受上項意見之一，中央當視同一體，紅軍給養與中央軍一律待遇，駐在上述地點至參加政權，可由我方提出名單與宋（子文）討論」[83]。

顯而易見，形勢至此已變得相當嚴峻。人們的觀感也頗不統一。潘漢年明確提出：「我意西北問題不可久持，蓋西北問題一日不決，整個抗救計劃無以實現，徒予日人以共同防共之藉口。我方當本對內和平團結，對外一致抵抗之初衷，力勸楊、張部隊負責者從整個禦侮救亡著眼，勿持私見以阻礙整個之實現」。但整個西安的情況卻極其複雜。據周報告稱：「此間左派群情激憤，主戰」，楊虎城「恐讓步後西北被分化，亦有戰意」，「東北軍軍長除繆澄流外均主作戰」。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指出：假如接受蔣介石的條件，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之左派勢將鋌而走險，而右傾者必將倒向蔣介石一邊，如此我們將失盡同情者，亦無法掌握其軍隊。如拒不接受，則只有打仗，打則只能勝不能敗，可勝的把握很少，各方響應者更少，一旦失敗，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仍必分化，到頭來我們也只能得到少量軍隊而已。因此，戰亦不是，和亦不是，目前處境萬分艱難，暫時也只有在原則上接受蔣之甲案，但

力爭西安駐十七路軍及東北軍能駐咸陽以西，同時拖延時日，準備戰鬥。據此，根據周恩來的建議，西安三方決定立即派李志剛飛奉化，表示原則接受甲案，並放棄張學良必須回陝的要求，但希望蔣同意：㈠中央軍暫退華陰，以便部隊運動；㈡潼關至寶鷄不駐多兵；㈢東北軍留一小部在西安，以保護三萬多東北軍人家屬；㈣張如難返陝，請給以名義；㈤十七路軍留一個師在西安；㈥紅軍問題可照蔣意見辦理[84]。

事情走到這種地步，無論和戰都是相當困難的。況且，是不是讓步就一定能夠解決問題呢？中共中央明顯地對此表示擔心。在反覆考慮後，中共中央致周恩來稱：

> （甲）問題在於是否有保證讓步而確能停止戰爭。讓步而依然是戰爭，且能出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面，則不能讓步。
> （乙）無論和戰，應使楊、孫、何、王、于、繆、劉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們處在建議與贊助地位，免致不利時招怨。
> （丙）無論和戰，紅軍主力應按前定計劃出至陝南，處在川陝之間。除二方面軍留渭北外，其餘應準備在數日內向南出動。
> （丁）西路軍東進，徐、陳電士氣尚旺，十天可達古浪處，如該軍不再遭挫折，爾後當位於文、武、成、康地區，如此我主力在陝南、甘南，便可破壞南京把聯軍圍困於渭水以北之計劃。[85]

從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他們這時的對策基本上還是立足於一個「打」字。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許了那麼多的諾，如今都一筆勾銷了，他們又如何能夠相信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眞的會對紅軍表示誠意呢？他們唯一能夠依靠的只有目前西北的這個「三位一體」，一旦三

位一體被破壞，等著他們的多半又是中央軍的大舉進攻，那時，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或被調走或遭分化，紅軍的處境自然遠比西安事變前還要危險得多。若眞是這樣，他們又有什麼理由照蔣介石所希望的那樣去勸說和平呢？當然，爭取和平仍舊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針，打只是不得已而爲之，如果南京方面能夠切實提供有效的保證，他們又何嘗願意斥諸戰爭？基於這種考慮，中共中央明確指示潘漢年：「爲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但蔣必須同意：

㈠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

㈡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給養。

㈢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可不駐商雒，因爲合水、慶陽、正寧、淳化、鄜縣、膚施等地糧食十分缺乏，以後可移駐別處。

㈣請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

㈤爲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以便很好的準備抗日，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我們可保證絕對守秘密，因爲紅軍幹部尚有許多懷疑者，[86]

從上述條件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至此已不得不放棄了西安事變後一度提出的爭取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的鬥爭目標。不僅如此，事變後三位一體共同堅持的撤兵、釋張、改組政府等項基本要求地位也被迫放棄了，就連西安方面此時所提中央軍暫時退華陰，潼關至寶鷄不駐多兵，東北軍留一小部在西安，請給張學良以名義，十七路軍留一個師在西安等六項要求，中共中央這時也未置一詞。中共方面事

實上已經相信，承認蔣、張所提甲案將是不可避免的。而它最爲關心的只是，實行甲案後，南京會不會再度發動剿共戰爭。「這種可能如果存在，則紅軍束縛於渭水與黃河之間是危險的，因爲現有紅軍實數而照過去一樣僅發很少的伙食費，每月也需五十餘萬元，以後停止打土豪將決無辦法，這是第一；慶陽、淳化、鄜縣、延安等縣糧食極少，官兵久駐亦絕無辦法，這是第二。」他們希望蔣介石能夠以自己的名譽（通過寫信的方式）做出明確的保證。當然，他們同時也希望蔣及南京「對張、楊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確定愛護政策，其方式宜表現在防地分配及對張、楊二人之待遇上，在一致對日立場上」。中共中央明確指出：張、楊及其軍隊「現在所顧慮的，完全在事件解決後，抗日主張實現與部隊之保存恐無保證，蔣應於此點施以寬大，以其安心，（他們）在共同對付日本與漢奸面前，是決不會也不能與蔣分歧的」[87]。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見，彭德懷和任弼時從三原趕到西安，於二十二日上午與楊虎城及東北軍抗日同志會中左派軍官分別進行了會談，勸說後者能夠接受蔣之甲案。會談最終達成一致，承認「即使接受甲案也較破裂爲好」。不過，與會者仍堅持，實行甲案必須以中央軍退出甘肅作爲交換，如有可能則仍應照昨日所提六項討價還價。三方還共同討論了萬一情況下的作戰方案問題，從討論中可以看出，三方這時對作戰都缺少勝利把握。會議曾提出三種方案，第一案，紅軍主力仍照原定計劃出南路作運動戰，但如衛立煌集團已發現紅軍十五軍團，堅守不進，且北路東北軍不能扼阻陳誠集團之進攻，則鳳縣、天水兩路中央軍又迅速逼近西安，必使東北軍被切成數段，把十七路軍迫上南山。西安必失無疑。第二案，紅軍主力參加北路決戰，合力保衛西安，地形及敵情都有利於敵空軍和步兵之進攻，紅軍特長不易發揮，且被牽制不能運動，中央軍部署無法打破，西安依然難保。第三

案，主動放棄西安，轉入甘肅境內與胡宗南集團作戰，如此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糧食、軍心均將面臨極大困難，部隊難免發生嚴重分化危險。總之，會議雖認定一旦戰爭發生，力爭第一案之實現，但對戰爭前景均不樂觀。

軍事形勢的進一步惡化還表現在紅軍西路軍這時的嚴重失利上。本來，西路軍已進至涼州以西地區，準備繼續西進，力爭早日進抵西安，接通新疆。但因西安事變後西安軍事形勢吃緊，中共中央於一月上旬即命令該部停止西進，就地在高臺、臨澤一帶創建根據地，以便在甘北中央軍背後構成威脅，使胡宗南集團不敢輕易進兵。然而，因西路軍被服、糧草乃至武器彈藥此時均困難已極，在甘西荒漠地區就地堅守更加難以支撐，以槍彈奇缺又難以找到足夠掩蔽物的疲憊步兵來對付馬步芳的大隊騎兵，又無良法可尋，它終於在一月二十日被敵攻破高臺，致使五軍大部損失，軍長董振堂等均告犧牲。西路軍雖被迫急速改向東進，準備回撤至黃河以東，事實上已很少可能。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頗爲焦急，他們十分清楚：西路軍在箝制甘肅中央軍，使紅軍得以在西安作戰時主力保持機動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如該軍受挫折，影響西安甚大。但形勢發展到這個地步，這時無論是求助於離甘西最近的于學忠，還是要求蔣介石直接下令給青海二馬停止進攻，都已無濟於事了。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能不促使中共中央更加看重和平解決西北問題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二十二日，西安方面從電話中得知，顧祝同表示，西安所提六項條件，原則上可以作爲進一步商談的基礎，並要西安儘快派人去潼關討論。這對西安方面至少在精神上不失爲一種安慰，但楊虎城對此仍有所猶豫，「恐和平解決後隊伍分化愈烈，統率愈難」，而東北軍同志會左派軍官也仍舊主張態度強硬，反對妥協。周恩來等不得不盡力做說服工作，促使楊虎城同意派米春霖等迅速前往潼關與顧祝同進行談判。至二十五日，米春霖等赴潼關得顧祝同、陳誠、衛立煌正式答覆如下：

一、中央軍暫留原陣地，西北聯軍先一天撤退後，中央軍次日進駐西安至咸陽線。
二、張學良出處問題在行營進駐西安前由蔣給以名義，否則行營進西安後，由顧祝同負責呈請解決。
三、西蘭公路咸陽至邠州道上東北軍可駐三團，西安可駐十七路軍一個旅。
四、陝南紅軍同時撤往陝北，接濟問題暫由楊虎城負責。
五、善後費六百萬，暫發一月薪餉，餘待蔣核准。[88]

對此，西安方面具體電話指示進一步要求如下：

一、中央軍先撤華縣，聯軍先撤渭北。
二、潼關至寶鷄線中央軍應限制駐軍數量。
三、蘭州至咸陽線駐東北軍一個軍，西安駐兩個旅。
四、對張學良先給名義，以便安撫部下。
五、紅軍防地仍要求一部駐陝南。
六、接防時間以兩星期爲限，並由閻錫山作保。[89]

既然南京方面可能接受對甲案作某些修改，毛澤東自然也希望在軍事善後方面的條件能夠儘可能變得對西安三方面更有利些。二十五日夜毛澤東爲此致電周恩來等，明確提出：「目前談判要點在要求陝甘

不駐多兵，與紅軍一部駐陝南，後者由漢年交涉，前者應由楊向顧祝同嚴重提出，要求不超過十個師，至低不超過事變前數目。蔣如有不繼續戰爭的誠意，無拒絕此點之理由」。當然，毛澤東也告誡周，應嚴重注意西安左派的過左情緒，務必使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說服左派，使之明白，接受甲案，做出妥協，退出西安將不可避免，「現在一切工作應放在退出西安後可能發生的新戰爭、新壓迫的基點上去布置」[90]。

整個西安善後問題之解決，這時已經全部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了。這就是對蔣介石承諾的信任問題。西安三方面，不論是楊虎城、東北軍，還是中共中央，這時擔心的都是同一問題：現在答應了蔣介石，是否就能確保自身的安全，確保不再有戰爭，確保張學良眞的能夠獲釋？中共中央這時之所以一再表示而要求蔣介石做出書面保證，純粹也是爲此。然而，蔣始終拒絕用書信的方式提出這種保證。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據觀察和經驗來判斷這一切了。毛澤東這時再三要求潘漢年就此作出判斷：「據你觀察，蔣與南京是否確有不繼續戰爭的誠意，此種誠意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不過，爲了有利於解決西北問題，蔣介石事變後對共產黨的態度畢竟一直是比較客氣的，除了堅持不給以書面保證以外，蔣介石對中共代表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盡量地給以解釋或滿足，力求使其感到放心。宋子文前後兩度代表蔣介石與潘漢年見面，表示願意代蔣擔保。二十七日，張冲更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再度確認：

(甲)關於防地問題，照貴方與張、楊兩部合併提案內所要求之地點，延川、延長、膚施、鄜縣、慶陽、西峰一帶及涼州以西，除陝南外，蔣先生一概承認。給養問題，蔣先生已答應與中央軍同一待遇，以軍隊之多少決定軍餉的數目。

三中全會前一切接濟由楊虎城將軍暫時負責，蔣先生亦已允許。

(乙)關於保障和平，解決後不再攻打紅軍，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貴方代表直接聲明，代表蔣負責保證。

(丙)派人參政事，蔣先生亦已允諾。

以上幾項均爲中央苦心維繫和平之誠意，予貴黨以轉圜之時機，取捨進退，望先生等明斷。請當機立斷，勿再猶豫，速予覆知。[91]

事情至此已很難再有多少轉圜餘地了。相信也罷，不相信也罷，在西部軍失利，張學良扣在對方手裡，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戰鬥力不強，負擔沈重的情況下，戰爭的方法無論如何不是出路。中共中央終於在一月二十七日晚做出決定：對南京作出讓步。毛澤東、朱德等於這天晚上專門致電這時在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負責人稱：

(甲)無論從那一面說，主要的從政治方面說，均應對南京讓步。

(乙)全力說服左派實行撤兵。

(丙)十五軍團亦準備撤退。

(丁)和平解決後三方面團結一致亦不怕可能發生的新的戰爭。[92]

第四節　柳暗花明

談到中共中央轉而堅決採取和平讓步的態度，不能不提到共產國際一月二十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該指示到達的日期多半是在二十二或

二十三日左右，已知中共中央是在二十四日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討論的。該指示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批評前此中共中央對蔣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議在爭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礎上解決一切問題。指示稱：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能受挫，這一方面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親日派在搞陰謀，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國共產黨採取了錯誤的步驟。中共中央固然改變了以前力圖通過排除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統一戰線的錯誤政策，但是還沒有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中共中央在蔣介石被釋放後所確定的方針尤其證明了這一點。這種方針實際上意在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這也就是爲什麼中共中央把在事變期間同蔣介石達成的妥協看成是蔣介石和南京的屈服，並且把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合作視爲反對南京的聯盟。所有這一切，只能助長親日派的氣焰並爲其製造內戰提供藉口。指示明確要求，立即把黨的主要任務放到爭取切實停止內戰，爭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來。同張學良、楊虎城及其軍隊的合作必須服從於這一主要任務的需要，並應在這方面向張、楊及其軍隊施加各種影響。只是在親日派調動軍隊向自己進攻時，才可以進行自衛，但無論如何自己不要爲這種進攻提供口實[93]。

共產國際的批評是否完全恰當，在中共中央方面並無多少爭辯的餘地。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共領導人因此相信就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錯的。很明顯，中共中央必須承認，在蔣介石釋放之後，認爲蔣已經投降，把蔣承諾的條件公開宣布，這是很幼稚的。過高地估計西安事變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實現西北半獨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說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政治指示到達後，中共中央並沒有眞正改變自己的政策，這是沒有人能夠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當時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指示，改變了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張

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也要求張學良去與蔣介石說和。問題是蔣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滅紅軍，宣稱中共是漢奸。當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與共產國際有一點是不同的。這就是，中共中央實行的是「逼蔣抗日」。在這一點上，共產國際強調的只是用群衆及其輿論來「逼」，「但我們還主張利用張、楊、閻、李、白、劉逼他」，即利用同各種地方實力派或反蔣派的力量來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就是這種逼蔣政策的結果，同樣事變後的對抗也是這種逼蔣政策的繼續。這樣究竟對不對呢？多數中共領導人明確認爲：「在中國封建社會環境下，這種方法也未嘗不對」。這是因爲，在當今中國，不論是要想使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視自己，使其改變錯誤政策，實現與南京的聯合，還是爲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堅持黨的獨立立場與紅軍的存在，「力量問題都是不能忽視的」。當然，他們也承認，這種策略實行起來確實也是相當困難和複雜的，它確實可能造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這樣逼，造成了內戰，當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僅僅在於結果如何。因此，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的實際作用，多半也就在於，它使中共中央開始更加明確地把爭取和平視爲其一切行動和政策的依據了。這也就是爲什麼，從二十五日之後，中共中央更加強調和平的方針，而在得到張冲的來電之後，會更進一步下決心，不惜再作讓步也要同南京和下來。

然而，在這個時候，不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還要困難。本來東北軍年輕軍官就反對讓步，情緒激昂，如今見中共代表步步退讓，更是心懷不滿。本來楊虎城因西安事變就已經整整丟了一個軍，如今更是擔心讓中央軍控制西安及隴海路沿線，地盤沒有了，餘下的部隊遲早也會被蔣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東北軍上層將領，此時的態度也頗猶豫，步步退讓的結果，是不是連張學良的出路也不爭了呢？

唯一能夠駕馭東北軍這駕馬車的張學良若回不來，東北軍難道還會有自己獨立的前途嗎？因此，越是到妥協關頭，西安的空氣就越是緊張，人心就越是混亂。

二十六日白天，西安與潼關談判的代表仍堅持：㈠首先給張以名義；㈡中央軍離開甘肅，至少天水以西不駐兵；㈢紅軍一部駐陝南；㈣十七路軍在西安駐兩旅。顧祝同開始時同意：㈠給張名義問題撤退後即可照辦；㈡中央軍原駐陝甘十四個師，可調三十個團出甘，但必須駐天水，寶雞至西安線至少駐十個團；㈢紅軍不能駐陝南；㈣十七路軍只能在西安駐一個旅。但蔣介石得知後很快否定了關於張學良一條，強調恢復張學良公權，須國府委員會決定，西北問題未解決之前，事實上不能為之呈請。「彼方如相信我，即應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則不必再談」[94]。面對這種情況，西安方面決策層內部意見嚴重分歧。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出面承擔放棄為張學良爭取自由的責任，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幾乎一致強烈反對，非要南京對張學良回陝作出明確擔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傾向於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這時也變得猶豫畏縮起來，王以哲、鮑文樾稱病不出，何柱國雖有意談判，卻無法作主，且部隊根本不能掌握。與此同時，楊虎城也擔心繼續妥協，內部將更加動搖，更便利蔣介石分化政策，態度也頗含混。整個形勢變得更加複雜。當天傍晚七時，蔣甚至下令次日正午東北軍再不接受條件開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開始轟炸東北軍前線各戰略目標[95]。顧祝同即據此通過電話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須接受南京條件，否則即告破裂。

再也不能猶豫了。周恩來明確提議：㈠接受蔣之甲案；㈡妥協達成後要求允許張學良隨顧祝同來陝一行；㈢推王以哲為甘肅省主席。可楊虎城當晚在他家召開的高層會議上，明確認為南京方面毫無誠意，

對蔣介石施加戰爭威脅相當反感。參加會議的東北軍將領除王以哲、鮑文樾主和外，其餘態度也相當含混。開始在另外一處開會的師旅團級軍官二十餘人，當晚轉來楊家開會後，更是激烈主張：「非張回陝不能撤兵，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結果，會議爭論不休，雖經周恩來反覆勸說，包括楊虎城在內，多數將領最後同意：㈠接受甲案，但部隊撤退請寬限十天；㈡部隊移動應在張學良回陝訓話之後；㈢三中全會前即給張名義並允許其出席三中全會說明政治主張。但「左派仍堅拒，並向前線活動」，情形更加混亂。然而，就是這樣的條件，南京方面也拒不同意。二十七日凌晨五點鐘左右，何柱國代表西安方面打電話將這些意見通知顧祝同，為顧所拒。何不得已再與各方商量，各方仍舊堅持，談判遂因此陷入僵局，有破裂之勢。直到這天上午，張學良電報來到，情況才開始出現轉機。

還在頭一天夜裡，張學良就已經得知這一嚴重情況，不禁焦灼萬分。一旦戰爭爆發，不要說自己不能回去，沒有外界的支持和自己和統馭，整個東北軍多半都會因與南京交戰而分崩離析，這與自己發動事變和和平解決事變的初衷實在是大相逕庭。因此，二十七日一早，張就借用南京方面的電臺緊急致電東北軍各軍長與師長，懇切要求部屬「立命部隊於今日正午以前開始移動，勿再固執誤事為要」。時至於此，張學良確實對西安方面的做法頗多抱怨，電報中直言不諱地埋怨其下屬「固執誤事」。電報稱：「此事如前次瑞風、志一兩兄回陝時，兄等接受甲案並即實行，則良之出處此刻已不成問題。今因遷延，引起誤會，委座實屬為難萬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則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96]。這一天，蔣介石態度也略有鬆動。他致電顧祝同，要其轉告東北軍將領說：「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後，可保證，必為其負責請

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但在此時萬勿提出事實上不可能之問題，以延誤大局也」。接到張學良電報，又得知蔣介石的解釋後，西安方面談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報何柱國，力勸西安方面接受條件。經過幾個小時的反覆討論，東北軍高層將領和楊虎城終於決定接受南京條件，只是要求撤退時間以七天爲限[97]。

二十七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協，與南京最後達成和解。但西安內部出現更大分歧與混亂。楊虎城「表示屈服後無前途，寧方不會抗日，釋張甚悲觀，對雙方合作亦覺無把握」，態度更趨消極。而「東北軍老派願和，但董（英斌）尚動搖，鮑（文樾）、馬（占山）亦有變化可能。少壯派師旅團長多數主戰」，當晚東北軍軍官會議，雖有董英斌主持，與會者仍一致強硬表示：「非張回不撤兵」。周恩來已清楚地感覺到：目前西安各方危機四伏，如蔣再不能給以保證，勢必會有人鋌而走險，到那時可能一派混亂，統一戰線將迅速破裂，共產黨不僅大受埋怨，而且將更陷於不利地位[98]。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雖竭盡全力勸說和平，其結果亦可想而知。而左派激烈情緒不得緩解，整個局面就隨時會具有爆炸性。在中共中央這時看來，目前唯一可能緩解左派情緒的，就是請蔣允許張學良回陝訓話一次。這不僅因爲張學良力主和平，而且因爲一旦蔣保證張學良回陝訓話，這些少壯軍官一時也再不能採取激烈行動。對此，毛澤東也頗爲贊同。故毛在這天晚上接周電後立即打電報給潘漢年，要求他向蔣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緩和西安內部的矛盾衝突。毛電稱：

> 恩來用全力斡旋，結果楊、于、孫、何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師團幹部堅決要求張漢卿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幹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爲東北軍面子起見，蔣先生不妨讓張來陝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決此問題。[99]

隨後，周恩來也爲此專電潘漢年，請其向蔣介石轉達這一要求。電報稱：

> （甲）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楊虎城已決心服從蔣先生，惟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漢卿不能回陝見面一次，決不肯先撤兵，恩來及何柱國、王以哲等向之說服亦無效。
> （乙）除我們繼續努力向他們說服外，務請蔣先生撫念此流亡之師，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即給張恢復公權，發表名義，許張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回陝訓話一次，以安東北軍之心。
> （丙）請蔣先生許張漢卿寫親筆信給楊、于、孫、何、王及東北軍將領，堅其撤兵之決心。
> （丁）請蔣先生許可西安及東北軍派代表見張一面，然後撤兵。[100]

但毛、周接連電去後，除張學良二十九日有手書來，要求部屬務必遵照蔣介石之部署及商定辦法迅速實施[101]以外，蔣介石遲遲沒有回覆。而西安這邊，左派軍官主戰空氣愈演愈烈，頗有些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一些少壯軍官甚至趕至前線，將前線師團級軍官數十人組織起來，一致抵制西安對南京的妥協決定，堅持非張學良回陝決不撤兵。面對如此局面，周恩來極感爲難。「現在情形下，我們若參戰，則違背主和原則，如和，必失東北左派，前線便一時混亂」。況且，左派基本上是東北軍隊的骨幹，直接掌握部隊，失去這些左派軍官，就意味著

三位一體事實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對左派略作讓步的問題迅速提上議事日程。對此，剛剛趕到西安附近紅軍前線指揮部所在地雲陽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態度極爲明確，他提出：「我們的方針應該毫不遲疑的堅決爲和平奮鬥」，不爲左派威脅所動。同時，盡力爭取左派，力爭使事變消滅於無形。張聞天二十八日給毛澤東的電報稱：

子、爲貫徹這一方針，必須要動員一切力量，爭取左派中之大多數分子相信我們政策之正確，對極少數不能聽服的過激分子應與鬥爭。

丑、向左派公開表示我們堅決主張和平，反對內戰態度，反對一切挑撥的行爲。

寅、提高楊虎城及東北軍高級將領對和平的積極性，並給以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萬一少數過激分子開始挑撥行爲，我們及一切願意和平的大多數堅持不參加內戰的決心，以爭取和平局面的實現。[102]

東北軍的高級軍官有些是歸併的（如于學忠、何柱國、沈克等），有些雖爲東北軍所培養，但久已形成自己的勢力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他們中多數依靠張學良，也敬服張學良，卻未必對張學良有濃厚的感情。但東北軍大多數中下級軍官則不同。他們多數沒有多少既得利益，文化層次又較高，且正處於晉升過程中，上進心極強，加上他們與下級官兵接觸多，受打回老家情緒刺激最深，因此，他們不僅從一開始就是張學良走聯俄聯共共同抗日道路最基本的推動者和擁護者，而且寄一切希望於張學良，很多人視張學良如同再生父母一般。要這些年輕軍官聽任張學良不能回東北軍，甚至被剝奪自由，在感情

上無論如何都是極端困難的。特別是面對南京方面的壓迫，西安方面一退再退，這些軍官在情緒上屢受刺激，激憤之情已如乾柴烈火，一點就著，在這個時候要想勸說他們接受失敗的事實，又談何容易。十七日晚，張聞天到西安，堅決主張和平，提出用紅軍不參戰的辦法來勸告激進分子放棄戰爭的想法。但當晚少壯派軍官五十餘人就得到消息，前往中共代表住處集體請願，提出八個問題，態度頗多挖苦。周恩來雖大發脾氣，對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揚言：如果紅軍不敢打，我們自己打，到時候別怪我們和你們翻臉。

第二天，即二十八日，楊虎城受此情緒影響，也決心要打，整個形勢越發變得不可收捨。周恩來不得不與主戰的東北軍少壯派代表開了一天的會，攤開地圖詳細地向他們解釋打的不利。但東北軍代表完全聽不進去，只是斷定打起來就會有辦法。除非張回陝，否則決不撤兵，寧願拼個魚死網破。他們再次當場逼周恩來等表態，或者破裂，或者紅軍一同作戰。周恩來報告說：「我們堅持讓步主和，討論一天未決。會後，何（柱國）、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與少壯派開會，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這時，「只有楊變轉，及鮑（文樾）、董（英斌）努力，才能影響少壯派撤兵，否則嚴守中立，萬一工作不好，必失東北軍、十七路軍與反蔣（派）大部同情」。因此，二十九日，周又進一步通過王以哲去做楊虎城的工作，並暗示楊，如不顧和平，致戰爭發生，紅軍將不會參戰。在前線的中共領導人也一致決定：

㈠我們應爲和平盡最大努力，盡調解的責任，特別爭取楊及東北軍穩健派，堅決站在和平方面，力爭左派的一部或大部。

㈡在和平尚未到絕望時期，紅軍仍不採取單獨行動，同東北軍、十七路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但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場。

(三)如和平絕望，戰爭或部分接觸發生，紅軍應公開表示爲求得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主張的實現，不願參加內戰，宣布我們在西安事變中爲和平而努力的經過，並且願爲和平繼續努力奮鬥。[103]

紅軍不願參加作戰的態度，根本上阻止了楊虎城的搖擺。二十九日一早王以哲與楊虎城談話後，楊即親自找周恩來談。楊虎城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經決定放棄成立西北半獨立局面的想法，不願與南京作戰，他考慮再三，決定做中共政策犧牲品，擁蔣抗日。「雖然他懷疑此種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獨立局面有由戰爭中求得可能，同時他估計我們擁蔣必將失去許多同情，但他仍願做共黨朋友到底」。對此，周恩來及毛澤東等均深受感動。周當場表示，中共決不會背棄朋友，如果蔣介石反過來陰謀對楊及十七路軍不利，紅軍決不坐視不顧。毛澤東得知楊虎城的態度後，也接連致電周恩來等，要求後者告訴楊虎城：和平政策是三方共同的，希望他對整個政治前途具有信心，說明如楊虎城部隊撤出西安等地後嫌駐地不足，包括鄜縣、甘泉、延長等城，「彼需要時由彼駐兵，我們退城外，將來如有緊急，我們同他總在一起，決不分別彼此，對東北軍亦然」。現在「我們與他們始終願在一起，爲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總方針而奮鬥。撤兵後蔣如食言進攻，彼時曲在蔣，我們則爲最後自衛而戰」[104]。

既要與南京求得團結統一，又要繼續保持西北三位一體，這已經變成一件兩難的問題。而中共代表關於紅軍不願參加作戰的表態，更迅速在西安左派軍官內部傳開，一時間不論東北軍、十七路軍的軍官中間，都出現了關於「紅軍出賣朋友」的不滿言論。三十日中午時分，又有幾批軍官前往周恩來等中共代表駐地表示強烈抗議。這種情況不

能不引起周恩來等人的嚴重擔心。周恩來估計，東北軍高層將領至今態度不夠明朗，而無論東北軍，還是十七路軍，部隊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這些中下級軍官的手中，三位一體的統一戰線最鞏固的部分原來也是建立在與這些中下級軍官的聯繫之上，失去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三位一體將很難保持與鞏固；而沒有這些軍官的贊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與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難以實行。周恩來爲此不能不再度致毛澤東等，提出：「形勢已到最後關頭，南京正在進行分化，指明此間已不要張。東西兩軍認爲打有出路，撤兵棄張只有死路。兩友軍決心打，而紅軍不打更刺激他們。一部將反動，造成南京分裂西北聯合戰線的基礎。東西兩軍已有紅軍出賣朋友的空氣。」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一定要冒失去最好朋友的危險呢？要知道，失去朋友未必能夠得到蔣介石的信任，且仍有失去全國同情的可能。相反，如果與友軍堅持要求張學良回陝訓話及恢復公權，證明三方面不可分離，雖可能因南京不讓步而致戰爭，但「我勝蔣可讓步，我敗則友軍必不怪我，我可擴大，蔣仍可與我們談判」。因此，周恩來等不僅堅決反對中共中央內部正在議論的紅軍首先開始實行撤退的提議，堅請軍委主席團授權由西安中共代表通知撤退時間，以避免進一步惡化三位一體的關係，而且還明確建議，改變原定紅軍不參加作戰的決定，準備與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同進退，以保持三位一體之團結。

當天傍晚，周恩來等爲勸說中共中央接受自己的意見，與博古、葉劍英等專程趕到雲陽，同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等政治局領導人一同開會討論此一建議。經過反覆討論，與會者最後一致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當晚，雲陽的中共領導人聯名致電毛澤東等，提出：如果友軍堅持在張學良回陝一次的問題上堅不讓步，爲不與友軍處於對立地位，我們必須準備與友軍一同作戰。「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

如打敗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和平主張，在更不利條件下接受和平」。我們力爭迅速結束內戰。對此，毛澤東等幾乎立即覆電表示同意，稱：

(甲)和平是我們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

(乙)但我們與張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而失去張、楊。

(丙)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105]

次日將近中午時分，周恩來、博古及葉劍英返回西安。但還在周恩來等回西安之前，于學忠也已從蘭州飛到西安，並與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先後會面[106]。于學忠本非東北軍出身，事變後依據南京任命又負有指揮東北軍和調處西北問題的全權，前此只因「眷屬不離蘭(州)，終不免有所顧忌」，不能大膽行使職權[107]。這時，其眷屬已撤離蘭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堅定。加上此時楊虎城思想已通，對作戰主張再不提起，多數東北軍高級軍官也因于學忠態度堅定而紛紛附和，因此，當周恩來回西安後，發現整個上層的情況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三十日晚所準備的方針雖仍可用於表示誠意，實際上卻幾乎已經派不上用場。另外，據密報，東北軍有四個師級指揮官已經秘密與南京方面聯絡，準備脫離西安。這使得西安整個上層更加軟化，決定迅速與南京達成妥協條件。據楊虎城事後告訴周恩來，于學忠不僅主張妥協，而且對西安赤化頗多疑懼，如于學忠也轉而投靠中央，那就連甘肅也沒有了。因此，現在只有一事尚在堅持，就是要張學良回來訓話一次，至於其他已無從提起了。在當天夜裡召開的三方會議上，周恩來說明

了中共中央關於準備與友軍同進退的決定，據周報告說：「我方同進退的主張相當的影響了張、楊兩部左派，(均) 堅 (決) 主戰」。然而在高層將領中，只有王以哲態度搖擺，討論竟夜，時間長達六個小時，最終會議仍舊決定主和。這種情況不能不使東北軍少壯派備受刺激。

二月一日，根據西安方面高層決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剛前往潼關談判妥協，中共方面亦派李克農前往接洽。幾人尚未動身即被左派軍官指揮的部隊攔截在城門內，不讓出城。東北軍特務團一部甚至包圍了于學忠的住地，要于學忠放棄成命，放棄頭天晚上的決定。後僅因何柱國大怒，痛加訓斥，以執行軍紀相威脅，後者才被迫撤去。但這件事已經預示著不祥的苗頭。

上午，李志剛等到潼關，進一步向顧祝同具體提出履行甲案的具體辦法如下：

一、聯軍方面從二月一日起開始撤收前線警戒部隊到本陣地，準備續回渭北地區集結。

二、俟張學良回來訓話後續向甲案指定地點移防。

三、各軍向渭北集結地域爲：

東北軍：富平、高陵駐五十七軍，田市到監鎮駐騎六師、騎十師，咸陽到乾縣駐一〇五師，監軍鎮、關頭鎮、廟灣駐一一七師，麟游駐一〇六師，固原、平涼、西峰駐六十七軍一〇八師及東三師，邠縣、涇川駐總部。

十七路軍：蒲城、白水駐警三旅，三原、涇陽駐三十八軍，長安駐警一旅，興平、耀縣駐警二旅。

紅軍：靈臺、崇信、高鑒鎮、天堂鎮駐羅、宋部，淳化、

口頭鎮、叱干鎮駐一、四方面軍，同官、美原、高陽鎮駐二方面軍。

南京方面具體答覆如下：

一、同意張復權授職並出席三中全會。
二、張可回陝訓話，以便聯軍向甲案地區移防。
三、東北軍在咸邠間暫駐三到四個團，移防畢可增加兩團。
四、十七路軍在西安附近駐一旅，如須增加時則加駐兩團，東北軍可駐一團。
五、西安城暫由綏署負責，以後共同負責。
六、中央軍在西安不駐有威脅的兵力。
七、善後費二百萬，續請核發。
八、東北軍、十七路軍各發足經費一個月，移防後再發一個月。
九、第三者（指紅軍）經費由楊虎城先發五十萬元。
十、移防時組織視察團。[108]

鑒於南京方面在最關鍵的張學良問題上初步答應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楊虎城和于學忠遂於當天下午向前線指揮官正式發布命令，命令他們當即撤退西北聯軍的警戒部隊，二日將前線部隊撤至渭北，三日撤至渭南。命令同時說明，根據已經達成的協議，中央軍五日將進駐渭南，六日前後將進駐西安。

難道這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就這樣恥辱地結束了嗎？難道正在締造著新一代東北軍人、勇敢地推動著中國政治變革的張學良將軍，就這樣成爲政治妥協的犧牲品了嗎？面對東北軍上層將領的決定，激

進的抗日同志會的主要成員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人終於按捺不住，決心公開反抗了。一次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人意料之中的事變發生了。二月二日，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假抗日同志會名義召開會議，一致決定發動政變，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導核心，改變一切妥協決定。事變從上午開始發生，至中午尚未結束。周恩來中午一時致電毛澤東等，通報了這一情況。電報稱：「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將主和首領槍決（王已死，何在追索中）」[109]。事實上，首先被殺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這時並不是最堅決的主和首領，甚至在周恩來傳達中共中央三十日晚關於紅軍將與友軍同進退的決定的時候，王甚至還曾一度贊成過左派的主張[110]。但同志會成員這時幾乎把所有贊同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都視爲他們奪權的障礙，孫銘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等一度在西安城內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派，不僅王以哲軍長首先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並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相反，由於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卻躲入楊虎城的公寓，倖免於難。

二、二事件只持續了一天左右的時間。至三日凌晨，事變仍在繼續中，但前線部隊已經撤了下來，且西安的這些年輕軍官根本上難以取得指揮之權，政變者除了得到十七路軍部分旅團長和西安城內左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個東北軍內部明顯地處於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對於此，楊虎城一方面反對政變行爲，一方面「估計撤兵後必被解決，有背城借一意」，于學忠雖仍然堅持主和，可他在西安只是光桿司令，又無力扭轉局面。時至於此，周恩來不得不再度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軍官，「批評殺王之錯誤」，一方面又打電話給楊虎城、于學忠，勸說楊、于兩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但即使

是周恩來，這時也無法對下一步的行動提出明確的對策。周爲此報告中共中央說：我意目前「主和主戰仍由西安楊、于作主，因東西兩軍情況不明，尙無法下決心」[111]。

三日上午，苗、孫、應等人已經淸楚地意識到他們達不到控制東北軍的目的，並且，此一行動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因此，他們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駐地，表示悔過認罪，請求周恩來等協助平息此事。考慮到中共人員中劉鼎等人與應德田、孫銘九等長期以來關係密切，必會因此而受到牽連，周當即著劉鼎帶苗劍秋等人乘車秘密出城遠避三原紅軍駐地。周同時告誡雲陽的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劉鼎帶來之人務要秘密，目前不可與任何外人見面，此事關係重大，千萬注意[112]。

三日中午，政變主謀離開後，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斃王事件東北軍高級將領均欲懲辦禍首，現少壯派已悔過認罪，離隊遠避」，「西變可結束」。與此同時，「東北軍前線已撤退，和平前途諒可逐步實現」[113]。

但是，二、二事件畢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遠遠超出了周恩來這時所能想像的程度。二月三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十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一〇六師也宣布效命南京，脫離西安。緊接著，過去深爲張學良所信任的東北軍一〇五師劉多荃部也轉而與潼關中央軍接頭，逮捕和槍殺曾經積極協助張學良聯共的高福源等少壯軍官，反過來向西安方面警戒。東北軍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已難以維持。四日中午，周恩來不得不電告中共中央，稱：「東北軍因王以哲遇難愈分化，少壯派趨極端，而右派紛紛投降反攻。劉多荃甚至對西安警戒，對潼關接頭，扣留少壯旅、團長，給蔣、顧以大好機會，張更難回來，東北軍甚至有被調開危險。」今後，「蔣對西北領導必著著進逼，最後有取甘肅可能」[114]。

這種情況的發生，不能不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深感意外。要知道，王以哲一年來與中共和紅軍合作融洽，對西北三位一體的建立貢獻顯著，毛澤東怎樣也不能想像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會對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況這一事件對西北統一戰線造成的破壞是如此嚴重，自西安事變以來，共產黨苦心孤詣地竭力維持的三位一體局面竟很可能會因此而一朝瓦解。毛澤東爲此非常氣憤。儘管周恩來明確提議，還應繼續贊助左派，同時設法緩和與右派關係，主張「少壯派須以取消組織，減少右派攻擊目標，實際則秘密團結，徐圖發展。張如不回，寧讓步開甘，以避免分裂，對右派宜反對分化，以團結眞正愛東北軍、擁護張分子，造成新的中心」。但毛澤東還是幾次致電周恩來等，堅決主張：殺王首犯必須槍決，無論是左派是黨員均應如此，否則無從彌縫東北軍之分裂。即是從犯我們也不能收容。

可是，交出殺王首犯是否就能彌合中共與整個東北軍之間日趨破裂的關係呢？實際上情況已遠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周恩來很快告知毛澤東等說：二、二事件後，少壯派已經潰亂，槍殺王以哲的特務連連長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槍決，四個團長被扣，一個營跑走，政訓處跑散，張學良公館機要人員也跑光，機要文件燒毀，在左派影響下的特務團及抗先隊已被迫遠避邠州，留在部隊的抗日同志會員大起恐慌。同時老派投降出賣，米春霖、謝珂在潼關大罵，騎十師到處搶劫，沈克師引中央軍到歧山、武功，鮑文樾、馬占山亦分裂東去，一〇五師劉多荃部、五十七軍繆澄流部聯爲一氣向西安興師問罪，揚言要消滅特務團，六十七軍副軍長吳克仁也揚言報復。而何柱國更公開說東北軍壞話，準備賣張降蔣，于學忠又無統一東北軍的能力。現在唯一可能扶植起來統一東北軍的只有董英斌，可是董太老實，能力不

強，張學良也不滿意，董領導下的剿總人員又處境孤立，與下級人員關係極差。因此，目前東北軍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蔣調離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再打擊左派，只能長右派氣焰，便利南京各個收買與分別指揮。東北軍自身的分化已勢不可免，要想保持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影響，努力團結大部分東北軍，求得上下老少目標一致，樹立中心領導，反對分裂出賣，還得想辦法從左派和眞正擁護張學良的分子中造成基礎、培植力量。

周恩來這時對東北軍的情況無疑比毛澤東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接受了他的建議。但問題在於，無論是實行這一策略的機會或者是時間，這時都已經沒有了。即然二、二事件已經極大地分化了東北軍，迅速利用這一時機將除了中央軍以外中國這個最大的軍事集團消融於無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選擇。僅僅幾天之後，蔣介石就做出決定，要盡可能利用這一機會將東北軍分解開來，所有宣布忠於中央的東北軍部隊仍留原防不動，其餘東北軍則被要求改行乙案，東調豫皖，接受整編。而東北軍中主要將領，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樣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對中共的信任。孫銘九等四人由劉鼎帶往紅軍駐地避禍的情況，也很快爲東北軍高級將領所知，以致一些將領竟懷疑此四人所爲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謠傳個別將領仍屬刺殺目標。所有這些情況都弄得東北軍上層人心惶惶，大都擔心「在西北將不可免地與共黨紅軍糾紛不了」，急於迅速離開此一貧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張學良回陝訓話之類的要求，自然變得可有可無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楊虎城和他的十七路軍。楊虎城及其十七路軍的高級幕僚們自事變發生後同樣也處於極度不安之中。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楊虎城態度曾經有所搖擺，東北軍將領這時對楊甚誤會，並懷疑楊曾對東北軍將領不利。周恩來對此自然

頗爲擔心，指出：「東西兩方彼此誤會，同時不易解釋，最易爲寧方利用」。可雖經周恩來反覆勸說，仍難釋其嫌。不僅如此，楊虎城亦因中央軍將到，確信十七路軍必受壓迫，自己的駐地又與東北軍犬牙交錯，雙方已缺乏信任，難免不有衝突發生，以致楊的態度明顯地變得更加消沈。他明確告訴周恩來：十七路軍以後必難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給紅軍才有出路，自己則只好離開部隊。當然，楊虎城明確表示，不論他今後行止如何，他必將與共產黨做朋友。他宣稱他已經了解到，這次西安事變之不成，完全在於當時日本與蘇聯都在拉南京，蘇聯已經比日本領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國應在蔣的領導下實現和平統一，當然不會援助西安之舉，這是事變事實上不能成功的關鍵。但他通過整個事變過程已經完全改變了過去對中共的看法，相信中共確實夠朋友，因而保證他今後不僅會從維護統一，團結禦侮方針上找出路，而且一定要「保持與共黨紅軍作朋友」。他唯一擔心的只是，莫斯科已經爲自身利益賣了西安一次，它「爲爭取南京，是否會接受取消共產黨，改編紅軍」的條件，而將中共也送入蔣介石的懷抱呢？

楊虎城顯然不了解莫斯科中國政策的本質特點。他不清楚，純粹只是從階級觀點看問題的那些莫斯科的決策者，之所以毫不在意張學良和楊虎城所做的犧牲，根本上是因爲他們從來都把中國的軍閥看成是不可信任的投機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可能放棄對自己的同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暗中支持。即使是在這時，在他們從自身的外交利益出發，希望看到共產黨盡可能快地與南京政府達成政治妥協的情況下，他們也仍舊在堅持這種妥協不能影響中共與紅軍的日後獨立發展的可能性⑮。他們這時甚至仍舊在全力準備通過中國新疆對紅軍進行具體的軍事援助，其渴望紅軍西路軍接通新疆的程度遠比中共中央還要急迫。在三月的來電中，他們甚至許諾，一旦紅軍能夠

接通新疆，蘇聯方面可以將援助資料再增加一倍以上，總重量可達到兩千噸左右，其中還包括了紅軍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區作戰中極爲有用的輕型裝甲車等，另外還可以送給紅軍五十個左右在莫斯科已經熟練地掌握了炮兵、裝甲車等項技術的中國同志[116]。不僅如此，共產國際這時還根據中共中央的請求，陸續開始通過上海和天津的秘密接收地點，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據共產國際電報稱，蘇聯方面二月間已經確定的援款數額即可達到將近兩百萬美元之多[117]。這說明，蘇聯人這時並沒有任何想要把中共送入蔣介石懷抱的意思，他們仍舊想讓紅軍存在下來，並希望它能夠在中國政治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然，楊虎城有一點是沒看錯的，即中共中央這時並非完全依照莫斯科的指示來行事，他們有自己判斷事務的標準，這使得他們在處理西安事變問題上，始終是把張學良和楊虎城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依靠的，始終是要堅持三位一體的，即使是在他們得到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嚴厲批評他們不應把同西安的關係放在決定的地位，必須把同南京的關係看成是一切其他關係的基礎之後，他們爲了不出賣朋友，也仍舊一度下決心採取同進退的方針；即使在二、二事件發生，包括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裡面一些激進的軍官要把部隊拉出來加入紅軍，他們也從未想過藉此機會來擴大自己的軍隊。爲了對得起朋友，中共中央明確指示紅軍各部，決不得利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困難趁火打劫，堅持不收東北軍（也包括十七路軍）一人一槍一彈的原則，拒絕收容那些主動要求編入或準備加入紅軍的友軍部隊。毫無疑問，張學良和楊虎城對此都倍受感動。

二月八日，中央軍開入西安。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隨後，中共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方分別開始與顧祝同談判。三位一體事實上已趨於瓦解。至三月初，東北軍正式開始東

調。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被撤銷，楊虎城被迫出國。張學良雖經蔣於二月十三日提議恢復公權，國民政府亦於二月十七日加以批准[118]，可是事實上仍舊被嚴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變兩大主角，張學良和楊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以及蔣介石當初的許諾，大多數並沒有成爲現實。甚至西北三位一體中的兩大主力，張學良和楊虎城所力圖保存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竟也隨著他們的統帥被拘與放逐而成爲中國現代史上一場重大歷史悲劇的扮演者。可以想見，不論是就張學良他們最初所追求的保存自身力量的動機，還是就他們當初所期盼的革命或政治變革的目標而言，西安事變所留給歷史的，無論如何都只能說是一次失敗的記錄。

但是，柳暗花明。西安事變在另外一層意義上卻可以說是成功的。這就是兵諫。儘管從我們已經看到的歷史事實，從張學良革命的動機與意願來看，西安事變嚴格說來不應當簡單地看成什麼兵諫。可是，從事變所取得的結果而言，這一事變確實也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兵諫。

兵者武力也，諫者勸說也。以武力勸說者何？改組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否。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否。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確實遵行總理遺囑？也是否。在西安事變時張、楊所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中，有哪些是張學良在過去向蔣進言、哭諫甚或諍諫時曾經一再提出過的主張呢？確切地說，也只有兩條與前此的進言內容相近罷了，這就是停止一切內戰，與釋放被捕之上海愛國領袖。遍查張學良此前之各種言論，與事後之回憶，均未見張曾提出過諸如改組政府之類激進的政治主張。何以八項政治主張過去大多均未曾提出過？那是因爲，這些主張多半也是共產黨人和左派團體的主張，提出這樣的主張，必被視爲共產黨的同路人無疑。況且，這樣的政治主張，多半也不是靠簡單地勸說一個蔣介

石就能夠實現的。張學良過去主要進言、哭諫或諍諫的是什麼？概括言之，其實也只是兩條，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容共。顯而易見，如果僅僅是爲了實現抗日與容共的目的，八項政治主張或均可束之高閣，因爲八項政治主張中，沒有一條是直接提及抗日與容共要求的。可見張學良等人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還並不僅僅在於要求抗日與容共，他們明顯地還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即試圖根本變革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架構與政治制度，來一次政治的革命和解放[119]。毫無疑問，作爲西安事變政治目標的這八項政治要求，大都未能實現。但從另一個方面，即如果我們把這次事變的最終結果同張學良過去進言和諍諫相聯繫的話，那麼，西安事變又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爲不論張學良、楊虎城最初發動事變時的主觀願望如何，事變畢竟通過一種兵諫的形式，促成了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放棄和大規模內戰的停止，進而直接推動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抗日與容共政策的形成。

由上可知，西安事變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與紅軍。正是因爲這場事變的發生，蔣介石最終停止了對紅軍的大規模軍事進攻，放棄了武力消滅紅軍的打算，改取了政治解決的作法，因而使得國共兩黨在內戰十年之後，終於得以在不長的時間裡達成了政治上的妥協。正因爲如此，共產黨人一直對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懷有一種特殊的尊重與感激之情。毛澤東所謂，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就包含著這層意思。

甚至，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內戰的終止，以及蔣介石攘外安內政策的根本取消，也促成了中國國內的團結與統一，加速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它對蔣介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下面這段評語頗有些說服力。唐先生講：「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眞是表現得刻骨銘心，爲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眞如日中天。……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統一，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臺上將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120]。

當然，西安事變不論在其醞釀與處理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著值得後人檢討的內容，事變本身的發生與和平解決都可以說是中共統戰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十年之後，共產黨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對手中找到了眞正的同盟者。周恩來曾經說過：通過西安事變，交了兩個朋友。這或者可以說是中共與張、楊關係發展變化的一種眞實寫照。反過來大概也是一樣，楊虎城不用說了，西安事變的結果消除了存在於他和中共之間的幾乎一切誤解。即使是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難有自由可言的張學良，看來也有同樣的感觸。他尤爲感動的是，即使在東北軍幾乎已經將近瓦解的情況下，中共仍舊能夠像朋友那樣幫助維持他魂繫夢牽的東北軍。在二月十七日張學良通過何柱國帶給周恩來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充滿著感激和希望繼續得到中共幫助的感情。張學良明確說：柱國兄來說，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維此西北危局，猶對東北軍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爲欽佩。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爲向諸同人致敬意。

「西望雲天，不勝依依」。這大概是張學良被軟禁後給中共方面的最後一封信了。張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無「密便」可尋，雙方自此再無往來。但不管以後張學良曾經怎樣認識他所做過的這一切，其在內心深處，始終還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個朋友[121]。

注釋

❶ 張培森前引文。

❷ 〈洛、毛致周、博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❸ 參見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 213-221 頁。

❹ 前引李允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報告。

❺ 蔣所記述宋子文三次談話，加起來不過五句，即「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擊中數槍，已傷重殞命」；「子文……謂：『門外有人竊聽不宜多談，唯京中軍事計劃與兄正同也』」；「子文強慰余曰：『後日當再來陝視兄』」；「子文言：『余來無妨，彼等對余之意尚不惡也』。既出，忽復入，重言曰：『余後日必再來視兄』。」

❻ 〈周致洛、毛、博、朱、張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❼ 照《西安半月記》中所記，宋子文始終是對蔣言聽計從，從未有過任何個人見解的，勸蔣讓步之說更毫無從談起。

❽ 宋子文只是到了一九四〇年才因蔣急需能夠打通美國政界和商界上層的人才，以獲得美國政府的貸款，才被蔣授以私人代表的身分派駐到華盛頓去，算是獲得了一份較重要的職位。但也僅僅是一個說客而已，並無參與決策之權。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宋子文才再度被授以部長之職，成爲多少可以參與些決策工作的外交部長。

❾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❿ 〈周恩來關於與宋子文談判情況的電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 72 頁。

⓫ 同上注，第 70 頁。

⓬ 同上注。

⓭ 同上注。

⓮ 同上注。

⓯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⓰ 不論張學良在事變期間與蔣交涉採取何種談話策略，也不論蔣介石事後所記談話內容有多少遺漏和修飾，從《西安半月記》中仍可看出張堅持要蔣承認其政治要求並以此爲釋蔣之條件的初衷始終未變。如蔣記十二日當天張之談話，即明確提出：「此間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數人共同之主張，余今發動此舉，當交人民公斷，倘國民贊同余等之主張，則可證明余等乃代表全國之公意，委員長即可明余之主張爲不謬，請委員長退休，由我來幹。」張並明言，其此次行動並非叛變，而爲革命。十四日張又謂：「此事殊不簡單，既有多人參與，一切須取決於衆議，且我等已發通電陳述主張八條，總需容納數事，庶我等此舉不致全無意義」。十九日張又言：「現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條件，最好請委員長加以考慮，擇其可行者先允實行幾條，俾易於解決」。二十日，張又謂，乘子文在此之機會，商定實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

⓱ 〈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⓲ 參見《西安事變簡史》，第 91 頁；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第 161 頁。

⓳ 蔣介石十二月十七日曾有手令由蔣鼎文轉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進攻和轟炸三天，即以十七日至十九日三天爲限停止進攻和轟炸。後因宋子文二十日赴西安調處，宋美齡堅持展期三日。至二十二日，宋美齡再赴西安，進攻自然再度展期，據宋美齡告訴張學良，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爲停止進攻最後一天。因宋美齡、宋子文、蔣鼎文等這時均在西安，南京內部主和力量大弱，此時確實非常關鍵，因再無人能夠阻止南京發動進攻了。參見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

⓴ 張的這種個性此前已經在他對閻錫山的態度中有所顯露。閻錫山前曾與張學良有過聯俄聯共，抗日援綏之種種秘密商洽，也曾與張於共同諫蔣失敗後大發感慨，有要張考慮日後訴諸行動之議，事變發生後閻卻態度大變，對張大加指責，同時打算出面調停。張爲此曾頗爲不滿，明確表示：「我決不讓老閻

做這一票買賣」。參見李金洲著:《西安事變親歷記》, 第 40 頁。

㉑ 〈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㉒ 〈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在這裡, 關於周恩來所報告的這次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以及周恩來見蔣介石的時間, 一般史書上均認爲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事。如《西安事變簡史》、張魁堂《張學良傳》、周毅等《東北軍史》等均稱: 周恩來等與宋氏兄妹的談判日期是在二十四日上午, 見蔣是二十四日晚上, 並說是由宋氏兄妹陪同去的。但這種說法看來很値得懷疑。首先, 根據張學良的說法, 已知陪同周去見蔣者, 實際應爲張學良, 而非宋氏兄妹。其次, 周報告與兩宋談判情況的電報是二十五日晚七時發出的, 其中並沒有一個字提到他所報告的這次談判是前一天上午發生的。而尤其應當注意的是, 周恩來自到西安之後, 每天一般都有幾封電報向中共中央報告有關情況, 從早到晚, 有事必報, 沒有一次重要談判、談話和有關的決定不是當天並且是事過不久即報告中共中央的。何以這次二十四日上午的談判結果、二十四日晚上周恩來見蔣這樣一些幾乎是最重要的情況, 周恩來要拖到第二天蔣介石走後的晚上七點鐘才報告中共中央? 何況, 如果二十四日白天眞的有過與兩宋的談判, 爲什麼二十四日晚七時半周恩來只報告了蔣介石答覆張學良對於六項條件的承諾, 卻不報告當天上午已經完成的內容大致相同的談判情況呢? 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因此, 依筆者之見, 周恩來二十五日晚七時報告的與兩宋的這次談判, 實際上是在二十五日上午進行的。而從周恩來二十五日晚電報報告的順序判斷, 周之見蔣似應在談判之後, 故此判斷周見蔣也是在二十五日, 即在談判結束之後。

㉓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㉔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㉕ 〈張學良接見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記者的談話〉, 一九九〇年六~八月;〈張學良答美國之音記者問〉,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張學良文集》, 第二冊, 第

1166, 1188 頁。

㉖ 關於周恩來見蔣的情況, 王禹廷在《細說西安事變》一書中明確認爲有兩次, 即相信蔣夫人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所記述的二十三日與二十四日兩次談話「實際上是蔣先生和她共同接見的」, 她文中所記自己對周說的那些話, 多半也是蔣先生說的。周恩來見蔣時蔣夫人在場, 這或者可以想像。但關於周恩來兩次見蔣之說, 則純屬推斷, 不僅宋美齡回憶中明確否定二十三日周與之談話時蔣尙不願見, 而且周恩來亦無任何報告提及二十三日見蔣之事。參見前引王禹廷書, 第 437-438 頁; 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

㉗ 張學良在蔣介石去世後曾送一輓聯, 上聯是「關懷之殷, 有如骨肉」; 下聯是「政見之爭, 宛若仇讎」。此聯說明了張幾十年裡同蔣介石之間的複雜感情關係。

㉘ 見前引《西安事變簡史》, 第 93-94 頁; 參見〈毛澤東致彭、任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㉙ 關於張學良爲放蔣事與楊虎城發生爭論的情況, 在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 以及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中均有所描述。但從周恩來二十三日晚十一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可知, 楊虎城在二十三日夜裡, 甚至很可能在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覆電到來之前, 都並不反對張學良所提出的只要兩宋擔保即可放蔣的提議。蔣介石及宋美齡均記述說: 至二十四日夜間始聞楊虎城有不主張送蔣回京之議, 當時西安方面內部激烈爭論, 楊「與張爭執幾決裂」。考慮到二十四日夜中共中央之來電, 此說或屬可信。

㉚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㉛ 〈毛澤東致彭、任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㉜ 〈恩來、博古致毛並轉中央書記處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㉝ 張學良:〈一九三七年元旦告東北將士書〉,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張學良文集》, 第二冊, 第 1113-1114 頁。

㉞ 張學良在十六日之前尙無任何準備在蔣接受抗日主張後「束身歸罪」的說法。自蔣夢麟等六校長來電之後，張第一次在十六日下午給馮玉祥的電報中提出此說，以後幾天裡接連作此表示。可知此後張已有此準備與決心。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081，1087-1088 頁。

㉟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06 頁。

㊱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06 頁。

㊲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10-1111 頁。

㊳〈張學良致楊虎城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07 頁。

㊴ 轉見〈周、博致彭、任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見〈宋子文致楊虎城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轉見前引米暫沈書，第 175 頁。信稱：「今日漢卿兄恪守國府明令，經過軍法會審審判手續，並即由委座具呈請示國府特赦。此項手續五日內可辦竣。現移居庸之兄寓內，弟敢保證，漢兄絕無任何危險，並請轉達諸同志千萬勿生誤會，靜待漢兄於下月五日回陝」。

㊵ 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12-1114 頁。

㊶〈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㊷〈周恩來、博古致毛澤東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㊸ 見《解放日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另外十二月二十九日楊又曾以十七路軍總指揮部名義致函陝西各縣長，內中也提到此六項內容，文字相同。見劉永端等編：《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 113 頁。

㊹ 毛澤東：〈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 238 頁。毛澤東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會議報告中發言曾將此概括爲：㈠停止內戰，撤後。㈡改組南京政府，行政院長宋慶齡，副院長孔祥熙，參加三個抗日領袖當部長，沈鈞儒、章乃器等，使政學系、汪精衛塌臺。㈢分批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㈣三個月召集救國會議。㈤停止進攻紅軍，抗日時改番號，統一指揮。㈥聯合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

㊺ 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並見《陳布雷回憶錄》，轉見米暫沈：《楊虎城將軍傳》，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 172 頁。

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轉見《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這裡的譯文與當年電報的譯文略有不同，這裡的譯文是：「不應就蔣介石在西安的許諾大發議論」。毛澤東在一月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也承認，事變後即把蔣在西安承諾的條件加以宣布，是不對的，並且是幼稚的。）

㊼〈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卷，第 141-142 頁。

㊽ 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㊾〈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來選集》，上卷，第 74-75 頁。

㊿〈周、博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1 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769 頁。

52 參見前引宋毅軍文。

53〈楊虎城致宋子文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前引劉永端書，第133-134頁；〈楊虎城致嚴莊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中國第二檔案館等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 91 頁。（據《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編者分析，此電日期當爲六日，而非四日）

54〈周、博致毛、洛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前引宋毅軍文。

55〈洛甫、澤東致周、博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56〈許靜芝致孔祥熙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90 頁。

57 戴笠一月七日攔蔣信見張後曾有信給蔣介石，稱張「奉讀鈞座書後，態度轉好，語亦和平」。可知張此前情緒態度相當不滿。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05 頁。

58 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05 頁。

59 參見〈蔣介石致張學良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張學良致楊虎城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張學良致東北軍各將領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17-1119 頁。

60 〈張學良致蔣介石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張學良意見書〉，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17-1119 頁。

61 〈蔣介石修訂的解決陝事之方案〉，一九三七年一月，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97 頁。

62 前引《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773 頁。

63 參見前引宋毅軍文。

64 〈毛澤東致彭、任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 777 頁。

65 〈蔣介石關於函復楊虎城陽電內容要點致顧祝同密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07 頁。

66 參見《周恩來年譜》，第 344 頁。

67 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368 頁。

68 同上注，第 368-369 頁。在這裡毛澤東提到的西安協定爲以下六條：㈠停戰撤兵。㈡初步改組南京政府，三個月後徹底改組。㈢釋放政治犯，保證民主權利。㈣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劃定防地，供給軍費，蘇區照舊，共黨公開。㈤聯俄並與英美合作。㈥西北交張學良處理。

69 〈周恩來致蔣介石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70 〈蔣介石致楊虎城書〉，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10-111 頁。

71 轉見〈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該文件在《文獻和研究》上公布時根據一有錯誤之抄件，將「痛哭」排成「痛器」，實不當也。

72 同上注。並見楊虎城派員呈送解決陝事方案致蔣介石函件等，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98-99 頁。

73 〈楊虎城致蔣介石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前引《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第 160-161 頁。

74 〈陳布雷關於蔣介石授意發動文教界聲討張學良罪狀致葉楚傖密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15-116 頁。

75 〈張學良致楊虎城等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張學良致王以哲、何柱國等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120-1121 頁。

76 〈蔣介石致楊虎城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20 頁。

77 〈周恩來、博古致洛甫、毛澤東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78 〈楊虎城、于學忠通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26 頁。

79 〈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80 〈洛、毛致周、博電〉，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43 頁。

81 〈張學良致楊虎城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22 頁。

82 〈蔣介石致楊虎城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33-136 頁。

83 前引《失去的機會》，第 30 頁。

(84) 〈周恩來、博古致毛澤東、洛甫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85) 〈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86) 〈毛澤東、周恩來致漢年同志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370-371 頁。

(87) 〈毛澤東、周恩來致漢年同志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 372 頁。

(88) 根據蔣介石一月二十二日的指示，顧祝同對西安方面條件的腹案與上述結果略有不同。原案為：一、中央軍於本月二十八日以前暫駐原防地。二、東北軍、十七路軍須於本月二十八日以前撤至涇陽、咸陽、雩縣以西地區；徐海東、陳光瑞在陝南各部應同時一律撤至陝北。二月五日以前，中央軍進至咸陽至寶鷄一線，接防完畢。三、中央軍定本月二十九日進駐西安與咸陽之線。四、東北軍可酌留一師約三團兵力暫駐西蘭公路咸陽至邠州一段。五、十七路軍可酌留一團至兩團兵力駐西安附近，但其駐地由行營指定，並於中央軍到達西安時，十七路軍駐西安部隊暫時集結於王曲與新城二地，以免誤會。六、張副司令之出處與名義，須等西北問題完全解決時另定之。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41-142 頁。

(89) 關於雙方談判情況，可參見何應欽一月二十五日關於顧祝同與米春霖等會談的兩次電話報告，與蔣介石當天的指示要點。內容與米春霖向西安報告的情況略有出入。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選編》，第 145-147 頁。

(90) 參見張培森前引文。

(91) 〈張冲致毛、周先生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92) 〈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各同志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93) 前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94) 前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 149-150 頁。

(95) 同注[illegible]，第 150 頁。

(96) 〈張學良致前方將領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同注[illegible]，第150-151頁。

(97) 同注[illegible]，第 152 頁。

(98) 〈周、博致毛、朱、張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參見張培森前引文。

(99) 〈毛澤東致漢年同志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48 頁。

(100) 〈周恩來致潘漢年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前引《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101) 〈張學良致東北軍各將領函〉，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同注[illegible]，第153頁。

(102) 〈洛甫致毛並告彭、任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103) 〈洛甫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同注(100)。

(104) 〈毛澤東致周、博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前引《毛澤東年譜》（上），第 649 頁。

(105) 〈周恩來等致毛澤東等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等致周恩來等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同注(100)。

(106) 何應欽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關於陝西問題解決經過的報告中稱，于學忠三十一日下午飛到西安，與事實似略有差異。因周恩來當日中午即有電報說明于學忠已經到西安，並與楊見面。後又有電稱「于學忠今早到」。

(107) 關於于學忠秘密要求南京代其運送家眷離開蘭州，以便大膽主和並行使職權的情況，可參見陳端致孔祥熙密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等），同注[illegible]，第 139-140 頁。

(108) 同注[illegible]，第 161-162 頁。

(109) 〈周恩來、博古致毛澤東等電〉，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同注(100)。

(110) 周恩來二月一日電報介紹三十一日晚高層會議討論情況時曾說明，在會議上「王以哲投機主戰」。

(111) 前引《周恩來年譜》，第 349 頁。

112 同上注。

113 〈周恩來、博古致彭德懷、任弼時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同注100。

114 〈周恩來致洛甫、毛澤東電〉，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同注100。

115 關於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對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原則界限，有著明確的提示與規定。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就曾明確規定：中共的對南京的妥協必須堅持如下條件：即必須保存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分，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並且只是在對日武裝作戰的情況下，才可能同意成立以蔣介石爲總司令的統一的總司令，在一定的戰線上爲完成總的對日作戰計劃而服從統一指揮。同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即西安事變之後不久，共產國際又電報指示，提出了中共可以放棄蘇維埃制度以及普遍的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的作法，但當中共中央據此起草了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公開信，提出願意放棄蘇維埃政策，改變紅軍番號，停止武裝暴動政策和沒收地主土地的作法之後，共產國際甚至對此一度感到驚訝。他們在二月五日的電報中特別提出：黨、紅軍和群衆對於你們這種徹底轉變政策的辦法，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呢？他們斷言，關於改變蘇維埃政策等問題，還需要仔細加以討論。有關這些情況可以參見拙作：〈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蔣抗日」方針的關係問題〉，《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116 從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到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北三位一體陷於軍事政治危機這段時間裡，中共中央對西路軍究竟向西接通新疆，還是向東回援西北，始終比較猶豫，命令也多次改變。但總的傾向還是要西路軍暫時以東援爲主。蘇聯方面對此顯然很不理解，曾幾次來電詢問西路軍爲何要向回走？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蘇聯軍方並幾次來電談到希望西路軍仍照原定方針盡快接通新疆，表示他們已決定擴大援助紅軍的軍事物資規模。中心檔案，全宗號 495，目錄號 74，卷宗號 281，285。

117 根據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幾次電報提到的數字合計起來，總數已達到一百八十萬美元左右。

118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第二冊，第 36-38 頁。

119 西安事變後，《西京日報》改《解放日報》也反映了這樣一種革命情緒。

120 轉見郭冠英著：《張學良在臺灣》，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版，第 40 頁。

121 在西安事變過去若干年之後，可以看到的張學良表示悔過的文字，只有一件，這就是〈西安事變懺悔錄〉。只是在這裡，我們才可以看到張學良對自己的所作所爲後悔莫及，並且對共產黨痛加指責。但是，這畢竟是在張學良失去自由期間的文字，而且又是經過外人整理後的文字。從張恢復自由之後屢次發表談話，強調自己對發動西安事變「沒什麼後悔的」這一情況看，可知張學良當年的這次「懺悔」看來未必盡是由衷之言。同樣，張學良對共產黨人的觀感也未必是〈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所記述的那個樣子。張自由後明確講，他對周恩來「非常佩服」，與周「感情極好」。周恩來不過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已，同周的感情極好自然也就說明他對中共領導人的整個印象也不錯。由此不難看出，在事變過去幾十年之後，張學良對周恩來，甚至對於中共本身的印象，同當年並無太大的區別。參見張學良：〈憶談東北軍二三事〉，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張學良：〈答美國之音記者問〉，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前引《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第 1185-1188 頁。

後　記

本書寫成後即請蔣永敬教授指教，蔣教授對本書頗加贊許，不僅極力推薦，且力主在臺北出版。但本書成稿前曾經與廣西師大出版社約定，加入其「抗日戰爭史叢書」，故初時仍想首先出大陸版。筆者所以一改初衷，實出偶然。只因本書交稿之日，意外獲知張魁堂先生早已完成同一題材著作一部，也商准加入叢書並已送審通過，進入排版印刷過程。考慮到同一叢書內出現兩部題材相同之著作，廣西師大出版社負責人士對續出本書態度猶豫，致使此書寫成後雖很快通過出版審查，並得到審稿人的高度評價，卻被迫擱置近半年時間。此後，因礙於前約，廣西師大出版社仍決定出版本書，但確感諸多不便，筆者亦對本書出在張書後之銷路及效果有所顧慮。經蔣教授代爲聯繫，並獲張玉法教授的鼎力支持，筆者最終放棄在廣西首先出版本書的計劃，轉而加入「中國現代史叢書」，改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此中反覆，確屬無奈，謹此說明，以述遺憾之情。同時，筆者對蔣永敬教授和張玉法教授所給予的熱情幫助，更表示由衷的感謝。

參考書目

一、文獻資料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版，第九，十卷。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十，十一卷。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中央統戰部與中央檔案館合編，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一九八四年版。

《革命文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十四輯（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史料》，朱文原編，臺北國史館一九九三年版。

《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西安事變文電選》，西安事變研究會資料室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西安事變資料選輯》，西北大學歷史系等合編。

《西安事變資料選編》(1-2)，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編寫組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年版。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文件選編)，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中蘇外交文件選譯〉，李玉貞譯，《近代史資料》第79-80號。
《蘇聯眞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等編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蘇聯新發表的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文獻〉，馬貴凡譯，《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1-3期。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澤東文集》(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等一九九三年版。
《毛澤東年譜》(上、中、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等一九九三年版。
《周恩來選集》(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張聞天文集》(二)，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編，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張聞天選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張學良文集》，第二冊，畢萬聞主編，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 NHK 記者專訪錄》，管寧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劉永端、丁雍年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丹心素裹》(1-3)，吳長翼等編，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一九九〇年版。
《高崇民詩文選集》，高崇民詩文選集編委會編，瀋陽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二、回憶及親歷史料

〈西安事變懺悔錄〉，張學良，《明報月刊》第三卷第九期，一九六八年九月。
〈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陳立夫，《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一期。
《西安事變親歷記》，吳福章等編，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六十年歷史風雲紀實》，徐彬如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版。
《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西安事變親歷記》，李金洲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張學良和東北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

社一九七九年版。
《紅色中華散記》，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歷史的回顧》，徐向前著，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回憶張聞天》，回憶張聞天編輯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革命回憶錄》（1-20），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一九八七年版。
《革命史資料》（1-18），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一～一九八六年版。
《中共黨史資料》（1-4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一九九三年版。
《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我的回憶》（1-3），張國燾著，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一年版。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應德田著，一九八〇年版。
《西安事變內幕》（未刊稿），何柱國等，原件存全國政協。

三、報刊資料

《鬥爭》（中共中央西北局編），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
《救國時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機關報之一），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在巴黎出版。
《先鋒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機關報之二），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在美國出版。
《紅色中華》（中共中央機關報），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解放日報》（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九三七年一月。
《人文雜誌》，一九九〇年第一期。
《文獻和研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一九八四～一九八七年。

《黨的文獻》，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合編，一九八七～一九九四年。
《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編，一九八〇～一九八七年。
《中共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編，一九八八～一九九三年。
《黨史研究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資料編輯部編，一九七九～一九九三年。
《黨史資料通訊》，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九八七年。
《明報月刊》（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號。
《傳記文學》（臺北），第三十一，三十九，五十九，六十，六十三卷。

四、著作

《周恩來傳》，金冲及主編，人民出版社等一九八九年版。
《張聞天傳》，張聞天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彭德懷傳》，彭德懷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中共在東北軍工作概述》（徵求意見稿），一九八六年，原件存全國政協。
《紅軍西征在寧夏資料選編》，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等編，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印。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編寫組編，軍事學院圖書資料館，一九八三年。
《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軍

事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楊奎松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楊奎松著，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周文琪編，中央黨校，一九八五年。

《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楊雲若、楊奎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西安事變簡史》，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編寫組著，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西安事變紀實》，申伯純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西安事變史實》，李雲峰著，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李雲漢著，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張學良傳》，張魁堂著，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東北軍史》，張德良、周毅著，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張學良生涯論集》，遠方編，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張學良在一九三六》，遠方編，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張學良將軍傳略》，武育文等著，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張學良的政治生涯》，傅虹霖著，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西安事變：中國現代歷史的轉折點》，吳天威著，美國密執根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張學良研究》，李敖編，臺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蔣介石與張學良秘聞》，李敖編，臺北李敖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張學良評傳》，司馬桑敦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楊虎城將軍傳》，米暫沈著，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宋子文評傳》，吳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中國的第一幕——西安事變秘聞》，詹姆斯·門羅·貝特蘭著，牛玉林譯，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端納口述，符致興編譯，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關於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問題〉，丁雍年，《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

〈有關西安事變幾項疑義的探討〉，李雲漢，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十七日。

〈張聞天與西安事變〉，《黨的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